

چوڭگونىڭ چىڭارا سىياستى

中國邊政

中原邊政研究

China Border Area Studies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六月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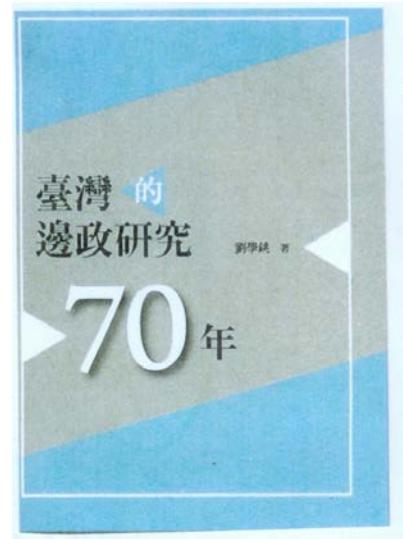
目 錄

李唐族源蠡測	劉學銚	1
被忽略的蒙古原鄉：保育與持續發展	甘德星	35
《游牧帝國的誕生》（翻譯文）	朱振宏	53
西藏近代史研究值得關注的譯作	韓敬山	71
滿州皇帝的漢化與大一統中國觀：乾隆五十三年御製	甘德星	85
台灣滿漢文碑的“碑石性研究”		
熱振呼圖克圖之生與死	孟鴻	133
奴兒哈赤名字裡的東北話印記	張華克	171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卅六）	華 華	213
稿 約		219

本協會前秘書長劉學銚教授（蒙藏委員會前委員兼主任秘書）新著《台灣的邊政研究 70 年》一書已由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出版，電話 02-2949-0172。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由多民族所共建而成，基此，邊疆地區各少數民族的歷史、語文、地理、習俗、宗教信仰、傳統政治制度……無一不是中國歷史、政治的一部分。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播遷來臺近七十年，有關臺灣的邊政研究及蒙藏委員會之重要措施與裁撤始末，極有必要加以「盤點」。作者將此書分上、下兩卷，上卷敘述近七十年來臺灣的邊政研究，包括研究人員及新疆維吾爾、哈薩克民族、蒙古族、藏族來臺同胞，政府及民間研究機構以及研究成果。下卷則專述蒙藏委員會，包括設立意義與沿革、播遷來台初期措施、歷任委員長任內重要措施、裁撤之經過，與鮮為人知之事件，供後人了解七十年來，臺灣在邊政研究與邊政措施並未缺席。



本協會前秘書長劉學銚所著《歷史原來是這樣》由台北大地出版社出版，電話 02-2627-7749。

歷史是什麼？廣義是過去發生的事，狹義是經過後人篩選過濾的事。現代人要了解歷史必須透過先人留下來的各種史書，歷史是人寫的，寫歷史的史官總會有既定的政治立場，很多主流的歷史說法也不一定是歷史真正的原貌。還原歷史真相，從不同的角度看歷史，也許會發現，我們曾經以為很熟悉的歷史會是如此的陌生。

本書包含以下十個主題：

- 一、北魏後宮多高句麗女子。
- 二、花木蘭其人、其詩、其事。
- 三、掀開五胡十六國序幕的匈奴劉淵。
- 四、北魏洛陽的靈異事件與西域胡僧。
- 五、幾個末代皇帝事蹟。
- 六、成吉思汗的霸業、容貌與陵寢。
- 七、隋、唐先世多胡化。
- 八、五世達賴喇嘛、噶爾丹與中俄尼布楚條約。
- 九、匈牙利是匈奴的後裔？
- 十、碑官野史中的武則天。



作者根據史料旁徵博引、交叉比對，加上本身專業的經驗與研究的修為，引領大家進入塵封已久的歷史禁地，窺探古代那些不為人知的傳奇軼事，帶給你聞所未聞的閱讀享受，看得過癮、讀得暢快—歷史原來是這樣。

李唐族源蠡測

劉學銚
前文化大學兼任教授

摘要

歷來對大唐帝國建國者李淵之族源有所懷疑，疑其非中原華夏炎黃之胄，乃北方游牧胡族之裔，千餘年來仍無定論，近代史學大師陳寅恪也僅稱：「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統雜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這至少說李唐族源有一半是胡族血胤，陳寅恪也指出李唐並非族出隴西成紀李鳩之後，而是趙郡李氏之破落戶，或鄰邑廣阿庶姓李氏之假冒貨。唐修《晉書》時纂改了李鳩的世系，把李淵的先人摻入李鳩後人之中，於是千多年來世人多認為李唐一族系出隴西成紀李氏，其實非也，至於李唐族源也是千多年來未斷之公案，本文擬就此一問題加以蠡測。

關鍵詞：隴西成紀李氏、敕勒、李虎、李淵

一、隴西成紀李氏

首先要對「隴西」一詞酌加說明，因甘肅簡稱「隴」，因此直覺反應隴西乃甘肅西部，其實非也，按在甘肅東北、陝西（簡稱秦）西南有一山脈，稱隴山，「隴西」係指隴山之西，即甘肅之東北部，古代北朝樂府或唐詩中，吟咏隴山者，為數不少，隴山雖不如五嶽之有名，但吟咏隴山之文學作品，則不少於五嶽；「隴西」一詞已酌述如上，至於成紀，西漢時始置縣，屬天水郡（今甘肅省天水市）唐宋時為秦州治所，元、明時併入秦州，故城在今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北，東距陝西省西安市直線距離約二百四十公里，實位於甘肅省東部，至於甘肅省西部（指蘭州以西），習稱「河西」。

隴西李氏，在中國歷史上是名門望族，時至今日，幾乎所有李姓人家的堂號都是「隴西堂」，歷史上許多李姓賢君名臣，都自稱族出隴西。東晉時在河西建立「涼」政權（史稱西涼，為「五胡十六國」之一，其實「五胡十六國」一詞並不妥適，其時命王稱帝者，既不止五胡，指匈奴、羯、鮮卑、氐、羌五支胡族，尚有瀘水胡、稽胡等，建元立號者也不止十六個），其中李暠，是漢人。李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關於其籍貫，有兩種不同說法，《晉書》卷八七《李玄盛傳》稱其為隴西成紀人；但《魏書》卷九九《李暠傳》、《太平御覽》卷一二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則稱其為「隴西狄道人」¹，「狄道」其地約當今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北京地圖出版社，1982年，頁7~8），無論成紀或狄道都在今甘肅省東部。

據《晉書·李玄盛傳》稱：

「（涼）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眾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孝奔喪，因葬於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姓。」

（見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晉書》頁2257）

此所以崔鴻《十六國春秋》稱李暠為狄道人之原由，由上引史料可知創建西涼政權的李暠，自稱是漢李廣的十六世孫，按當時尚無譜牒之學，實在無從證實李暠是否確係李廣十六世孫，現在姑且以《晉書》所說：李暠是漢代李廣之十六世孫，且看《史記》卷一百九如何記李廣一家：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²，徙成紀。……廣子三人，曰當

¹ 《太平御覽》係類書，北宋太宗趙光義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命李昉等十四人據北齊人所輯《修文殿御覽》，唐人所輯《文思博要》及其他類書編撰，歷時七年成書。共一千卷，分五十五門，初稱《太平編類》，後改今名，省稱《御覽》。此書徵引材料豐富，蒐羅許多古籍佚文，保存許多原始資料。《十六國春秋》係崔鴻所撰。

² 槐里，西漢時為司棟部，其地當今陝西省咸陽市西南興平市，參看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秦、西漢、東漢時期》頁15~16，及2011年北京中國地圖出版

戶、椒、敢，為郎……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李氏陵遲衰微矣。」見《史記》標點本頁 2867～2876)

從上引《史記》所載，李廣一族最早乃槐里之人，後徙成紀，再徙狄道，且李廣一族自李陵降匈奴後，李氏一族已「陵遲衰微」，如何還有李敢以後十四代之記載？西涼李暠自稱是李廣之十六世孫，其可靠性應存疑。及至唐代，建國者李淵自認是西涼李暠之胄，就必須將自李廣至李暠之世係加以補齊，甚至更向上推到傳說時代之顓頊高陽氏，如《新唐書》卷七十《宗室世系上》、唐、李延壽之《北史》卷一〇〇《序傳》，就將隴西李氏一族的世系向上推到傳說時代以至李暠，茲將其所舖陳之譜系以表列方式呈現如次：

顓頊高陽氏——大業——女華（《元和姓纂》作“女峰”）——
皋陶（廢堅）——益——思成（以官命族為李氏）——（商
紂射時）理徵——將寅（遠難于伊侯之虛，食木子得全，逐改理
為李氏）——昌祖——彤德——口——口——碩宗——（五世
孫）——耳（聃·即老子）——宗——岡——兌———
躋——云

恪一洪——興族（汪）——曇——崇（隴西房）——
平燕

——辨——昭——璣（趙郡房）

——瑤——信——超——元曠

——仲翔——伯考——尚——廣——當戶——陵

——向（范陽房）——蔡

——敢——禹

——忠（積近房）

——丞公——先——長宗——君兄一本

——恣公———軒——降———

——恬（游口房）一潛（申公房）

——壅一倫（丹陽房）——蓋（安邑房）

————柔——弇——昶——嵩³

如果照上表所列，李嵩是顓頊高陽氏之後裔，則戰國時屈原曾自稱：「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⁴，則李嵩與屈原為同源共祖，但屈原係楚國人，是則兩者必有一個為假，甚至兩者均假，為誇耀已身系出名門，乃宣稱係古史名人之後，雖然這種自誇是古代貴胄之裔，其心理可以理解，但就史論事，仍然存疑。上表所列世系，雖經李唐「精心」杜撰，但如所周知，《史記》對李廣一族僅記載「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設若李信之前的譜系，確有可考者，司馬遷撰《史記》時，豈有不加載錄之理，因此吾人可知，上表所列自顓頊高陽氏至李信之數十代，應為李唐時代所杜撰；而上表所列自李敢（李廣之子）之子李禹以至李嵩之曾祖李柔之前十代，也應係李唐時所補列，其可信度很值得懷疑。

李嵩出身隴西成紀，應屬可信，不過諸胡列國時期（即一般文獻所稱的五胡十六國時期），隴西地區民族已經相當多元從「狄道」一詞，已可想見其地已是多民族混聚之處，因此胡、漢文化互相混融乃是必然之事，不過當時李嵩一族的譜系大部分都很詳實的記載下來。

李嵩，據史傳所載其祖為李弇（弇音掩，意為小而中寬之器物，如花瓶等是）曾任前涼張軌的武衛將軍、安世享侯，其父為李昶，幼有令名，早卒，李嵩為其遺腹子，史傳稱李嵩「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

³ 本表係採用周偉洲《魏晉南北朝時隴西李嵩一族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一文之表，該文刊載於《中國邊政》季刊 202 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2015 年六月，頁 2

⁴ 見屈原《楚辭》首句

尤善文藝」⁵，及長，頗習武藝，且誦孫吳兵法，由此可稱之為文武兼質之人。

李暠與後涼呂光的太史令郭饗（饗，音鈴，近仍）的同母異父弟宋繇，志同道合⁶，郭饗為西平人（西平，應為西郡，其地當令甘肅省金昌市西邊山丹縣一帶），精易學、善占卜，極受呂光所重；宋繇則是河西敦煌人宋配之後，為敦煌知名學者。呂光晚年政多繆誤，段業，沮渠蒙遜，禿髮烏孤等紛紛起而反抗呂光，其中以段業聲望最高，李暠、郭饗、宋繇都起而響應段業。後涼呂光龍飛二年（西元 397 年、東晉安帝司馬德宗隆安元年）段業在瀘水胡沮渠蒙遜等人支持下，自稱涼州牧、建康公，拜李暠為效穀令（其地在今甘肅省敦煌市東北安西一帶），一年後，敦煌護軍司馬馮翊人郭謙等人，推李暠為寧朔將軍、敦煌太守，李暠起初並未應允（政治人物一向善於偽示謙虛），稍後宋繇恰好從段業處回敦煌，又加以勸進，於是李暠乃同意任敦煌太守，並進號冠軍將軍，但仍稱藩於段業，段業既無力制裁李暠，乃稱李暠為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這裏所說的「護西胡校尉」，所謂「西胡」指西域胡人，而「胡」原為匈奴自稱之詞⁷，但中原華夏或漢朝之人，以其屢犯邊境，造成困擾，遂不以中性不帶貶義之「胡」稱之，而以讀者相近且帶有貶義「匈」稱之（匈、凶、兇音皆同），復再加以「奴」字，以示對其侵犯邊境之譴責，自西漢司馬遷之《史記》始，「匈奴」遂成為定稱，而且在東晉諸胡列國之時，「胡」乃專指匈奴而言，在匈奴之東的非華夏或漢人各民族，稱之為東胡（意為在胡之東邊），在匈奴之北者，稱北胡，在匈奴之西者，稱西胡，而西胡或作西域胡，所以段業任李暠領「護西胡校尉」，按當時的觀念，西出陽關便是西域，而陽關屬敦煌所轄，而當時敦煌郡境內有為數不少的西域胡人，因此，所謂「護西胡校尉」有兩種意義，其一為治理敦煌境內的西域胡人；其二段業為虛張聲勢表示廣大西域也在其統轄之下，而置「護西胡校尉」，無論含義為何，都證明李暠在敦煌已站穩腳跟。

⁵ 見《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

⁶ 見《晉書》，但今人趙向羣於其《五涼史探》一書頁 126 稱宋繇為李暠同母異父兄弟，有誤，該書為甘肅人民出版社於 1996 年出版

⁷ 匈奴抓鹿姑單于曾致漢廷稱：「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可見其自稱為「胡」，見標點本《漢書·匈奴傳》，頁 3780

西元 399 年，段業稱涼王，他的右衛將軍索嗣（索氏為敦煌大姓），想回敦煌為太守，遂在段業面前訴說李暠的壞話，段業原已懷疑李暠有二心，既經索嗣挑撥，即同意以索嗣取代李暠，於是索嗣興沖沖的帶五百騎從張掖西向敦煌，在離敦煌二十里時，派人先行入城向李暠傳話，要李暠出城迎接，李暠原想照辦，但效穀令（李暠前一個職位）張邈（邈，音秒，遙遠之意；或藐，輕視之意）等人出面勸止，張邈說：「呂氏政衰，段業閼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處一國之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拒之，可一戰而擒矣。」

宋繇也說：「大丈夫已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索）嗣，豈不為天下笑乎！大兄英資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李暠則回應說：「吾少無風雪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群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⁸現在既見敦煌士人擁載，於是乃派其二子及宋繇出城，將索嗣逐回張掖。

按之前李暠與索嗣交稱莫逆結為刎頸，因此對索嗣在段業面前說他小話，感到深痛惡絕，而段業身邊大將瀘水胡沮渠男成素來厭惡索嗣⁹，而段業又是心無定見。好聽小話者，遂殺了索嗣，可憐索嗣賣友求官不成，反而斷送了性命。

索嗣既已見殊，段業遂將敦煌的興涼、烏澤、晉昌等縣（都在今敦煌市之東）置為涼興郡，進李暠為持節、都督涼興以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國史傳統對創建政權或王朝者，總要來一段「靈異」傳說，用以彰顯其命王稱帝乃是「奉天承運」命中注定者，《晉書》對李暠也有如下一段記載：

「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跡見於小城。」

這一段文字等同說李暠的割地自雄是天命所歸。雖則如此，李暠畢竟不是河西人氏，當時敦煌位處中原西北邊垂，往西則為西域，因此具有特殊地理意義，當時中原喪亂，各胡族紛紛起而建立漢魏式政權，執政者既為胡族，在施政上對中原漢魏之人（時「漢人」、「漢子」均為帶有貶義

⁸ 以上對話均見《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

⁹ 瀘水胡沮渠部一般文獻均稱將之歸為匈奴，實則非也，詳情可參見劉學銚《五胡史論》台北南天書局，2001 年，頁 66~73

之稱謂）不免有歧視之作為，因此中原諸多飽學之士，紛紛避禍河西，敦煌地區反而成為中華文化發達地區，這種現象向者少有人提及，筆者不惴簡陋，曾撰有《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該書由台北知書房出版社，2005年）一書，對於此一部分，或有參考價值。

李暠雖得敦煌在地右族的擁戴，但畢竟不是在地望族，為求政通，必得從人和著手，因此政府中重要職位，都任命河隴豪門出任，如李暠於西元400年（歲次庚子、東晉安帝司馬德宗隆安四年、南涼禿髮利鹿孤建和元年、南燕慕容德建平元年），李暠所任命之官員中，河西、敦煌著姓宋、索、陰、令狐、張等家族，占相當多數，如以索仙為長史（本為秦時所置，歷代沿之，相當於丞相府之總管，詳見徐連達《中國歷代官制大詞典》，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以下皆同）、索承明為牧府右司馬（似相當於牧官都尉，此官係三國時曹魏所置），索訓為威遠將軍（係雜號將軍，三國魏、吳均置有此官），西平太守，索慈為廣武太守、索術為武興太守，重用索氏家族，正可以沖淡索嗣被殺之怨懟，這一套攏絡羈縻的作法，自然得到敦煌、河西土人的好感。人和而後自然政通。

同年（西元400年）底，北涼晉昌太守唐繇叛段業（晉昌在敦煌東約一百公里處），轉而支持李暠，不僅如此，唐繇更傳檄敦煌、酒泉、晉昌、涼興、建康（在酒泉東南部）等張掖以西各郡，共推李暠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西涼政權由是建立，也是國史上第一個由李氏所建立的政權，李氏成為產生帝王的姓氏。由是凡是李姓者，幾乎都自稱系出隴西李氏，許多邊疆少數民族也改姓李氏，自李淵創建唐帝國後，對若干邊族領袖都賜姓李氏，李氏遂成為中國大姓，而這些李姓人家的堂號，十之八九都是「隴西堂」，隴西成紀李氏遂成中國著姓。

二、李暠後人與李淵先世

李唐一族既自認是西涼武昭王李暠之後裔，因此就必須要對李暠的後人與李淵的先世作一連結，不僅如此，還要將李暠的先世與李廣的後人加以連結，這項工程在時間跨度上長達五、六百年，是相當艱巨的一項工作，何況《史記·李廣傳》曾明載：「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當戶

有遺腹子名陵，…李氏陵遲衰微矣」，可見李陵之後，李氏一族已是衰微的破落戶，很難再有完整的族譜傳世，要把李暉的先人往上推十六世，其難度可想而知，唯其譜系不明，也就有了操作空間。

李唐建立之初，雖自稱遠祖李耳（聃，即老子，道教尊之為教主）、十六代後為李廣、再十六代為李暉，為隴西右姓李氏，但民間對此似乎並不相信，長安流傳李唐一族系出北方胡族，由於李唐皇室自稱係李耳之後裔，故李唐崇尚道教，唐太宗李世民（627～649 年在位）貞觀十三年（639 年），有道士檢舉佛僧法琳（572～640 年），河南穎川人（一說襄陽人）俗姓陳，為維護佛法，曾多次與道士爭辯，時人稱之為護法菩薩更為徹底批駁道教，曾還俗而為道士，精研道家經典，找出破綻之處，然後再度出家，以便與道教更進一步爭辯，著有《破邪論》，《辯正論》，在《辯正論》中對被道教尊為始祖之老子李耳有所批評，被道士秦世英向唐太宗檢舉，指稱法琳詆毀李唐遠祖李耳，有謗上之罪，唐太宗由是大怒，下詔加以逮捕，事在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 年），遂遣刑部尚書劉德威、禮部尚書令狐德芬、待御史韋悰、司空毛明素等加以審問，法琳辭氣不屈半個多月後，劉德威等只得據實上奏，唐太宗乃親自審詢，據唐·釋彥悰於其所撰《法琳別傳》一書所載，法琳作如回答：

「竊以拓拔元魏，北代神君達闐達（闐，音都）系陰山，
貴種經云，以金易鉅石（鉅，音偷，意為黃色鐵礦，同鎰），
如舍寶女與婢女通、陛下即其人也，棄北代而認隴西，陛下即
其事也。」¹⁰

這段話的意思簡單的說，就是指唐太宗不是隴西，李氏之後，而是代北神君達闐達之後，這下唐太宗始知民間對李唐族出北方胡族，早已流傳，為免「流言」在長安繼續流傳，於是將法琳以「雖毀謗宗祖（按唐太宗於其貞觀十一年宣稱李唐為李耳之後）」。非無典據，特可赦其極犯，徙往益都為僧（益都當成四川省成都市），法琳於貞觀十四年七月死於赴成都之途中。可見在唐初社會對李唐之族源已有懷疑。

為徹底根除流言，唐太宗乃於其貞觀十八年（644 年）以原何法盛等

¹⁰ 《法琳別傳》中華電子佛典出版社，2018 年七月。

十八家所修之《晉史》未臻至善，乃命房玄齡，褚遂良等重撰《晉書》，命李淳風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敬播等考正類例，而唐太宗自撰宣、武二帝（指司馬懿、司馬炎）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由是《晉書》總題曰「御撰」。揆其重修《晉書》的目的，是想在李暉的後人中，加入李淵的先世，如此一來李淵一系源出隴西成紀李氏就有了依據。

按唐太宗命房玄齡、褚遂良等纂修《晉書》時，為貞觀十八年（644年），至貞觀二十年（646年）書成，僅費兩年多，《晉書》凡一百三十卷，其中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晉書》成於多人之手（兩《唐書》或云八人、十八人、二十人、二十一人，殆以二十人左右較合於實，見羅聯添、戴景賢、張蓓蓓、方介編著《國學導讀》國立編譯館主編，巨統圖書公司，2013年，頁414），歷時又短，不免有許多缺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晉書》評之曰：

「其（指《晉書》）所褒貶，略實行而獎浮華，忽正典而取小說，波靡不返，有自來矣！…正史之中，惟此書及《宋史》，後人紛紛改撰，其亦有由矣。」

正因為如此，在修撰《涼武昭王李玄盛子士業傳》時，才會說：

「（西）涼後主諱歆，字士業，…士業立四年而宋受禪（時為西元420年），…士業聞（沮渠）蒙遜南伐禿髮傉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為蒙遜所敗。…勒眾復戰，敗于蓼泉，為蒙遜所害。…至是而亡。…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指南朝劉宋）。後歸（拓跋）魏，為恆農太守。」

在上引《晉書》末句「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後歸魏，為恆農太守」，大有問題，極可能是秉承李世民的意思而要求加上的，因為李唐曾宣稱李重耳為其先人，如是則李淵為李重耳之五代孫，其為隴西成紀右姓李氏之苗裔，可說是拼湊的天衣無縫，避開源於北方胡族的傳言，然而杜撰的歷史，卻經不起考驗，且看成書早於《晉書》的《魏書》（成書於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五年、西元554年，早《晉書》九十二

年)卷九十九《私署涼王李暠傳》中，並沒有提到李歆(士業)有子重耳一事，當然更不會有李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於宋，後歸魏，為恆農太守。」這件事；且再進一步看，李歆(士業)在西元 420 年兵敗於蓼泉(其地望約當今甘肅省酒泉市臨澤縣蓼泉鎮)且死於該地，按西涼東南距南朝劉宋，直線距離二千三百公里，何況向東有沮渠族的北涼、鮮卑族禿髮部的南涼、羌族姚氏的後秦、向南則有鮮卑族的吐谷渾，層層阻隔，西涼李重耳如何能「脫身奔于江左」？此可疑者一，其次，即使勉強說李重耳脫逃到南朝劉宋，如何就能夠「仕於宋」？沒有從任何文獻上看到李重耳有什麼過人才華記載的，憑什麼能夠「仕於宋」？難道江左都沒有人才子？當時江左可說是人才濟濟，而且特重門閥觀念，李重耳並非王、謝等大姓，怎可能輕易「仕於宋」？又怎能夠「後歸魏，為恆農太守」？

陳寅恪於其所撰《李唐氏族之推測》一文也認為李重耳脫奔南朝宋之說係後人所偽造¹¹。至於《晉書》稱李重耳「後歸魏，為恆農太守」也是杜撰，按唐太宗於其貞觀九年(635 年)謚李重耳為「宏農府君」¹²注意是「宏農府君」，只是「府君」不是「太守」，「宏農」有宏揚農事之意，而「府君」是對普通男性的一般稱謂，並非官稱，設若果真有李重耳其人，充其量也只個精於農事者，只是「宏」與「弘」音同，意也可通，而北魏有弘農郡(地當今陝西省潼關一帶)，後因避北魏獻文帝拓跋弘(456~471 年在位)名諱，改弘農為恆農，於是修《晉書》時，就把「宏農府君」改為「弘農(恆農)太守」(因貞觀九年已公開進謚李重耳為宏農府君，已無法更改，而宏農與弘農音近，遂漁目混珠以弘農取代宏農)，這種偷天換日的作法，相當高明，透過李重耳將李淵先世與李暠後人連結起來了。

據《新唐書·宗室世系表》所述：

「(李)歆字士業，西涼後主。八子：暠、紹、重耳、弘之、崇明、崇產、崇庸、崇祐。重耳字景順，以國亡奔宋，為

¹¹ 《李唐氏族之推測》刊於中央研究院院史語所集刊第三期，1971 年再版。

¹² 見《唐會要》卷十二，此書係北宋王溥撰，自「帝號」始，以「四夷」終，共分 514 事目，共一百卷。王溥，字齊物，並州祁人，歷任後周太祖，世宗，恭帝及北宋太祖宰相

汝南太守。後克豫，以地歸之，拜恒農太守，復為宋將薛安都所陷。後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生獻祖皇帝熙，字虛良，後魏金門鎮將。生懿祖光皇帝，諱天賜，字德真。三子：長曰起頭，長安侯。生達摩，後周羽林監太子洗馬長安縣伯。次曰太祖（虎），次曰乞豆。」

茲將上述文字以表列方式呈現如下：

李歆（士業）——（三子）重耳（景順）——熙（孟良）——天賜（德真）——	起頭——達摩
	——虎
	——乞豆

李天賜（德真）的三個兒子，其長子起頭及三子的名字，很可能只是北方胡族語言的音譯，起頭之子「達摩」其為胡語音譯，已是毫無疑問，因此可以推定起頭，乞豆也是胡語音譯，至於「虎」字，倒是可以作為人名，但也不無可能仍是胡語的音譯。另上引《宗室世系表》稱：「重耳字景順，以國亡奔宋，為汝南太守，更是疑竇重重，按北魏（即後魏）攻打南朝宋汝南諸郡事在西元 450 年，其時為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十一年、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元嘉二十七年，據《宋書、文帝紀》所載：

「（元嘉二十七年二月）辛丑，索虜（按當時南朝稱胡族所建的北朝為索虜，而北朝稱漢人所建的南朝為島夷）寇汝南諸郡，陳南頓二郡太守鄭琨、汝陽穎川二郡太守郭道隱委守走。索虜攻懸瓠城，行汝南郡事陳憲拒之。」

可見當時汝南太守並不是李重耳。同樣《宋書》《柳元景傳》、《索虜傳》都提到北魏攻打南朝宋汝南之事，也都沒有提到汝南太守是李重耳，而是另有其人，陳寅恪也認為「李重耳為宋汝南太守一事，微諸上引史實（按係引徵《宋書》紀·傳及《魏書·薛安都傳》）絕不可能。」¹³

¹³ 見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該文原刊載於 1931 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後輯入陳著《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局 2001 年，上引文字見頁 325

可見《晉書·李玄盛傳》所謂「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以《新唐書·宗室世系表》所稱：「重耳字景順，以國亡奔宋，為汝南太守」全屬杜撰，此乃是可以確定者。

李重耳之名應係捏造，但應確有其人，茲據《宋書》卷七七《柳元景傳》所載：

「（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八月，（隋王）誕遣振威將軍尹顯祖出貨谷，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入盧氏（今河南省三門峽市盧氏縣）。……閏十月（龐）法起、（薛）安都、（魯）方平諸軍入盧氏。……（龐）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启，去弘農城五里。……諸軍造攻具，進兵城下。偽（指北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困。（龐）法起、（薛）安都、（魯）方平諸鼓譟以陵城。…（薛）安都軍副譚金、薛係孝率眾先登，生擒李初古拔父子二人。…殿中將軍鄧盛、幢主劉驥亂使人入荒田，招宜陽人劉寬糾，率合義徒二千餘人，共攻金門鴈，屠之。殺戍主李買得，（李初）古拔子也，為虜（指北魏）永昌王長史，勇冠戎類。永昌聞其死，若失左右手。」

這一段資料，如與《晉書》、《新唐書》所載西涼後主（士業）之子為後魏恒農（即弘農）太守，頗為符合，陳寅恪也推定李重耳也即李初古拔，但陳寅恪則認為李初古拔「名雖類胡名，姓則為漢姓。」（同注13），此說一出數十年來未有駁之者，但如再細看上引《宋書》「殺戍主李買得，古拔子也」句，略去「李初」二字，是否也有可能「李初」二字，也是胡語之音譯？唯其首音「李」，恰與漢姓李氏同音，陳氏遂認為其「姓則為漢姓」。事實上北方胡族原無所謂「姓」，多以部落為姓，且其語言屬阿爾泰語系為膠著語型多音節語言，「李初古拔」有可能是胡語的音譯，許多北方胡族進入漠南、中原與漢人多所接觸後，發現漢人有名，而且係單音節多聲調語言，為「入境隨俗」，往往將其胡語名字，取其第一音，作為姓氏，如是相沿成習，晚至明代境內許多蒙古人，如博兒只斤氏（或作博兒濟錦氏），多改為姓包、鮑、白，如是「李初古拔」遂以「李」為姓，因此其子遂為李買得，當然以上僅為筆者之推測，尚無

確切的證據，不過也無確切的證據加以推翻，可備為一說。

李初古拔之後的世系，始為李唐先世可靠的世系，依照《新唐書·宗室世系表》所載李重耳（應即李初古拔）子李熙（另一子李買得已戰死），李熙生李天賜，天賜生三子：起頭、虎、乞豆；李虎生八子，分別為：延伯、真、岡、璋、繪、禕、亮、昺；李昺生四子，其長即為建立唐朝之李淵；李淵生建成，世民（即唐太宗），元吉，從此進入大唐帝國。

三、李淵先世事蹟

上文提到李唐捏造係隴西成紀西涼武昭王李暠之遺裔，乃是不可靠之事，前輩史學大師陳寅恪於其所撰《李唐氏族之推測》、《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各文中，已有詳細分析，李唐先世絕非隴西李氏數十年來尚未有非之者，已成學界定論。因此，要論李唐先世事蹟，只能始於李初古拔，之前係偽託於隴西西涼武昭王李暠一系，概屬不可信者。

《新唐書·宗室世系表》既將李初古拔改為李重耳，為美化其官位，稱：「後魏克豫州，以地歸之，拜恒農太守，復為宋將薛安都所陷。」現在且看上文所引《宋書·柳元景傳》所載南朝宋建武將軍薛安都等於西元 450 年（宋元嘉二十七年）生擒李初古拔父子二人，由是可知李初古拔即李重耳，現在再看《魏書》卷六十一《薛安都傳》記載此事為：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汾陰地在今山西省運城市萬榮縣南）。父廣，司馬德宗（晉安帝）上黨太守。

（薛）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廄。……（太平）真君五年（太真君係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年號，其五年為西元 444 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逆（沮渠秉或作沮康），事發，奔於劉義隆（南朝宋文帝），後自盧氏入寇弘農（恒農），執太守李拔等（即李初古拔），遂逼陝城。時秦州刺史杜道生討（薛）安都。仍執（李初古）拔等南遁，及世祖（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臨江，（李初古）拔乃得還。」

以上《魏書》與《宋書》所載，完全符合，可見李淵先人李初古拔確

曾為北魏弘農（恒農）太守，吾人如將「李初古拔」視為胡語之音譯，則其系出北方胡族，應無可疑，不能因為「李初古拔」首音「李」，即斷其為漢姓李氏，如段就六眷（見《魏書》卷一〇三《段就六眷傳》，《晉書》卷六三作段疾陸眷），賀拔阿斗泥（見《周書》卷十一《宇文護傳》）其首音「段」、「賀」也為漢姓所有，就斷段就六眷、賀拔阿斗泥為漢姓，因此稱「李初古拔」姓漢人之李氏，未必絕對正確。

就目前既有文獻看，均未見有關李初古拔先世之記載，而李初古拔被南朝宋建武將軍薛安都生擒，且將南返宋境，若非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率軍趕到江邊（考其地望當係今河南省陝縣附近之澗水）始將李初古拔奪回，就在拓跋燾率軍臨江將李初古拔奪回的同一年（西元 444 年，北魏太平真君五年），西涼武昭王李暠之孫李寶（與李重耳為同一祖父的堂兄弟）入朝北魏，拜為外部大臣，轉鎮南將軍、并州刺史、內部大臣、鎮北將軍，極為顯赫，如果李初古拔確是李重耳，按當時北魏極重視門閥，李重耳是西涼後主李歆的哲嗣，無論李暠或李歆父子，都曾遣使貢獻於北魏（見《魏書》卷九十九《私署涼王李暠傳》），李重耳應該比他堂兄弟李寶更受到北魏朝廷的重視與重用，然而《新唐書·宗室世系表》只說李重耳是汝南太守，在位階聲望上，與李寶都有很大的差距，可見李重耳只是一個虛構的人物，於此又得一證。

李寶之子李沖（如確有李重耳其人，則李沖當為其堂侄，關係極為親密），在北魏朝廷為中書令、南部尚書，且為文明馮太后之面首（見《魏書》卷五十三《李沖傳》作：「沖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千萬，進爵隴西公…」、「始沖之見私寵也」分見標點本《魏書》頁 1180、1189），可見其權傾一時，而李沖為人對宗親、姻親及隴西、河西鄉親，也照顧有加，據《魏書》載李沖「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己接物，垂念羈寒（羈，音義皆同羈），衰舊淪屈由之躋敘者，亦以多矣。」（見《魏書》標點本頁 1180）可見其對親族之照顧、可以說是無以復加。回過頭看，據《新唐書·宗宣世系表》稱：

「（重耳）生獻祖宣皇帝諱熙。字孟良，後魏金門鎮將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云：“率豪傑鎮武川，因家焉”)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也同)

按北魏初期在北方設六鎮（武川為六鎮之一），以防柔然之南下，當時北魏都於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附近），地近草原，易受柔然攻擊，因此設六鎮以禦柔然，所派六鎮鎮將多為鮮卑等族貴胄備受重視，且有很多出路，即使鎮兵，也多是鮮卑等胡族子弟，雖也有漢人，也多為官宦子弟，因此北魏初期視鎮將、鎮兵均視為榮譽職，也都有很好的前途，但自遷都洛陽後，而柔然之威脅已不如以往，鎮將、鎮兵已不受重視，其出路更受影響，且往往被洛陽官場卑視，其時李熙「率豪傑鎮武川」，可見李熙難以在洛陽立足，設若李重耳果有其人，則李熙應與李沖是同曾祖的堂兄弟，以李沖對親族，同鄉的照顧，絕不會任令堂兄弟「淪落」到武川為鎮將，從而又可證明李初古拔與隴西李氏全然無關。

李熙生李天賜，唐朝建立後，追謚為懿祖光皇帝，生三子曰：起頭、虎、乞豆；除李虎外，另兩子的名字，也極似胡語的音譯，起頭後追封為長安侯，生子名達摩，又是胡語音譯的名字，據《新唐書·宗室世系表》稱達摩曾在北周任羽林監太子洗馬、長安縣伯。

據舊《唐書》卷一《高祖本紀》所載，李熙曾做到金門鎮將同書也稱李熙「率豪傑鎮武川，因家焉」，考武川地望，約在今內蒙古自個區呼和浩特市武川縣（縣治在可可以力更鎮），其子李天賜只做到幢主（統五百人之武官，約相當於現在的營長），這兩官都不大，但李淵建立唐朝後，卻尊謚李熙為獻祖宣皇帝、追尊李天賜為懿祖光皇帝；但對李初古拔（捏造為李重耳）曾官至恒農（弘農）太守，在官階上顯然高於其子李熙，其孫天賜，何以唐朝建立後並未追尊為皇帝，很可能唐初尚存的魏澹《魏書》及魏收《魏書·高車傳》，有關於李初古拔族籍及事跡的記載，明指李初古拔非漢人，所以加以銷燬，而李熙、李天賜之所以以「李」為姓，極可能是以「李初古拔」一名首音「李」，遂以之為姓，按李初古拔既曾任北魏恒農太守，已是處於以漢人為主的社會，不習慣胡族音譯的姓名，遂以其名字的首音為子、孫的姓，這情形在諸胡列國及北朝時極其常見的，或許李熙、李天賜、李虎祖孫三代的漢姓「李」，「都是李淵發達

後才補取的」¹⁴。

李天賜有三子，其次子李虎，曾在北周為柱國大將軍，地位顯赫，但《周書》（唐·令狐德棻奉勅撰）、《北史》（唐·李延壽撰）均無《李虎傳》，考其原因極可能是李虎仍具相當北方胡族的事蹟，所以刻意不為之立傳，按李虎即李淵之祖父。李虎在北周貴為柱國大將軍，北周建國者宇文泰（字黑獺），以「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應為西元 554 年、西魏恭帝拓跋廓元年、其時宇文泰已總攬大權），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¹⁵這裏所謂「國」，與後世之所謂國家，完全無關，只是一個方域、一個部落，而「姓」也只是一個氏族，宇文泰銳意、復古摹擬成周分封眾建之制，對功臣賜姓，如《周書·楊忠傳》稱：「魏恭帝初，（楊）忠以功賜普六如氏。」而《隋書·高祖紀》也稱：「皇考從周太祖（指宇文泰）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胡氏。」茲查招跋鮮卑確有「普陋茹氏」（見《魏書》卷一百十三《官氏志》標點本頁 3007），賜李虎姓大野，近代史家王桐齡認為這恢復其本民族之部落姓，也即所謂「復姓」（復其舊姓），王桐齡稱：「西魏文帝（元寶炬）大統十五年五月，詔代人復其舊姓。恭帝（元）廓元年，恭帝復姓拓跋氏，是時宇文泰當國，李虎、楊忠皆西魏功臣，虎為八柱國之一、忠為十二大將軍之一，然則所謂賜姓普六茹、賜姓大野氏者，律以代人復舊姓之例，似即復姓，非賜姓。」（見王桐齡《中國民族史》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 年，頁 326，按此書早在 1928 年即已出版，其中《楊隋李唐先世系統考》曾刊載於北平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二期），王桐齡稱賜姓即「復姓」，用之於楊忠（賜姓普六茹，而鮮卑確有普陋茹氏），尚屬合適，如用於李虎（賜姓大野氏）則說不通，《魏書·官氏志》所列鮮卑各部落，並無「大野」氏，可王桐齡賜姓為「復姓」之說，並不全然，關於此點，陳寅恪於其所撰《李唐氏族之推測》一文，已明白指出賜姓並非「復姓」，但陳氏並未指出鮮卑並無「大野」部，甚至認為有「大野」部，如該文「丁」段之標題即為「李唐先世與大野部之關係」，等於認定有「大野」部，但不是鮮卑

¹⁴ 見常華安《敕勒人史蹟源流考》台北史哲出版社，2009 年，頁 71

¹⁵ 見《周書》標點本頁 36

族。

經查《周書》卷二十《閻慶傳》載：

「閻慶字仁慶，……（閻）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展勳勞。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見標點本頁 342）

此外，鄭樵《通志》卷二十九《氏族略五》、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卷三十一等都載有閻慶賜姓大野氏，想來應有大野部，否則如何賜以空虛之大野氏？按一般賜姓之原則，其一，恢復其原來之部落姓，尤以西魏、北周時為最常見；其二，賜以與皇帝相同之姓，以表恩寵或示羈縻，唐代頗常賜邊族領袖以李姓；其三，賜以其所源出民族。李虎之被賜姓「大野」氏應屬於第三種情形。

從上所引資料看，北方草原上，之前應該確有稱為「大野」的部落，只是諸多文獻都沒提到這個大野部，所以很難確定大野部屬於什麼民族。按當鮮卑拓跋部南下建立魏政權後，北方草原仍有許多游牧民族，有匈奴、柔然、雜胡、敕勒等許多游牧民族，其中柔然，或茹茹、蠕蠕。芮芮等，名稱相當不一致，但柔然一詞較為「正當性」，至於柔然之族源，就漢文文獻而有不同說法，如認為是匈奴別種、指柔然為塞外雜胡，西方文獻則認為柔然為阿瓦爾（Avars，或譯為阿哇爾），但以柔然也為東胡苗裔，與鮮卑同源較為合理，本文僅就與鮮卑同源稍作敘述，據《魏書》卷一〇三《蠕蠕傳》稱蠕蠕乃「東胡之苗裔也。」不僅如此，同書更進一步對柔然之族源有較細之敘述：

「蠕蠕，東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閻氏。始神元之末（神元
係指拓跋部之力微），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
其主字之曰木骨閻。木骨閻者，首禿也。木骨閻與郁久閻聲相
近，故後子孫因此為氏。木骨閻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
(指拓跋猗盧，304~316 年，穆帝係追謚者)，坐後期當斬，
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厥部。」

從上引《魏書》所載，可知柔然出於鮮卑，至少其統治階級出於鮮

卑，應屬有據。另《魏書》同傳指稱柔然阿拉瓌降北魏時，曾向北魏孝明帝元詡（515～523年在位）稱：「臣先世源出於大魏」，孝明帝答以「朕已具之」，這等於北魏孝明帝承認柔然源於鮮卑拓跋部。因此可以知曉「大野」部不是柔然。

不過柔然強盛時掩有漠北，且時常侵入漠南、漠西乃至代北，在此廣袤地域中，有許多游牧民族均臣服於柔然，如鐵勒、突厥，敕勒…等，因此吾人可以說柔然族本身沒有大野部，但受柔然統治之眾多游牧民族中，未必沒有大野部。

大漠南北除柔然外，尚有烏桓，或作烏丸，係秦漢時東胡部落聯盟之一，被匈奴冒頓單于擊敗後，向東逃亡，藏匿於今東北大興安嶺某支脈中，遂稱該山為烏桓（或烏丸）山，後漢匈奴勢衰之後，烏丸漸盛，據《三國志、魏書、烏丸傳》注引《魏略》稱：

「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為號焉！……至匈奴壹衍鞮單于時（壹衍鞮為壺衍鞮之誤），烏丸轉強，發掘匈奴單于塚，將以報冒頓所破之恥。」

東漢季世烏丸更稱強於北方，曹操於東漢獻帝劉協建安十二年（西元207年）親率大軍北伐烏丸，事後於其《步出夏門行》（又名隴西行）樂府詩《觀滄海》一章，有如下之詩句：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見《魏武帝魏文帝詩註》香港
商務印書館，1961年，頁27）

上引曹操《步出夏門行》樂府詩中之「碣石」，係碣石山之省稱，經查其地當今河北省秦皇島市西南之碣石山，將數十萬烏丸擊敗，烏丸從此一蹶不振，及至三國鼎立時，烏丸已然為「雜胡」之代稱，如《魏書·官氏志》稱：「其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各以多少稱酋庶長。」但

雜胡之中並未見有大野部，因此可以斷言，大野部不是烏丸。

別有稽胡，也稱步落稽，較晚登上歷史舞台，北魏建國後（事在西元386年），始見其名，且其活動地區在今山西呂梁山一帶，與北魏之六鎮無關¹⁶，因此大野部也與稽胡無關。另有盧水胡，顧名思盧水胡係指分佈於盧水一帶之胡族，主要是指沮渠部，以往幾乎所有文獻都指沮渠部為匈奴。實則不然¹⁷，盧水胡內並無大野部。

此外，活動於大漠南北、漠西乃至今中亞東部一帶之敕勒族，此族內含極為多元，且有多種稱謂如：鐵勒、勅勒、涉勒、丁零、高車、狄歷等不一而足，且為突厥、回紇等民族之先導，其內部部落眾多，活動空間也大，「敕勒」一詞，最早見於《晉書》卷九七《北狄傳》稱晉武帝司馬炎（265~290年在位）太康年間（280~289年），漠北有十九種游牧部落遷入塞內，其中即有「赤勒種」，（見標點本《晉書》頁2549），「赤勒」即敕勒。同書卷一一〇《慕容儻載記》也稱西元357年（前燕烈祖慕容儻光壽元年、東晉穆帝司馬聃升平元年）慕容儻曾派慕容垂等率兵「討丁零，敕勒于塞北」；之後又稱「塞北七國賀蘭、涉勒（按即敕勒）等皆降。」可見從西元三世紀中葉之後，敕勒就在北方活動。

現在先要釐清赤狄、狄歷、敕勒（或作勅勒。勅同敕）、高車，丁零這些名詞的含義，才能作進一步分析敕勒之內含，據《魏書》卷一〇三《高車傳》有如下一段記載：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勅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見標點本頁2307）

如所周知，《魏書》卷一〇三早已亡佚，後由宋人以《北史》卷九《高車傳》補之，且看《北史·高車傳》如何描述：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高

¹⁶ 北魏所建六鎮為沃野（今內蒙古自治區五原東北）、懷朔（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固陽縣）、武川（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武川縣西）、撫冥（今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東南）、柔玄（今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興和縣西北）及懷荒（今河北省張家口市張北縣）

¹⁷ 沮渠部非匈奴詳情可參見劉學銚《五胡史論》，台北南天書局，2001年，頁66~73

軍、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

兩者相互比對，現行《魏書》多了「勅勒，諸夏以為」六字（關於這一點，清代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八《高車脫文》已予指出，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北史》，已將此六字補入），由於有了上述情形，今人對《魏書·高車傳》遂有不同解讀，至於如何分辨，當在下節《李唐先世蠡測》詳為說明。

四、李唐先世蠡測

上文提到《魏書·高車傳》早已亡佚，今本係宋人以《北史·高車傳》補之，但文字又有所出入，今本《魏書》稱「北方以為勅勒，諸夏以來高車·丁零」，而《北史》則為「北方以為高車·丁零」，少了「勅勒，諸夏以為」六個字，這六個字藏了玄妙，按《魏書》係北齊魏收所撰，魏收係北朝人，但自認為華夏（即諸夏），視南朝為「島夷」，而《北史》係唐人李延壽所撰，其所謂「北方」與《魏書》之北方，顯然不同，按《魏書》所謂「北方」，明顯是指北魏疆界以北之地，也即今漠北漠西乃至更北之今西北利亞一帶，乃柔然、高車等族活動地域，而《北史》之所謂「北方」，似僅指大漠南北而言，可見《魏書·高車傳》未必全部採用《北史·高車傳》，換言之《魏書》之「北方」顯然較《北史》之「北方」更偏北，蓋北朝之鮮卑族，早已自認是「諸夏」。

再進一步看，《魏書》顯然將赤狄、狄歷、敕勒、丁零統視為一個民族，其實所謂「夷、狄、戎、蠻」都是諸夏對四周不同民族的統稱，也是他稱，因此吾人可以這樣解讀《魏書》所謂的赤狄、狄歷是指自西元前三世紀以前，諸夏對中原以北所有各民族的統稱（或泛稱），並不專指某一民族；敕勒則是這個民族的自稱；而高車一詞，則因敕勒族「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見標點本《魏書》頁 2308），其所以車輪高大者，以漠北草原，無甚高山，一般以緩坡居多，車輪高大正可以越過緩坡，此正說明在近代交通發達之前，人類生機類型，往往受生存空間自然條件所制約，換言之，人類為適應生存空間的自然條件，自會創造出合於自然條件的生機類型，這就是文化，所以不同文化是無法比較其高低，因此，「高

車」乃是北朝人因敕勒族「唯車輪高大」而給予的稱謂，仍是他稱而非自稱。

據《魏書·高車傳》稱：「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同傳又稱：「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干氏，七曰阿倫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沛氏。」這裏既說種有狄氏等六氏，又說有泣伏利氏等十二姓，《北史》所載也同，其中「袁紇氏」顯然就是回紇，只是「其種」、「其姓」頗難理解，或者無論《魏書》或《北史》所載不完全，但已可看出敕勒族其內含是極其多元。

這裏要注意的是，北朝稱其為高車，《魏書》、《北史》均為之立有專傳，但南朝的史書（如《宋書》、《南齊書》、《梁書》及《陳書》）均未見高車之名，而是以「丁零」之名稱之。提到「丁零」，自然會想到西漢武帝劉徹（西元前 140～前 87 年在位）時，蘇武出使匈奴，因其副使涉入匈奴內部鬥爭，蘇武因而被捕，流放到北海（今外蒙古北部之貝加爾湖）邊牧羊，而其羊被丁零所盜，是則丁零也為一源遠流長之民族。

其實《魏書》對丁零一名的用例，是指早已入居內地（中原）的敕勒族而言¹⁸，也因此《魏書》中常見到敕勒與高車並列的情形。《魏書·高車傳》稱高車「其種有狄氏……」，狄氏即春秋時代之赤狄，可見《魏書·高車傳》稱：「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並非無根之說，而狄氏進入中原後，就成為戰國以後的翟氏，據《資治通鑑》稱東晉成帝司馬衍（西元 326～342 年在位）咸和五年（330 年）載：「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至是入朝於趙（指羯族石勒所建之後趙）；趙以（翟）斌為句町王。」¹⁹句中之「世居康居（今中亞薩馬爾罕一帶）」，可見丁零分布地域極廣，約略言之，在今中亞地區之丁零，可稱之為西丁零，在今外蒙古北方貝加爾湖一帶者，可稱為東丁零。

東丁零之南下漠南、中原，是由於地理毗鄰，氣候等因素，乃可以理解者，而西丁零之東來，可能是漢初匈奴鼎盛之時，威震廣義之西域（指

¹⁸ 見周偉洲《刺勒與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5

¹⁹ 見《資治通鑑》卷九十四《晉紀》十六，標點本頁 2977

今中亞地區），諸引弓之國皆號匈奴，而匈奴擣其青壯為兵，因而東來，其情況一如羯族，雖未能在文獻上找到確切證據，但卻有此可能。翟斌初為氐族苻氏前秦（351～394 年）之衛軍從事中郎將，及苻堅（357～385 年在位）於 383 年敗於淝水之後，翟斌首先起而反抗前秦，頗得各族支持，「故丁零一唱（指翟斌），旬日之中，眾已數千」²⁰可見翟斌其頗有才略，其後雖為後燕（384～409 年）慕容垂（384～396 年在位）所殺，但其弟翟檀、侄翟真及其從兄翟非均非等閒之輩，尤以翟遼勇略兼具，於西元 388 年稱魏天王，建元建光並置百官，翟魏政權於焉成立，雖其祚極短，前後僅五年（388～392 年），但畢竟是一個政權。也是敕勒族所建漢魏式政權。

細讀有關史傳，無論丁零、狄歷實為一音之諧譯，而敕勒、勑勒或赤勤（實為赤勒之誤），而赤勒既敕勒之諧譯，則為其周邊相鄰非華夏（或漢人）民族對彼等之稱謂，至於高車一詞，則為北朝以其俗用高輪車而給予之稱謂，如同為敕勒系之回紇，其在漠北建立汗國時，仍乘用高輪車，問於此點，《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專》即明載：「回紇，……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可見回紇也屬敕勒系民族，先於回紇登上歷史舞台之突厥族也為敕勒系民族，而且許多敕勒族習俗，均由突厥族保留下來（乘高輪車則由回紇沿襲之，此實因漠北地區多為緩坡，適合高輪車），此一系民族自西元前三世紀以前，甚或更前，漢文史料對其中東來者，已有零星記載，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周圍民族給予不同稱謂，茲析敘如次：

（一）魏晉南北朝時，北朝文獻對諸胡列國之前東徙或南下漠南、內地之敕勒族，稱之為丁零，而在北魏時始入居塞內之敕勒則稱之為敕勒或高車，較集中聚居於今內蒙古自治區西部一帶，則稱之為「敕勒川」，北朝樂府詩之《敕勒川》，即是描述敕勒人駐牧地區之風光，其歌詞北齊時漢譯如次：

「敕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罩四野，

²⁰ 見《資治通鑑》卷一百五《晉紀》二十七，標點本頁 3317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北朝（北魏、東、西魏，北齊、北周）雖為鮮卑所建（北齊高氏雖自稱為渤海高氏，但完全鮮卑化），但完全與漢人融合，且以諸夏自居，因此稱敕勒為高車；南朝文獻則對無論何時進入塞內之丁零、敕勒，一律稱之為丁零，此為南、北朝文獻對此一民族在稱謂上之差異，有關史傳可以覆按，於此不必一一列舉。

（二）赤狄、狄歷敕勒（或赤勒、勑勒）、高車、丁零等稱謂，乃是漢文史料在不同時期給予此一民族之稱謂，如春秋時期稱之為赤狄，而狄歷乃該民族之自稱，敕勒則為西晉初期塞外其他胡族對此民族之稱謂。

（三）自赤狄、狄歷、敕勒、高車、丁零諸稱謂出現後，復申引出鐵勒之諧音，從而導出突厥、回紇等稱謂，突厥、回紇在隋、唐史上具有重大意義，但一般而言，仍以敕勒一詞較為普遍使用，且此一民族實為開啓後代中國民族中突厥族系之先導，不宜以「突厥」取代之，蓋敕勒係內含多元的名詞，突厥僅為其中之一支系，就邏輯而言，敕勒係上位概念，突厥係敕勒之下位概念，不宜以下位概念取代上位概念，以免以偏概全，而「突厥」一詞，在敕勒語中有「強力」或「氣力」之意，西元六世紀中葉，敕勒系一支分布於金山（今阿爾泰山）之陽，自認「氣力強大」（敕勒語讀為「突厥」），其原為柔然鍛製武器的附庸民族，柔然稱之為「鍛奴」（見《周書》卷五十《突厥傳》，標點本頁 908），當時柔然鼎盛，常凌虐所屬各民各民族，時被凌虐之鐵勒（與突厥同為敕勒系民族）率兵反抗柔然，時為西魏文帝元寶炬大統十二年（西元 546 年，西魏 535～551）年，名為西魏，實權操諸宇文泰手中），邀突厥共同反抗柔然，但突厥在土門領導下，竟邀擊鐵勒，大破之，盡降其眾五萬餘落（每落即一帳蓬，歷來每落都以五人計算），從此實力大增。

突厥（實為敕勒之一支）力量強大後與西魏和親，宇文泰以西魏長樂公主妻土門可汗，隨即攻滅柔然汗國，建立突厥東西兩汗國，可說威震世界，已有許多專書加以論述，²¹於此不贅，自突厥崛起後，丁零、敕勒、

²¹ 關於突厥汗國，可參見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劉錫

高車等名詞遂不復見諸文獻。

此處之所以對敕勒系民族作較詳細之敘述，實因本文認為李唐先世應源於敕勒（即高車），因此對敕勒（即高車）作較詳細的敘述，尤其諸胡列國最後被鮮卑拓跋部所統一高車與鮮卑拓跋部的關係，也應作更進一步的瞭解，按拓跋部初建代政權（338～376 年），其後又建魏政權（386～551 年，初稱代，旋改為魏，551 年指西魏滅亡之年），其對高車之征伐，據《魏書》等史傳之記載，其情況約略如次：

（一）、代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建國十六年（363 年）「帝（拓跋什翼犍）討高車、大破之，獲萬口，馬牛羊百餘萬頭。」

（二）、代昭成帝建國三十三年「征高車，大破之。」

（三）、代昭成帝建國三十九年（376 年），前秦符堅派其大司馬苻洛率大軍討拓跋什翼犍，什翼犍戰皆不勝，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所屬高車各部盡叛。

（四）、北魏武帝拓跋珪登國四年（389 年）「襲高車諸部，大破之。」

（五）、北魏登國五年正月「帝（指拓跋珪）西征，次鹿渾海（地當今外、蒙古前杭愛省，額勒濟特一帶），襲高車袁紇部，大破之，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頭。」

（六）、北魏登國五年十月帝「討高車豆陳部於狼山（即封狼胥山，今外蒙古肯特山，此處係引常華安《敕勒人史蹟源流考》頁 101）

（七）、道武帝拓跋珪天興二年（399 年）二月，會同諸軍，破高車雜種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千餘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驃騎大將軍、衛王儀督三萬騎別從西北絕漠千餘里，破其遺逆七部（逆，意為散失，遺逆，意為散失之部眾，獲兩萬餘口，馬五萬餘，牛羊二十餘萬頭，高車二十餘萬乘，並服甚諸物。」

（八）、道武帝天興四年（401 年）正，高車別帥率其部三千餘落內附（每落平均為五人）

淦《突厥汗國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6 年，劉學銚《狼的子孫、突厥汗國》台北風格司出版社、2011 年，香港智能教育出版社，2012 年；陝西人民出版社，2019 年

(九)、道武帝天興六年（403 年），「詔將軍伊調率二萬騎襲高車餘種袁紇、烏頻，破之。」

(十)、明元帝拓跋嗣泰常三年（418 年），「帝自長川（地當今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興和縣之西，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詔護高車中郎將薛繁率高車、丁零十二部大人眾北略，至弱水，降者三千餘人，獲牛馬二萬餘頭。」

以上謹就北魏道武、明元兩帝對高車之征伐，就已獲高車生口數十萬，牲畜百多萬頭；數十萬人（姑以二十萬計），就今天看只是小數字，但在南北朝時，則是一個可觀的數目，據趙文林、謝淑君所著《中國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一書稱北魏與南朝對峙時期全中國（含南北）總人口約為二千五百萬左右（見該書頁 117），自兩漢以後，尤其晉室南渡編安江左後，長江及其以南人口，幾占總人口三分之二，估以一千五百萬人計，則北魏人口約為一千萬，如所週知，冀、魯、豫人口又幾倍於晉陝甘，是則晉、陝甘人口不會超過三百五十萬，是則二、三十萬高車人被擄或降於北魏者，北魏多處之於國之北境，其地約當今晉北，內蒙古一帶，該等地區不僅漢人少，鮮卑人也不多，且北魏對高車人仍維持其原有之部落組織，並未成為編民，其所以如此者，據《魏書·高車傳》稱是由於「唯高車以類粗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為部落。」（見標點本頁 2309），但從另一角度看，這句話可以解讀為高車部落難以馴服，無法成為編民，故准其保留血緣體之部落組織，從而可知在北魏北境，高車人數相當可觀，既維持原來的部落組織，當然也保留有許高車的習俗；北魏為安撫、羈縻境內的高車，乃優寵高車部落首領，多任之為朝廷高官，如北魏道武帝天興三年（400 年）「高車姪利曷莫弗敕力鍵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敕力鍵為楊威將軍，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斛。」（見《魏書》，以下皆同）次年「高車解批莫弗幡豆建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亦拜為威遠將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給歲稟給。」；此種情況在《魏書》中均可查到，因而許多高車高層逐漸鮮卑化，而鮮卑本身又逐漸與北方漢人互相混融，一般文獻均稱之為「漢化」（說漢化僅是易於瞭解，實際的情形是鮮卑人與漢人的生活習慣也即文化互相吸納混融，不是誰「化」了誰，例如現行漢字，其中有一千多字就是北魏時由鮮卑人所創制

的，²²，所以說鮮卑族「漢化」未必妥適），高車人也隨之與北方魏晉之人混融，成為隋唐時期的「新漢人」，但源於高車者，當然會保留若干高車族的習俗，此乃極自然之事。

高車，除《魏書·高車傳》所稱的六種十二姓外，從其他紀傳中仍可以見到頗多高車部落如《魏書·世宗本紀》：「蠕蠕、高車民他莫孤率部來降。」²³可見高車另有他莫孤部；再如《魏書·世宗本紀》：「（永平三年秋九月，西元 510 年）丙辰，高車別帥可略汗等率眾一千七百內屬」（見標點本頁 209），可見高車另有可略汗部，從而可知高車部落絕對不只有六種十二姓，必然還有許多其他種或姓，而原《魏書·高車傳》之所以遺失，或與李延壽之撰《北史》有所關聯，李延壽或奉李唐帝室之命將《魏書·高車傳》許多部落、姓氏刪去，以掩飾李唐帝室之所出，因此《北史·高車傳》只稱高車有六種十二姓，宋人以《北史·高車傳》補《魏書》之所佚失，自然就不會出現與李唐有關之種、姓，此種推測雖乏絕對之證據，但尚屬合理範圍之內。

前文提到李淵之祖父李虎，曾在北周任柱國大將軍，地位顯赫，照常理而言，《周書》應有《李虎傳》然而唐人令狐德棻奉勦撰《周書》，當然深知李唐帝室的忌諱，因而未為李虎立傳，而《隋書·魏澹傳》稱魏澹撰有《魏史》²⁴，其書所載上自建立北魏之道武帝拓跋珪（西元 386 年）、下至西魏恭帝拓跋廓（西元 556 年，其時政秉完全操諸宇文奉之手），因此其所撰《魏史》不可能沒有《李虎傳》，然而此書入唐後也消失不見，要說與李唐帝室無關其誰能信？

唐代尚未有雕版印刷（更無活版印刷），帝王要銷毀一部史書，「實

²² 關於北魏曾創制漢字千餘字，事見《魏書·世祖本紀》載：「始光二年（425 年），初造新字千餘，……故篆隸草楷，並行於世，……今創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為楷式。」（標點本頁 70），雖然有學者認為「初造新字千餘」是鮮卑字，或鮮卑字母，但深入推究後，其所創制之「新字」仍是漢字，詳情參見劉學銚《鮮卑族可曾創制文字》一文，該文輯入劉著《少數民族史新論》一書，台北南天書局，2011 年，2014 年兩度出版。

²³ 見《魏書·世祖本紀》正始四年冬十二月甲子，標點本頁 205

²⁴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及楊堅受禪，出為行臺禮部侍郎，嗣楊堅以魏收所撰《魏書》，褒貶失實，事不倫序，詔魏澹別撰《魏史》，計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卷，連同目錄，合九十三卷，見《隋書》卷五十八《魏澹傳》，見標點本《隋書》頁 1416-1417。

為輕而易舉之事，李世民、李治父子篡改歷史的手法是細膩的，他們都是在原有史書的基礎上，將二本以上的史書編輯成為一本內容更加豐富的史書，在新書中加上他們偽造的史料或刪掉他們不希望別人知道的史實，以達到取代原有史書的目的。²⁵」《魏書·高車傳》、《魏史》的消失、《周書》、《北史》的撰著，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雖然前賢早已指出李唐先世並非族出隴西李氏（見前文所引陳寅恪之三篇專文），雖指出其「女系母統雜有胡族血胤」（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但仍認為其父系為漢人，其實不然，筆者十多年前即懷疑李唐先世源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一的敕勒（高車）族，今人常華安直指李唐先世為敕勒（高車）族（見其所著《敕勒人史蹟源流考》頁 59～61），但常氏將敕勒人定位為高加索種（即一般所謂的白種人），其所操語言屬印歐語系，在語言屬性上為曲折語型（*Inflective Language Type*），這種看法似乎走得太遠了。如所周知，突厥、回紇屬敕勒系民族，而其語言為阿爾泰語系，在語屬性上為膠著語型（*Agglutinative Language Type*），兩者有極大差異，雖然語言不是識別民族的唯一元素，但絕對是一項重要元素，因此敕勒（高車）仍是操阿爾泰語系的蒙古利亞種（即一般所謂的黃種人），因此李唐帝室在體質特徵上，與漢人差異不會太大，而操印歐語系的各高加索種各民族，其體質特徵為「深目、高鼻、多鬚」，從既有文獻看，並未看到描述唐代諸帝形貌為「深目高鼻多鬚」，可見敕勒（高車）不是高加索種人。

首先不要將「李初古拔」（兩《唐書》將之附會為虛擬之李重耳）之「李」看作姓氏之李，「李初古拔」未嘗不可以是胡語之音譯，如是則以下的許多問題，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上文曾提到《魏書·高車傳》只提到高車有六種十二姓，但在其他紀傳中又出現了若干高車的部落（北方游牧諸民族多以部落為姓），固然沒有明確的證據證明高車有大野部，同樣的也沒有證據證明高車沒有大野部，照李唐帝室刻意隱諱的族源的作為來看，對魏濬的《魏史》的消失、魏收《魏書·高車傳》的亡佚，李唐帝室幕後操作是很有可能的。現在且從李唐帝室的潛在文化習俗去尋找其與敕勒（高車）、突厥相同之處，似乎更具說服力。

²⁵ 見常華安《敕勒人史蹟源流考》，頁 66。

就現有史料看，李虎之妻梁氏，無法確定其為漢人或胡族。蓋諸胡列國時代，北方諸胡族多有冒用漢姓者，尤其北魏孝文帝全面華化後，易胡姓為漢姓（胡俗本無姓氏，以部落為號，以為姓——見姚徽元《北朝胡姓考》緒言），如《魏書·官氏志》：「拔列氏後改為梁氏」，又《晉書·姚興載記》：「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今甘肅省平涼市）作壽家，……前後征伐，屢有大功，（姚）興以為鎮北將軍，封平輿男…」（見標點本頁 2996），可見不僅北方胡族有梁姓者，西域胡也有以梁為姓者，李虎之妻梁氏，未必不是胡族。李虎之子李暠，娶鮮卑獨孤氏，生李淵，李淵娶鮮卑族竇氏，生李世民，李世民娶鮮卑族長孫氏，這些都以說明李唐皇室女系母統幾乎都是鮮卑而且都是貴族，除李虎之妻梁氏背景不詳，李暠所娶獨孤氏，獨孤氏原系匈奴，後入於鮮卑為鮮卑右姓，北魏時為勳臣入姓之一；李淵之妻氏竇氏，乃北周太師竇毅之女，而竇毅則為北周太祖宇文泰之婿；而李世民之妻長孫氏，其先為北魏拓跋氏，後為宗室長，因號長孫氏，其父為長孫晟，隋時為左驍衛將軍，從此種情形看，李唐帝室如染有濃厚之鮮卑習尚，應屬可以理解者，然而就既有文獻看，李唐帝室並未染有鮮卑習尚，反而具有高車（敕勒）、突厥習尚，豈不是證明李唐帝室極可能系出敕勒。

按李淵在隋煬帝楊廣（605~618 年在位）大業十三年（617 年）為太原留守，次年隋煬帝南巡，薨於途中，由是天大亂，群雄並起，李淵在其子李世民、建成、元吉鼓動下，也聚眾起事，各地起事群雄多結好於北方的突厥，並向之稱臣納貢，接受突厥所給之封號，據《隋書》稱：

「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指突厥）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同凌）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縣附近）。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見《隋書》卷八十四《突厥傳》，標點本頁 1876）

按《隋書》係唐人魏徵所撰，自然刻意抹去李淵曾向突厥稱臣一事，而兩《唐書·高祖本紀》也不載李淵曾向突厥稱臣之事，但撰史者為忠於史實，在《李靖傳》中，提到李淵曾向突厥稱臣之事，也算是一種「曲

筆」，舊《唐書·李靖傳》有如下一段記載：

「太宗（李世民）初聞（李）靖破（突厥）頡利，大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指指李淵，玄武門事件後不久，李淵禪位於李世民，故稱皇太上）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此處匈奴指突厥而言），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單于指突厥頡利可汗），恥其雪乎！』」

可見李淵確有向突厥稱臣之事、突厥也確實給予若干協助，終於推翻隋政權、逐步叛平群雄，建立唐政權，在整個起事過程，秦王李世民出力獨多，但李世民並非太子，終於引發玄武門之變，李世民及其僚屬戕殺李建成、李元吉，迫使李淵立李世民為太子，李世民乃「跪吮李淵的乳頭為胡俗，可證李氏當非漢族」²⁶，另據劉餗所撰《隋唐嘉話》（又名《國朝傳記》、《國史異纂》共三卷，劉餗，唐時人，生卒年不詳，彭城人，字鼎卿係劉知幾之子，進士及第，玄宗天寶初，官河南功曹參軍）曾載有：單雄信曾呼李世民之弟李元吉為「胡兒」，而李元吉小字也叫「三胡」²⁷（見台北中華書局據《四部備要》武英殿版卷 79 頁 4 正面），由是可見其形貌頗具「胡」狀；而舊《唐書》卷六十四《高祖二十二子》也指稱李淵曾孫滕王李涉「狀貌類胡而豐碩」，可見李唐帝室在體質特徵上，確實具有胡人的某些特徵，在北方諸游牧胡族中，以敕勒族分佈地域最廣，西至今哈薩克草原都可見其蹤跡（一般稱之為西丁零），因而其具有西域胡的體質特徵，也不足為怪了。

抑有進者，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一個太子李承乾（其後廢為庶人，謚為常山愍王），此人完全模仿突厥習尚，據《新唐書》卷八十《太宗諸子·常山愍王傳》有以下一段記載：

「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生承乾殿，即以命之，……太宗即位立為皇太子，……下愈怒懟，稱疾不朝累數月，又使戶

²⁶ 見常華安《敕勒人史蹟源流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9 年，頁 60

²⁷ 見《新唐書·高祖諸子》

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剪綵為舞衣，尋橦跳劍，鼓鞞聲通晝夜不絕，造大銅鑪六熟鼎，招亡奴，盜取人牛馬，親烹燭，召所幸廝養共食之，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辯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為陣，繫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眾號哭鬱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

從上引這一段史料，可以看李承乾在潛意識裏自認為是突厥人，就現有史料中，似乎找不到李唐皇室與突厥有親緣關係，如果說李承乾表現出來的是一副鮮卑族的習尚，是極其自然的，因為他的母親、祖母、曾祖母是不折不扣的鮮卑族，甚至他的高祖母也可能是鮮卑族，然而他卻表現要作突厥人的願望，而且「又好突厥言」如所周知，突厥語是阿爾泰語系，與漢語有極大的差異，李承乾憑什麼能「又好突厥言」，如果不是從小在家裏聽過突厥語，在理論上他不可能「又好突厥言」，李淵或李世民都是極其黠慧之人，既為一國之君，而且所統治的人民，絕大多數是漢人，他兩人無論如何都會把自己胡族的身份隱藏起來，而李承乾少不更事、且政治敏感度不足，所以暴露了自己民族身分，而且更大言：「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這裏所提到的「思摩」，全名是阿史那思摩，是東突厥汗國南面設叱吉設之子，原是東突厥汗國額利可汗手下的夾畢特勤（有些文獻誤作為特勒）；「設」或「特勤」都是突厥汗國的官名。「設」，在儒尼文碑銘中設作 Xad，語漢音譯為「設」，其地位僅次於葉護，可以擁兵在外，有獨自發號、施令宰制一方之權，西方文獻常將「設」解釋為司令官。而「特勤」，在儒尼文碑銘中讀作 Tegun 或 Tekin，漢文音譯為「特勤」，有時誤為「特勒」，如《太平寰宇記》卷一九四載：「其（指可汗）子弟謂之特勒（勒為勤之誤）」，特勤的任務是對內掌典機要對外交涉，似乎具有外交官性質，經常參與談判軍國大事。李承乾那一番表現，可以解讀為對己身所源出的敕勒族之嚮往，按突厥原只敕勒之一系，以其自認「氣力強大」，敕勒語氣力強大，讀為「突厥」，於是遂以之為族稱。所以李承乾的表現，正可以

說明是對敕勒族的回歸與認同，據此，推測李唐先世源族敕勒，似可成立。

五、結語

「中國」一詞，文化的內涵遠大於政治含意，顧自三皇五帝以至當今海峽兩岸，歷經五、六十個王朝或政權，從未以「中國」為正式國號，即以今日四個字的「中華民國」，與七個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邏輯上絕不能等於兩個字的「中國」，因此「中國」是一個概念，絕不是某個政權所能獨自擁有。而一般漢人總以華夏之裔、炎黃之胄自矜，如細究之，華與夏乃是兩個民族融合後的稱謂，而且自古以來對民族的區隔，不重血緣而重文化，因而有所謂「夷狄入於華夏則華夏之，華夏入於夷狄則夷狄之」的說法，近代史學大師陳寅恪也說「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

（見陳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1年，頁200，按該書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合輯，《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自頁183起），前後兩說，其字雖殊，其意則同，不重血緣之民族觀，為中國文化之一大特色（見拙撰《中國文化史講稿》第十九章《國史省察》台北昭明出版社，2005年，頁264～265）。自華與夏融合成華夏族以來，隨著時代之推進，不斷吸納四周不同的民族，至秦統一天下後，秦祚短暫，漢代秦而有天下，漢朝之人（即後世所謂之漢人）即包含華夏、東夷、百越、荊吳四大系民族（只要檢閱任何一本有關中國民族志或民族史之論著，都會提到此種說法），越至晚近，其內涵越多元，此乃歷史演進之事實，無需隱諱，更無法否認。

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應以東晉諸胡列國時期，北方諸草原游牧民族紛紛湧入中原建立漢魏式政權或王朝，帶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豪邁，率直的氣息融入北方漢人血脈之中，成為隋唐之人，近人劉大杰即曾說：「自五胡亂華到隋唐統一的那幾百年中（此處「五胡亂華」一詞不妥，應稱諸胡列國時代，蓋古往今來從無一項律法規定東亞大陸，只能由華夏或漢人建元立號，如有非漢人之胡族命王稱帝，則稱之為「亂華」，此狹窄的大漢族沙文思想，極不妥適），是漢胡民族血統的大混流時代」（見劉著《中

國文學發達史》，台灣中華書局，1963年，頁276），此話屬實，由於胡漢民族的混融，使中國隋唐之人充滿活潑氣質，創制了大唐璀璨的文化，關於此點梁啟超曾於其撰《中國韻文裏所表現的情感》一文中明白指出：

「五胡亂華的時候（分析同上文），西北有幾個民族加進來，漸漸成了中華民族的份子。他們民族的特色，自然也有一部份溶化在諸夏民族裏面，……這種新民族的特性，恰恰和我們的溫柔敦厚相反，他們的好處，全在抗爽直率，……經過南北朝幾百年民族的化學作用，到唐朝算是告一段落，……盛唐各大家為什麼能在文學史上占很重要的位置呢？他們的價值在洗滌南朝的鉛華靡曼，卻又不是北朝粗獷一路。」（轉引自劉大杰前揭書頁276～277）。

梁啟超之說的是，其實北方胡族帶來的豈僅是文學上的新氣象，更重要的是豐富了中國民族的內涵，厚植了中國民族的氣魄，增加了中國民族的底蘊。

在一、兩百年前，民族畛域之見還是很深，尤其晉代江統於其提出的《徙戎論》強調入塞各胡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更說「戎狄志態，不與華同」（按江統之《徒戎論》全文冗長，載於《晉書》卷五十六《江統傳》，見標點本頁1529～1534，上引兩句在頁1531-1534），強調不同民族，其心態不同，更誇稱夷狄入居塞內之為害，因此隋、唐之建國者，雖都具有北方胡族之血胤，但為便於統治起見，都刻意隱瞞其胡族身分，在情理上應屬可以理解者，但在行為表現上，不時會透露北方胡族潛在習性，如上文所提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被立為太子後，跪吮李淵乳頭、李承乾之誇張式的向突厥族認同回歸，固然是胡族文化的復現，如再進一步看，歷代先皇帝薨後，其所留下的後宮嬪妃，年長者或許遣回原生家庭、或許仍留宮中、或許准其出家為尼，但對年輕貌美者，新帝嗣位後，不免對之有所覬覦，但絕少敢於公然將之納為妃，之後更進位為皇后（如李治之於武則天），而玄宗李隆基之納其子壽王妃楊玉環為貴妃，此種蒸報婚（下淫上曰蒸，上淫下曰報）在歷代帝室中似乎唯唐代有之（按有史以來人類婚俗，因時代與環境而呈現多樣性無所謂優劣好壞）此乃胡俗之再現，李唐帝室之源出敕勒（高車），應屬合理之推論。

再進一步看唐太宗李世民對突厥的態度，貞觀十五年（641 年）時曾有意要突厥俟利苾可汗渡河北返草原，但薛延陀真珠可汗（薛延陀也為敕勒系民族）不以為然，認為突厥「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為至尊（指唐太宗）克之，當翦為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請至尊誅之。」但唐太宗則告以「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唐紀十三、貞觀十八年，標點本頁 6215）。唐太宗又曾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見《資治通鑑》標點本頁 6247），有唐一代任用了許多胡族將領，如《陔餘叢考》（清趙翼撰）卷十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頁 313）所載：

「唐初多用蕃將，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按係特勤之誤），馮盎本高州之酋；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之子；阿史那忠本蘇尼失之子；契苾何力本鐵勒莫何可汗之孫；黑齒常之本百濟西部人；泉男生本高麗蘇蓋文之子；李多祚本靺鞨酋長之後；論弓仁本吐蕃族；尉遲勝本于闐國王；尚可狐本鮮卑別種。」

這些胡族人才，《新唐書》卷一百十《諸夷蕃將列傳》，都載有他們的來龍去脈，可以覆按，於此不贅，但一些「名氣」較大的如哥舒翰、僕固懷恩、高仙芝、安祿山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蕃將」，關於哥舒翰、史傳稱：「哥舒翰事王忠嗣，署牙將。吐蕃盜邊，與（哥舒）翰遇苦拔海，翰持半段槍擊，所向輒披靡，名蓋中軍。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哥舒翰功在西垂，所以當時在西邊的人作詩以歌咏他的事功，這首詩就是以《哥舒翰》為名，收錄在《唐詩三百首》中，其詩為：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

唐朝之所以大量任用胡族為將，原因雖多，與李唐帝室源出於胡族也

必然有關。關於此點近代史學大師陳寅恪曾指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頽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啓，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見陳著《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該文輯入陳著《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344），確屬的論。

本文雖推測李唐源出敕勒（高車之族），但缺乏明確文獻記載，惟斷「李初古拔」為胡語之音譯，而非「李·初古拔」，此為學界先進所未曾提出者，如此項推論得以成立，則其族出胡族更具說服力，惟此也仍為推論，因此本文定名為「蠡測」，未敢稱為定論，尚祈學界先進方家有以指正。

被忽略的蒙古原鄉：保育與持續發展

甘德星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

一、前言

談起蒙古人的原鄉，很多人會馬上想到《蒙古秘史》（Mongyol-un ni'uča tobča'an）中記述成吉思汗（Činggis Qa'an）的祖先孛兒帖·赤那（Börte Činō）和妻子豁埃·馬闌勒（Qo'ai Maral），即所謂的蒼狼和白鹿，渡過騰汲思海（Tenggis）所到斡難河（Onan）源頭的不崙罕·合勒敦山（Burqan Qaldun），即肯特山。不過，這看法並不完全正確。蒙古人的發祥地，應在唐代的望建河（即今額爾古納河 Ergüne 及黑龍江上中游）一帶。¹這個地區所以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是因為相關的考古挖掘和研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才逐漸增多。這些新出資料的累積，讓我們對蒙古源頭的認知，得以超越《蒙古秘史》的記載，更確切地東延至額爾古納河流域的草原地帶及其鄰近的幽深密林。



圖 1. 額爾古納河及黑龍江流域圖(Wikipedia: Shilka River)

¹ Kam Tak-sing, "The Term Mongyol Revisited,"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60 (2017)1/2, pp.183-206.

二、文獻記載

早期的蒙古人即唐代的蒙兀室韋。他們沿望建河居住。《舊唐書·室韋傳》說：

（望建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流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東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與那河、忽汗河合又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於海。²

文中的「俱輪泊」，即今之呼倫湖，所謂「屈曲東流」，即額爾古納河由北轉向東，與石勒喀河匯合後注入黑龍江。

蒙兀室韋之所以遷入額爾古納河鄰近的山林地帶是因為受到突厥的攻擊。13世紀末，波斯史學家拉施特(Rašīd-al Dīn)在他主編的《史集》(Jāmi al-Tawārīkh)中就指出了這一點，並將蒙兀生息之地記載為「額兒古涅·昆」Ergüne Qun：³

大約距今兩千年前，古代被稱為蒙古的那個部落，與另一些突厥部落發生了內訌，終於引起戰爭……另一些部落戰勝了蒙古人，對他們進行了大屠殺，使他們只剩下了兩男兩女。這兩家人害怕敵人，逃到了一處人跡罕見的地方，那裡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過一條羊腸小路，歷盡艱難險阻可達其間外，任何一面別無途徑。在這些山中間，有豐盛的草和[氣候]良好的草原。這個地方名叫額兒古涅·昆。「昆」字意為「山坡」，而「額爾古涅」意為「險峻」；這個地方意即「峻嶺」。那兩個人的名字為捏古思和乞顏(kīān)。他們和他們的後裔長時期居留在這個地方生息繁衍……當這個民族在這些山裏和森林裏生息繁衍，[他們所占的]地域顯得日益狹窄不夠時，他們就互相商量，有什麼好辦法和不難[做到]的辦法，可使他們走出這個嚴寒的峽谷和狹窄的山道。於是，他們找到了一處從

² 《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5358。

³ 烏熱爾圖在《蒙古祖地》(2006)一書中推斷額兒古涅·昆大致在額爾古納河中段東岸地區，亦即西起莫爾道嘎山，北至激流河匯入額爾古納河的河口地帶，見趙玉霞：《蒙古之源——呼倫貝爾》(呼倫貝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頁70。

前經常在那裡熔鐵的鐵礦產地。他們全體聚集在一起，在森林中整堆整堆地準備了許多木柴和煤，宰殺了七十頭牛馬，從它們身上剝下整張的皮，[用那些皮]做成了風箱。[然後]在那山坡脚下堆起了木柴和煤，安置就緒，使這七十個風箱一起煽起[木柴和煤下面的火焰]，直到[山]壁熔化。[結果，]從那裡獲得了無數的鐵，[同時，]通道也被開闢出來了。他們全體一起遷徙，從那個山隘裏走出到原野上。⁴



神聖額爾古涅·昆

圖 2. 額爾古納·昆
(《蒙兀聖地額爾古納》，頁 67)

《史集》的上引文，除「額兒古涅·昆」外，也記載了與蒙兀密切相關連的「乞顏」和「熔鐵出山」的傳說。「大蒙古國」(Yeke Mongyol Ulus) 的創建者成吉思汗鐵木真(Temüjin)，意即鐵匠，⁵便是乞顏的後裔。這個氏族一直秉承著熔鐵和打鐵的傳統：每當除夕夜，他們便將風箱、熔鐵爐、煤準備好，再把鐵燒紅，放到砧子上錘打，以紀念先祖走出山林的舊事。

應該注意的是這時的蒙兀室韋的文化，與其後在草原成立的「大蒙古國」不同。蒙兀室韋基本上是一個遊獵而非遊牧的族群。一直到成吉思汗第十一世祖朵奔·蔑兒幹 (Dobun Mergen)，蒙兀人主要以捕獵和採集為

⁴ 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頁 251—52。

⁵ Paul Ratchnevsky, *Genghis Khan, His Life and Legacy*, tr. and ed. by T. N. Haining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1), p. 17.

生，他們從事有限的農業，養豬，但不養羊。然而，蒙兀人的定居生活並不妨礙他們成為遊牧民。西蒙古的衛拉特人（Oyirad），一如其名，也曾經是森林之民。蒙兀人騎馬、乘牛車四處移動。蒙兀室韋的移動性讓他們輕易地過渡到其後的遊牧生活。⁶

蒙兀自走出額兒古涅·昆的森林後，便沿著額爾古納河逐步由北向南移動，一直到了河的源頭呼倫湖為止，並在以呼倫湖和海拉爾河為中心的呼倫貝爾草原，開始過著遊牧人的生活。蒙古人日後的典型遊牧文化即在此逐漸成形。



圖 3. 大興安嶺林區
(海平的網誌，蒙兀室韋：呼倫貝爾掠影之三)



圖 4. 呼倫貝爾草原 (東方 IC)

⁶ Kam Tak-sing, "The Term Mongol Revisited," p. 184.

10世紀時，蒙兀為契丹所逼，⁷趁著當時因突厥、回鶻、吉爾吉斯相繼退出蒙古大草原後所留下的真空，⁸由呼倫湖再往西遷移到肯特山下克魯倫河（Kelüren）、土拉河（Tula）、鄂嫩河（幹難河）三河流域之地生息。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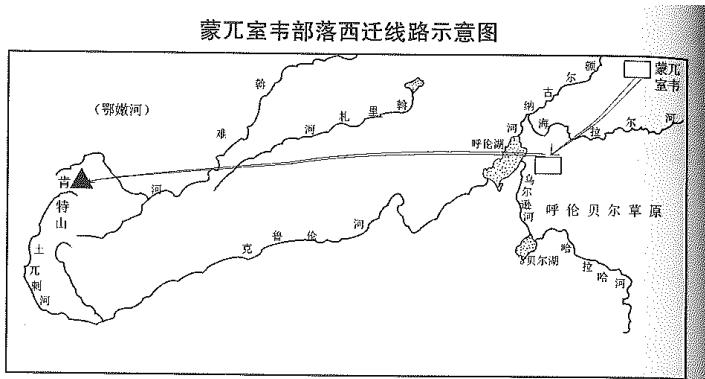


圖 5. 蒙兀室韋西遷圖（《蒙古之源——呼倫貝爾》），頁 86。

三、考古挖掘證明

上面對蒙兀人沿著額爾古納河由北向南逐漸遷徙的記述，可由近 30 多年的考古挖掘得到證明。現說明如下：

⁷ 林梅村，〈從額爾古納松林到成吉斯汗的崛起〉，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呼倫貝爾民族博物館、海拉爾區文物管理所編著：《海拉爾謝爾塔拉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 210。

⁸ 自 7 世紀開始，室偉人已逐部、零星地遷入草原。見韓儒林主編：《元朝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 9—13。

⁹ 呼倫湖應是《蒙古秘史》開篇所說的騰汲思海。但羅依果認為此海應是貝加爾湖，見 Igor De Rachewiltz,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Volume one, Leiden, Boston: Brill, 2004, pp.1, 228-229。惟證諸蒙兀人 10 世紀前沿額爾古納河的移動軌跡，一路往南而非往北，《蒙古秘史》中的騰汲思海應以呼倫湖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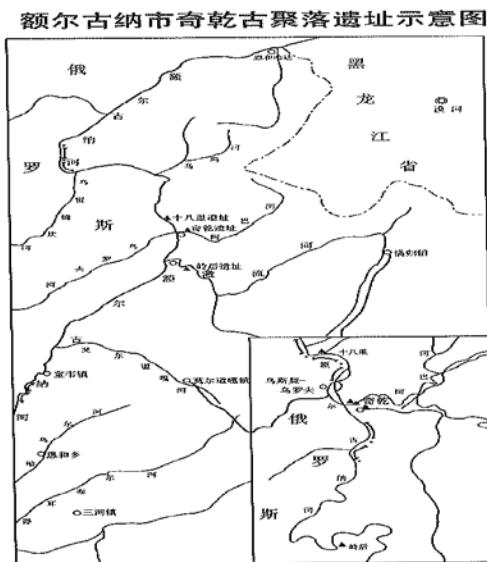


圖 6. 奇乾古聚落圖(《蒙古之源——呼倫貝爾》, 頁 63)。

(一) 奇乾穴居遺址

奇乾位於額爾古納河下游東岸。蒙兀人在遷至草原前，夏天巢居，冬天則住在地穴，以狩獵為生。¹⁰1990 年，考古學者在奇乾共發現三處半地穴式的古代聚落遺址。¹¹三個遺址出土陶片的質地、陶色、紋飾頗具一致性。通過對小孤山遺址第 5 號坑穴內木炭進行碳十四測定，大概可以推斷遺址群的時期約為西元 9—10 世紀。¹²這三個遺址是：

1. 小孤山遺址：

遺址座落於奇乾鄉東北約 1 公里的小孤山東南坡上，其下的阿巴河繞山而過，注入額爾古納河。自山頂到半山腰共有 53 個近似圓形的坑穴，大體可分成五排，排列有序。¹³坑穴多數直徑為 4 米，其中最大的一個直徑 10x8 米，最小的 2x2 米。第五號坑穴內出土陶片、骨器、獸骨及木

¹⁰ 保羅·拉切夫斯基：〈室韋人是蒙古人嗎？〉，鄭炳林，《法國西域史學精粹》III(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頁949–50。

¹¹ 2011 年，額爾古納市檔案史誌局局長鄒玉至奇乾一帶考察，發現阿巴河南北岸皆有石堆墓及石圍牆，說明蒙兀人曾於此處居住過。見鄒玉：《蒙兀聖地額爾古納》（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頁 45–48。

¹² 見呼倫貝爾文物管理站：《呼倫貝爾文物》，1992。台灣無此書，文中有關奇乾的論述乃轉引自趙玉霞：《蒙古之源——呼倫貝爾》，頁65。以下同，不另註明。

¹³ 趙玉靈：《蒙古之源——呼倫貝爾》，頁 63。

炭。紋飾有壓印網格紋和壓印同心凹旋紋，也有少量指甲印紋，與謝爾塔拉墓葬（見下）出土陶器的紋飾相同。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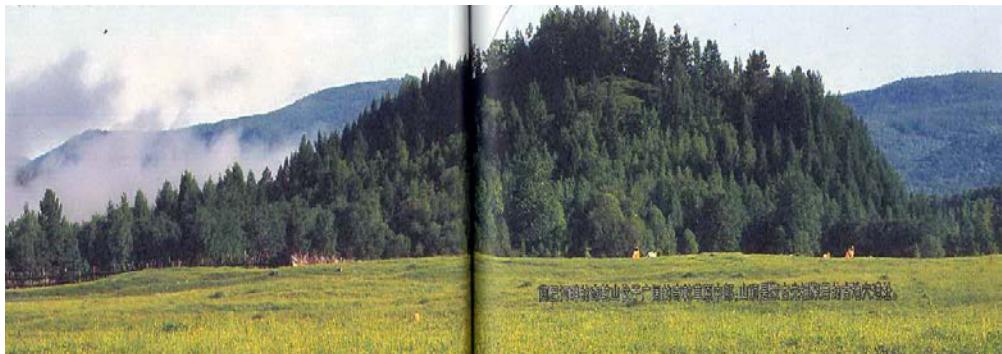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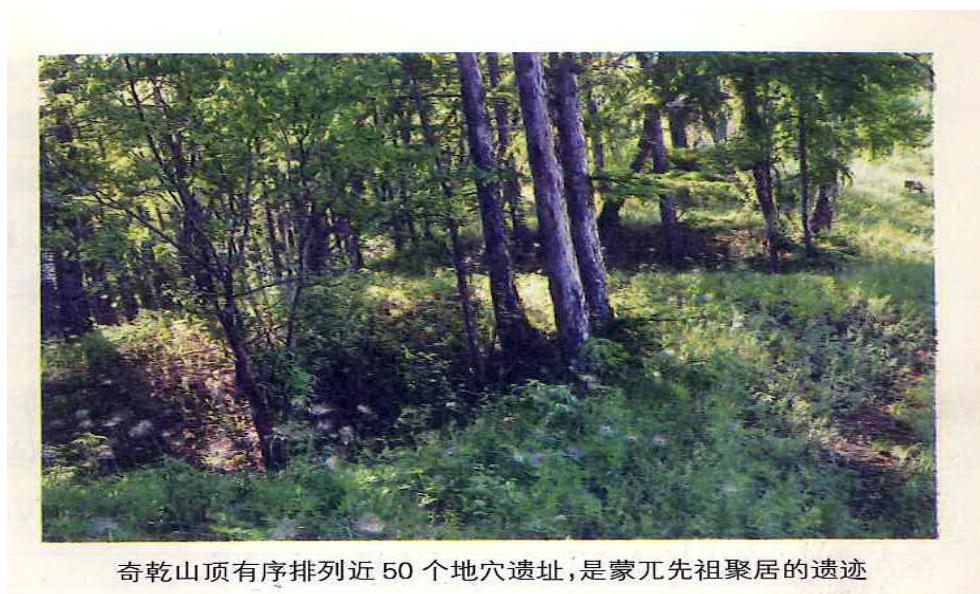


圖 7. 奇乾的小孤山¹⁵
(《蒙兀聖地額爾古納》, 頁 44-45)



奇乾山頂有序排列近 50 個地穴遺址，是蒙兀先祖聚居的遺跡

圖 8. 奇乾山頂地穴
(《蒙兀聖地額爾古納》, 頁 45)

¹⁴ 趙玉霞：《蒙古之源——呼倫貝爾》，頁 63—64。

¹⁵ 鄭玉將圖中的山稱為奇乾山。由於奇乾地區山上有地穴且有序排列者只有學界一般稱為小孤山一處，故所謂的奇乾山應即為小孤山。同書頁 46 所謂的「小孤山」，位於阿巴河北岸，與奇乾的小孤山遺址無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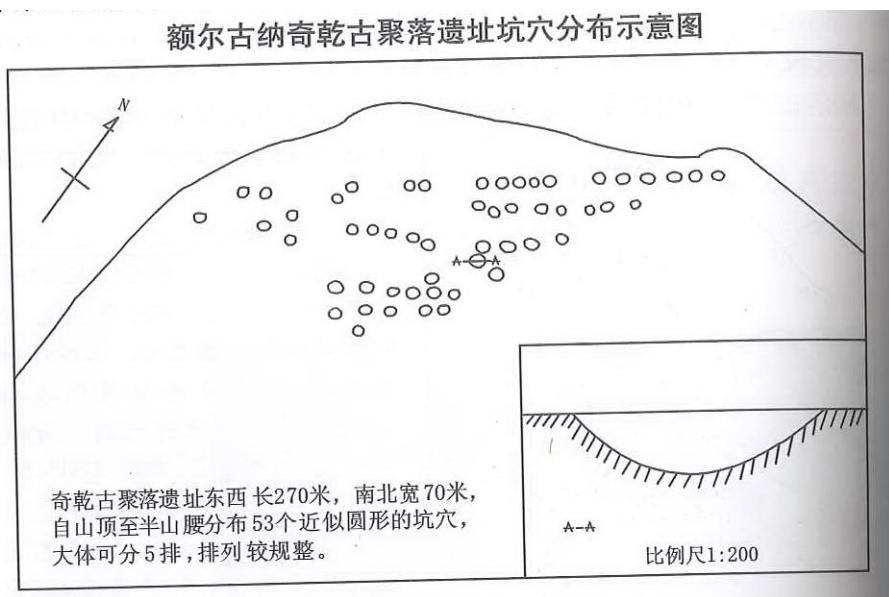


圖 9. 奇乾遺址坑穴分布圖
(《蒙古之源——呼倫貝爾》，頁 64)

2. 領後遺址：

遺址位於激流河注入額爾古納河河口以東 5 公里處的河崖上，面積約 5000 平方米，其東南側有一土牆，長約 100 米，內有 56 個近似圓形坑穴，向北為石崖的邊緣，石崖下為激流河。坑穴分佈密集，排列較為整齊，共分七排。坑穴大小不等，最大的直徑 7.5 米。出土遺物有陶片、獸骨等。¹⁶

3. 十八里遺址：

遺址位於奇乾北約 9 公里的山坡臺地上，面積約 5000 平方米。南側有一名為十八里谷的小溪，向西流入額爾古納河。其西側和北側有一道相連成直角的土牆，牆內有 58 個圓形坑穴。每個坑穴直徑為 5-7.6 米之間。坑內出土少量手製夾砂黑褐色陶片，陶片表面磨光，並飾以附加堆紋。¹⁷

(二) 激流河岸的荒火地遺址

荒火地也稱做皇火地或黃火地，其名字據說來自於古時發生的一次大

¹⁶ 趙玉霞：《蒙古之源——呼倫貝爾》，頁 64—65。

¹⁷ 趙玉霞：《蒙古之源——呼倫貝爾》，頁 65。

火。¹⁸。荒火地是《額爾古納右旗誌》中所用的稱謂。遺址位於大興安嶺森林莫爾道嘎至白鹿島公路 90 公里處的激流河東岸的山坡臺地上。經初步勘探，推測荒火地遺址為古代室韋人的祭祀遺址。¹⁹



圖 10. 荒火地地形

(《蒙兀聖地額爾古納》，頁 57)

遺址面積約 52,000 平方米，內有圓形、橢圓形、方形的石堆。石堆排列有一定規律，完整的共有約 90 座。這些石堆與俄羅斯鄂嫩河流域的蒙古石堆墓相似。²⁰又有石牆 8 道，呈東西和南北方向，中間有間斷之處。石牆將石堆分割成若干區域。²¹額爾古納當地學者孟松林在荒火地考察時，發現遺址有含鐵金屬的礦石，和燒過的礦石殘渣等物。²²這發現與「熔鐵出山」的蒙古傳說或有關聯。

¹⁸ 鄭玉：《蒙兀聖地額爾古納》，頁 51。

¹⁹ 〈黃火地遺址文物保護總體規劃〉(呼和浩特市：內蒙古蒙文盛文物保護有限公司，2015)。http://nmgmws.com/caseDetail.php?nid=207&&pid=112&child_id=127。參閱時間：2018 年 9 月 16 日。

²⁰ 鄭玉：《蒙兀聖地額爾古納》，頁 52；林梅村：〈從額爾古納松林到成吉斯汗的崛起〉，頁 212-13。

²¹ 〈黃火地遺址文物保護總體規劃〉，2015。參閱時間：2018 年 9 月 16 日。

²² 趙玉霞：《蒙古之源——呼倫貝爾》，頁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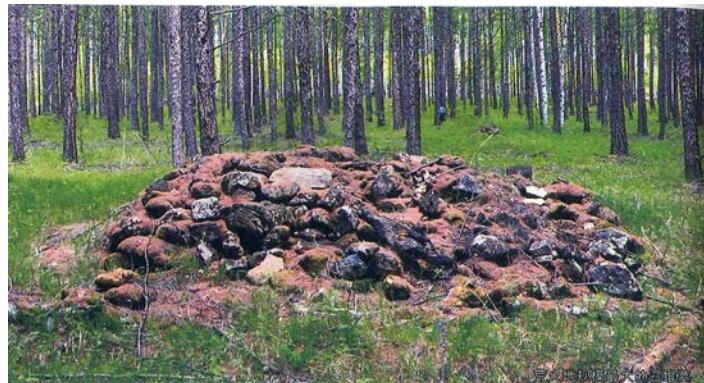


圖 11. 荒火地石堆，最大直徑約 5.6 米，最小直徑約 2 米，最高距地面約 1 米
(《蒙兀聖地額爾古納》, 頁 52)



石围墙残垣

圖 12. 荒火地石圍牆
(《蒙兀聖地額爾古納》, 頁 53)



圖 13. 荒火地石圍牆 (東方 IC)

(三)獨木棺墓地遺址

石勒喀河和額爾古納河匯合處：20世紀80年代後期俄羅斯考古學家在石勒喀河和額爾古納河匯合處發現了稱為 Dabsun 文化的墓葬群。墓內有用大塊原木掏空而成的獨木棺，年代可以追溯到西元 8—9 世紀。²³據《元史·祭祀志》記載，所謂獨木棺，即「用香楠木，中分為二，刳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²⁴明人葉子奇在《草木子》中記述：「元朝棺裏，用桿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大合為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園寢之地深埋之」。²⁵獨木棺的源頭或可往前追溯到住在森林時期蒙兀人的「樹葬」。²⁶

西烏珠爾：位於陳巴爾虎旗境內呼倫湖以北的西烏珠爾，除了樺樹皮棺和樺木板棺外，也發現了類似 Dabsun 文化的獨木棺，²⁷年代不早於 10 世紀初。²⁸其墓葬形制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主仰身屈肢葬。隨葬品包括小口殘陶罐、樺樹皮弓囊（內裝木弓）、骨弓弭、木馬鞍、鐵刀、鐵箭頭、蹀躞帶銅牌飾、銅帶扣。此外，發掘者還在地表採集到鐵馬鎧、銀耳環、陶罐、陶壺。²⁹這些文物說明這時在草原上生活的蒙兀人已遊牧化。

²³ 林梅村：〈從額爾古納松林到成吉斯汗的崛起〉，頁 204。

²⁴ 《元史》，卷七十七，志第二十七下，祭祀六，國俗舊禮（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1925。

²⁵ 《草木子》，卷三下，雜制篇（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60。

²⁶ 保羅·拉切夫斯基：〈室韋人是蒙古人嗎？〉，頁 948。

²⁷ 林梅村認為兩種不同的葬具屬於蒙兀人在走出山林前原來的兩個氏族，即「尼魯溫」的乞顏（獨木棺）和與之實行族外婚的「迭列列斤」的捏古思（樺樹皮棺和樺木板棺）。見林梅村：〈從額爾古納松林到成吉斯汗的崛起〉，頁 209。

²⁸ 林梅村：〈從額爾古納松林到成吉斯汗的崛起〉，頁 209。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將出土獨木棺測定為 7-8 世紀的遺物，見《海拉爾謝爾塔拉墓地》，頁 74。

²⁹ 林梅村：〈從額爾古納松林到成吉斯汗的崛起〉，頁 207。



圖 14. 西烏珠爾獨木棺 呼倫貝爾博物館
(本文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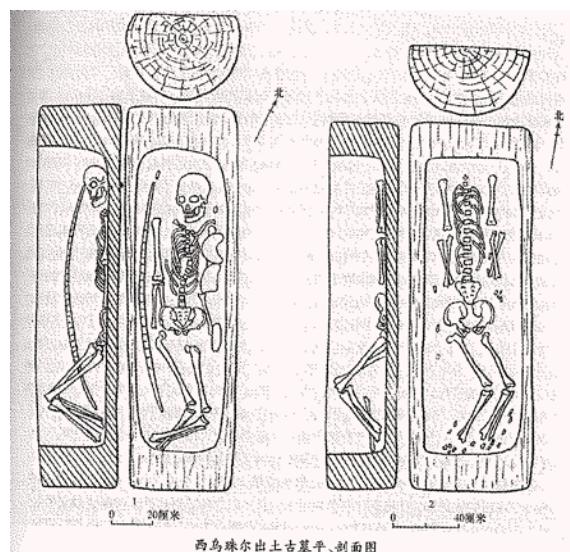


圖 15. 西烏珠爾獨木棺平、剖面圖
(《海拉爾謝爾塔拉墓地》, 頁 74)

崗嘎:同樣位於陳巴爾虎旗內的呼和諾爾鎮(原名完工鎮)的崗嘎墓地,2014年,也出土以獨木棺為主要葬具的典型遊牧民族文化遺存。崗嘎墓地北距海拉爾河主流約600米,東距呼倫貝爾市區約55公里。獨木棺用整段的松木加工製作而成,頂部開鑿出長條形的凹槽,將死者和隨葬品放置其內,用樹皮或獸皮包裹。其中的18號墓葬是呼倫貝爾首次發現以獨木棺為葬具的男女合葬墓。經碳十四測定棺木樣品,其年代為西元

8-10世紀。³⁰



圖 16. 崗嘎墓地西區 M7 獨木棺（東北—西南）
(〈內蒙古陳巴爾虎旗崗嘎墓地〉，頁 77)



圖 17. 崗嘎墓地東區 M18 雙人獨木棺合葬墓（東北—西南）
(〈內蒙古陳巴爾虎旗崗嘎墓地〉，頁 78)

墓地的隨葬品十分豐富，依其功能可分為生活用具、裝飾品、騎射用具等。三座女性墓中，墓主頸部均有紅色瑪瑙珠等飾品，與文獻謂室韋人「俗愛赤珠，為婦人飾，穿掛於頸，以多為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的記載相印證。³¹騎射用具，和西烏珠爾相同，主要有樺樹皮箭囊、箭、木弓、木馬鞍、鐵馬蹬、馬銜等。³²

³⁰ 劉國祥、白勁松、陳永志、李存信、沈睿文：〈內蒙古陳巴爾虎旗崗嘎墓地〉，《考古》，第 7 期(2015)，頁 75-76。

³¹ 《魏書》，列傳第八十八，失韋(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2221。

³² 劉國祥等：〈內蒙古陳巴爾虎旗崗嘎墓地〉，頁 80、82。

鄂嫩河、河北:蒙古西遷漠北後，其葬具也用獨木棺。這可從鄂嫩河流域溫都貢湖畔和鄂嫩河上游欽丹特鎮的墓葬得到證明。這些獨木棺被測定為 11—12 世紀的文物。³³值得注意的是元代蒙古的皇族也使用獨木棺。河北沽源縣發現的安西王阿難答的棺木便是使用一段完整的紅松木挖出凹槽後，再將死者的遺體置於其中。³⁴由此可見，額爾古納地區的墓葬與其後蒙元的喪葬傳統一脈相承。



圖 18. 安西王阿難答的獨木棺
(《海拉爾謝爾塔拉墓地》，頁 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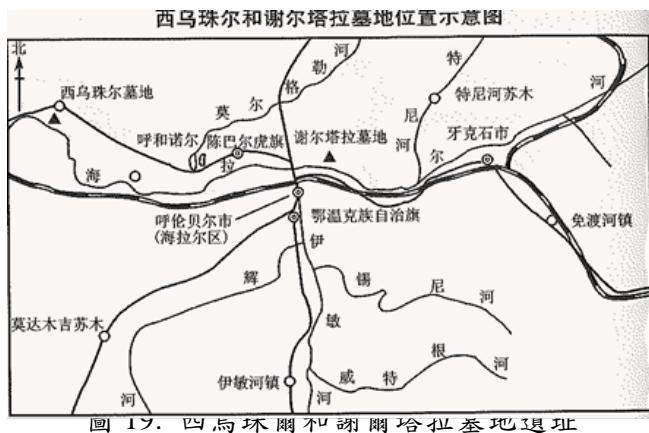
(四) 謝爾塔拉墓地遺址

墓地遺址位於海拉爾區謝爾塔拉鎮東約 5 公里的臺地上。墓葬年代約在 9-10 世紀左右。其文化內涵與西烏珠爾遺址存在較多共性，應屬同一文化系統，西烏珠爾為該文化的早期遺存，而謝爾塔拉墓地則屬於晚期遺存。因此，學者將西烏珠爾和謝爾塔拉墓葬為代表的遺存合稱為「謝爾塔拉文化」。³⁵

³³ 林梅村：〈從額爾古納松林到成吉斯汗的崛起〉，頁 212-14。

³⁴ 林梅村：〈從額爾古納松林到成吉斯汗的崛起〉，頁 217—19。

³⁵ 《海拉爾謝爾塔拉墓地》，序三，iv、頁 66。



(《海拉爾謝爾塔拉墓地》, 頁 3)

出土文物多與遊牧生活有關，墓葬有隨葬馬或羊肩胛骨。其他的隨葬品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為生活用器，主要有陶罐、陶壺、樺樹皮罐、木盤、木杯、木箸和鐵盤等；第二類為生產工具或武器，主要有矛、弓、箭、箭囊、刀等；第三類為馬具，主要有馬鞍、馬銜；第四類為裝飾品，主要有金或銀鎏金耳墜、銀螺旋形飾、銅人面形飾、玻璃珠、綠松石珠等。有些器具的種類與形制與後來蒙元時期蒙古族使用的器具不乏相似之處。³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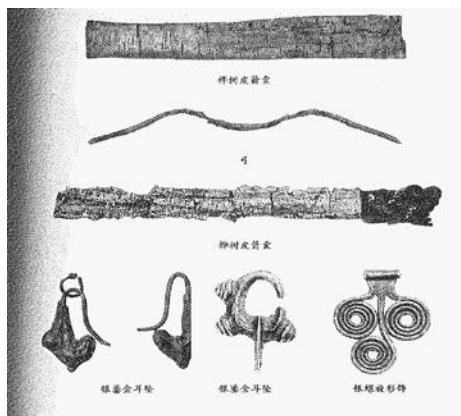


圖 20. 埋葬品

(《蒙古之源——呼倫貝爾》, 頁 77)

³⁶ 《海拉爾謝爾塔拉墓地》, 頁 32-58。

謝爾塔拉墓地，與西烏珠爾遺址的部分墓葬形制一樣，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³⁷其棺底或棺蓋板上鋪樟樹皮，這與崗嘎墓地的葬具接近，而墓主人多為屈肢葬，這又是三處墓地的共同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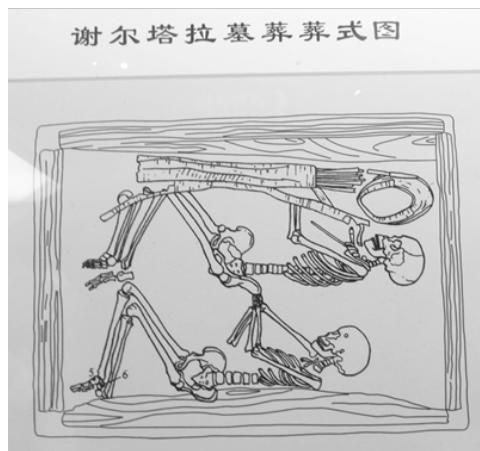


圖 21. M5 墓葬葬式
(《海拉爾謝爾塔拉墓地》，頁 15)

(五)保育與政治

額爾古納地區是蒙古人的發祥地，其中的遺址乃屬於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定義的「有形文化資產」中的「文化遺產」。³⁸不過，遺址位於戶外，易為雨雪所侵。雖然遺址因處於荒遠邊地，可免人為破壞，但若缺乏遊人問津，保育經費則難以累積。如何在保護遺址（及其自然環境）與資金挹注之間取得平衡，得靠中央小心擘畫，始克成事。

在額爾古納的諸多遺址中，奇乾，由於音近乞顏（MC. kiət ɲan < Mo. Kiyan），又位在激流河入額爾古納河右側，因此被認為是傳說中的「額兒古涅·昆」。³⁹近日，有個別學者開始注意到奇乾的保育和開發問題，

³⁷ 「西烏珠爾-謝爾塔拉」遺址中，獨木棺主要發現在西烏珠爾的墓地，謝爾塔拉墓地目前尚並沒有相關的文物出土，我在“The Term Mongol Revisited,”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60,1/2 (2017)一文，頁 197，註 110 中沒說清楚，特於此補記。

³⁸ 紀念碑、建築群、歷史場所、考古遺址皆屬之。

³⁹ 在史料中，奇乾之名僅一見於清屠寄撰《黑龍江輿圖說·呼倫貝爾》：額爾古納河又東北流四十餘里，左岸有喀吉米爾河，自界外分為二支先後來注之，右納二小水又東北流六十里，左岸先後納界外六小水，右岸先後納七小水，有奇乾河，西北流四十六里，左挾一溝水，右挾八溝水來注之，此水產金。見《遼海叢書》（二），

以便「建立可持續利用的模式」。⁴⁰額爾古納地方政府也表示，在保護奇乾的原生態環境前提下，加強奇乾村歷史文化的保護和利用，並製定了《奇乾村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總體規劃》、《奇乾村新農村新牧區建設規劃》、《奇乾村特色景觀旅遊規劃》。⁴¹

然而，額爾古納遺址的保育不應只是地方政府的事。鄂爾多斯伊金霍洛的八白室建於 1956 年，⁴²且只為成吉斯汗的衣冠冢，人民政府尚且將之核定為最高保護級別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具有 1000 多年歷史，且與蒙古源頭息息相關的額爾古納遺址，其所蘊含深厚「碑石性」(monumentality)的歷史特質，⁴³實非「假」文物的八白室所能相比。但除了謝爾塔拉墓地遺址於 2013 年 5 月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外，⁴⁴奇乾古遺址、⁴⁵荒火地遺址、西烏珠爾獨木棺墓群、崗嘎墓群，目前也只列作「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⁴⁶若從全球的觀點看，曾經

(瀋陽市:遼瀋書社，1985)，頁 1047。清以前無著錄，將奇乾比附為乞顏似尚需更多的證據。

⁴⁰ 杜立柱、周小新：〈試論少小邊民族地區資源保護與旅遊開發策略獨木棺——以奇乾鄉旅遊規劃為例〉，《設計》3期（2016 年），頁 74—75。

⁴¹ 張瑋、韓金龍：〈中俄邊境「世外桃源」：世界蒙古學者都在尋找的「額爾古涅·昆」〉，中國新聞網，，2017 年 03 月 19 日。
<http://www.chinanews.com/life/2017/03-19/8177706.shtml>，參閱時間：2018 年 9 月 18

⁴² 至元三年（1266 年）十月，成吉思汗八白室在燕京修建完成。元朝滅亡後，八白室多次播遷，1956 年最終遷建於鄂爾多斯伊金霍洛（Ejen Qoroy-a）。

⁴³ 所謂「碑石性」即古蹟文物的永恆性，除了刻意建立的紀念碑外，有「古舊價值」(age value)的空間，如遺蹟、廢墟、宮殿、古戰場、古都，甚至是已發黃的紙張，只要具重大的歷史意義，如大憲章，皆有此特質。參看甘德星：〈滿洲皇帝的漢化與大一統中國觀：乾隆五十三年御製臺灣滿漢文碑的「碑石性」研究〉，載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北京：中華書局，排印中）；Wu Hung,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15.

⁴⁴ 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2013):(二)古墓葬，序號 535，編號 7-0535-2-019。 http://www.sach.gov.cn/Portals/_0/download/_dqpqgzwbbhdw_.pdf。參閱時間:2019 年 6 月 3 日。

⁴⁵ 內蒙古政報 1996 年 8 期，第三批內蒙古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1996)，編號 3-31 (古文化遺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第三批內蒙古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參閱時間:2019 年 6 月 3 日。

⁴⁶ 見第五批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6): (一)古遺址，序號 15、(二)古墓葬，序號 6、7。<http://www.nmgsls.com/index.php?c=article&id=203>。參閱時間:2019 年 6 月 3 日。

建立世界超級大國的蒙古人，其發祥地的整體更值得推薦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中。世界遺產不只是一種榮譽，使遺址成為著名的旅遊景點，更重要的是在遺址一旦受到天災人禍的破壞後，可以得到全球的即時協助，修復原來的遺跡。

不過，在文化保育的背後實潛藏著一更嚴肅的課題：蒙古的正統之源，應在蒙古國的克魯倫河、土拉河、鄂嫩河的三河流域，還是中國的額爾古納地區？蒙古人的國族意識一旦高漲，內外蒙的合併即可以「故土收復」（irredentism）為由被提到議程上來，原來的文化保育或將變質，成為一複雜難解的政治議題。

（本文於 2020 年二月投稿，於 2020 年三月廿日審查通過）

《遊牧國家的誕生》

朱振宏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所長

何謂歐亞草原地帶

歐亞大陸的中央遠離海洋，由於南部連接著高聳的山脈，溫暖潮濕的空氣很難到達，成為乾燥地帶。特別是在偏南的低緯度地區，大沙漠連綿不斷。然而，在靠近北部的高緯度地區，由於受到從北方吹來潮濕空氣的影響，因此降下些許的雨和雪。但是，森林僅在山脈的北坡上形成，其他平地則是草原。儘管在草原地帶也可能可以耕種，但當時主流的是遊牧（儘管現在農耕在許多地區占主導的地位）。在草原和沙漠地帶間，有一片稱為乾燥草原和半沙漠的地帶。由於這裡也有一定的程度可以生長草，遊牧是十分可能的。甚至在它的南方，像天山山脈中的草原這樣海拔高而不適合農耕的地區，也成為遊牧者的天地。

讓我們具體看一下草原和半沙漠地帶是如何分布的。東起蒙古高原東部的大興安嶺山脈，西至多瑙河（River Danube）中流的匈牙利平原，綿延八千公里。東部包括中國北方的一部分，中部包含中亞和西亞綠洲地帶，西部包括東歐的部分地區。或許有人會懷疑，這樣一個如此廣闊的地域，在歷史上是否可以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然而，從斯基泰（Scythia）¹時代到匈奴²時代，這裡具有相對共通的文化、習慣和生活

¹ 斯基泰（Scythia），最初是西元前七世紀——西元前四世紀，希臘人對從北高加索（Ciscaucasia）地區到黑海（Black Sea）北岸統治的騎馬遊牧民的名稱。據信他們是屬伊朗語系（Iranian languages），沒有自己的文字。與其相同的文化已傳播到蒙古高原的東部和中國的北部地區，而且東方出現的年代更早，所以將西元前八/七世紀——西元前四世紀的歐亞草原地區，稱為斯基泰時代（Scythian Epoch Age）。西元前四世紀——西元前三世紀，受到來自東方的薩爾馬提亞人（Sarmatae）壓迫而衰退、消滅。

² 匈奴，西元前三世紀後半葉出現在中國北方的騎馬遊牧民。漢文史料記錄了他們的官號、人名等，說著突厥（土耳其）語系或是蒙古語系的語言，有人說他們有自己的文字，但沒有根據。西元前二世紀，統治著東起大興安嶺，西到中亞東部的地

方式的騎馬遊牧民，在保持相互交流的同時，也形成自己的獨立世界。

讓我們再談一談有關歐亞草原地帶的地理特徵吧。事實上，草原地帶也是東西交通的重要路線。試著將歐亞大陸東西方的中心城市用直線連接起來。首先，將據說是所有道路都會經過的羅馬（Rome）*連接到從元代以來即成為中國首都的北京（戰國時代已經是燕國的都城），會發生什麼結果呢？如果手邊有地球儀，試著用繩子連繫起來。在本書中，我將使用與地球儀相近似的蘭伯特圓錐投影法（Lambert conformal conic projection）所描繪的地圖，沿著從羅馬到北京的路線走一遍。

離開羅馬後，穿越亞德里亞海（Adriatic Sea），通過塞爾維亞（Serbia）首府貝爾格萊德（Belgrade）附近，在羅馬尼亞（Romania）北部橫貫喀爾巴阡山脈（Carpathians）進入烏克蘭（Ukraine）。穿過威爾加河（Wilga River），稍稍向北移動，是晚期斯基泰時代（Late Scythian）大型古墓集中的區域。通過烏拉山脈（Ural Mountains）的南端，進入到早期薩爾馬提亞（Sarmatae）³時代最大的菲利波夫卡古墓（Filippovka burial ground）北側。沿著哈薩克（Kazakhstan）北部前行，經過阿爾泰山（Altai Mountains）北部的巴澤雷克古墓群（Pazyryk burials）附近，從西北向東南橫貫蒙古高原，越過萬里長城，就到達北京。這條路線從喀爾巴阡山脈一直延伸到萬里長城，全程近九成都經過草原地帶。

接下來讓我們將伊斯坦堡（Istanbul，以前稱為君士坦丁堡）和西安（也被稱為絲路終點的古都長安）連接起來吧。離開伊斯坦堡，斜切黑海（Black Sea），穿過早期斯基泰時代（Early Scythian Epoch）大型古墓較多的北高加索山脈（Ciscaucasia Mountains），再掠過裏海（Caspian Sea）北部。伏爾加河口（Volga River）*有一座城市阿迪爾（Itil），因

區，西元前一世紀左右，分裂為東西兩部，東匈奴臣屬於西漢，西匈奴則被消滅。
東匈奴在西元一世紀左右又分裂成南北，南匈奴臣屬於東漢。

* 譯者案：作者意思是「條條大路通羅馬」（All roads lead to Rome）。

³ 薩爾馬提亞人（Sarmatae），西元前四世紀——西元前三世紀，從烏拉山脈南部西進壓迫斯基泰人，統治著從北高加索到黑海北岸的騎馬遊牧民。據信他們的語言與斯基泰相同，屬伊朗語系。他們的祖先是烏拉山南部的薩爾馬特人（Sarmatians），北部是高加索另外一支遊牧民，但沒有確實證據。

* 譯者案：伏爾加河（Volga River），又名窩瓦河。

作為七世紀——十世紀遊牧國家可薩汗國（Khazar）⁴的首府而興盛。越過鹹海（Aral Sea）的北岸，從早期薩迦⁵時代（the epochs of the Saka）到中世紀（Middle Ages），遊牧民的遺跡集中在錫爾河口（Syr Darya）附近，橫穿哈薩克南部逆流而上伊犁河流域（Ili River），從薩迦時代到突厥⁶時代，重要的遺跡可說是層出不窮。越過天山山脈到吐魯番的南方，進入沙漠到達敦煌。在那裡，將經過河西走廊的綠洲地區，越過黃河再往前走一段路，就抵達西安。從北高加索地區到天山山脈，全程有超過一半的路屬於草原及半沙漠的遊牧地帶。

作為東西交流的代名詞——絲綢之路，大致分為三條路線：從北方的草原路線，到綠洲路線，再到海上路線，其中以連接布哈拉（Bukhara）、薩馬爾干（Samarkand）等中亞綠洲城市的綠洲路線，一般認為是主要的路線。但是，連接大陸東西方最短的路線，就是這樣通過草原地帶的草原路線。而且在草原地帶，也很少有難以逾越的大沙漠和險阻的山峰。

除了這樣的地理優勢外，草原地帶還有人為的優勢，那就是這個地區的主人公是騎馬遊牧民。在南方農耕地區的綠洲地帶，很難產生一個有許多城市並且佔據大區域的統一國家，但在草原地帶，一旦遊牧國家興起，就會形成強大的力量（蒙古帝國就是最大的例子），當如此強大的國家誕生時，交通變得更加順暢，促進了商業活動和文化交流。

眾所周知，綠洲地帶的居民也依靠遊牧政權，廣泛地致力於交易和商

⁴ 可薩（Khazar），統治著裏海、黑海北岸，語言屬突厥語系（Turkic languages）的遊牧國家。經常入侵高加索以外，當今亞塞拜然（Azerbaijan）和亞美尼亞（Armenia）的領土，並與阿拉伯伊斯蘭強國的勢力相衝突，但與拜占庭（Byzantine）保持較好的關係。他們建立城市，貿易活躍，統治階層在九世紀初改信奉猶太教（Judaism）。

⁵ 薩迦（Saka），中亞草原地帶的騎馬遊牧民，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Persia）對他們的總稱。與希羅多德以希臘語所記載的斯基泰相同，漢文史料稱他們是塞人。西元前一世紀南下進入印度的一部分薩迦，也被稱為印度——斯基泰。

⁶ 突厥，大約在西元六世紀中葉，以蒙古高原為中心興起的突厥語系的遊牧國家。西元 583 年左右分製為東西兩國，西元 630—650 年代臣屬於唐朝。但是，東突厥在西元 680 年重新復國，創造自己的突厥（鄂爾渾）文字。通過粟特人（Sogdian）進行活躍的交易活動。西元七四四年被回紇所消滅。

業、金融活動，並深深地融入遊牧國家（粟特人⁷與突厥、回紇汗國⁸共存共榮關係最為著名）。這樣的遊牧國家，不僅影響到中亞的綠洲地帶，還影響到毗鄰的中國、西亞和歐洲。

本書將利用文獻史料和考古資料，探討騎馬遊牧民族和遊牧國家是如何誕生的，形成的時間，以及遊牧國家的特徵等問題。

第一章 騎馬遊牧民的誕生

騎馬遊牧民和「騎馬民族」

對騎馬遊牧民一詞進行分解，就變成騎馬+遊牧+民。毋庸置疑，民就是人類，關於剩下的兩個詞彙，我想先略作說明。

遊牧是畜牧的一種，是指定期性的移動更換牧場形態。畜牧與農耕同樣是人們生產糧食和衣服原料主要的手段。隨著機動性的增加，人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受到很大的影響，就連住房（搭建帳篷的原料），也會通過畜牧生產而成。英文將遊牧民稱為“(pastoral) nomads”，把遊牧稱為“nomadic pastoralism”或僅僅是“nomadism”。

所謂騎馬就是乘坐在馬背上，因此稱為騎馬。「騎」字右邊的「奇」，意思是「彎成鉤形」，即兩腿彎曲，也就是跨坐的意思。因此，側坐不能說是騎乘的原意。英文中稱為“horseback riding”（騎在馬背上），騎馬遊牧的人稱為“mounted nomads”（騎在馬上的遊牧者）或是“nomadic horsemen”。

目前，騎馬遊牧民的分布，只有從蒙古高原的阿爾泰山脈、天山山脈、喀拉崑崙山（Karakoram）與興都庫什山（Hindu Kush Mountains）兩山脈周邊的地區，但過去曾經是廣泛地分布在歐亞草原地區。另一方面，許多遊牧民也不騎馬了，非洲的遊牧民不騎馬，北極圈附近和西伯利亞

⁷ 粟特人，生活在今天從烏茲別克（Uzbekistan）東部到塔吉克（Tajikistan）的綠洲地帶。語言屬伊朗語系。自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時代就聞名於世，尤其是在西元五世紀——西元九世紀，在與遊牧國家保持關係的同時，他們在絲路沿線建立了貿易網絡，從事東西方之間的貿易活動。

⁸ 回紇汗國，取代突厥成為統治蒙古高原，屬突厥語系的遊牧國家。與唐朝進行活躍的絹馬貿易。統治階層信奉摩尼教（Manichaeism）。統治階層居住在都城宮殿中，在其周邊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農耕，這在遊牧國家歷史中是劃時代的。西元 840 年滅亡，一部分逃往西方，重新復興起來。

(Siberia) 的部分地區，遊牧民也有以馴鹿取代馬匹。

順道說一下，與騎馬遊牧民相似的用語是騎馬民族。這是江上波夫⁹於戰後所提出的一種學說而廣為人知。江上波夫將歐亞地區的人民分為農耕民、遊牧民與狩獵民，其中遊牧民轉變成騎馬民，與農耕民進行對抗，據其所言，最終形成一個全面控制這些民族的國家的是騎馬民族。他以日本古墳時代大和政權的成立為例，提出大和政權是從大陸東北亞系的騎馬軍團作為征服者東渡建立的。作為天皇家族不是起源於日本，而是出身大陸的騎馬民族。此一說法得到了一般歷史愛好者的廣泛支持，但是遭到歷史學者和考古學者的否定和忽視，考古學者小林行雄和佐原真對此相繼提出了批判。

該學說解除了天皇對戰前的束縛。應該予以評價的是，他試圖通過從大陸的交流來掌握日本的古代史。另外，儘管筆者無法判斷此一說法與日本有關的部分是否正確，然而，在歐亞大陸可以舉出許多由相對少數的武裝集團，入侵其他地區成為征服者的例子，但是我不願意將這樣的集團稱之為「騎馬民族」。

「民族」這個用語，歷史學上是在國家和政治權力結合時使用，指的是現代政治上獨立的民族國家或是尋求獨立的集團。現代的政治領袖，在說明國民的團結是否自古以來就是連續存在時，常常使用「民族」一詞。在超越時代的人類學中，民族被稱之為“ethnos”，作為無色透明的術語使用。但是在無法忽視時代性的歷史學中，古代和中世紀的國家，特別是適用於歐亞草原地帶騎馬遊牧民所建立的國家，不能毫不猶豫的使用現代民族的概念。因此，在本書中我想使用「騎馬遊牧民」這個用語。

動物的家畜化

遊牧始於何時何地？騎馬起源於何時？遊牧民何時開始騎馬？這些問題都尚未完全解決。各種類型的說法與爭論，我無法逐一介紹，因此我將集中敘述目前最合理的說法。

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是綿羊（sheep）與山羊（goat）。那是在西亞

⁹ 江上波夫（1906——2002），考古學者、東洋史家。1930——1940 年代在長城地區進行考古學和民族學的調查，著眼於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的差異性，提出騎馬民族說的看法。1948 年發表了騎馬民族說，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靠近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的地區，今天的黎巴嫩（Lebanon）、以色列（Israel）、巴勒斯坦（Palestine），即所謂肥沃月彎地帶（Fertile Crescent Region）¹⁰的一部分。年代在西元前七千六百年，距今約一萬年前。在此前不久，人們開始大規模的建立定居聚落和進行農耕（栽培野生麥）。他們集體狩獵，捕捉綿羊和山羊，並在聚落中將牠們豢養起來，不一次性全部殺掉，一部分保留下來。如果豢養的羊生了羔羊，那麼這隻小羊就不再是野生，而是接近家畜。如果進行了世代交替的豢養，那麼完全的家畜就誕生了。如果進行農耕的話，只收割穗子，剩下的莖也會用作成家畜的飼料。換句話說，大型的定居聚落和農耕的確立，是家畜化的先決條件（藤井純夫《麥子和綿羊的考古學》）。

家畜化的目的，首先是要提供穩定的肉類，這點毋庸置疑。如果屠宰的話，可以獲得毛皮。但是，既使不屠宰羊，也可以只剪羊毛使用，紡成毛線，然後織成織物。也可以用水將羊毛做作毛氈。此外，每頭羊的乳產量很少，但是數十頭綿羊和山羊集中擠奶的話，就可以達到可觀的奶量了。奶易於腐壞，不過可以加工成各種各樣的奶酪和奶油等奶製品保存起來。

關於食肉以外的利用方法始於何時，意見分歧，有的認為是家畜化以後即開始，但認為是家畜化後一千至二千年才開始的說法則更有說服力。毛氈具有良好的防水性和保溫性，適合作為帳篷的布料。另外，做為可以保存的乳製品，對於移動者及遊牧民來說是重要的食物。毛氈帳篷和乳製品的開發，雖然並不一定是遊牧不可或缺的條件，但卻是促進遊牧形成的主要原因吧。

比綿羊和山羊稍晚，大約在西元前七千年左右，肥沃月彎地區的西北部，對牛和豬似乎也進行了馴化。關於馬的馴化年代，目前的爭論分為兩個種：一是，西元前四千年至西元前三千五百年，草原地帶開始騎馬；二是，西元前三千年左右，開始在草原上飼養食用的馬，西元前二千年左右，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開始有了騎馬，到了西元前十世紀至

¹⁰ 肥沃月彎地帶（Fertile Crescent Region，或稱為新月沃地），從地中海東岸的黎巴嫩山脈到伊朗西南部的札格羅斯山脈（Zagros Mountains）的弧狀山麓地帶。秋冬時節，從地中海吹來的潮濕空氣，使山脈降下雨雪，生長麥子，野生的山羊和羊棲息於此。

西元前九世紀，騎馬才普級化。然而，根據近年考古學發掘的成果與分析，認為後者的說法更是具有優勢。

遊牧的產生和騎馬遊牧民的誕生

大約從西元前五千五百年開始，西亞的氣候暖化，導致該地區草原出現乾燥化的現象，有人認為開始有了捨棄農耕選擇遊牧的想法。不僅是自然環境，人類社會也形成逐漸促進遊牧的基礎。如果完成畜牧化，控制群體的再生體制也已就緒的話，就無需留在聚落（原本他們就是移動的採集者）。隨著一些村落發展成城市，周邊栽種麥子的範圍也會擴大，羊就會被趕到外面去。在此之前，肥沃月彎之外的乾旱土地是無人居住的荒地，但是隨著遊牧民的進入，連結西亞各地的交易路線也增加了選擇。然而，這個階段的遊牧民還沒有搭建帳篷，只是將營地周邊可以使用的材料，搭建簡易的住所。

農耕與畜牧的混合文化，在西元前六千年紀（西元前 6000 年——西元前 5001 年），從巴爾幹半島（Balkans），經由高加索（Caucasus）、中亞（Central Asia）南部，進入歐亞草原地帶。但是草原地帶的遊牧化過程似乎進展相當緩慢，由於村落沒有發展到城市，羊也沒有被趕出，因此無需從事遊牧。

促使草原地帶遊牧化的主要原因是氣候的乾燥化、引進移動方便的車和騎馬技術。據推測，車子是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發明於美索不達米亞（車子有各種起源說法，例如：滾輪說、雪橇說、兩者折中說等）。車輪呈現沉重的圓盤狀，可以讓牛來牽引，然而既使這時候馬已經被馴化，但也不適合牽引車輛。似乎在二、三百年之間，車子已在歐洲和草原地帶西部廣為傳開。

從西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氣候逐漸乾燥化。比起農耕，草原地帶的水土更適宜發展遊牧，但區域之間也存有差異。烏拉山脈的東部似乎更加乾燥，此時已經引入冶煉銅的技術，但還沒有發展到能製作實用工具的階段。從西元前二千年稍晚，草原地帶也開始製作比銅更加堅硬的青銅。從那時起到西元前一千三百年左右的文化，在烏拉山脈以西有斯魯夫納亞文

化（Srubnaya culture，又稱木槨墓文化）¹¹，烏拉山脈以東有阿凡納謝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¹²，可以看出兩種文化之間似乎存在著關聯性，但細節還不太清楚。總之，此一時期定居仍是占主流的地位。

大約從西元前一千三百年，草原地帶東部開始出現被稱為卡拉蘇克文化（Karasuk culture）¹³的晚期青銅器文化。通過製作銳利的短劍、斧頭、馬具（銜和銜扣），¹⁴青銅器的生產有了相當大的進步。騎馬在草原地帶取得普級被認為是在卡拉蘇克文化後期（西元前十世紀——西元前八世紀）。至此騎馬遊牧民終於誕生了。騎著馬追趕家畜，根據季節轉移牧地成為了可能。遊牧民的行動範圍一下子擴大了。

騎馬不僅帶給遊牧民移動上的便利，與性能較低的老式車子不同，馬具有快速前進、停止、迴轉等優點。最重要的是，馬比什麼都快。在十九世紀前半葉蒸氣車被商業化之前，馬是最快的乘坐物。這種機動性和速度，在採取集體行動時，特別是在軍事層面上所發揮的效果。在強大的騎馬軍團背景下，一個威脅南方定居農耕地帶的騎馬遊牧民登場了。

王權的象徵——營建大型古墓

在世界各地古代王權誕生的地方，通常會建造象徵王權的紀念性建築物（紀念碑）。埃及古王國時代（Ancient Egypt, Old Kingdom）初期，建造了金字塔。日本在大和政權建立時代，也建造了大小不一的古墓，其規模的不同被認為是代表社會地位的差異。那麼在草原地帶會是怎麼樣呢？

¹¹ 斯魯夫納亞文化（Srubnaya culture），「斯魯夫納亞」是俄羅斯語「木槨」的形容詞。將圓木組裝在一個長方形的洞中製成棺材，遺體屈葬放入棺材，在低矮的土堆中覆蓋。分布在烏克蘭到烏拉爾，進行農耕與畜牧（養豬）的定居聚落。

¹² 阿凡納謝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文化名稱是來自於南西伯利亞（South Siberia）的考古遺址。前期有火葬，陶器上的特徵有雷文和萬字（卍）文等幾何學圖案。這種類型的陶器分布從南烏拉爾（South Ural）、哈薩克、南西伯利亞到中國新疆北部等廣泛地區。農耕與畜牧複合型經濟，但沒有養豬。

¹³ 卡拉蘇克文化（Karasuk culture），以南西伯利亞的米努辛斯克盆地（Minusinsk Basin）的考古遺址命名。這種文化特色的青銅短劍分布於中國北方、哈薩克，甚至是黑海北岸。從刀劍之類的整個青銅器來看，與中國北方西元前十世紀前後的文化關係密切。

¹⁴ 銜和銜扣，駕御馬的工具。在馬的下頸地方有一個無牙的區域，在其中插入一個棒狀或是二枝連結式的銜，兩端戴上銜扣（日本的馬具用語是「鏡板」），取出繮繩，從銜扣的孔中拉出繫面繩（頭部的帶子）。

為了尋找最古老的騎馬遊牧民古墓，日本與蒙古國聯合調查團從 1999 年開始著手調查。

我們選擇的發掘地點是位於蒙古國西北部的庫布斯格爾縣（Khövsgöl）的歐西貢—烏布林考古遺址（Ulaan Uushig site），在那裡有許多被圓形或方形石圍（環狀列石）牆包圍的石塚（草原考古學專門的用語稱之為「海列克斯爾」〔khureksur, Hereksur〕）¹⁵和鹿石¹⁶。由於太大的石塚發掘困難，所以我們選了一個規模較小的進行發掘。石塚的直徑是 12—13 公尺，高不到 2 公尺，這一帶圍繞著 25—30 公尺的方形石圍，在其外側有二十一座小石堆圍繞著東半部。

在石塚中央下方的石槨中，沒有發現人骨及殉葬品，東邊的二十一座石堆發現了鼻面朝東的馬頭蓋骨和頸椎平行排放（一部分的石堆中只挖出骨頭的碎片）。在一些石堆中還發現了馬蹄和尾椎骨。由此可以推測，埋葬在這個墳墓的人，當時在舉行葬禮時，殉葬了二十一匹馬，馬肉被參加葬禮的人分食，馬的頭和頸、馬蹄和尾椎，埋在石堆下面。也許是墓主人的二十一個人或二十一個家族，分別獻出一匹馬吧。

值得注意的是，鹿石的周圍也出現了完全相同的情形。從石塚向 400 公尺的地方，樹立著許多鹿石。繞圍著直徑 2 至 3 公尺的石圈，而那些石圈也都發現了朝向東方的馬頭蓋骨和頸椎、馬蹄。從相同的葬禮儀式來看，製作石塚的人和樹立鹿石的人應該是同一批人。鹿石有卡拉蘇克文化特徵的短劍，是早期斯基泰時代（Early Scythian Epoch，西元前八世紀—西元前六世紀）典型的動物圖案，兩者被同時表現出來，所以可以推定西貢—烏布林遺址的年代大概是在西元前十世紀—西元前六世紀左右。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石塚的年代也大致相同。

我們所發掘的石塚規模很小。據筆者所知，蒙古最大的石塚，石圍邊長超過 200 公尺，中心高 5 公尺，外側的石堆有一千七百座以上。據悉，美國

¹⁵ 石塚，十九世紀的俄羅斯研究者將蒙古語中吉爾吉斯人（Kyrgyz）表示墳墓意思的「希爾吉斯福爾」，聽成了「海列克斯爾」。分布在蒙古、圖瓦（Tyva）、阿爾泰、天山等地。周圍的石圍牆除了圓形、方形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形狀。有說法認為不是墳墓，而是太陽崇拜的祭祀遺跡。

¹⁶ 鹿石，刻有淺雕鹿的圖像，高 1—3 公尺石柱（多棱柱，少圓柱）。除了鹿以外，還有耳飾和頸鏈，弓矢和盾、腰帶、短劍和刀等。據認為他們是沒有人臉的戰士（儘管很少），分布地區幾乎與石塚相當。

的調查團嘗試發掘了幾處石堆，也出土了朝向東方的馬頭蓋骨和頸椎。也就是說，埋在石堆的人，獻上了超過一千七百匹以上的馬。能夠讓人獻出這麼多馬的人物，一定是擁有相當權力的人物吧。如此推測，在西元前十世紀或是西元前九世紀，蒙古高原已經出現了可以稱之為「王」的騎馬遊牧民存在。但是目前還不清楚他的名字和實際情形。草原地帶的西部在斯基泰出現後，情況就變得很清楚了；草原地帶的東部只有等到匈奴興起後，統治制度和社會制度才為人所知。

第二章 斯基泰的起源

適應草原的社會

在世界史的舞台上，作為遊牧國家最早被記下名字的是斯基泰，接著是出現在歐亞草原東部的匈奴，他們聞名於世，具備了與先進文明地帶的希臘和西亞、中國相匹敵的強大軍事力量，甚至超越當時先進的定居農耕地區。對於定居社會的人民來說，他們的社會制度與農耕國家完全不同，令人感到驚訝。因此，定居社會對他們存有偏見和蔑視，視他們為惡魔之子，在人類社會中，他們野蠻地如同鳥獸一般的存在。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遊牧是草原上最適合的生活方式，遊牧民有他們所認同的價值觀。也有一些抱持靈活思想的人，例如希羅多德（Herodotus）¹⁷和司馬遷¹⁸，他們兩人憑藉著對人類有著深刻的洞察力，同時又能對事物採取客觀的方式書寫，吸引了讀者的興趣。可以說他們兩人都具備了作為歷史學家最高的素質。他們的著作被定位是東西方史書

¹⁷ 希羅多德（西元前 485 左右——西元前 424 左右），希臘歷史學家，被稱為「西方史學之父」。出生於小亞細亞（Asia Minor）西南部哈利卡那索斯（Halikarnassus，今土耳其博德魯姆〔Bodrum〕）的上流家庭，叔叔是敘事詩人。他的著作《歷史》（*Historiae*），描述他周遊各地，以及為何當時超級大國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與希臘人之間戰爭主題的「調查研究」。那個詞彙“*Historiae*”，後來被用作「歷史」（History）的意思。

¹⁸ 司馬遷（西元前 145/135——西元前 93/87），西漢人，擔任漢武帝（西元前 141——西元前 87 年在位）時的史官。繼承父親司馬談，完成了《史記》，有中國的「歷史之父」稱呼。《史記》按順序組成，「本紀」記載從傳說的五帝到漢武帝時期重要的事件；「列傳」是描寫人物傳記和記載異國的事情，還有其他的部分〔譯者案：還有「表」、「書」、「世家」等部分〕。司馬遷不迷信權威，在保持客觀眼光的同時，也描繪出人情的微妙之處。《史記》作為文學作品也是被高度的評價。

的最高峰，至今仍被人們持續地閱讀著，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有趣的是，他們兩人在論及斯基泰和匈奴的風俗習慣，竟然有著驚人地相似。讓我們比較一下：

希羅多德《歷史》卷四	司馬遷《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
不修築城市或城牆	毋城郭常處
不留下一人，家宅跟著遷移	逐水草遷徙
騎馬使用弓箭	士力能毋弓，盡為甲騎
不知播種與耕種的方法	毋耕田之業
生活上……依賴家畜	隨畜牧而轉移
波斯王……攻打過來時……逃跑……撤退；波斯王撤退時，則追擊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

總結以上的共通點，整理如下：

- (1)不從事農耕的純粹遊牧民。
- (2)隨家畜一起遷移，沒有定居的城市和聚落。
- (3)特別擅長弓箭，全體男子都是騎馬戰士。
- (4)戰術富機動性且現實，處於不利的時候，會毫不猶豫的撤退。

這些共同的特徵，都和定居農耕地帶的文化、社會和道德標準完全相反。斯基泰與匈奴如此地相似，絕非偶然。這是因為歐亞草原的自然環境與包括鄰近的地區在內，都適合發展騎馬遊牧民，使其具備了適合登場，活躍於歷史的條件。

希羅多德講述斯基泰的起源神話

希羅多德在《歷史》的卷四第 5——12 節中提到了關於斯基泰起源的三種傳說。第一種傳說是斯基泰人自己說的。在希臘最高神宙斯（Zeus）和黑海的維斯杜拉河（Vistula River）（現今流經烏克蘭〔Ukraine〕的聶伯河〔Dnieper〕）的女兒，在一個無人之地生下一個名叫塔爾吉泰斯（Targitas）的男孩，這個男孩後來又依順生下了利波克賽斯（Lipoxays）、阿爾波塔賽斯（Alpoxys）、科拉克賽斯（Colaxsats）等三子（沒有提到三個小孩的母親）。在這三個人統治的時代，從天上掉下黃金製成的器具——犁和軛（為了牽引犁和車套在馬和牛頸的用具）、戰

斧和杯子——。當大哥和二哥試圖要將它們拿起來時，黃金製成的用具就燃燒起了，無法靠近。但是當幼弟走到器具旁邊時，火就熄滅了，幼弟就將它們帶回家。兩個哥哥同意把王權交給幼弟。出自於幼弟的王族，希臘人稱其為斯基泰。

另外一方面，住在黑海地方的希臘人，流傳著稍有不同的傳說。希臘神話中最偉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¹⁹擊敗了三頭三身的怪物革律翁（Geryon），帶著怪物擁有的大量牛群，路過後來成為斯基泰人居住的無人之地。此時正值嚴寒的冬季，他披著獅子皮睡著了（他隨身攜帶著曾經被他所消滅獅子的皮）。就在這個時間，從車輶上拆下來吃草的馬，就像神隱一樣消失了。醒來的赫拉克勒斯在尋找馬的時候，來到了維斯杜拉河東岸廣闊的森林地帶。赫拉克勒斯在那裡的一個洞窟中，遇到了上半身是少女，下半身是蛇的蛇女，蛇女說馬就在她的身邊，如果不和她交往，就不把馬還給他。於是赫拉克勒斯與蛇女發生了關係，蛇女並懷了三個兒子。蛇女問赫拉克勒斯孩子們長大後該怎麼辦？赫拉克勒斯向蛇女展示了如何拉弓（或是如何拉弦）和帶子的繫法，表示孩子中誰能和他做同樣的事，那就由他繼承王位，赫拉克勒斯將弓和金杯的長條帶給了蛇女。三個兒子長大之後，蛇女就遵照命令，長子和次子因為無法完成任務離開了國家，幼子斯庫特斯（Scythes）完成了所有的任務留在了國家。據說斯基泰世世代代的國王，就是斯庫特斯的子孫。

這兩個傳說的共同點是，父親都是外來神，母親都是本地出身，生了三個男生，只有最小的兒子通過了資格測試。上天或是赫拉克勒斯給他金製品和工具。根據這個神話，法國的杜梅吉爾（Georges Dumézil）和日本的吉田敦彥，發表了與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神話²⁰進行比較的看法。筆者認為，弓和帶子是騎馬遊牧民典型的武器和服裝的一

¹⁹ 赫拉克勒斯（Hercules），希臘神話中怪力的英雄。他因為誤殺自己的妻子而感到後悔，根據神諭踏上了完成十二項功業（消滅怪物等考驗）的旅途。他首先絞殺了涅墨亞獅子（*Nemean lion*），剝取獅皮。第十項是消滅了怪物革律翁（Geryon），把它所擁有的牛群全部帶走。

²⁰ 印歐語系神話（Indo-European languages），杜梅吉爾（Georges Dumézil）指出，印歐語系的社會分別由神官、戰士貴族和農民三個階層所組成。斯基泰（語言是印度語系，即印度、歐洲語系）也不例外，神話中的金盃是神官使用的聖杯，戰斧是戰士的財產，犁和輶則是農民的象徵。

部分，第二種說法更接近原始斯基泰的神話，可能斯基泰統治黑海北岸的定居農耕民族後，改變了神話中農耕具的內容。

希羅多德認同的說法

希羅多德還介紹了另一個說法。根據此一說法，斯基泰是亞洲最早的遊牧民，但因受困於馬薩革泰人（Massagetae）²¹的攻擊，結果離開了阿拉斯河（Araxes River），遷往辛梅里亞（Cimmeria）地區，將辛梅里亞人（Cimmerians）²²趕走，然後住了下來。這個說法與希臘人和巴爾巴羅伊人（Barbary，非希臘人〔譯者案：古希臘人對於異民族的蔑稱〕）的說法一致，希羅多德自己也認為這個說法最可信。

斯基泰居住的辛梅里亞地區，無疑是從高加索北方到黑海北岸的草原地帶。然而對於他們所經過的阿拉斯河與現今哪一條河相對應？以及馬薩革泰人原本居住在哪裡？則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最有力的說法是將阿拉斯河看作是今天的伏爾加河（窩瓦河）或者是中亞的錫爾河；馬薩革泰人居住地是在今天的哈薩克西部或是烏茲別克北部。

無論如何，根據這個說法，斯基泰被另一個騎馬遊牧民攻擊，從遙遠的東方遷移到北高加索和黑海北岸的草原，又將別的騎馬遊牧民趕走。這個說法，沒有像第一種及第二種說法有著神話傳說的要素。希羅多德理所當然的會認同這個說法。其實，若是通觀日後歐亞草原的歷史發展，會很自然地接受這個說法。

以歐亞大陸的中央為中心，觀察大集團遷移和入侵的浪潮，浪潮的方向存在著特殊的趨勢。以南北方向而言，浪潮是由北向南；在東西方向上，則是從東向西，這兩種方向的浪潮，占了壓倒性的多數。由北向南的浪潮，是由於從草原或森林地帶的遊牧民、狩獵民、半農半牧民，入侵具

²¹ 馬薩革泰人（Massagetae），是中亞的騎馬遊牧民。被認為是與斯基泰同系。獻祭馬匹、崇拜太陽。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西元前 559 年——西元前 530 年在位）攻打馬薩革泰，但敗給了馬薩革泰女王托米麗絲（Tomyris），居魯士在激戰中戰死。

²² 辛梅里亞人（Cimmerians），根據希羅多德的說法，騎馬遊牧民是被斯基泰追趕，從黑海北岸入侵西亞。也有人主張世界史上最早的騎馬遊牧民應該是給辛梅里亞。也有人將其存在限定在西亞的說法。根據亞述（Assyria）的泥板文書，兩者似乎是在西元前八世紀末——西元前七世紀同時在西亞活動。

有城市文明的定居農耕地帶所引起的。另一方面，從東向西的移動，是因遊牧民之間的衝突所引起的，主要是在草原地帶發生。繼斯基泰之後，薩爾馬提亞人（Sarmatism）從東方出現並消滅了斯基泰。西元四世紀後半葉，匈人（Hun）²³也從東方出現，襲擊了薩爾馬提亞人的後裔阿蘭人（Alan）²⁴。隨後在西元六——七世紀，阿瓦爾人（Avars）²⁵從中亞向西進入草原地帶，出現在歐洲。西元六世紀中葉，在阿爾泰、蒙古高原崛起的突厥，像是在追趕著阿瓦爾人，其勢力一口氣擴展到了鹹海（Aral Sea）和裏海（Caspian Sea）北岸。此外，保加爾人（Bulgars）²⁶、可薩人（Khazars）、馬札爾人（Magyar）²⁷、佩切涅格人（Pechenegs, Patzinaks）²⁸、波洛韋茨人（Porovec 或稱庫曼人、欽察人）²⁹等等，主要是突厥族系（馬札爾人屬烏拉爾系），相繼從東方出現。到了十三世紀，可稱得上是最會打仗的蒙古人（Mongols）登場了，席捲了整個西亞和東歐。

²³ 匈人（Hun），西元四世紀後半葉，從東面越過伏爾加河，征服了阿蘭、東西哥德，並威脅東西羅馬帝國，引起民族大遷移。從語言上來看，應該是突厥語族或是蒙古語族。西元五世紀中葉，在阿提拉（Attila）統治時期迎來了頂盛期，但他死後快速衰落。

²⁴ 阿蘭人（Alan），西元一世紀後半葉——二世紀，出現在薩爾馬提亞人（Sarmatae）東方的騎馬遊牧民。相當於《後漢書·西域傳》中被稱為「阿蘭」的民族。雖然也有和薩爾馬提亞人不同的說法，但在語言上似乎同樣是屬伊朗語系。西元 350——西元 360 年左右，雖然被匈人所征服，但在匈奴滅亡後，仍殘存於高加索山中。

²⁵ 阿瓦爾人（Avars），西元六世紀左右，從東面出現在裏海（Caspian Sea）和黑海北岸，對拜占庭構成脅協的騎馬遊牧民。語言上被認為是突厥語系或是蒙古語系，也有說是被突厥所滅亡的柔然一部分。今天的匈牙利（Hungary）留下許多遺址。西元九世紀被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消滅。

²⁶ 保加爾人（Bulgars），西元五世紀末出現在裏海和黑海北岸以突厥語系為中心的騎馬遊牧民。西元七世紀中期，由於內訌和哈薩克斯坦的侵略而分裂，遷移到多瑙河下游的一部分控制了巴爾幹半島，慢慢被斯拉夫（Slavic）同化。

²⁷ 馬札爾人（Magyar），原本住在烏拉山脈附近，語言上是烏格爾語系（Ugric）的騎馬遊牧民。西元八世紀左右西進，經過可薩領土北部、南俄羅斯，西元九世紀末，定居在匈牙利平原（Great Hungarian Plain）。匈牙利人的自稱。

²⁸ 佩切涅格人（Pechenegs, Patzinaks），原居於中亞西北部，以突厥語系為中心的騎馬遊牧民。九世紀初被突厥語系的烏古斯（Oghuz）擊敗而西進，驅逐馬札爾人，威脅基輔（Kyiv）、俄羅斯和拜占庭，西元十一世紀衰落。

²⁹ 波洛韋茨人（Porovec），西元十一世紀從伏爾加河方向進入黑海北岸，吸收了佩切涅格人（Pechenegs）。西元十二世紀與基輔、俄羅斯等諸侯國有著對立、合作的複雜關係。西元 1223 年被蒙古軍隊擊敗，臣屬於蒙古。

這種由東向西方向的浪潮，可分成一個遊牧集團驅趕其他的集團，以及遊牧集團入侵其他集團兩種形式。希羅多德的第三種說法，也就是薩爾馬提亞人趕走斯基泰人，斯基泰人又將辛梅里亞人趕走，屬於前者的例子，可以稱之為撞球式的移動。與此相對，匈人的移動是將路經的各族併吞消滅（最先的是阿蘭人，接著是東哥德〔Ostrogoths〕³⁰、西哥德〔Visigoths〕³¹），擴大勢力。這種情況，與其說是從 A 地向 B 地完全移動，不如說是本隊停留在 A 地，遠征隊不斷地擴大統治的領域（蒙古帝國就是好的例子）。這可稱之為雪球式擴大。

有利於外來起源說的發現

根據這樣的證據所表明的情況，斯基泰外來說是有利的。以前考古學界認為斯基泰是土著說，也就是從早期青銅器時代以來，在黑海北岸階段逐漸發展起來文化，最終開花成為斯基泰文化。可能是有幾個原因使得這個說法成為定論：作為斯基泰研究中心的前蘇聯（Soviet Union），在解釋任何地區的歷史，都是按照唯物史觀發展階段進行解釋，不太重視從其他地域所帶來的影響。還有一個偏見，就是越接近歐洲，越是先進，東方則發展落後。另外一個決定性的原因是，在草原地帶東部並沒有發現比草原西部更古老的斯基泰文化相關遺址。但是 1970 年代以來，這些不利的因素消除了，特別重要的是，圖瓦共和國（Tyva Republic）³²發掘調查阿爾贊古墓群（Arzhan Cemetery）。

在圖瓦首府克孜勒（Kyzyl）西北方約 100 公里的阿爾贊村，周圍散

³⁰ 東哥德（Ostrogoths），西元四世紀左右，黑海北岸日耳曼語系部落。西元 375 年—西元 376 年，與阿蘭人一起被匈人所擊敗，許多人受其控制。脫離匈人統治後，從現今匈牙利進入到義大利建立王國，西元 555 年，被拜占庭帝國消滅。

³¹ 西哥德（Visigoths），在東哥德西邊的日耳曼語系部落。因為受到匈人的壓迫，越過多瑙河向羅馬帝國尋求庇護，卻遭到了冷落，從而發動叛亂，在西元 378 年，擊敗了羅馬軍隊。西元五世紀時，統治了南法國和伊比利半島（Iberian Peninsula），但被法蘭克（Frank）和伊斯蘭（Islam）勢力所消滅。

³² 圖瓦共和國（Tyva Republic），位於南西伯利亞，葉尼塞河流域（Yenisei）的國家。臣屬於清帝國。1911 年清朝滅亡後，俄羅斯提出土地的要求，俄國革命後，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從 1921 年起，雖然在名義上是獨立的國家，但在 1944 年被蘇聯合併。蘇聯崩解後，成為俄羅斯聯邦（Russian Federation）的一個加盟共和國。語言屬突厥語系，但在文化上則接近於蒙古，宗教上也屬藏傳佛教（Tibetan Buddhism）。

佈著各種大小的古墓，其中在 1971—1974 年發掘的一號墓已經嚴重坍塌，原本直徑約為 110 公尺，高約 3—4 公尺的積石塚。在石頭下面，發現了近百個由原木組合成井字型的房間。在中央的木槨中發現了男女二具遺骸（老年男性和成年女性），被認為是墓主人。在其周圍一共有十五具遺骸（除了一具是老年男性）和鐙形銜（兩端帶著半圓形馬鐙狀的銜，但這個時代還沒有馬鐙），以及一百六十匹安裝有三孔銜扣等馬具的馬匹遺骸。這十五具遺體被認為是殉葬者。

古墓周圍有許多小石堆，發掘了其中的二十一座，發現了若干綿羊、山羊、牛骨，一些馬的骨頭（頭和腿）。以此推斷，整個石堆中大約有三百匹馬被殺。做為葬儀時的參與者，俄羅斯研究者推測，一次消費這麼多的肉，想必至少會有一萬人。

墓室雖遭受到了盜掘，但幸運的是仍遺留有大量的青銅製品（在古董愛好者普遍化的近代以前，盜墓者的目標只是金銀製品）。如按照用途分類，可分為馬具、武器（短劍和鏃）、裝飾品等。引人注意的是，這些都屬於斯基泰出現在草原地帶西部前後時期的前斯基泰時代或是早期斯基泰時代（西元前九——西元前七世紀）。

更具衝擊性的是，用碳 14 年代測定法（碳—14）³³分析木材的年代，是在西元前九世紀後半葉——西元前八世紀前半葉。這顯然是比草原地帶西部的斯基泰還要古老。此外，在中國北部的內蒙古自治區周邊的西元前九世紀——西元前七世紀遺址，最近也發現了相同的短劍和動物圖案裝飾品。

從以上所述，可見西元前九世紀在圖瓦的高原也有權力者將十五名殉葬者和一百六十匹戴著馬具的馬匹安葬在墓中，並聚集一萬人參與葬儀。這些新發現，使俄羅斯近年來也開始有力地提倡斯基泰東方起源說。

草原的古墳時代

蒙古的大型石塚和阿爾贊一號墓，雖然表面積很大，但是高度卻不

³³ 碳 14 年代測定法，碳的放射性同位素（碳—14），利用約 5730 年半衰（Half-life）的性質，測定年代的方法。例如：對從遺址出土的木材一部分（一耳杯的量）取樣分析，如果碳—14 減少了 50%，那顆樹就是在距今 5730 年前被砍伐。但在實際應用上，會需要加以修正。

高，並且墓室建在被墳丘覆蓋之前的地表上，不是建在地底下。之後，墳丘的高度變得高聳。位於哈薩克斯坦南部伊犁河北岸的貝斯沙圖爾古墓群（Bes-Shatyr burial mounds），有一座目前高度為 17 公尺，直徑為 104 公尺的巨大古墓。墓頂已被盜掘者嚴重破壞，推測原始的高度有 20 公尺。

墳丘周圍環繞著九十四座石圈，從中發現了灰燼和煤灰、燒過的獸骨、陶器碎片、珠子等，可以看出這裡曾舉行過獻祭的儀式。這個大古墓尚未發掘，根據已發掘小古墓的結果表明，墓室是由經削整過的原木在地面上組成井字型，在上面覆蓋著土和石頭。這個古墓已完全被盜掘，幾乎沒有出土物，因此難以判定古墓的時代，但是因為墓室是建在地面上的，所以被認為是建在西元前七世紀左右。

北高加索也在西元前七世紀左右，在地面上建造了一座高約 20 公尺的大古墓。為了使新的王權廣為人知，因此必須把它建得高大。然而從這個時候開始，在地下置有墓室，且有加深墓室的傾向。墓室的位置從地面變成地下的原因，可能是他們的死亡觀念發生了變化，但也可能出自於防止盜掘的現實理由吧。

被認為是建在西元前四世紀後半葉的喬爾托姆利克古墓（Chertomlyk burial），高 21 公尺，直徑 100 公尺，墓室深達 12 公尺，是黑海北岸規模最大的古墓。首先鑽探了一個像井一樣深的垂直洞穴，再從底部往四周各方向橫挖洞穴，就到達了墓室。墓葬中心人物的遺骸被毀壞了，發現了被認為是墓主妻子的女性和九位殉葬者的遺骸。墳丘下的地表附近埋葬著十一匹馬。

墳丘是將草地切成一定大小的草堆疊起來的。喬爾托姆利克墳丘的營建需要一片 0.75（或是 0.84）平方公里的草原。此外，在土堆的外側還圍繞著高約 2.5 公尺，寬約 7 公尺的石牆，石頭的總重量達到八千噸。若是要重現當時建造情況的話，看起來就像是在巨大的石頭平台上，建立石造的墳丘。

在墳丘內的不同高度和地點，發現了葬禮之後獻祭的器物和獸骨。特別是在石牆下面發現了大量的雙耳瓶（口的兩側有把手，圓底或尖底的垂直酒瓶）碎片或獸骨，還有戴著馬具的馬骨和人骨也被發現。在十九世紀

中葉的發掘中，也發現了二百五十個鐵製銜。這些被認為是殉葬的人和馬。

在黑海北岸還有二——三座相同事級的古墓，以及幾座比它們略小的古墓，另外還有幾座是未經調查但可與之匹敵的古墓。此外，在次一等級的古墓中，也有挖掘出象徵王權的金製品。

黑海北岸在已發表的研究成果，根據墳丘的高度可將古墓分為四個等級：①22——14 公尺；②11——8 公尺；③7——4.8 公尺；④4.5——2 公尺。雖然也需要考慮到不同時期的差異，但這些等級的劃分，大概顯示了社會階級的分層。

在日本，比較古墓的大小是根據從前端到後端的長度為基準。與之相對的是，在黑海北岸由於墳丘的下半部被削去的例子很多，所以是以高度為基準。如果是這樣的話，高度越高，直徑也就越大，應該是會很顯眼的吧。在如何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意義上，很自然的是以高度做為基準。的確，斯基泰時代（Scythian Epoch Age）可以稱為是草原的古墓時代。

（本文於 2020 年二月投稿，於 2020 年四月審查通過）

西藏近代史研究值得關注的譯作——讀 林孝庭先生《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 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漢文版

喜饒尼瑪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二級教授
韓敬山
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博士

摘要

學界關於近代邊疆，特別是西藏的歷史研究，成果頗多。但是，林先生此書則以西藏為例，從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的角度，探討清末以來中國邊疆地區政治秩序崩解與重建的過程。運用的海外史料豐富，視角獨特，研究方式新穎，觀點亦鮮明。但作者對西藏地方仍缺乏足夠的了解，資料來源單一，較多注意了西方學者的話語，主觀色彩較濃，以致在一些問題的敘述上與歷史的真實相悖。不過，該書對今天的西藏近代史研究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值得關注。

關鍵字：民國時期；邊疆研究；西藏近代史

【中圖分類號】K25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8824
(2019) 02-0098-07

A Book Review for Lin's Work on the Modern Tibetan History

Xirao nima Han Jingshan

【Abstract】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frontiers,

especially Tibet, has yielded many results. However, Mr. Lin's book takes Tibet as an exam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 building, it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disinteg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tical order in China's border areas since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In this book, the overseas history is rich, the perspective is unique,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novel, and the viewpoints are distinct, too. However, the author still lacks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Tibetan area on the ground of that there exists a little subjectivity due to some points are contrary to the truth of history for the single data cited in the book--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scourse of Western scholars,. However, the book has its own unique insights into the study of modern Tibetan history today, which deserves attention.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ntier research; modern history of Tibet.

2018 年，收到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由美國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著、朱麗雙女士翻譯的《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 – 1949）》漢文版一書，喜不自勝。翻開這部散發著紙墨清香的新著，迎面跳入眼簾的是這部 299 頁著作竟使用了《西藏問題》為書名，剎那間讓人勾起對民國時期涉藏書籍的記憶……

由於從事近代藏事研究，手頭以《西藏問題》為書名的著作就有多部，如謝彬著《西藏問題》（1925 年，商務印書館），王勤堉著《西藏問題》（1929 年：商務印書館），華企雲著《西藏問題》（1930 年，大東書局），陳健夫著《西藏問題》（1930 年代，商務印書館），秦墨哂著《西藏問題》（1930 年代，南京印刷公司）等等。誠然，如藏學前輩任乃強先生所言上世紀 30 年代就“有些人，是只從康雍乾隆年代的舊著裡去找資料，翻舊話。有些人打起調查的旗號，用了國家一筆旅費，只跑到康定去住了幾天，便寫出什麼‘西藏問題’的巨著來騙人。這幾年中，我收集的用‘西藏問題’及其類似名稱標題的書籍近 20 種，各家書局皆有，全是東抄西湊，自欺欺人的翻舊話；一兩句新的調查資料都沒有。”^[2]但毋庸置疑，其中還是有真材實料之作。80 餘年過去後，同樣的《西

藏問題》亦讓人增加別樣的期待感。

林孝庭先生這部書稿脫胎于作者的博士論文，實際上早在 2006 年就已正式出版英文版，即《西藏與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邊疆（1928－1949：陰謀與族群政治》（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1949）一書，曾獲得“2007 年國際亞洲學者會議人文類最佳圖書獎”（the best study in the humanities in the 2007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Book Prize）。

筆者之一於 2014 年訪問加拿大 UBC 時，校方贈送的禮物就是這本書。見到此書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封面原西康省甘孜女士司德欽汪姆（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傳賢的乾女兒）的照片。作為家鄉人，感覺很親切。該書寫的是西藏，卻用西康人作封面，顯然不僅僅是因為她的美，出版者或作者應該另有想法，值得琢磨。目前的香港漢文版使用了《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這一書名（以下簡稱《西藏問題》），不管出於什麼考量，事實上此書的出版，已經演化成著者與編者對 20 世紀上半葉《西藏問題》研究熱潮後在 21 世紀的再延承、再思考。

先後在北京和成都兩地逐字逐句地讀完了這部著作的中文版。毫無疑問，這是一部讓人眼前一亮的學術專著，尤其是對西藏近代史頗有研究的朱麗雙女士之翻譯，字斟句酌，恰如其分，其行雲流水般的語言為該書增色不少。

統觀該書，其目的在於以國家建構（State – Building）的角度，探討清末以來中國邊疆地區政治秩序崩解與承建的過程。

以下系該書部分目錄：

地圖、圖與表目錄

縮略語列表

前言

致謝

序篇

第一部分：背景

第一章 地方化的中央政權、國家表象與領土割據

第二章 邊疆政策與想像的主權

第二部分：戰前十年（1928 – 1937）

第三章 動盪的西南邊疆

第四章 黃慕松使團

第五章 “宣慰使”政治

第三部分：抗戰時期（1937 – 1945）

第六章 西南地區的國家建構

第七章 戰時中印公路

第八章 修辭、政治現實與戰時西藏議題，

第四部分：戰後時期（1945 – 1949）。

第九章 戰後邊疆決策與少數民族分裂活動

第十章 色拉寺事件

結語

參考文獻

索引

全書分為四個部分十章。

第一部分首先談歷史背景，自清中央王朝談起；並述及英國在南亞地區的擴張與清朝崩潰之後，西藏地方在英人蠱惑下，所處特殊位置，並帶出作者希冀探討的主題。

第二部分討論 1928 年後國民政府對包括西藏在內的邊疆，以口頭或書面的方式，宣示中國對於邊疆區域的影響力。但問題多多。

第三部分討論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南京國民政府被迫轉進西南，與西藏地方的關係有了微妙的變化。這時候已在重慶的國民政府，與邊疆的距離拉近，特別是與西部少數民族間有更緊密的利害關係。此時的國民政府在對西藏事務的處理上更為慎重，以避免西藏謀求獨立而投入軸心國陣營。國民政府還利用黃慕松、吳忠信等赴藏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機會，增強其對西部邊疆的控制力。

第四部分討論抗戰勝利後，邊疆雖較過往鞏固，但緊接而來的內戰，讓國民政府拙于應付。諸多問題仍困擾著戰後的國民政府，如西藏的熱振

事件等。此期間，國民政府對西藏事務仍給予高度重視，如十世班禪的坐床大典，就是在全面潰敗的 1949 年 8 月舉行。這個久拖不決的坐床大典上的班禪活佛，卻與其他有影響的藏族人一樣，都希望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西藏，進而迫使達賴喇嘛派出和談代表。

一般而論，“歷史學至少有兩個優長值得借鑒：一是它的歷史視野，任何問題如果不放置在它的歷史背景下，將很難把握它的發展脈絡；二是它的史料分析方法，讓史料開口說話，這是一套很高妙的學術技藝。”林先生注意到了這些。尤其是作者依據近年來解密的令人目眩的大量漢文原始檔案、蔣介石私人日記等資料和海外學術研究最新成果，在高度吸納和概括的基礎上，重構了這一時期西藏研究的框架，讓專業讀者感受到民國時期西藏政治以及邊疆問題的跌宕起伏與起承轉合，他的文字縱橫馳騁，富有表現力，書中所談具有豐富深邃的眼光與內涵，令人欽佩。

本書作者注意到在這一學術區域的豐富內涵，展示出西藏問題的特殊性與複雜性。作者謀篇佈局的把控力和平衡力，在這部作品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見證。林先生通過豐富的話語體系和歷史語境，以全新的角度切入，提出真正的問題。他使用淺顯易懂、直白明快的語言風格，通過對一個個歷史過程融合為一個時代節點來把握，對於從事近代藏事研究的學人有著很大的啟發和參考價值。

當下的邊疆史學思考正自覺地將局域歷史的過程安放在大和廣的背景之下，這不僅是當下學科發展的要求，更是有為學人的再出發。

有學者認為：“歷史研究的突破主要取決於兩點，一是新資料和新物件的發現，一是理論方法的革新，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

作者在《西藏問題》一書中為這一領域所闡發的新觀點，寬闊的視野，數十載學術積澱和治學經驗，對海外檔案的審視是此著作的最用力之處，而這種功力在我們近代藏族歷史的學術研究中相對罕有。

在筆者看來，這部《西藏問題》有四點思考和啟示：

史識之識：史學家的觀察力和敏銳力

近代藏族歷史千頭萬緒，如何選擇相關的內容使其成為筆下書寫的歷史事實？林孝庭來自中國臺灣，在美國任職，他兼有東西方的雙重史學格

局。選擇什麼樣的史事入書，其實對他個人來講就是選擇什麼樣的文化價值標準。作為華裔的他，比西方學者更易懂得官方檔案中那些廣博文字背後的精神內涵，因此在書中可以看出他努力選擇極具意義的典型事實使其變成“西藏問題”的主體，由此全書所書寫的準確“問題”具有今日鏡鑒之用。這種具有專業水準的西藏歷史研究，時刻可見西方涉藏研究中對其書寫的影響，更有自覺不自覺的敘事選擇。

梁啟超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有一總結：“有本意並不在述中，不過借故人以寄其理想”。

展閱此書，林孝庭已經做到“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忽人之所謹”，由小見大，層層推進，探究真味，傳遞了大量信息，值得學習。筆者最讚賞的是書中《處於新政治氣氛下的西藏議題》一節中，其學術推進點是林孝庭站在更高的層面，發揮其學術研究的大格局優勢，跳出西藏看西藏，展示在這一特殊時期，國民政府採用秘密的方式討論並欲行廢除和改造“根深葉茂”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這是西藏地方政治史上的大事。以往學界對此並沒有太多的涉入。他注意到了中國中央政府在涉藏事務上的原則與靈活度，更看到了英國人對我國西藏地方事務的干擾、離間等。

他總結出“國民黨的軍事人員不尋常地提議逐步廢除西藏的政治——宗教雙重體制，這意味著傳統西藏架構的改變”^[2]。這種不同尋常的制度設計緊跟著一系列配套制度互相輝映，如“派遣資深的漢族僧人前往西藏，參與當地的寺院事務，鼓勵漢藏佛教徒之間的互動”^[2]，最終“逐漸改變西藏現有的政治架構”^[2]。說明國民政府對西藏的改造始終念念不忘，因為這關涉國家的核心利益。

林先生之《西藏問題》一書的出版，告誡我們在學術研究中，最宜謹嚴鑒別，始不至以理想代之於事實。

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作者在書中從經濟角度對西藏這段歷史的分析。經濟基礎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在涉藏研究中重視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的研究少之又少，這是近代藏學研究中可見的短板。

值得一提的是，他利用第一手的原始檔案，認為蒙藏委員會“絕非如同某些學者所描述，是國民黨的一個無足輕重的冷衙門”^[2]。他提醒蒙藏

委員會的批評者，應當關注“這個機構在蔣介石網羅和處理鄰近邊疆地區的諸省軍閥時所扮演的角色”^[2]。在該會成立初期，其委員長均為地方實力派人物（如閻錫山、馬福祥、石青陽），可見其分量不輕。他認為蒙藏委員會“為南京中央與邊疆省份之間提供了一個討價還價的平臺，雙方可以藉此尋求解決或創造與邊疆事務完全無關的議題”^[2]。

他還在《戰時中國的西藏議題》中書寫了國民黨特工在西藏工作的內容；在《國民黨政府在西藏的秘密工作》中，又惟妙惟肖、引經據典地書寫了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和軍令部第二廳在西藏建立的據點，情報人員涉及小學校長、測候所長、電臺台長等，這些都是藏學研究中乏人書寫卻頗具價值，且吸引讀者的題目。

推想之想：雙語世界中畫出歷史書寫的圓

一部好的作品，在普通讀者看來，其所要的也許並不是精確至極，所要的並不一定是見解驚人，而是筆尖圓韻的驚詫故事。林孝庭累年專注邊疆研究，這種專注生發到一定層階一定會自然進發學術直覺。這種直覺就是學者最可貴的接近歷史的真實推想。這部書稿，林孝庭細緻入微地開展推想並重構分析民國西藏時期的歷史脈跡，他對西藏近代歷史的敘事方式值得學人觀瞻與思考。

這部書稿的亮點是展示給我們一個又一個精微細緻的西藏微觀史個案，一個個看似平常的史實，經過作者縱深切片之後呈現的模樣令人大吃一驚，甚至目瞪口呆。作者沒有止於一個個切片切開後的滿足感，而是在此基礎上再一次提升自己，讓思維飛到高處，再一次用宏大的視國審視周圍，置之於世界。這種宏大敘事加上微觀敘述，讓這部書稿充盈厚重之感。在研究中，他尤為關注從新的視角去發現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如他在書寫 1947 年西藏發生的“熱振事件”時，沒有僅僅停留在對人物和過程的描述上，而是更多地利用新的檔案史料，著重分析了事件的緣起、國民政府高層對事件的因應，從而讓人們關注到“熱振事件”對國民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係，特別是對國民政府的邊疆民族政策的影響。從而條分縷析地提出了不同於旁人、能夠自圓其說的觀點，即“國民政府真正失去西藏是在 1947 年”。

愛丁堡大學歷史學教授哈里·狄金森（H. T. Dickinson）總結當代史學發展的過程和學科特點時說：“比歷史知識的巨大增長更為重要的是學者們在如何對過去進行研究的方法和態度上發生了重大的革命”。林孝庭先生的大作正是很好地詮釋了這一說法。這也是我們敬佩林孝庭先生的理由之一。

失誤之誤：緣何放棄原始檔案，采二手英文資料？

“歷史上的智慧，自懷疑始。”既然這是一部高質量的學術專著，就一定會被高度關注。以專業的眼光來看，林書中也有不少瑕疵，如寫的是1943年班禪轉世問題，卻誤為達賴^[2]。此類問題這也許出自於列印的失誤。但還有一些不得不說的遺憾則應該是著者自身的認識問題。細細究來，這些遺憾的出現都是因為輕信了英文著作而沒有深究中文檔案或相關中文史料。實際上，今日一些學者的著作，自覺不自覺地大量引用西方的二手文獻，最終再現西方學者的觀點，而自己卻不以為是。試將中國歷史尤其是邊疆民族史的研究強塞進西方定制的“馬爵子”，一旦入其窠臼，縱使如何書寫均難以自圓其說。

其實在林先生書的章節設置中即可見其問題所在，如“邊疆政策與想像的主權”等。文中多次出現的“中國”與“西藏”並列使用，沿用了一些西方人的說法，實在有些令人困惑。文中甚至提到“十三世達賴喇嘛最大的願望是建立一個包括康區和安多的所有藏族在內的國家”^[2]，這個推想是在何時，何地，何因？一向治學嚴謹的林先生卻未給出出處，當然也不可能有出處。

具體如在近代藏族歷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甘肅代表團”入藏事件。歷史事實是1919年甘肅省都督張廣建遵照國務院令，“特派管理甘肅青海紅教佛僧古浪倉、管理玉樹三十六族佛僧拉卜尖貢倉、本署軍事諮議李仲蓮、軍事參事朱繡”^[3]等赴藏，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李仲蓮一行返甘之際“設筵祖錢。聲言余親英非出本心……余誓傾心內向，同謀五族幸福。至西姆拉會議草案，亦可修改”^[4]。上述材料均為北洋政府時期檔案資料，作者卻在此專門引用了英文資料：“1920年，中國政府大概是想改善與西藏之間的關係，派遣了一個甘肅使團前往拉薩”^[2]，隨後他繼續引用倫敦

桑姆出版社 1985 年出版《帝國棋盤上的西藏：英國對拉薩的政策制定（1899－1925）》的結論：“這是中國官員除了自 1912 年以來首次踏足西藏土地，卻無功而還”^[2]。是否如 Premen Addy 所說的“大概是想”“無功而還”？只要看下述檔案就可了之一二。“甘肅代表團”入藏後有一份甘肅都督給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正式函件，開篇即強調“民國改建以來，首標五族共和為立國宗旨……大總統協和五族至公無私，自必准情酌理，嘉惠邊陲，何忍使藏民稍受屈抑……如有諮商事件，不妨備細告知，以便轉呈大總統鑒核”^[3]可知這次代表團入藏是中央政府的用意，目的是改善雙方的關係。據此，十三世達賴喇嘛釋放善意，親派官員洛桑更登給甘肅督軍張廣建送上秘密信函及名貴禮物，信函中稱：“如遇機密要文，請即告知洛桑更登”^[5]，從中可分析出“民國政府與十三世達賴喇嘛和噶廈的關係，開始有了某種程度的恢復和改善”^[6]，何謂“無功而返”呢？

遵照 Premen Addy 的思路，林書順勢推出這是“惡化的漢藏關係”^[2]，又推理出“英藏關係卻達到新高峰”^[2]。如果閱讀十三世達賴喇嘛專門給甘肅督軍的信函中專門囑咐“藏地要情千萬勿令外人窺知，免生他患”^[5]，可見“達賴傾向之誠，及畏某國如虎”^[5]，“足征英人從中作祟，殊非藏人本心反抗”^[7]。十三世達賴喇嘛趁熱打鐵，為繼續與中央政府建立正常關係，還於 1922 年正月，派遣“敦柱旺結來京，陳述願歸服中央之意。至於十一月，敦氏又代表喇嘛來京見黎總統，然以英人之挑撥，卒未有結果”^[8]，上述文字足證其時漢藏關係並沒有特殊變化，英國與西藏地方的關係也並沒有達到高峰。

再舉一例：“民國政府的邊疆政策：一種不同的視角”一節中有個論斷：“自民國政府時代的最初階段，南京並沒有表現出要實施強烈的、積極的、有效的邊疆計畫的意圖，以將邊疆地區納入掌控之內”^[2]，並列舉戴季陶和蔣介石對邊疆事務的“無為而治”，甚至“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意圖。事實上，南京民國政府成立後，戴季陶作為蔣介石最依賴的邊疆事務操盤人，對治理藏族聚居區先後提出的一個又一個具體的頂層設計和實施方案，基本上都得到蔣介石的認可。

如戴季陶領銜主掌民國政府教育後，立即提出“邊地教育，則謂絕不可求急功速效，乃至不可希望其目前有何種對於時局政治之作用，只要真

是抱定為當地人民謀真正萬年利益的宗旨。則結果利人便是利己，利地方便是利國家”^[9]。再如戴季陶主持中央最高人事機構後，即制定一系列惠及邊疆考生和人才政策，如《首都高考普考邊區應考人從寬錄取辦法》《邊地青年教育及其人事行政實施綱領》《蒙藏邊區人員任用條例》等，就是為了“補救蒙藏等邊區青年在服公職方面的不利條件”^[10]。再如《籌畫邊族人才甄用訓練案》《邊疆從政人員獎勵條例》的施行，目的是打開雙向溝通的渠道，鼓勵內地人才前往邊疆服務。

更值得一提的是，戴季陶還妥籌蒙藏邊疆學生入學之方，提出“東方文化院”培養計畫，並相繼提出並強力實施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邊疆分校，“這計畫是相當大而費錢的”^[11]，“在抗戰以前，這計畫已經次第實行，受過這些本校、分校教育的邊疆青年有好幾千人。沒有季陶先生的贊助……在當時的情形之下，可以說是很難完成”^[11]。

戴季陶之邊疆教育計畫力求有所為有所不為，即“其所規劃之宏偉與審慎，蓋兼而有之”^[12]。此外他還親自主導設立新亞細亞學會，為西藏等邊疆人民經營各類事業，“為來內地求學之學生，謀各種便利，對於邊地及內地人民之交通往來，特為之盡力幫助，以求達到中國文化民族之融洽統一”。戴季陶還親自過問挑撥回藏民族感情的事件，親自設計邊疆學校教材，親自協調為藏區各寺院捐款，禮邊疆權費使其自發擁護政府……

如果明晰這些事實，也許就不會再堅持“檢討歷史，在 1920 年代末與 1930 年代初，南京高層對中國西南這片遙遠的邊疆是否真正擁有清晰明確的政治藍圖”^[2]的結論了。

洞見之見：注意感知文獻中不曾言明的內容

我們注意到在《打破一個歷史神話》一節中，著者對黃慕松代表中央政府入藏致祭十三世達賴喇嘛一事僅僅淡化為“訪問”，並將這次重要的政治活動稱為“最具政治象徵意義的事件”^[2]。作者使用“象徵”一詞，並稱這是“漢人觀點寫作的著述”。我們分別是藏族、滿族，對黃慕松入藏致祭取得的不易成就是認可的，簡單歸之為“漢人的觀點”，顯得有些主觀了。

該節結論有二：一是“國民政府高層領導人並不特別關心西藏問題是

否得到解決”^[2]；二是“1934 年的黃慕松使團再一次證明，國民政府高層不過利用邊疆或少數民族議題來鞏固南京的權力與建立威望，而非純為戰略性思考”^[2]，事實上，即使在日寇步步緊逼之時，國民政府高層在黃慕松入藏致祭前後，每日均有大量密電往來，高效運轉于拉薩與南京之間，可見國民政府對解決藏事的新期待。

為全方位、多角度解決西藏問題，戴季陶早在 1920 年代末期即開始有計劃、分階段、多層次解決西藏問題：慧眼識珠運籌劉曼卿入藏；水到渠成安置孔慶宗留藏；請信佛之陸軍中將趙守鈺護送九世班禪靈槂入藏；致力內地蒙藏諸大宗教領袖修建護國法會；縝密考慮安欽呼圖克圖入藏；妥籌九世班禪返回青海，甚至請蔣介石“自己用心收一二忠實而有用之人作隨從副官之類，其用最大……”¹

以上所言在 1933 年日本退出國聯七天前的 3 月 20 日，戴傳賢自寧波給蔣介石的密信中都有述及。在信中，他還特別加上了一段話，即“此種國家千年萬古之大事，只有先由私人名義去作，結果自然國家得到好處，若非由兄名秘密以至誠事感化，單靠政府公事，其力甚小也。”²

從上面這一封最高密級的信函中可知，在史學研究中，還有大量難以示人的奧秘，這就需要對歷史做出準確的理解和合理的推論。西方近代史學家往往願意在史學書寫中使用“大概”“想象”“直覺”等字樣也就不難理解。

宋代曾鞏的《南齊書目錄序》中有這樣一句話提醒我們：“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14]。這是從事近代歷史學術研究的一個基本定力。

閱讀視角新穎的林孝庭先生的漢文譯作，帶出上述文字，權作這篇書

¹ 這封最高密級的極密信件是戴季陶自寧波寫給蔣介石，編號為 24 號的四頁紙長信，戴季陶叮囑蔣介石，絕對不可示人。此信件是韓敬山博士在台北“國史館”新店館戴季陶原始檔案卷中發現的夾頁，並沒有裝訂在檔案內，該檔案入檔後從未被拆閱過。轉引自韓敬山：《戴傳賢與民國藏事（1912-1949）》，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 年 4 月，第 230 頁。

² 這是韓敬山博士在台北“國史館”新店館戴季陶原始檔案卷中發現的信件夾頁的最後一頁，轉引自韓敬山：《戴傳賢與民國藏事（1912-1949）》，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 年 4 月，第 231 頁。

評的結語吧。

參考文獻

- [1]考察西康與《西康圖經》——任乃強《筱莊筆記·身世錄》錄注（二）[J]. 任新建，何潔校注，中國藏學，2017年第4期，p89
- [2]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M]. 朱麗雙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年，p190、41、39、268、76、8、45、26、102、103
- [3]甘督張廣建致達賴函（1919年8月），轉引自《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內部發行）[Z].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9月，p314
- [4]朱繡，西藏六十年大事記[M]. 吳均校注，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p50
- [5]張廣建為派員赴藏事致大總統電（1920年7月1日）[A]. 蒙藏院檔案，西藏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選輯）[M]. 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p466、465
- [6]王貴，喜饒尼瑪，唐家衛，西藏歷史地位辨[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p278
- [7]李朱二員呈報抵藏情形文（摘錄）（1920年9月）[A]. 蒙藏院檔案，西藏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西藏地方是中國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選輯）[M]. 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p467
- [8]王勤堉，西藏問題[M]. 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10月，p98
- [9]陳天錫，戴季陶先生編年傳記[M]. 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年5月，p120
- [10]韓敬山，戴傳賢與民國藏事（1912-1948）[D]. 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4月，p44
- [11]羅家倫，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生[A]. 羅家倫，逝者如斯集[M]. 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9月，p147、147-148

[12]陳天錫，戴季陶先生編年傳記[M]. 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年5月，p76

[13]戴季陶，新亞細亞學會綱領（1933年12月15日）[A]. 陳天錫，戴季陶先生文存（卷三. 學藝部門）[M]. 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9年3月，p930

[14]（梁）蕭子顯，二十四史·南齊書卷一至卷五九[M]. 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p707

[責任編輯：曾雪玫]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有刀槍，勢力大；有真理，天不怕。（白族）

真理無敵，風雨無情。（蒙古族）

純鋼折不彎，真理駁不倒。（維吾爾族）

手掌遮不住太陽，謊言辯不過真理。（藏族）

如果是夜明珠，放在那裡都閃光。（景頗族）

參天大樹，有根才能長新葉。（毛南族）

人往大處看，鷹往高處飛。（納西族）

伸手容易縮手難，張嘴容易閉嘴難。（回族）

成人易，做人難。（烏孜別克族）

禿子找花不難，戴花難。（維吾爾族）

進山要帶柴刀，進城要帶錢鈔。（苗族）

結實的包頭靠扎，漂亮的獵槍靠擦。（傈僳族）

筍子不割成竹，穀子不收成泥。（佤族）

兄有弟有，不等於自己有。（布依族）

樹枝沒有一般齊的，力氣沒有一樣大的。（哈尼族）

看人看心，聽話聽音。（藏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滿洲皇帝的漢化與大一統中國觀： 乾隆五十三年御製台灣滿漢文碑的 「碑石性研究」

甘德星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摘要

碑石有其「碑石性」，為建碑者形塑社會集體記憶、強固國家論述之用。透過碑文的主觀敘事，「碑石性」的文化、政治意涵，得以彰顯。乾隆 53 年，林爽文之亂平定，乾隆將之列為「十全武功」之一，並於臺灣建十碑，以誌其盛。林爽文之亂，雖不能和伊犁、回部、金川的邊亂相比，但臺灣「孤懸海外」，與內地不同，故乾隆亦不以小事視之。這可從乾隆事後另將碑文製成緯絲、墨刻、玉冊，以及銅版戰圖以作紀念得到證明。一般以為碑文乃儒臣代筆。其實，十碑的碑文乃乾隆御製，並且是先寫漢文，後譯滿文，其中的《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的漢文碑文更是御筆。值得注意的是，與「御製碑」有關的其他書寫，如緯絲、玉冊、墨刻上的碑文，和《平定臺灣戰圖》上的御筆、印章全為漢文，可見「御製碑」的滿文碑只是聊備一格的製作。乾隆其實是個十分漢化的滿洲中國皇帝，其立碑台灣之舉，乃傳統中國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思想的反映。因此，「御製碑」可視為滿洲中國皇帝乾隆在臺灣的石化分身，也是乾隆作為大一統君主的具體註腳。

關鍵詞：碑石性、林爽文之亂、乾隆御製臺灣滿漢文碑、漢化、滿洲皇帝、大一統中國觀

- 一、前言：碑石與「碑石性」
- 二、乾隆御製臺灣滿漢文碑
- 三、乾隆的感情投注：御製與御筆：
- 四、乾隆的漢化思維：碑文的先漢後滿
- 五、乾隆的中國觀：「滿洲面具」背後「漢人身體」的折射
- 附錄 1.《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碑文
- 附錄 2. 滿文《清實錄》所載《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碑文

一、前言：碑石與「碑石性」

碑石是刻意突出地表，建立於公共空間之物，其目的在將特定史事紛繁複雜的細節，化約為一簡單符號，以引人注目，產生預期的共鳴。碑石（連同其附屬物）有其「碑石性」，即其紀念碑特質(monumentality)內蘊的歷史性、莊嚴性、宏偉性、紀念性、恆久性，¹為建碑者形塑社會集體記憶、強固國家論述之所資。這與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月上諭中提到臺灣林爽文亂後「配建碑亭勒石」一事時所謂「以壯觀瞻而垂久遠」的意義相合。²

透過碑文的主觀敘事，「碑石性」隱而不顯的文化、政治意涵，得以在建碑者意願的導引下解碼、重現、定調，而為人所察覺感知，³並通過大眾的口耳相傳，不斷複製，最終轉化為社會的共同「知識」。可見，碑文乃被刻意規劃的記憶，其功能主要在給碑石起畫龍點睛的作用，產生傳播的漣漪效應，而非供人在場作仔細的閱讀。⁴有別於單一的碑石，跨地

¹ 英文 monument 與 monumentality 二字皆源自拉丁文的 monumentum，即「提醒」及「警告」之物，其動詞形式為 monēre。二字乃一體兩面，前者指的是形式，後者指的是概念。參看 Wu Hung,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10。

² 《清實錄》，冊 25（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306，頁 7b/575。

³ 此即「文化研究」學者 Stuart Hall 所指出在「編碼-解碼」傳訊過程中的「選定意義」（preferred meanings）。參見 Stuart Hall, “Encoding, Decoding,”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ed. Stuart Hall et al. (London: Hutchinson;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980), pp. 128-38。

⁴ 對一般人而言，要在現場通讀碑文全文可以說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碑文的高度

域的龐大碑石群，如本文所討論的「御製臺灣滿漢文碑」，由於碑文眾多，相互映襯，互相發明，更能有效地將碑石全部所折射出的「碑石性」相對應地放大。是以，「御製碑」各碑文的母題敘事，重見疊出，其細節如立碑緣由、出兵平亂等等，大同小異，目的即在增大其和應之效。

乾隆皇帝自認是「中國之主」，⁵他在臺灣建立「御製碑」之意，並不在紀念亂中倒下的亡魂，而在彰顯大亂之為他所平定。⁶從「御製碑」碑文所呈現的漢化思維，不難窺見，作為儒化君主的乾隆，他對盛清大一統版圖的整體想像。⁷

二、乾隆御製臺灣滿漢文碑

乾隆五十三年（1788）二月，林爽文之亂平定後，乾隆分別在臺南及嘉義樹立了十通碑文。藉著堅實的石碑，乾隆將林爽文、莊大田二人，永久打成破壞大清版圖的「逆賊」，並同時警惕後之欲叛亂者，切莫以身試法。

十碑現合稱「乾隆御製臺灣滿漢文碑」，包括《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四碑，滿漢各一，合共八通，立於台南；以及《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

讓閱讀碑文的人不容易看到碑頂的文字，而且碑文字小行密，在閱讀時行數更易生混淆。這是我在臺南及廈門研究「御製碑」時的親身經驗。

⁵ 清朝秉承中國傳統，以位處中原的儒化中國皇帝自居。滿洲入關後，即自視為取代明朝之國（順治），並自覺乃上繼黃帝（康熙）、堯舜（雍正）的中國君主，其治術與內陸歐亞無關。（參看甘德星，〈康熙遺詔中所見大清皇帝的中國觀〉，《清帝國性質的商榷——回應新清史》，中壢：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4。乾隆說：「朕仰賴天恩，為中國之主」。見《清實錄》，冊 9（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9，頁 41a/336。即帝位前，他的潛邸，依「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之意」，取名曰「樂善堂」，見清高宗，《樂善堂全集·樂善堂記》，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549 冊，《清高宗樂善堂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卷 8，頁 161/18a；即帝位後，他又依《尚書·舜典》：「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而改潛邸之名為「重華宮」。由此可見，一如其父祖，乾隆亦以繼承堯舜之治為其職志，而儒家思想亦早已融入其日常生活的實踐中。

⁶ 《清實錄》，冊 25，卷 1300，頁 21a-21b/484。

⁷ 有關乾隆對大一統的想像，可參看趙剛，〈「大一統」話語與早期全球化視野〉，收入楊念群，《新史學》第五卷，《清史研究的新境》（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1-45。

事》二通，滿漢合璧，一樹臺南，一樹嘉義。

由於廈門是滿洲出兵渡臺平亂之處，故前八通碑文又見於福建廈門南普陀寺；而熱河文廟，因為是乾隆為平臺「籌於斯、發於斯/ubade tulbime bodoxo. ubade icihiyame yamaxa」之地，⁸所以御碑中的《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復見於熱河。⁹一如其碑題所示，《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是平定林爽文之亂十碑中的總結性敘事，故該碑文字最多。《告成熱河文廟碑文》也是十碑中唯一同時見於熱河、廈門、臺灣三地者，而其中又以位於被視作「塞外京都」¹⁰熱河的碑文首先製成，為地處大清國邊緣的閩臺二碑之所本，其在政治上的象徵意義，從三碑製作的先後次序，不難察見。¹¹因此，《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的重要性，尤其是刊刻於熱河文廟者，可說是十碑之最。

碑文上所記的建碑時間不一。《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三碑立於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二碑則立於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不過，碑文上所記的時間與碑石實在建立的時間並不一致。¹²乾隆希望其先後追加的《文廟》及《生祠》二碑文與之前頒發的三碑文一同辦理，以致建碑工程延宕至乾隆五十六年才基本完成。¹³

⁸ 《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漢文行 8，滿文亦行 8。

⁹ 《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原刊刻文廟戟門外左壁西嚮，見海忠，《承德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 12，頁 12a/544，文革期間被毀。

¹⁰ 林爽文之亂平定後，乾隆除告成熱河文廟外，尚在避暑山莊舉行慶功宴，並以山莊清音閣觀吉祥戲為背景，繪有《凱旋賜宴圖》以誌其盛。清音閣分福臺、祿臺、壽臺三層，形制與紫禁城暢音閣大戲臺同。該圖為十二幅《御題平定臺灣戰圖》之一，由此可見熱河在清代政治的重要性。參看莊吉發，〈清初諸帝的北巡及其政治活動〉，《清史論集》（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頁 235-276。

¹¹ 《清實錄》，冊 25，卷 1306，頁 7b/575。

¹² 《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二碑文末將立碑時間繫在三月上灘，但建碑時間應稍晚。乾隆五十三年三月癸酉（十一日），乾隆始降旨將御製文發交福康安、李侍堯於臺灣府城及廈門二地勒石建碑。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軍機處隨手登記檔》，第 40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161，所發出的上諭，見《清實錄》，冊 25，卷 1300，頁 20b-21b/484。

¹³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五本，頁 416-417。

相對於滿文碑，「御製碑」的漢文碑較為清晰。滿文碑文，由於年久風化，字頗泐滅，文內夾行小字及標點，部分剝蝕消失，其搨本也漫漶不清。因此，在引用碑文時，特將滿文碑文先行補訂，再完整轉錄，以方便與漢文碑文相互對讀。¹⁴滿文是清朝國語，林爽文之亂乃國中大事，乾隆時滿文荒廢已久，臺人認識者亦不多，今碑文於漢文以外，復添加滿文，其中的政治意涵，實不難理解。

三、乾隆的感情投注：御製與御筆

臺灣「御製碑」是乾隆亂平後感情投注所在之處。他感嘆因得上天眷顧，始得剿滅逆賊，使大清版圖免於崩壞。不過，大亂平定時，乾隆自覺已年近八旬，所以他感慨地說：「且予老矣」，並在碑文中多次提及此事。¹⁵因此，對自詡為「十全老人」的盛世君主乾隆而言，在台灣立碑記功，「示後有述」，¹⁶不能說沒有一點迫切感。

雖然林爽文之亂不能和收服伊犁、回部、金川三事相比，但乾隆並不以小事視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臺灣「孤懸海外」，與內地不同，動亂一旦發生，較難收拾。乾隆於「御製碑」中的三通碑文開首，即不厭其繁，屢次述及製碑之由，以申明其意。《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云：

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是三事皆關大政，各有專文勒太學。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洗田五，是三事雖屬武功，然以內地，懷懃弗繙其說。至於今之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則有不得不詳紀顛末，以示後人者。（行 2-3）

Ili-i ba-be necihiyehe Xoiise aiiman-be toqtobuxa Zanla Cucin-i ba-be γaiixangge ere ilan baiita. gemu amba dasan-de xolbobuxa

¹⁴ 參看臺灣大學及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御製碑」搨本。由於穆麟德 Paul von Möllendorff 的拼寫法有不能還原成滿文的問題，文內的滿文拼寫乃依據甘德星，〈滿文羅馬字拼寫芻議〉，收於閻崇年主編，《滿學研究》，第六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頁 50-68 的方法拼寫。

¹⁵ 見《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行 17-18；《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行 16-18；《御製平定台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行 11、14-15。

¹⁶ 《御製平定台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行 15。

turgunde. yooni coxotoi ejebun bithe arafi. gurun-i taciqô-de eldengge wehe ilibuxabi. Wang Luwen-be geterembuhe. Su Si” Ši San-be mukiyebuhe. Tiyan U-be gisabuxangge. ere ilan baiita. udu cooxai gungge bicibe. damu dorgi ba-i irgen-i baiita gicuke bai seme. umai coxome tucibume leolehe ba aqô bihe. Te Tai wan-i¹⁷ fudaraqa xôlxa-be gisabume muki yebufi. Lin Šuwang Wen-be weiihun jafaxangge. erei da dube-be narxôšame ejefi. amaya niyalma-de ulhiburaqô oci ojoraqô. (行 2-3)

《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又云：

近著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以為伊犁、回部、金川三大事，各有耑文。王倫、蘇四十三、田五次三事，不足繙其功。若茲林爽文之勦滅，介於六者間，雖弗稱大事，而亦不為小矣。（行 2-3）

Jaqan Tai Wan-i fudaraqa xôlxa-be gisabume mukiyebufi. Lin Šuwang Wen-be weiihun jafaxa baiita-be ejehe gisure arara-de. Ili. Xoiise aiiman. Zanla Cucin-be necihiyeme toqtobuxa ilan amba baiita-be gemu. coxotoi ejeme araxa. Sirame Wang Luwen. Su Si” Ši San. Tiyan U-be mukiyebuhe ilan baiita oci. gungge-be tukiyecere-de isinaraqô sehe. Damu Lin Šuwang Wen-be gisabume mukiyebuhengge. ere ninggun baiitai sidende bisire-be daxame. udu amba baiita seci ojoraqô bicibe. inu ajige baiita seci ojoraqô. (行 2-3)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初三日上諭曰：

「從前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皆於太學立碑，以示武功。臺灣不過亂民聚眾海島一隅，雖不值刊碑太學，而此次辦理迅速，首夥生擒，亦不可無紀實之作。朕現在駐蹕熱河，欲將此次平定臺灣事蹟，御製記文，於熱河文廟大成門廡內嵌

¹⁷ 此處碑文拓本模糊不清，今按遼寧省檔案館藏《Daiicing gurun-i g'aozung yongkiyangya xôwandi-i yargiyan qooli..》,emu mingyan ilan tangyôci debtelin, Abqai Wehiyehe [sic] susai ilaci aniya ilan biyai dergi, 頁 40b 行 7 補上格助詞-i。

石刊刻，俾振武敷文盛軌，永昭上塞。」¹⁸

故《御製平定臺灣告成勳河文廟碑文》開宗明義云：

昨記平定臺灣生擒二兇之事，亦既舉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為三大事，嵒文勒太學。其次三為誅王倫、剪蘇四十三、洗田五，以在內地，懷慚弗繙其事。而平定臺灣介其間，固弗稱勒太學，然較之內地之次三，則以孤懸海外，事經一年，命重臣、發勁兵，三月之間擒二兇、定全郡，斯事體大，訖不可以不紀。（行 3-4）

Jaqan Tai Wan-i babe necihiyeme toqtobufi. juwe ehe xôlxabe weiihun jafaxa baiita-be ejeme arara-de. Ili-i babe necihiyeh. Xoiise aiiman-be toqtobuxa. Zanla Cucin-i babe yaiixa. ere ilan amba baiita-be coxotoi ejebun bithe arafi. gurun-i taciqô-de eldengge wehe ilibuxa. Sirame Wang Luwen-be geterembuhe Su Si” Ši San-be mukiyebuhe Tiyan Ube gisabuxa. ere ilan baiita-be dorgi ba-i irgen-i baiita gicuke bai seme. umai coxome tucibume leolehe ba aqô. Te-i Tai Wan-i babe necihiyeme toqtobuxangge. ere ninggun baiitai sidenderi bif. gurun-i taciqô-de eldengge wehe ilibure-de isinaraqô secibe. damu dorgi ba-i sirame ilan baiita-de duibuleci. Tai Wan-i ba mederi cala yoro maqtabufi baiita dekdebufi emu aniya o xo bime. ujen amban-be tucibufi baturu cooxa-be unggifi ilan biyai sidende juwe ehe xôlxabe jafafi Tai Wan-i gubci babe toqtobuxangge ere ambaqan baiita. suwe ejeraqôci ojoraqô.（行 3-4）

正因為林爽文之亂「斯事體大」，所以乾隆特別破格，將之與平定伊犁、回部、金川三事一同列入「十全武功」/juwan mudan-i yonggiyaxa cooxai gungge 之內。「十全武功」中，並不是每事都有嵒文勒太學，緬甸、安南、廓爾喀諸役皆無碑。乾隆雖然亦以平定臺灣不值刊碑太學，但

¹⁸ 《清實錄》，冊 25，卷 1306，頁 7a-7b/575。

他將「御製碑」置於臺南孔廟之旁，其用意實不言而喻。¹⁹

「御製碑」儘管沒有勒石太學，但其規格與「十全武功」中伊犁、回部、金川三大事之有碑者相較，不但毫不遜色，而且更有過之而無不及。首先，就碑石的整體而言，「御製碑」的布建橫跨三地四點，²⁰其覆蓋空間範圍之廣，是「十全武功」中其他記功碑所少見。再就碑石的件數而言，亦復如是。「御製碑」的碑石一共十通，一次建成，而且碑文內容不一。「十全武功」中的準噶爾之亂，雖然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始得平定，可謂亂事中之大者，但其記功碑，如《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及《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不但分前後二次建成，其形制亦只一式四通，滿、漢、托忒、藏文各一，且四體碑文的內容相同。²¹若就碑文（漢文）的總字數而言，臺灣的「御製碑」合計約 6000 字，雖然較困擾乾隆最甚的兩金川之役的 8000 多字為少，²²但仍然較準噶爾、回部之亂之只有約 2000 字為多。從各碑的用字多寡，多少可以看出，平臺一事在乾隆心目中的比重。

乾隆對林爽文之亂的重視，亦見之於他在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亂平後，於半年之間，迅速完成所有御製碑文的製作。不止如此，乾隆更用不同的形式，大量複製碑文，以彰顯動亂的最終平定。他將五通碑文，連夾行小字，全文置於乾隆五十三年武英殿刊刻的《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首。²³

¹⁹ 清代的四大定邊御製碑《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幾乎遍佈全國各地的廟學，其目的在使清朝盛世開疆拓土的武功成為各地士人的集體記憶。見朱玉麒，〈從告於廟社到告成天下——清代西北邊疆平定的禮儀重建〉，載於東方學研究論集刊行會編，《高田時雄教授退休紀念·東方學研究論集[中文分冊]》，2014，頁 397-411。

²⁰ 三地四點即臺灣(臺南、嘉義)、廈門、熱河。

²¹ Erich Haenisch, “Zwei vier sprachige Inschriften zum Dsungarenkrieg aus den Jahren 1755 und 1758,” *Miscellanea Academica Berolinensis*, II/2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50), S. 224-247.

²² 大小金川的碑文，除漢文本外，尚有滿、蒙、藏文本，唯未得見，其字數應與漢文本相約。碑文漢文本見《御製文二集》，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570 冊，《清高宗御製文》，第二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卷 28，頁 1a/105—卷 29，頁 12a/116。參看黃潤華、屈六生，《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頁 363、384-85。

²³ 見《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6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首一，頁 1a /363-3—卷首二，頁 3b /363-11；卷首二，頁 18b—19a /363-54。故宮本雖亦將御製碑文置於卷首，但非首頁。見《欽定平定臺灣紀

又將滿載記憶的碑文化成緯絲(Ma. sirge folongyo; k'ose)²⁴，留作紀念。²⁵這些緯絲碑文的製就，除了《生擒莊大田紀事》與石碑碑文的製作同時完成於乾隆五十三年農曆三月外，²⁶緯絲《生擒林爽文紀事》、《告成熱河文廟碑文》二卷，更在碑文製成前即已完成：前者在農曆二月製成，²⁷比碑文早約一個月；後者在農曆六月中澣製就，亦即比碑文早了約兩個月。²⁸五月十六日，乾隆復傳旨蘇州織造處將御筆《生擒林爽文紀事》、《生擒莊大田紀事》裱做手卷二卷。²⁹七月初九日，又將《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發交閩省刊刻，抄發八旗。³⁰更在同年十二月，將《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以及《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四碑，製成墨刻，分前後二次，³¹賞賜給阿哥、親王、郡王、軍

略》，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55 冊，卷首三，頁 21a/44—卷首五，頁 3b/55。乾隆將此書一部六套置於其潛邸毓慶宮以備閱覽，見王子林，《明清皇宮陳設》（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頁 122。

²⁴ Erich Hauer, Handwörterbuch der Mandschusprach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7), S.320.

²⁵ 紫江朱啟鈐（桂辛）輯、合肥闕鐸（霍初）校，《清內府藏刻絲書畫錄》，收於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第 5 輯，0 646，藝術叢編，第 1 集，第 32 冊，《繡譜》（臺北：世界書局，1982），卷 1，頁 55 錄有清刻絲高宗書《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一冊。另朱啟鈐，《存素堂絲繡錄二卷》（1928 年序排印本），頁 30b-31b 內開《乾隆刻絲平定臺灣方略》四卷，包括《清高宗御書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清高宗御書平定臺灣功臣贊序》、《清高宗御書生擒林爽文紀事》、《清高宗御書生擒莊大田紀事》。

²⁶ 朱啟鈐，《存素堂絲繡錄二卷》，頁 30b-31b 謂《清高宗御書生擒莊大田紀事》款乾隆戊申季春月御筆（季春月即農曆三月）。

²⁷ 朱啟鈐，《存素堂絲繡錄二卷》，頁 30b-31b 謂《清高宗御書生擒林爽文紀事》款乾隆戊申仲春御筆（仲春即農曆二月）。

²⁸ 朱啟鈐（桂辛）輯、闕鐸（霍初）校，《清內府藏刻絲書畫錄》卷 1，頁 55 謂《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款題乾隆戊申季夏月中澣御筆。季夏月即農曆六月，中澣即中旬。《清實錄》亦將碑文繫在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乙卯（六月十四）條下。見《清實錄》，冊 25，卷 1307，頁 17a/604。

²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 50，頁 591。手卷九月十六日裱好後送懋勤殿。

³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 14 冊（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頁 397，第 974 條。

³¹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分兩次賞賜親貴官員碑文墨刻。第一次賞賜名單中，雖未明言《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是墨刻，但從受賜官員如伍拉納、浦霖、金士松、勒保、巴延三、李世傑、曹文埴、李奉翰、沈初、圖薩布、孫永清、蔡新、閔

機大臣、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協辦大學士、尚書、侍郎、左都御史、將軍、總督、巡撫、衍聖公，以共慶亂事的戡定。³²透過御製碑文的刊刻和餽贈，乾隆得以將其勦滅逆賊，安靖海疆的個人記憶，擴大為統治階層的集體記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刊本、緝絲、墨刻，全在亂平後即開始製作，而且大部分都在不足一年之內完成，可見林爽文亂事的平定一直是乾隆心思所繫之處。即便到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及五十八年（1793），乾隆仍將碑文製成墨搨，甚或鐫刻成玉冊，³³置於乾清宮、重華宮、寧壽宮內，³⁴以便在閒暇時或歸政後，可隨時把玩觀賞，於連翩的回憶中，重溫其昔日出兵臺灣舊事的種種。

乾隆對平定林爽文之亂的情意結也反映在《御題平定臺灣戰圖》銅版刊本的製作上。這些《戰圖》，重在紀功，一共十二幅，其目的在重現戰爭和儀式場景，以作為亂後的視覺記錄。與上面提到的刊本、緝絲、墨刻一樣，《戰圖》也是在乾隆五十三年大亂告終後即馬上開始製作。銅版刊

鶲元、孫士毅的謝恩折中，皆謂獲賜者為墨刻，可見與第二次所賜一樣，亦為碑文墨刻。見洪安全主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頁 76、80、89、94、97、98、100、104、114、123、155、157、189；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71 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8），頁 2、19、59、63、72、112、171、257、290、422、646。

³² 兩次賞賜名單，除少部分人名不一樣外，大致相同。見《乾隆朝上諭檔》，第 14 冊，頁 719—21，第 1666 條，頁 730—32，第 1687 條。據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71 輯，頁 198—199 所載，衍聖公孔憲培雖未見於第二次名單中，但從其於乾隆 54 年 2 月 8 日所上的謝恩摺中所奏，可知彼亦獲贈《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三碑的碑文墨刻。

³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53，頁 135、203—204、222。

³⁴ 權麗梅，〈乾隆詩文玉冊：清宮特殊的文化現象〉，收於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八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頁 377—82；王子林，《明清皇宮陳設》，頁 45、216、261—62，文中所謂藏於乾清宮及重華宮東配院漱芳齋的《御製平定臺灣告成黃河文廟碑文》實為《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之誤，而寧壽宮所藏者包括《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三碑。《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則未見列為宮中擺設。重華宮是乾隆的潛邸，即帝位後，乾隆每歲於此茶宴聯句。寧壽宮是乾隆於歸政後作為太上皇養老的居所。不過，乾隆雖言禪位，但實則仍居住在養心殿，一如其晚年所刻印章所言：「歸政仍訓政」。乾隆雖居於養心殿，但乾清宮在禮制上仍為皇帝「正寢」。永壽宮是后妃居所，另藏謝墉書《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一冊，見王子林，《明清皇宮陳設》，頁 122。

本在鐫刻前，先製有紙本彩繪。這紙本是根據福康安早前進呈御覽的十六幅稿本增刪而成。紙本上鈐皇帝閒章，畫工精細，較福康安的稿本正式。

《戰圖》上所刻御製詩，其製作較《戰圖》的繪圖更早。御製詩十二首中的三首作於丁未年（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首作於戊申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包括最主要的《生擒逆首林爽文戰圖》及《生擒莊大田戰圖》上的二首；其餘見於《大埔林戰圖》、《集集埔戰圖》、《大武壠戰圖》的三首，則成於己酉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除此三首御製詩屬事後補製外，其他九首的製作與戰事的發展同步，幾乎是勝仗打到哪裡，御製詩就寫到哪裡，而且戰事愈近尾聲，詩作就愈快完成。這顯然與乾隆心情因戰事變得順利而越來越舒暢有關。後期製作的《枋寮戰圖》、《生擒莊大田戰圖》、《渡海凱旋圖》、《凱旋賜宴圖》四圖上的御製詩，即在當月完成。《戰圖》銅版刊本的製作共費時四年多，時間雖然稍長，但乾隆對其間所作的圖樣一一過目，有關戰圖的風格尺寸也有所堅持，而且一如既往，將製成本分賞阿哥及軍機大臣。³⁵因此，不以林爽文之亂為小事的乾隆，其直接介入碑文的製作，實不足為奇。

十通碑文皆為御製。雖然御製文有時或先由翰林擬稿，不過，林爽文之亂的御製文基本上是乾隆自撰的。作為文學侍從的翰林頂多對碑文加以潤色。³⁶碑文的敘事全採用第一人稱「予」/bi>mini 的觀點，如《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云：「則予「遲速論」所云，未能速而失

³⁵ 李泰翰，〈清乾隆年間臺灣戰圖製作經緯〉，《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五卷，第二期（2007 年冬季號），頁 142-49。銅板戰圖可參看張曉光，《清代銅板戰功圖全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頁 40-52 或李泰翰，〈清乾隆年間臺灣戰圖製作經緯〉，頁 167-78，圖 1-圖 12。紙本設色《戰圖》見朱誠如，《清史圖典》，第六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 108-119。《戰圖》的名稱，見慶桂，《國朝宮史續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頁 972-75 或于敏中、慶桂，《國朝宮史及其續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314 冊，卷 98，頁 9a-13a/401-403。

³⁶ 在《御題平定臺灣戰圖》中的《凱旋賜宴圖》的御筆題詩後，乾隆自謂乃「即席成什」。見張曉光，《清代銅板戰功圖全編》，頁 52。乾隆並沒有誇大其詞。趙翼，《簷曝雜記》（北京：中華書局出，1982），頁 7，卷 1，〈聖學一〉記曰：「上聖學高深，才思敏贍，為古今所未有。御製詩文如神龍行空，瞬息萬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學碑文，屬草不過五刻，成數千言。讀者想見神動天隨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尋常碑記之類，亦有命汪文端具草者，文端以屬餘。餘悉意結構，既成，文端又斟酌盡善。及進呈，御筆刪改，往往有十數語只用一、二語易之，轉覺爽勁者，非親見斧削之跡，不知聖學之真不可及也。」

於遲，予之過也（行 7）/Ere utxai mini araxa Elhe Xôdun-i Leolen-de henuhe. Xôdulame muteheqô elhešere-de ufaraxangge. mini endebuku dabala（行 7）」、《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云：「而朕親製贊五十者為二十，餘命文臣擬撰，一如上次之式……況予古稀望八之年（（行 4-5）/ mini beye maqtacun arara gungge amban-i ton-be susai-ci orin obume ekiyembufi. γôwa-be bithei ambasa-de afabufi. nenehe mudan-i durum-i songqoi banjibume arabuxa.....Tere angyalal mini beye jaqônju se xamiqa（行 4-5）」；《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云：「則予之所以深感昊慈，豈言語之所能形容也哉（行 17-18）/ede mini Abqai γosire kesi-be šumilame hukšere babe gisun leolen-de tucibume mutembio（行 17-18）」、《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云：「且予去歲籌臺灣之事，日於斯。天佑予衷，命福康安、海蘭察率百巴圖魯以行，及簡精兵近萬，亦發於斯（行 5-6）/ Tere angyalal. duleke aniya mini beye ubade tefi. inenggidari Tai Wan-i baiita-be tulbime bodoro-de. Abqa minde γônin baxabufi. Fuk'angyan. Xaiilanca-be tucibufi. tangγô baturu-be γaiifi ungihe geli tumen isire silixa cooxa-be fideme tucibuhengge inu ubade bihe（行 5-6）」。

從「御製碑」的行文書寫看，碑文亦頗能反映乾隆撰寫碑文當時躊躇滿志的心情，其口氣並不是代筆大臣所能輕易模仿的。乾隆一直為林爽文之亂所困擾。³⁷當時叛亂所及之處遍及大半個臺灣：彰化、淡水、諸羅、鳳山、臺南府城等重要城鎮，無一倖免；而且戰事由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開始，即停滯不前，拖延足足一年多，所以乾隆對戰事的進展極為關注。乾隆《起居注冊》中，有關臺灣於叛亂期間的記事，有愈往後便愈詳、愈多的趨勢。³⁸其針對臺灣發佈的諭旨，隨著叛亂的發展，亦變得越來越頻密。這些諭旨很多時更是以「六百里加緊」送出。³⁹事後編修的檔

³⁷ 乾隆焦慮之情，從其御製詩中不難察覺。見《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首一，頁一 b/1—4b/2。

³⁸ 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第三六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³⁹ 參看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二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書中所收上諭，有多起是六百里加緊發佈的，如頁 103、113、149。

冊中，以《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所蒐羅的資料最為詳盡，冊中幾乎每天都有亂事的相關紀錄。從其載記中可以看出，乾隆一直緊貼軍情，而且每當戰況有所變化時，他的心情亦隨之起伏波動。⁴⁰因此，當動亂平定後，乾隆累積多時的焦慮頓時一掃而空，其興奮快慰之情，躍然紙上。《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云：

「茲盡美盡善，以成功於三月之間，則上天之所以啟佑藐躬，俾以望八之年而獲三捷之速，則予之所以深感昊慈，豈言語之所能形容也哉！」（行 16-17）

Te ilan biyai sidende. saiin dade saiin-i gungge mutebuhengge. coxome Dergi Abqa mini beyebe yosime aiisime ofi. tuttu jaqônju se xamiqa bime. uttu xôdun gungge mutebure-de isibuxabi. Ede mini abqai yosire kesi-be šumilame hukšere babe gisun leolen-de tucibume mutembio.（行 15-18）。

《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又云：

「幸邀天助順而成功速。此予所以感謝鴻覲，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又不能已於言者也。」（行 6-8）

Abqa ijišxôn-de aiisilame xôdun gungge mutebuhe. Mini Abqai aiisia-be hukšere yônin. gisun leolen-de tucibume muteraqô bime. gelî esi seci ojoraqô gisurerengge. ede qai.（行 7-8）」

由於皇天助順，亂事得以迅速敉平，乾隆如釋重負，在志得意滿之餘，奮筆疾書，其目的即在盡快給平定臺灣亂事立一存照。為求速成，故碑文基本上平鋪直述，不注重詞藻修飾。他親製《紀事語》二篇及《平定

⁴⁰ 乾隆每當戰事變得順利時，他的心情也變得暢快，如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戊午），他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海洋風信頂阻，未能剋期開駕，正是上蒼默佑，天妃助靈，俾福康安得以等候新兵，揚帆同渡，未始非極好機會，朕方轉愁為慰。」見《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1，頁 1b-2a/122-23。但當戰事有所拖延時，他又馬上轉慰為愁。乾隆御製詩《新正重華宮二律》云：「正值傳餐憩武成，置郵忽見達紅旌。眾欣賊首必生獲，細按軍書未報明。雖此春韶行賚酒，那能歡樂聽歌笙？宴回卓午重華坐，七字聊攬不快情。」見《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首二，頁 3b/15。

臺灣功臣像贊序》一篇，於亂後不消一月即寫作完成。其餘二篇，即《告成熱河文廟碑文》，以及《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雖製作稍晚，時間亦相對充裕，但碑文於改用韻文處，也僅在篇末以十數行作結，或乾脆只以短什成篇。碑文行文更是重複臃腫，如《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中有關「遲」與「速」的討論，架床疊屋，幾乎佔了碑面的一半（漢、滿碑文皆由行 6-行 15），而有關「日蝕」的部分，也囉嗦累贅，篇幅亦幾乎佔了碑文面積的四份之一（漢文碑由行 18-行 22；滿文碑由行 19-行 23）。雖然碑文整體是急就章，稍欠文采，不過這正反映出乾隆那一吐鬱悶而後快的感覺。乾隆急不及待的心情，同樣反映在其後翻譯的滿文碑文上。由於要迎合乾隆求快速成的心態，以適時建立碑石，碑文滿譯被迫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因此，不管是史事的記述還是在遣詞用字上，錯誤不少，而其錯誤之多，可說是清代御製碑刻之最（見下）。一般而言，乾隆朝的滿漢翻譯，頗為工整，但御製碑的譯文，偶有句順顛倒，可見時間緊迫，不容刻意整齊對譯，如《林爽文碑》漢文碑文謂：「遂於二十八日申時放洋，至二十九日申時兵船齊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帆直達」；而滿文碑文則將其中二十九日的記事順序前後顛倒謂：Tereci orin jaqôn-i bonio erinde jaxôdai-be jurambufi. mederi-de emu inenggi šuwe mingyan bade isitala yabume. orin uyun-i bonio erinde. cooxai jaxôdai sasa Lu Zi' Giyang sere bade isinaxa（行 13b-14a）。

碑文的夾行小字最能看出乾隆的自說自話，如《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行 3a-5b 的小字，明顯是乾隆對生祠建立的敘述，尚意猶未盡而特意追加的補註：

近年以各省建立生祠，最為欺世盜名惡習，因令嚴行飭禁，並將現有者概令燬去。若今特命臺灣建立福康安等生祠，實因臺灣當逆匪肆逆以來，荼毒生靈，無慮數萬。福康安等於三月之內，掃蕩無遺，全郡之民，咸登衽席。此其勳績，固實有可紀，且令奸頑之徒，觸目警心，亦可以潛消很戾。是此舉似與前此之禁毀跡雖相殊，而崇實斥虛之意，則原相同，孰能橫議。且勵大小諸臣，果能實心為國愛民，確有美政者，原不禁其立生祠也（行 3a-5b）

Ere udu aniya geren yoloi beyei arbun-i juqten-i boo iliburengge-be. jalan-be eiitereme gebu-be xôlxara umesi ehe tacin seme. tuttu hese wasimbufi ciralame fafulame naqabubuxa bime. ne-i bisirengge-be bireme gemu efulebuhebi. Te coxotoi hese wasimbufi Tai Wan-i bade Fuk'angyan-sei beyei arbun-i juqten-i boo ilibubuxangge. coxome Tai Wan-i bade fudaraqa ehe xôlx facuxôn-be deribuhe-ci. banjire irgese-be nungneme jocibuxangge. ududu tumen-de isinaxa bime. Fuk'angyan-se ilan biyai dolo hede funcceburaqô wacihiyame geterembufi. Tai Wan-i gubci ba-i irgese-be yooni taiifin-i banjire-de isibuxa turgunde. esei gungge faššan-be yargiyan-i ejeci acara teiile aqô. geli jalingya ehe urse-be erebe erin aqô tuwame dolo isefi. ceni ehe osxon γônin-be dorgideri mayambukini sehengge qai. Erebe tuwaci. te-i ilibuburengge. neneme fafulame efulebuhengge-ci songqo udu encu bicibe. yargiyan-be wesihulere untuhun-be naqabure γônin daci encu aqô-be daxame. we enculeme gisureme mutembini. Ere ineku amba ajige xafasa-be unenggi yargiyan mujilen-i gurun-i jalin faššame. irgen-be γosime. yargiyan-i saiin dasan iletuleme muterengge bici. umai beyei arbun-i juqten-i boo iliburengge-fafularaqô seme huwekiyeburengge.. (行 3a-5b)

說此話的人若非乾隆本人，誰敢用如此口吻為建立福康安的生祠辯解！

乾隆於《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中自謂「幼年書室學詩」(行 13)。他對其中的《采薇》、《出車》二章似猶為喜愛。碑文云：「因思《采薇》、《出車》諸章，乃上之勞下，其義正，斯為正雅/Γônic defere gurumbi. sejen-be jurambumbi sere jergi fiyelen dergingge-i fejeringgei joboxo-be γôninjarangge. tere juryan tob ofi tuttu tob šunggiya-de obuxabi」(滿、漢碑文行 13-14)。此前，二章也見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御製《避暑山莊後序》：「又扈蹕之眾，歷數月於役，《采薇》、《出車》，古人所以恤下，此亦不可不念。俾人知其所繫者大，且

時加惠賜焉，則勞而不怨。若圖己樂而忘人苦，亦非仁人之所為也」。⁴¹碑文中的某些冷僻用語，更是乾隆所愛用，如「埋根倡首」（行 10）一辭中的「埋根」二字，即同時見於《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所錄御製詩《致遠齋題句》：「易將更調兵，埋根弗迴顧」、《閱武》：「奮勇堅心，埋根前進」、《見機》：「並不知埋根首進，直搗賊巢」、《仲春朔日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等以平定臺灣聯句並成四律》：「埋根踴躍資群力，執首綢繆賴一人」、《平定臺灣聯句（有序）》：「五隊埋根龍豹合」，御製贊《福建陸路提督奮勇巴圖魯梁朝桂》：「金川剿逆，埋根進首」、⁴²《御製十全記》：「埋根批吭，手足胼胝」。⁴³「埋根」一辭頗古雅，大臣中之有文學者如趙翼亦不解其意。⁴⁴《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所載「惟在見幾而作」（行 22）中「見幾」一語，也是乾隆常用之詞。御製詩《見機》云：「嘗讀繫辭傳，見幾曰君子」，⁴⁵御製文《御製四知書屋記》云：「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義，可不審乎」、「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之宜，何如其凜凜哉！」⁴⁶御筆《普寧寺碑記》亦云：「君子有見幾之作，兆人有可格之誠」、「而見幾君子之作，予亦不敢不勉」，⁴⁷可以為證。

值得注意的是，十通碑文中，《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的漢文碑是唯一特別標明是乾隆親筆書寫的；其他四通的漢文碑文皆

⁴¹ 《御製文二集》，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570 冊，《清高宗御製文》，第二冊，卷 17，頁 11a/44。

⁴² 見《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首一，頁 4b/2（《致遠齋題句》）、頁 5a/3（《閱武》）、頁 8a/4（《見機》）；卷首二，頁 13b/20（《仲春朔日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等以平定臺灣聯句並成四律》）、頁 28b/28（《平定臺灣聯句（有序）》）；卷首五，頁 8a/57（《福建陸路提督奮勇巴圖魯梁朝桂》）。

⁴³ 《御製文三集》，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570 冊，卷 8，頁 10a/274。

⁴⁴ 《簷曝雜記》，卷 1，〈聖學二〉記曰：「又用兵時，諭旨有硃筆增出『埋根首進』四字，亦不解所謂。後偶閱後漢書馬融傳中始得之，謂決計進兵也。聖學淵博如此，豈文學諸臣所能仰副萬一哉？」見趙翼，《簷曝雜記》，頁 7。趙翼，乾隆二十六年進士，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除《簷曝雜記》外，尚著有《二十二史劄記》、《陔餘叢考》、《甌北詩鈔》、《甌北詩話》、《皇朝武功紀盛》等書。

⁴⁵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首一，頁 7a—8b/4。

⁴⁶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首四，頁 10a-10b/49。

⁴⁷ 《御製文初集》，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569 冊，《清高宗御製文》，第一冊，卷 19，頁 10a/170—11a/171。

無「御筆」二字。比對嘉義和臺南兩地的福康安生祠碑，兩者不止每行字數一致，而且字體相近，可見二碑乃出自同一人之手。相反，臺南及廈門兩地的同名碑刻，行數參差不一，字體也時有差異，如《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中的「發」字(行 8)和「巢」字(行 9)，可見四碑非同一人所書，畢竟要乾隆把四幅碑文的底稿工整地重鈔各二遍，是難以想像的事。再者，福康安生祠碑的字體，與其他四碑比較，亦不相似。如以碑文最後一行的「乾隆五十三年」這幾個字為例，其中的「乾」字和「年」字的運筆書寫，不管是臺南的福康安碑文，或者是嘉義的同名碑文，都與其他四通御碑明顯有別，再將之與乾隆其他同期御筆碑文比對，其書法字體頗為一致，⁴⁸故所謂「御筆」之言似乎不假。不過，同碑的滿文碑文行 6 所謂的 qan-i araxangge (汗所寫的) 乃根據漢文碑文「御筆」二字翻譯而來，滿文碑文並非乾隆親筆，而為臣工後來所補製。畢竟，乾隆滿文基礎頗佳，簡單如在年號 Abqai Wehiyeh 下必得加格助詞-i，應不會不曉得。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之上諭云：「將御製功臣生祠誌事詩一首，繕寫清、漢字發往，一併刊勒碑旁。」⁴⁹所謂「繕寫」，即自原稿謄錄抄寫，而此處之原稿當即乾隆的漢文御筆及其滿譯。⁵⁰之所以只有福康安碑是御筆是因為乾隆視之為平亂的最大功臣，故對之格外施恩；⁵¹而且，碑文只有短短數行，與熱河碑等碑文的長篇大論相比，日理萬機的乾隆當有較大的意欲揮筆完成。⁵²由此可見，在御碑的製作過程中，乾隆本人並非置身

⁴⁸ 參看乾隆五十三年三月《白雲觀左碑》的御書，收於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 75 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頁 93。

⁴⁹ 《乾隆朝上諭檔》，第 14 冊，頁 503，第 1176 條；洪安全總編輯，《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二）（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頁 1290「方本上諭」；《清實錄》，冊 25，卷 1311，頁 10a–b/680。

⁵⁰ 清代御書刊刻，先摹勒成碑模，後再鐫刻，臺南、嘉義福康安二碑碑文形制、行數、字距相近，可以為証。有關御書刊刻的步驟，可參看崑岡等，《大清會典事例》，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禮部，卷 428，頁 27a–28b/831；《清實錄》，冊 25，卷 1306，頁 7b/575。

⁵¹ 《乾隆朝上諭檔》，第 14 冊，頁 503，第 1176 條；《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二），頁 1290「方本上諭」；《清實錄》，冊 25，卷 1311，頁 10a/680。

⁵² 有關乾隆的起居作息，可參看《簷曝雜記》，卷 1，聖學二：「上每晨起，即進膳。膳後，閱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撫摺子畢，以次召見諸大臣，或一人獨見，或數人同見，日必四、五起。最後見軍機大臣，指示機務訖，有銓選之文武官，則吏、兵

事外，而是實際參與於其間。

乾隆曾謂：「現在大功告成，所有辦理此事顛末，曾親製紀事語二篇及平定臺灣功臣像贊序一篇」。⁵³根據上面的討論，碑文出自乾隆之手，實信而有徵。乾隆之自白，當非虛語。

四、乾隆的漢化思維：碑文的先漢後滿

乾隆既視平定臺灣之亂為大事，同時又以振興滿洲舊俗，特別是「清語騎射」為己任，照道理他應該以身作則，文必滿洲，暢述敉平叛亂的原委。但經比對「御製碑」的滿、漢文碑文，再與滿、漢文《清實錄》相互對照，可知碑文原文是漢文，滿文碑文只是漢文原稿的翻譯。滿文碑文，由於並非皇帝御製，顧忌不多，所以和漢文「御製碑」碑文不一樣，在實錄中改動之處不少。茲以立於臺南的《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碑文為例，以說明之(見附錄)。

《福康安等功臣生祠》的碑文是先漢後滿可以從滿文《清實錄》所載滿文碑文的改譯中窺見。漢文《清實錄》所錄的碑文，除了夾行小字不錄外，完全沒有改動，與原漢文碑文完全一致，但滿文《清實錄》則對滿文碑文改動極大，而且其改動處明顯是依照漢文碑文翻譯而來，以便力求滿文碑文與漢文碑文行文一致。茲略去輕微改動處不論（如第八句改 dasan 「政治」為 doro 「政道」），只舉其改動較大者數端如下，以明滿文碑文乃依據漢文碑文翻譯而來：

漢文碑文正文的第一句「三月成功速且奇」，其相對應的
滿文碑文的頭二字 ere mudan 「此次」，於滿文《清實錄》中被
刪去，以便滿文譯文能更貼近原來的漢文碑文。

第二句「紀勳合與建生祠」，滿文《清實錄》刪掉了原碑文中 esei 「這些人的」一字，因為漢文碑文中並沒有這個字，並且補譯了漢文中的

二部各以其員引見。見畢，日加已，皆燕閒時矣。或作書，或作畫，而詩尤為常課，日必數首，皆用硃筆作草，令內監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文學者，用摺紙楷書之，謂之詩片。」見趙翼，《簷曝雜記》，頁 7。

⁵³ 《清實錄》，冊 25，卷 1300，頁 21b/484；《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行 4-5）。參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50，頁 591。

「合」字為 giyan，「生祠」一詞則改譯為 bisire fon-ci juqten-i boo (iliburengge)，強調乃「在生時」所建，較原譯的 beyei arbun-i juqten-i boo 更貼近漢文。

第三句「垂思琬琰忠明著」中的「琬琰」一詞有二義，即碑石之美稱或者比喻品德或文詞之美。滿文碑文原譯，依前義將「琬琰」譯為 eldengge wehe，滿文《清實錄》則依後義，改譯為 wesihun algin「盛名」，以便用滿文 tutabufi 一字，補入漏譯的漢文「垂思」一詞。

第四句「消彼崔苻志默移」，滿文《清實錄》以 geterembu 加譯原來未譯的「消」字，又以 γônin-be dorgideri xalabuxa 直接譯「志默移」三字，這和原滿文碑文的 dorgideri isefi saiin-de foryošombi「畏懼繼而暗暗轉好」相較，《清實錄》的新譯與漢文碑文亦步亦趨。

第五句「臺地期恒樂民業」，滿文《清實錄》補譯了原滿文碑文所無的「期」字為 kiceme。

第六句中的「海灣」，依漢文義，滿文《清實錄》將原碑文的 dabqôri mederi 「重洋」改譯為 mederi ongyolo。

第七句「曰為曰毀似殊致」的滿文《清實錄》新譯 weiilekini sehe efulekini sehengge encu gese bicibe，幾乎將滿文碑文原譯 embici ilibubuxa embici efulebuhengge songqo encu bicibe 改寫，以便更貼合漢文的結構。「曰為」對譯作 weiilekini sehe，「曰毀」對譯作 efulekini sehengge，並補譯原脫漏「似」字為 gese。

末句年號部份，漏掉屬格助詞-i。這個錯漏絕不是手民之誤。除了福康安碑外，其他「御製碑」的滿文碑文的乾隆年號 Abqai Wehiyehe 後皆漏刻屬格助詞-i，廈門南普陀寺的碑文與臺灣本一樣，各碑文亦漏寫了屬格助詞。漢文一般的紀年，「乾隆」和「五十三年」中間不須加「之」一類表示屬格的字，但標準滿文，年號與年份之間，必得用屬格助詞。可見滿文碑文明顯是翻譯自漢文的「乾隆五十三年」一辭，只是譯文並非出自高手。經查看清代其他各朝的檔案，唯有乾隆朝的檔案漏寫年號後的屬格助詞，而且漏寫的頻率相當高。⁵⁴即便是乾隆歿後編製的滿文《高宗清實

⁵⁴ 參看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敕諭、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敕諭。見王宏鈞主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明清檔案卷》（清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錄》的封面，亦同樣漏寫了屬格助詞。這對大力提倡清語的乾隆來說，未免是一大諷刺。

福康安碑以外，其他的碑文也是先寫漢文，再翻譯為滿文。茲從四方面說明之：

(一) 史事誤記：《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碑》中提到福康安於乾隆五十二年率大軍入臺平定林爽文之亂的時日，滿文碑文誤記，但漢文碑文皆正確無誤，可見滿文碑文並非正本。若漢文碑文是據滿文翻譯而來，滿文碑文譯漢時當即複製滿文底本的誤記，而不會出現滿漢碑文記載互異的情形。《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碑》行13a-14b的夾行小字記云：

13a. 福康安到廈門，於十月十一日自大擔門開船，被風打

13b. 回；十四日得風駛行半日，又以風遮至崇武澳停泊，

似

14a. 覺遲滯。然當此候風之際，四川屯練二千、廣西兵三千俱至，而風亦適利，遂於二十八日申時放洋，至二十九日申時兵船齊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

14b. 帆直達。其餘之兵，亦陸續配渡。福康安率此生力之兵，旬日內頓解諸羅之圍；繼克賊巢，生擒逆首。是未渡以前若遲，而計其成功又未可為遲也。

13a. Fuk'angya Hiya Men-i bade isinafi. omšon biyai juwan emu-de. Da Dan Men sere baci jaxôdai-be jurambume jaqa edun-de lasihibufi. amasi γociq. Juwan duiin-de. edun ijisxôn ofi. xontoxo inneggi yabufi. gelı edun-de xangγabufi. Cung U Oo

13b. sere bade isinafi. jaxôdai ilixangge. elhešeme γoiidabuxa gese bicibe. ere edun-be aliyara sidende. Si"cuwan-i juwe mingyan tulian cooxa. Guwangsi-i ilan mingyan cooxa gemu isinaxa bime. edun inu ijisxôn oxo. Tereci orin jaqôn -i bonio erinde

14a. jaxôdai-be jurambufi. mederi-de emu inenggi šuwe mingyan bade isitala yabume. orin uyun-i bonio erinde. cooxai jaxôdai sasa Lu Zi' Giyang sere bade isinaxa bime. tereci γôwa cooxa-be inu siran siran-i doobuxa. Fuk'angya ere ice genehe cooxa-be yaiifi.

14b. juwan inenggi dolo utxai Ju Lo Hiyan-i qabuxa babe subuhe. Sirame xôlxai yelu-be efulefi. daxala fudaraqa xôlxabe weiihun jafaxabi. Erebe tuwaci. mederi doore ongyolo elhešehe gese bicibe. gungge mutebuhe inenggi-be bodoci. geli elhešehe seci ojoraqô..

文中「十月」，滿文本行 13a 作 omšon，即「十一月」。考之清代史料，福康安於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中旬至月底半月間渡臺前史事發生的次序先後，與上引漢文碑文小字所記完全吻合。茲開列相對應的檔案資料及碑文以證明之：

1. 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日江西巡撫何裕城奏摺附片：

再，福康安在船守風，因風汛不順，未能放洋。嗣於十一日清晨風勢稍平，已經開出大擔。臣正為欣慰，午後東風又復大作，福康安船隻仍被吹回。⁵⁵

2. 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一日閩浙總督李侍堯奏：

緣東風甚大，不能放洋，福康安等亦尚在大擔候風。⁵⁶

3. 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協辦大學士福安康奏：

及至十一日清晨，臣見風勢略平，強令放船，行未十數里，仍被風打回。⁵⁷

⁵⁵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65 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頁 748，同片見洪安全主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九）（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4），頁 617；參看洪安全總編輯，《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頁 556。

⁵⁶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65 輯，頁 758。

⁵⁷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65 輯，頁 778。

4.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上諭：

至福康安自九月二十四日在大擔門發摺後，迄斤兩旬，未據續有奏報。計此時自己得有順風放洋，前抵鹿港。即或因風色不順，尚在大擔門守候。⁵⁸

5.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六日上諭：

據福康安奏，在大擔門守風旬日，現令船戶等晝夜候視，一得稍順之風，立刻放洋。⁵⁹

6.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七日上諭：

至福康安奏此時若尚在大擔門候風。⁶⁰

7.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七日閩浙總督李侍堯奏：

茲本月十四日風勢已平，將軍參贊及粵兵俱由大擔放洋，如風汛平順，不過兩三日即可抵鹿港。⁶¹

8.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上諭：

福康安既據李侍堯奏，尚在大擔門候風渡洋。⁶²

9.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福康安奏：

竊臣前在大擔門守風，曾將十一日開船被風打回情形奏蒙聖鑒在案，十四日得有順風，與海蘭察同舟放洋，駛行半日……二十三日卯刻，望見崇武大山，將近泉州惠安縣洋面，維時風信愈烈，詢據船戶，僉稱現值暴期，三四日方能平順，當另收入崇武澳中灣泊。⁶³

⁵⁸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一），頁475。

⁵⁹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一），頁487。

⁶⁰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一），頁503。

⁶¹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65輯，頁825-26；參看《清實錄》，冊25，卷1291，頁43b/326，乾隆五十二年十月癸亥（二十九）條：上詣奉先殿、壽皇殿行禮，諭軍機大臣曰：「福康安同海蘭察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於十四日俱由大擔門放洋，不過兩三日，可抵鹿仔港」。

⁶²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一），頁528。

⁶³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66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10. 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福建布政使覺羅伍拉納奏：

福康安等船隻於二十三日早間被風吹至縣屬之崇武地方，現在澳中灣泊……現已得有順風，福康安等即於二十八日申刻放洋，逕渡鹿仔港。⁶⁴

11. 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閩浙總督李侍堯奏：

而福康安以風訓平順，不過兩三日即可抵鹿港。⁶⁵

12. 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上諭：

今福康安統領大兵適抵鹿仔港。⁶⁶

13. 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一福康安奏：

竊臣在崇武澳守風三日，屢經具奏，二十八日拜摺後，風色漸轉，即於申時與海蘭察同舟放洋，二十九日申刻已至鹿港，因潮退不能進口。⁶⁷

14. 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二上諭：

福康安前抵鹿仔港，已有粵西兵三千隨往，其川省團練即日可以續到，而黔省官兵又接續前進，且鹿仔港本有新舊兵一萬，又有義民萬餘，是福康安處兵力已極壯盛，足敷進剿。⁶⁸

15. 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上諭：

據徐嗣曾〔奏〕十月二十八日海洋風色平順，福康安等已放〔洋〕前進，詢之船戶人等。俱稱風色甚好。必可速到鹿仔

1987），頁 37，同摺見《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九），頁 664；參看同日乾隆上諭中所引福康安原摺，見《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一），頁 541。

⁶⁴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66 輯，頁 99，同摺見《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九），頁 687。

⁶⁵ 本件為軍機處錄副奏摺，見《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參輯，第三十三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7），頁 313。

⁶⁶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一），頁 589。

⁶⁷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66 輯，頁 111。

⁶⁸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一），頁 742。

港並見各船銜尾而行，甚為安穩等語。⁶⁹

16.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諭：

福康安於二十八日在崇武澳放洋。今於二十九日，即抵鹿仔港。以數百里洋面，一晝夜間，揚帆穩渡。所帶兵船百餘號。同時到港。實仰荷天神默佑。⁷⁰

17.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二日上諭：

此即上年福康安統兵勦捕臺灣逆匪。在大擔門守風月餘。及至續調官兵齊集。由崇武澳放洋。一日直抵鹿仔港。成功迅速之明徵也。⁷¹

18.乾隆五十三年戊申《敕建天后宮碑記》：

乾隆五十一年冬，逆匪林爽文作亂，滋蔓鴟張。我皇上特命協辦大學士嘉勇公福康安為將軍，統率巴圖魯侍衛數百員、勁旅十餘萬，於五十二年十月杪由崇武放洋。時際北風盛發，洪波浩湧，三軍聯檣數百艘，漫海東來，一日齊登鹿仔港口岸，繼而糧餉、軍裝分馳文報，舳艤羅織，均保無虞。⁷²

其他較間接的文獻資料也有相同的載記。先言《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其相關的記事如下：

19.《福康安奏大剿諸賊，開通諸羅，並進攻門六門，賊勢潰散信至，詩以志慰。因改賜諸羅縣名為「嘉義」，用旌士民守城之善》：

福康安於十月十一日自大擔門開船，被風打回。十四日，得風駛行半日，風色又轉，復在崇武澳停泊候風，似覺稽滯。然當此候風之際，四川屯練兵二千及廣西兵三千先後到彼，風

⁶⁹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一），頁 635。

⁷⁰ 見《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一），頁 765-66；同諭亦見《清實錄》，冊 25，卷 1293，頁 6a/349，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辛巳條。

⁷¹ 《清實錄》，冊 25，卷 1314，頁 34b/756—35a/757，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庚子條。同諭亦見《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一），頁 18。

⁷² 原碑立於彰化縣鹿港鎮新祖宮，搨本現藏國立臺灣圖書館。新祖宮乃乾隆 53 年因感念天后助佑，大軍得以渡臺平亂而敕建。

色轉順，遂於二十八日申刻放洋。至二十九日申刻所有兵船齊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帆即達，為從來渡海罕有之事。此實仰賴上天賜惠，海神靈佑。⁷³

20.《命晉增天后徽稱，詩以昭靈誌謝》：

至福康安於上年十月二十八日申刻，在崇武澳放洋，一晝夜間，駛行千里；所有兵船百餘只，於二十九日申刻，齊抵鹿仔港。⁷⁴

21.《福康安奏報抵廈門登岸並巴圖魯侍衛等皆平安渡海凱旋，詩以誌慰》：

福康安於上年十月，在惠安縣之崇武澳候風十餘日，似乎遲滯。乃當此停留之際，所調四川屯練二千及廣西兵三千先後到彼，而風亦旋利，遂於二十八日申刻放洋，至二十九日申刻，所有兵船，已齊抵鹿仔港。⁷⁵

22.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庚戌），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恆瑞、柴大紀、蔡攀龍、李侍堯曰：

若福康安在大擔門守風尚須數日放洋，則此項兵丁當已陸續到彼，福康安即可帶領一同渡洋。⁷⁶

23.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丁巳），李侍堯奏：

九月以來，海風連作，臺灣久無文報……至粵西兵三千，現已到齊登舟，緣東風甚大，不能放洋。福康安等亦尚在大擔候風。⁷⁷

24.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戊午），福康安奏言：

⁷³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首一，頁 23b/12。

⁷⁴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首三，頁 10a/38。

⁷⁵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首三，頁 16b/41。

⁷⁶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0，頁 14b/112。

⁷⁷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0，頁 26b-27b/118。同件部分亦見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軍機處錄副奏摺，參看《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參輯，第三十三冊，頁 260。

十一日清晨，臣見風勢略平，強令放船，行未十數里，仍被逆風打回。⁷⁸

25.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庚申），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普吉保、李化龍曰：

此時，福康安自早得有順風，揚帆徑渡，前抵鹿仔港。⁷⁹

26.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癸亥），李侍堯奏言：

而本月十四日風勢已平，將軍、參贊及粵兵俱由大擔放洋。如風信平順，不過兩、三日即可抵鹿仔港。⁸⁰

27.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癸亥），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曰：

福康安同海蘭察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於十四日俱由大擔放洋，不過兩、三日可抵鹿仔港。⁸¹

28.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乙未）孫士毅奏言：

現聞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已帶兵東渡，直趨鹿仔港。⁸²

29.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乙未），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李侍堯、柴大紀、普吉保、徐嗣曾、孫士毅曰：

今福康安已於十月十四日開洋，自己早抵鹿仔港，大兵雲集，尤當士氣百倍，即日會合長驅，定可一舉蕩平。⁸³

再言《嘯亭雜錄》，其《臺灣之役》乾隆五十二年記事云：

30.六月中，即調陝督福康安為將軍，及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來統兵，並發明詔，聲言調兵十餘萬來滅賊。冬十月，所謂蜀番及粵西兵共五千先至，有旨，官兵不必至府城，當即往鹿港進。會颶風不得渡，守風於

⁷⁸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1，頁 1a/122。

⁷⁹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1，頁 13b/128。

⁸⁰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1，頁 26a/135。

⁸¹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1，頁 27a/135。

⁸²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2，頁 6a/139。

⁸³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2，頁 11a-b/141。

崇武澳。二十八日忽得順風，一晝夜數百艘盡抵鹿港海口，檣竿如櫛，列數里。賊聞之，不測多寡，謂真有十萬兵至，始懼。⁸⁴

滿文碑文顯然乃內閣漢本房譯滿時，⁸⁵誤將漢文碑文底稿「十月十一日」看作「十一月十一日」所致。有趣的是欽定製作如《文淵閣四庫全書》所錄《御製文三集》、⁸⁶《欽定平定臺灣紀略》，⁸⁷以及地方誌如《廈門志》，⁸⁸直接抄錄自漢文原文，皆無錯誤，月份亦作「十」，但近人所編的《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自《御製文三集》轉錄碑文時亦錯看「十月十一日」為「十一月十一日」，⁸⁹可見這是極易犯的人為錯誤，古今無別。

另外，《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滿文碑行 19，載林爽文之亂發生於 fulgiyan tasxa aniya/丙寅年，即乾隆十一年（1746）；而實則林爽文於丙午年起事，即乾隆五十一年，漢文碑文正確記為「丙午載」。這也是內閣譯滿時，誤將丙午的滿文 fulgiyan morin 錯記為 fulgiyan tasxa 之故。若誤記的滿文是原本，則漢文碑文不可能將年份正確記載。《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滿文碑行 11 謂：「Te Lin Šuwang Wen susai emuci aniya omšon biya-de baiita dekdehe」，漢文對譯為：「茲林爽文於五十一年十一月起事」，可見《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所記的 fulgiyan tasxa aniya/丙寅年是筆誤無疑。

(二)文法錯誤：臺南各碑的乾隆滿文年號 Abqai Wehiyehe 後皆漏刻屬格助詞-i，已如上述。個別碑文如《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滿文）行 27a 「正月初四」的滿文並不是 aniya biya ice duuin，aniya biya 與 ice duuin 之間，應有屬格助詞-i，即「正月的初四」。漏列-i 明顯

⁸⁴ 昭樞，《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6，《臺灣之役》，頁 157。

⁸⁵ 漢本房，又名漢本堂，又有翻譯房之稱。有侍讀學士 4 人（滿、漢各 2 人），侍讀 5 人（滿 3 人，漢 2 人）、中書 42 人（滿 31 人，漢軍 8 人，漢 3 人），貼寫中書 16 人（都是滿員），供事 3 人。其職掌之一是將漢文碑文翻譯為滿文。參看徐藝圃等編，《清代文書檔案圖鑑》（香港：三聯書店，2004），頁 13。

⁸⁶ 見《御製文三集》，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570 冊，卷 12，頁 8a/304，及《御製文三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1，卷 12，頁 7b /1301-652。

⁸⁷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首四，頁 3b-4a/4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63，卷首，頁 3b /363-4。

⁸⁸ 見《廈門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卷 1，頁 10 b /27。

⁸⁹ 見《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第 9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頁 1970。

是受漢文「語言幹擾」（linguistic interference）的影響。

有趣的是碑文另有多加屬格助詞-i 的情況。《御製平定臺灣告成勲河文廟碑文》（滿文）行 17 載：enteke dabqôri tulergi-i ba。滿文 tulergi 一字後，與大部分以-rgi 結尾，表示方位的字相同，一般在限定後隨的名詞時，不再另加格助詞-i，以免重覆累贅。如 tulergi ba/口外、tulergi gurun/外國、tulergi hergen/外字。因此，滿文《清實錄》抄錄此碑文時，亦刪去此多餘的屬格格助詞。⁹⁰屬格助詞-i 的用法極為簡單，對懂滿文的滿洲人來說不容易出錯。這說明漢文碑文應為原本，滿文碑文是按漢文本後來翻譯的。

(三)錯字：《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行 19dahime「重複」一字漏點，誤記為 tahime，此尚可說是手民之誤。⁹¹但《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碑行 5 把 baturulame 寫成 batuBULame 就不應如此看待，⁹²因為後者根本不是滿文。如果滿文是正本，這個不是滿文的字，如何能翻成漢文碑文中的「奮勇」，而且碑文若原為滿文，那麼譯漢時發現錯誤，應可馬上改正之。正因為碑文原是漢文，所以譯滿後出錯亦沒有察覺有改正之必要。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熱河碑文》對福安康解救諸羅時，人民的歡欣雀躍的描述。漢文碑文行 25.1 寫作「歡欣踴躍」，邏輯上與前後文密合；但滿文用 ferguwehebi 「奇妙、驚奇、驚異」一字，與文章脈絡完全不能結合。滿字 ferguwehebi 其實應作 fekucehebi 雀躍，urgunjembi 常與 fekucembi 連用，即歡欣雀躍之意，同碑行 25b 謂「義民等無不歡欣踴躍，出城迎師」中「踴躍」兩字的滿文對譯即 fekuceme urgunjendume。可見滿文碑文乃翻譯自漢文，否則滿文碑文不會出現如此不合情理的錯誤。廈門南普陀寺的《熱河碑文》雀躍一字亦誤作 ferguwehebi。由此可知，碑文底稿必為漢文無疑。

⁹⁰ 見遼寧省檔案館藏《Daiicing Gurun-i G'aozung Yongkiyangya Xôwangdi-i yargiyan pooli..》，emu mingyan ilan tangyôci debtelin, Abqai Wehiyehe [sic] susai ilaci aniya ilan biyai dergi，頁 45a 行 7。

⁹¹ 臺大圖書館與國立臺灣圖書館的臺南碑文搨本 dahime 第一音節皆漏點，誤寫作 ta，但廈門碑文同字的第一音節似加點，正確記作 da。

⁹² 見遼寧省檔案館藏《Daiicing gurun-i g'aozung yongkiyangya xôwangdi-i yargiyan pooli..》，emu mingyan ilan tangyôci debtelin, Abqai Wehiyehe [sic] susai ilaci aniya ilan biyai dergi，頁 48b 行 4，以及廈門碑文皆作 baturulame。

(四)加譯：《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滿文碑文行 19
 Fuk'angyan- sei Giya I Hiyan-i qabuxa ba-be subufi，漢文碑文曰：「福康安等解圍」，無 Giya I Hiyan-i（嘉義縣的）等字。後出的滿文《清實錄》與漢文碑文相互對應，亦無 Giya I Hiyan-i 等字，可知漢文碑文乃原本，滿文《清實錄》編製時，依照漢文本，將加插的多餘部分刪去。

不只「御製碑」碑文是先漢後滿，與「御製碑」有關的其他書寫，也以漢文為主。《平定臺灣戰圖》上的御筆只有漢文，所鈐的印章，與乾隆其他的閒章一樣，亦為漢文，如「古稀天子之寶」、「太上皇帝之寶」等，可見其生活上的語言選擇也傾向使用漢文。⁹³上面提到的緝絲、玉冊、墨刻上的碑文亦全為漢文。⁹⁴如果考慮到乾隆御製詩、文，幾乎全用漢文，⁹⁵則「御製碑」上的滿文碑文乃據漢文翻譯而來，並非無據。乾隆的滿文著述並不多，從《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所見，⁹⁶「號稱」乾隆的滿文著作，大略只有如下各條：

（一）、圖書部分

序號	滿文書名	漢文書名	說明	頁碼
0011	Inenggidari saxangge-be isamjaxa	日知薈說	滿文譯于	3

⁹³ 乾隆的印章，據統計約共 1800 餘方，除少數用以宣示政治權威的寶璽加用滿文外，閒章多用漢文。

⁹⁴ 紫江朱啟鈐桂辛輯、合肥闢鐸霍初校，《清內府藏刻絲書畫錄》卷 1，頁 55 謂清刻絲高宗書《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一冊，五彩邊素地刻絲黑字，行書二十頁，可見所用文字非滿文。朱誠如，《清史圖典》，第六冊，頁 121 載有《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記》玉冊圖，冊上文字亦是漢文。有關墨刻，可參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 75 冊，頁 91 所載內府藏漢文《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揭片。

⁹⁵ 乾隆御製詩，凡四萬多首，數量雖然驚人，但恐非全由他人代作。據他的扈從詞臣趙翼所言，乾隆詩作，「日必數首」，即趙翼本人一生詩作亦幾達五千首。見趙翼，《簷曝雜記》，頁 7；梁揚、黃海雲，《古道壯風：趙翼鎮安府詩文考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 43-44。不過，乾隆御製詩，以漢文居多，滿文詩作，寥寥無幾，其中較為人知的有《永安莽喀詩》/Yongyan Mangyan-i irgebun 及《御製河源詩》/Xôwang Xo Birai sekiyen 二首。《四庫全書》雖然亦收錄滿文典籍，如《繙譯四書》/Manju ubaliyambure duuin bithe 等，但此二詩只列漢文本，不列滿文本，可見在乾隆時代，滿文非如想像中重要。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89，頁 189-282—189-669；579 冊，《御製河源詩》，1a/579-3—2b/579-4；1307 冊，《御製詩四集》，卷 24，頁 20b/1307-665—21a/1307-665。

⁹⁶ 黃潤華、屈六生，《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

序號	滿文書名	漢文書名	說明	頁碼
	gisurehe bithe		漢文右側	
0154	Xôturi fengšen-i irgebun toqtoxo	吉祥偈（乾隆譯）	滿文	48
0156	Enduringge wacir-i lasxalara sure-i cargi dalin-de aqô naxa amba kluge-i nomun	金剛般若波羅蜜多 經（乾隆重譯）	滿漢合璧 抄本	49
0173	Ebišen alibure nomun toqtoxo	沐浴經（乾隆譯）	滿文	52
0175	Budi juγôn-i jergi tangqan-i šošoxon juryan toqtoxo	菩提要義（乾隆 譯）	滿文	52
0540	Xan-i araxa yongkiyan mudan-i irgebun	[御製]全韻詩	滿漢合璧	133- 34
0541、 0542	Xan-i araxa Muqden-i fu bithe	[御製] 盛京賦	滿文、滿 漢合璧	134
0613	Ioi lun bithe	御論	滿文及滿 漢合璧，	149
0708	Taiizu Xôwangdi Ming Gurun-i cooxa-be Saryô Xan-de ambarame efuleme afaxa baiita-be ejeme araxa bithe	太祖皇帝大破明師 於薩爾滸山之戰書 事文	滿漢合璧	173- 74

(二)、石刻拓本部分

序號	滿文書名	漢文書名	說明	頁碼
0469	Mergen saiin c'i" tang-ni bei bithe	賢良祠碑	漢滿文	359
0470	Kungzi-i miyoo-be dorolome wecere bei bithe	釋奠孔子廟碑	滿漢文	359
0478	Xôwaliyasun xôwaliyaqa gung-ni bei	雍和宮碑(並額)	滿漢蒙藏 文	361
0481	Jung-i taqtu-i eldengge wehe-de ejeha bithe	鐘樓碑(並額)	滿漢文	362
0484	Xan-i araxa Gin Cuwan-i babe	平定金川告成太學	滿漢文	363

序號	滿文書名	漢文書名	說明	頁碼
	necihiyeme toqtobufi amba taciqô yamun-de šangnaxa-be alaxa eldengge wehei bithe	碑(並額)		
0486	Hesei ilibuxa yargiyan-i entehe juqtehen-i eldengge wehei ejetun	實勝寺碑(並額)	滿漢蒙藏文	363
0487	Wacir boobai tekui subaryan-i eldengge wehei bithe	金剛寶塔碑	滿漢蒙藏文	364
0498	Tumen jalafungya juqtehen-i ekdebgge wehei ejebun	萬壽寺碑	滿漢文	366
0499	Nesuken mergen fu r'in dung xala-i eldengge wehei bithe	溫淑夫人董氏墓碑	滿漢文	366
0500	Hesei γabtara mManjurara-be kicebure bei bithe	諭習國語騎射碑	滿漢文	367
0505	Xôwangdi-i gemun-be irgebuhe fiyelen	皇都篇	滿文 ⁹⁷	368
0507	Ferguwecuke-i acabuxa juqtehen-i šangnaxa subaryan-i eldengge wehei bithe	妙應寺白塔碑	滿漢蒙藏文	369
0508	Ferguwecuke-i acabuxa juqtehen-i eldengge wehei bithe	妙應寺碑(額並陰)	滿漢蒙藏文	369
0512	Jun Γar-be necihiyame toqtobuxa babe Ili bade ejeme ilibuxa eldengge wehei bithe	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碑(並額)	滿漢蒙藏文	370
0513	Jun Γar-be necihiyame toqtobuxa gungge mutefi gurun-i taciqô-i yamun-de ilibuxa eldengge wehei	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	滿漢文	370

⁹⁷ 《皇都篇》，除滿文外，尚有漢文。碑文通篇用漢文典故，以唐太宗、駱賓王始，槐市、陸海終。見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卷 90，《郊壠南》，頁 1521。

序號	滿文書名	漢文書名	說明	頁碼
	bithe			
0515	Gubci niqton juqtehen-i si” eldengge wehei bithe	普寧寺碑	漢滿蒙藏文	371
0518	Jun Gar-be necihiyame toqtobuxa sirame Ili bade ejeme ilibuxa eldengge wehei bithe	平定準噶爾後勒銘 伊犁碑(並額)	漢滿蒙藏文	371-2
0519	Be Lin Si” juqtehen-i eldengge wehei bithe	柏林寺碑	滿漢文	372
0524	Xoiise aiiman-be necihiyame toqtobufi gurun-i taciqô-de gungge mutehe jalin ilibure eldengge wehei bithe	平定回部告成太學 碑(並額)	滿漢文	373
0525	Cooxa-be huwekiyebume xoton-i julergi-de beye enggelenehe cooxa- be ejeh irgebun	京縣郊南親勞軍詩 刻	滿漢蒙回文	373
0526	Sirame araxa yargiyan entehe juqtehen-i ejebun	實勝寺後記(並陰)	滿漢蒙藏文	373-4
0527	Šun-be alixa duqai wehei juyun-i eldengge wehei bithe	朝陽門石道碑	滿漢文	374
0528	Tumen jalagungya juqtehen-i eldengge bithe	萬壽寺碑	滿漢蒙藏文	374
0529	Suqan subaryan-i juqtehen-i eldengge wehei bithe	正覺寺碑	滿漢文	374
0530	Dergi colxan-i juqtehen-i eldengge wehei bithe	東嶽廟碑	滿漢文	375
0531	Hecen-i xoton ulan-i enduri-i juqtehen-i eldengge wehei bithe	都城隍廟碑	滿漢文	375
0532	Jalan jalan-i xan-sai juqtehen-i eldengge wehei bithe	歷代帝王廟碑	滿漢文	375

序號	滿文書名	漢文書名	說明	頁碼
0533	Xoiise-sei dorolon hengkilere juqtehen-i eldengge wehei ejebun	回人禮拜寺碑	滿漢蒙維文	375-6
0534	Gubci cibsengge samadi juqtehen- be dasame weiileme šangnaxa doroi doroloro-de baiita-be fisembume irgebuuhengge	普靜寺瞻禮詩碑	滿漢文	376
0538	Γorokingge-be elhe obure muqtehen-be dasame weiileme šangnaxa doroi doroloro-de baiita- be fisembume irgebuuhengge	安遠廟瞻禮詩刻 (乾隆撰並書)	漢滿蒙藏文	377
0542	Gubci sebjengge juqtehen-i bei bithe	普樂寺碑(乾隆撰並正書)	滿蒙藏文	378
0545	Kungzi'-i juqtehen-be dasame weiilebuhe eldengge wehei ejebun	文廟碑	滿漢文	378-9
0546	Guwan-ni beiise-i juqtehen-i eldengge wehei bithe	關帝廟碑	滿漢文	379
0548	Mingyan fucihi asari-i eldengge wehei ejebun	千佛閣碑	漢滿蒙藏文	379
0551	Suwayan juqtehen-be dasame weiilehe eldengge wehei bithe	黃寺碑	滿漢蒙藏文	380
0552	Bodala-i tub šajin-i juqtehen-i eldengge wehei bithe	普陀宗乘廟碑	漢滿蒙藏文	380
0562	Šanyan subaryan alin-i uheri ejebun	白塔山總記	滿漢蒙藏文	382-3
0564	Bi hiya yuwan giyôn-i juqtehen eledengge bithe	碧霞元君廟碑	滿漢文	383
0565	Ma jioi kiyoo dooxan-i eldengge	馬駒橋碑	滿漢文	383

序號	滿文書名	漢文書名	說明	頁碼
	wehei bithe			
0567	Šu sekiyen asari-i ejebun	文源閣碑	滿漢文	384
0568	Šu tunggu asari-i ejebun	文淵閣碑	滿漢文	384
0569	Taiizu xôwangdi Ming gurun-i cooxa-be Sarxô alin-de ambarame efulehe baiita-be tucibume araxangge	薩爾滸山戰事碑	滿漢文	384
0570	Gin Cuwan-i babe necihiyame toqtobufi Meiino-i babe folon folobume ilibuxa eldengge wehei bithe	平定金川美諾碑	漢滿蒙藏文	384-5
0571	Zanla Cucin-i babe necihiyame toqtobufi amba taciqô yamun-de gunnge mutehe-be alaxa eldengge wehei bithe	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並額)	滿漢文	385
0574/05 76	Nadan fucihi subarxan-i eldengge wehei ejebun	七佛幢/七佛塔碑記	滿漢蒙藏文	386
0578	Ilan saqda sunja dulembuhe sere gisuren-i bei	三老五更說碑(並額)	滿漢文	386-7
0581	Zanla Cucin-i babe necihiyame toqtobufi amba taciqôi yamun-de gung mutehe-be alaxa eldengge wehei bithe	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	滿漢文	387
0583	Sumiri alin-i adali xôturi jalafungya juqtehen-i eldengge wehei ejebun	須彌福壽廟碑	漢滿蒙藏文	388
0584	Joo miyoo juqtehen-i irgebun-i bei bithe	昭廟詩碑	滿漢蒙藏文	388

序號	滿文書名	漢文書名	說明	頁碼
0585	Bancen Erdeni-i jalafun-i doroi jalin niruxa sala moo-i niruyan	繪娑羅樹壽王班禪 額爾德尼	滿漢蒙藏 文	388
0587	Šu songqon asari-i ejebun	文溯閣記	滿漢文	389
0589	Bolyo boloqo qôbuliqqa xoton-i subaryan-i ejebun	清淨化城塔記	滿漢蒙藏 文	389
0593	Gurun-i juse-be xôwašabure yamun-de ice weiilehe gurun-i taciqôi yamun muheliyengge muke-i weiilen šangyaxa eldengge wehei ejebun	國學新建辟雍園水 工成碑記	滿漢文	390
0594	Šajin tunggu juqtehen-i ejebun	法淵寺碑(額並陰)	滿漢蒙藏 文	390-1
0596	Jalan jalan-i xan-sai juqtehen-be wecere dorolon šangnafi gingguleme ejehengge	祭歷代帝王廟碑	滿漢文	391
0606	Lama-be gisurehe fiyelen	喇嘛說	滿漢蒙藏 文	393-4

不過，細心分析，這些乾隆御製滿文著述，不是翻譯自佛經，⁹⁸就是多體的文本著述，其源頭仍是漢文。滿文《盛京賦》與渲染帝都形勝文物的漢大賦，如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等，一脈相承；賦中的用典，如「周曰邠岐，漢惟豐沛，白水慶善，興王之會」等句，都是挪用自漢文。滿洲文學的底蘊不深，難以跟漢文相比，所以典出漢文，是自然不過的事。上列乾隆御製文中，以有關記功、寺廟的碑文居多，但這些碑文也是先漢後滿。承德《普寧寺碑記》即為其例。《碑記》云：「皇天有輔德之私，至聖有越世之度，君子有見幾之作，兆人有可格之誠」，又云：「豈非皇天無親，惟德之輔，至聖之度，越世先知，而見幾君子之

⁹⁸ 乾隆的御筆佛經，大部分是漢文，見向斯，《清代皇帝讀書生活》（北京：中國書店，2008），頁137-186的圖版。

作，予亦不敢不勉」，⁹⁹其引用漢文經典以為己用，至為明顯。如文中的「豈非皇天無親，惟德之輔」，乃襲用《尚書·周書·蔡仲之命》中的「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而「見幾君子之作」一句，則是脫胎自《周易·繫辭下》的「君子見幾而作」。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上諭云：「御製文有『我滿洲舊風，以不得捐軀國事，死於牖下為恥』一節，係在《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內，全文業經翻譯，發交閩省刊刻，今遵旨抄發八旗，各交閱看。謹奏。」¹⁰⁰從上諭內所引用的碑文乃來自漢文《二十功臣像贊序》來推論，「御製碑」原文應是漢文，後再翻譯為滿文，當無疑問。八旗滿文荒廢，將滿文譯文抄發八旗，正符合乾隆振興滿文的政策。

五、乾隆的中國觀：「滿洲面具」背後「漢人身體」的折射¹⁰¹

「御製碑」碑文的製作之所以先漢後滿自然與滿人「身體」的深度漢化有關。看來，乾隆雖「夙善國語」，¹⁰²但遇到複雜的問題或者需要作冗長的敘述時，仍傾向用漢文表達。乾隆的思維之所以不得不受漢文左右，是因為滿文並沒有足夠的詞彙全面應對複雜的外在情境。¹⁰³因此，乾隆振興滿文的目的，在於以之作為民族標記和正統的表徵，多於以之作為平常日用的實用語言。¹⁰⁴「御製碑」中的滿文碑只是聊備一格的製作。

⁹⁹ 《御製文初集》，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569 冊，卷 19，頁 10a-b/170-71。

¹⁰⁰ 《乾隆朝上諭檔》，第 14 冊，頁 397，第 974 條。

¹⁰¹ 法籍非裔學者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Frantz Fanon,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5)一書乃探討黑人白化的專著，小節標題乃借用其書名並稍作變更。不過，和法農探討的黑人不同，滿洲人作為政治的宰制者，其文化卻為被宰制者所改變。換言之，滿洲人，猶如帶著滿洲假面的「准漢人」，其「身體」雖然已大部漢化，但仍以不是漢人的「滿洲人」自居。

¹⁰² 昭樞，《嘯亭雜錄》，卷 1，頁 19。

¹⁰³ 「幾何」二字出自《幾何原本》(1607)一書。此書乃利瑪竇和徐光啟根據德藉耶穌會傳教士克拉維烏斯 Christopher Clavius 的《歐幾里得原本》*Euclidis elementorum libri XV* (1574) 合譯而成。滿洲人因為沒有深厚的數學基礎，因此康熙請法國傳教士據法文本翻譯《幾何原本》為滿文時，「幾何」二字也只能依照漢文音譯作 *ki xo*,全書則譯作 *Ki xo yuwan ben bithe*.

¹⁰⁴ 滿文因為是官方語言，入關後一直到清亡，滿洲旗人官契仍堅持滿漢合璧，但滿人私契，自康熙中期後，已通行漢文。這說明滿文實際上只是虛擬的政治語言，不是

乾隆的思考方式，因受漢地文化符號的制約，基本上乃從中國本位出發。¹⁰⁵他的天下觀，與傳統中國的儒家君主無異。¹⁰⁶在《御製平定臺灣告成勅河文廟碑文》的繫辭篇首，他指出康熙時臺灣之入於中國版圖乃朱明對臺灣認知的後繼(滿、漢文，行 17)。在《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中，他將自己和開疆拓土的光武帝相比，並引用《詩經》中的《采薇》、《出車》、《祈父》、《北山》諸章來說明佳兵黷武」的不可(滿、漢文，行 5-6、13-16)。在《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中，他又以自漢至明的日蝕為例，說明這個自然現象與出兵臺灣的關係(滿、漢文，行 20-22)。

乾隆自覺是中國的天子/Abqai jui。¹⁰⁷在「御製碑」各碑文中他多次公開宣示自己因賴上天眷佑而得以平定叛亂。作為「撫育天下」的天子，乾隆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¹⁰⁸臺灣「御製碑」是實踐這個傳統抽象政治概念的有效「技

真實的生活用語。有關旗人契書所使用的文字，可參看劉小萌，〈清代契約文書——以北京旗人契書為中心〉，《2011 年“滿學與清史研究”研習營講義》(北京：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臺北：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2011），頁 29、34。

¹⁰⁵ 有關乾隆的漢文化傾向，參看崔岩：〈從御製詩論乾隆帝的文化認同一兼論清朝的漢化〉，《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臺北：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115—132。

¹⁰⁶ 清代的滿洲皇帝並非如「新清史」的學者所言，與傳統的中國皇帝有別。乾隆二十年御筆《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碑》云：「於恒有言，曰殺寧育。受俘赦之，光我擴度。漢置都護，唐拜將軍，費賂勞眾，弗服弗臣。既臣斯恩，既服斯義，勒銘格登，永詔億世。」可見乾隆之視邊疆，與中國歷代君主並無不同。見《御製文初集》，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569 冊，卷 19，頁 9a/170。《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稱金川為「金夷」與《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之稱準噶爾為「準夷」，皆可為証。見《御製文初集》，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569 冊，卷 17，頁 15b-16a/157；卷 19，頁 2a/166。

¹⁰⁷ 《御製平定臺灣告成勅河文廟碑文》，滿、漢文皆行 15。

¹⁰⁸ 乾隆的大一統觀乃清初大一統思想的延續。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上諭云：「何況朕天下之主。普天之下皆朕土，率土之濱皆朕臣乎。」見《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14，卷 17，頁 7b/414-149。他的大一統思想具體反映在《大清一統志》(1744 年)中。《一統志》序云：「聖祖仁皇帝特命纂輯全書，以昭大一統之盛，卷帙繁重久而未成。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重加編纂。閱今十有餘載，次第告竣。自京畿達於四裔，為省十有八，統府州縣千六百有奇，外藩屬國五十有七，朝貢之國三十有一。星野所占，坤輿所載，方策所紀，憲古證今，眉列掌示，圖以臚之，表以識之，書成凡三百五十餘卷。」見《御製文初集》，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569 冊，卷 10，頁 7b-8a/96-97。

藝」(technology)之一。就「土」而言，「御製碑」的佈置猶如大清「地體」(geo-body)¹⁰⁹南北縱深的視覺再現：碑石由南而北，從臺灣經對岸廈門，一直伸延至滿洲龍興之地的東北。銘刻於其上的是盛清武功的欽定集體記憶。碑文中屢屢述及林爽文之亂的平定，乃來自全國各地的猛將（福康安、海蘭察、烏什哈達）精兵（閩、浙、桂、川、湖、黔、粵各省），¹¹⁰聯同臺灣的官軍義民協力而成。透過碑文在多地的「複製」，乾隆將「遠隔重洋」¹¹¹的臺灣孤島，重新納入大清「想像共同體」之內，¹¹²其作用與御賜諸羅嘉義之名，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就「臣」而言，碑文中提到原來「非我臣僕」的臺灣「生番」，¹¹³儘管彼等位處國家邊緣的邊緣，但乾隆仍以其平亂有功，將之載錄於《職貢圖》之中，¹¹⁴以示「生番」並非邊陲的化外遊民，而為隸於大清版圖¹¹⁵的「人類」。¹¹⁶

¹⁰⁹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我將 geo-body 譯作「地體」以便與「人體」和「天體」作一對比，以突顯其「地」的意涵。

¹¹⁰ 除碑文外，尚可參看《清實錄》，冊 25，卷 1301，頁 16b/ 499。

¹¹¹ 《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漢文行 18a，滿文對譯作 dabqôri mederi-de yoro maqtabu，亦行 18a。

¹¹² 參看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 .

¹¹³ 見《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行 14，「生番非我臣僕」的滿文對譯為 eshun fanzi'-sai ba Dulimbai Gurun-i irgen waqa(行 13)，句中「我」字滿文譯作 Dulimbai Gurun，即中國。

¹¹⁴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頁 217。亂後，臺灣「生番」於乾隆 53 年及乾隆 55 年兩次赴京朝覲，以示忠誠。見何孟侯，〈清代林爽文事件中的臺灣原住民〉，《故宮學術季刊》，第 26 卷，第 4 期（2009 年夏季），頁 121-35。相關圖版見蔡承豪，〈赴京瞻觀--乾隆年間臺灣原住民進京之行〉，《故宮文物月刊》，349 期（2012 年 4 月），頁 86-93；蔡承豪，〈我有嘉賓--臺灣原住民的乾隆八旬壽典之行〉，《故宮文物月刊》，353 期（2012 年 8 月），頁 84-94。蔡承豪在後文頁 91 及頁 94 說《告成熱河碑》位於熱河避暑山莊內並不正確，碑石應立於鄰近山莊的文廟。

¹¹⁵ 在清代，臺灣「生番」為隸屬中國之民的這種看法，一直沒有改變過。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藉口「琉球飄民」為臺灣土著所殺，派兵登陸臺灣，同治特諭軍機大臣曰：「生番地方，久隸中國版圖，與臺灣唇齒相依，各國覬覦已久，日本相距尤近，難保不意圖侵佔」；又曰：「生番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不得謂為化外遊民，憇置不顧，任其慘遭荼毒。事關海疆安危大計，未可稍涉疏虞，致生後患。」見《清實錄》，冊 51（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365，頁 13a/831，30a/839。

¹¹⁶ 見《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生番化外，然亦人類」（行 26）/

作為一個象徵大一統的符號，「御製碑」不啻是乾隆重申已內地化的臺灣，乃大清不可分割之一部的強烈政治宣言，並且是其於亂後，重新確立統治合法性的歷史見證。表面上，「御製碑」看似只針對臺灣一隅，但實質上，若將之置於全國的大格局來考察，其背後實隱含國家整體地理空間的內在聯繫，臺灣乃繼蒙（準部）、回（回部）、藏（金川）域外三地內屬滿洲之後，重歸大清的漢人邊地，宜乎其碑文，與彰顯盛世意象的「十全武功」御製碑文的「文類」(genre)相一致，其意義已超越當下地方亂平的記憶，而轉化為大清國史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有機一環。

要之，「御製碑」是乾隆大一統思維在臺灣的具體視覺展現。此冰冷無情，強佔空間的龐然大物，額示御製，邊飾龍紋，文兼滿漢，其巍然聳立，寂然不動之姿，儼然隱身在其背後的建碑者乾隆，居高臨下，睥睨其肅清「逆賊」之地，一如西方學者所謂的「凝視」，¹¹⁷其營造的肅殺之氣，我武維揚的威攝力，足以「令奸頑之徒，觸目警心」。¹¹⁸因此，以臺灣「御製碑」為漢化滿洲中國皇帝在大清南疆的石化分身，可謂思過半矣。

附錄 1. 《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碑文¹¹⁹

1. Hesei Tai Wan-i bade Fuk'angyan-i jergi gungge ambasai

Eshun fanzi'wen-de daxaxaqô bicibe. emu adali niyalma (行 26)。

¹¹⁷ 參看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W.W. Norton, 1981);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¹¹⁸ 《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行 4b。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三日，福康安上奏謂：「該處地隔重洋，民俗素稱刁悍。若不明示武威，恐民人等事過即忘，不足令其怵目驚心，常思安分畏法。」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67 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頁 531。因此，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上諭云：「該處民人，經此一番懲創，暫知歛戢，第恐日久復忘，是以許在彼建立福康安等生祠，明示武威，使之怵目儆心，望而生惕。」見《清實錄》，冊 25，卷 1305，頁 566/19b；參見卷 1298，頁 445-46/9b-10a；卷 1311，頁 680/9b。上諭雖針對福康安生祠而言，但實屬點睛之作，臺灣「御製碑」中的其他碑石，亦應作如是觀。

¹¹⁹ 由於碑文漫漶不清，陳捷先，〈台灣的滿文石碑〉，《清史雜筆》，第七輯（臺北：學海出版社，1988），頁 157-58 所載同碑的碑文轉寫僅限於大字部分，而其中有九處誤記；小字部分亦未有轉錄。

beyei arbun-i juqten-i boo ilibubure jalin irgebun arafi
baiita-be ejehe..

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

2. Ere mudan ilan biyai sidende gungge mutebuhengge
xôdun

bime ferguwecuke. esei gungge-be ejeme beyei arbun-i
juqten-i

boo weilebuhebi. Eldengge wehe ilibufi tondo-be iletuleme
temgetulembime. ehe osxon urse dorgideri isefi saiin-de
foryošombi. Ede Tai Wan-i ba-i

三月成功速且奇，紀勳合與建生祠。垂斯琬琰忠明著，消彼萑苻志默
移。臺地

3. irgese enteheme hethe-de sebjelere-be daxame. ereci
dabqôri

mederi-i bade jai amba cooxa-be ilire-be baiiburaqô ombi.
Embici ilibubuxa embici efulebuhengge songqo encu bicibe.

3a. 【Ere udu aniya geren yoloi beyei arbun-i juqten-i boo
iliburengge-be. jalan-be eiitereme gebu-be xôlxara umesi ehe】 3b.
【tacin seme. tuttu hese wasimbufi ciralame fafulame naqabubuxa
bime. ne-i bisirengge-be bireme gemu efulebuhebi. Te coxotoi】

期恒樂民業，海灣不復動王師。曰為曰毀似殊致，近年以各省建立生
祠，最為欺世盜名惡習，因令嚴行飭禁，並將現有者概令燬去。若今特

4a. 【hese wasimbufi Tai Wan-i bade Fuk'angyan-sei beyei
arbun-i

juqten-i boo ilibubuxangge. coxome Tai Wan-i bade fudaraqa
ehe xôlxâ facuxôn-be deribuhe-ci. banjire irgese-be nungneme
jocibuxangge. ududu tumen-de isinaxa bime. Fuk'angyan-se
ilan biyai dolo hede funceburaqô wacihiyame geterembifi. Tai
Wan-i gubci ba-i irgese-be yooni taiifin-i banjire-de】 4b.
【isibuxa turgunde. esei gungge faššan-be yargiyan-i ejeci acara

teiile aqô. geli jalingya ehe urse-be erebe erin aqô tuwame dolo isefi. ceni ehe osxon γônin-be dorgideri mayambukini sehengge qai. Erebe tuwaci. te-i ilibuburengge. neneme fafulame efulebuhengge-ci songqo udu encu bicibe. yargiyan-be wesihulere untuhun-be naqabure γônin daci】

命臺灣建立福康安等生祠，實因臺灣當逆匪肆逆以來，荼毒生靈，無慮數萬。福康安等於三月之內，掃蕩無遺，全郡之民，咸登衽席。此其勳績，固實有可紀，且令奸頑之徒，觸目警心，亦可以潛消很戾。是此舉似與前此之禁毀跡雖相殊，而崇實斥虛之意，則原

5a. 【encu aqô-be daxame. we enculeme gisureme mutembini. Ere ineku amba ajige xafasa-be unenggi yargiyan mujilen-i gurun-i jalin fašsame.】 5b. 【irgen-be γosime. yargiyan-i saiin dasan iletuleme muterengge bici. umai beyei arbun-i juqten-i boo ilibure-be fafularaqô seme huwekiyeburengge..】 5. Enteke yargiyan-be wesihulere untuhun-be naqabure dasan ede bi..

相同，孰能橫議。且勵大小諸臣，果能實心為國愛民，確有美政者，原不禁其立生祠也。崇實斥虛政在茲。

6. Abqai Wehiyehe [sic] susai ilaci aniya bolori dulimbai biyade

xan-i araxangge.

乾隆五十三年仲秋月御筆。

附錄 2. 滿文《清實錄》所載《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

碑文¹²⁰

20b.2—9

Xan-i araxa irgebun-i gisun. Ilan biya ome gungge mutebuhengge xôdun bime. ferguwecuke fašsan-be ejere jalin. bisire fon-ci juqten-i boo iliburengge giyan. Esei wesihun algin-be tutabufi tondo-

¹²⁰ 見遼寧省檔案館藏《Daiicing gurun-i g'aozung yongkiyangya xôwandi-i yargiyan qooli..》，emu mingyan ilan tangyô juwan emuci debtelin, Abqai Wehiyehe [sic] susai ilaci aniya jaqôn biyai fejergi，頁20b-21a。

be gehun iletulehe. tenteke ehe xôlxa-be geterembufi γônin-be dorgideri xalabuxa. Tai Wan-i ba-i irgen enteheme hethe-de sebjelere-be kiceme. mederi ongyolo deribure bade jai amba cooxa tucire-be naqaxa. Weiilekini sehe. efulekini

御製詩曰。三月成功速且奇，紀勳合與建生祠。垂斯琬琰忠明著，消彼萑苻志默移。臺地期恒樂民業，海灣不復動王師。曰為曰毀

21a.1—2

sehengge. encu gese bicibe. yargiyan-be wesihuleme. untuhan-be naqabure doro ede biqai sehe..

似殊致，崇實斥虛政在茲。

引用書目

- 于敏中、慶桂
2000 《國朝宮史•國朝宮史續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314 冊。
海口：海南出版社。
- 于敏中等編纂
1985 《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 不著撰人
1983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冊 36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不著撰人
2000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55 冊。海
口：海南出版社。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1987 《明清史料》戊編。北京：中華書局。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2002 《乾隆帝起居注》，第 36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1991 《乾隆朝上諭檔》，第 14 冊。北京：檔案出版社。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2000 《乾隆朝軍機處隨手登記檔》，第 40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
200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
- 允祿等編、弘晝續編
1983 《世宗憲皇上諭內閣》，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14。
-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王子林
2011 《明清皇宮陳設》，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王宏鈞主編
2007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明清檔案卷》（清

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京市天龍長城文化藝術公司編

1999 《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第 9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

1990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 75 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甘德星

2001 〈滿文羅馬字拼寫芻議〉，收於閻崇年主編，《滿學研究》，第 6 冊，頁 50-68。北京：民族出版社。

甘德星

2014 〈康熙遺詔中所見大清皇帝的中國觀〉，《清帝國性質的商榷——回應新清史》，頁 109—114。中壢：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向斯

2008 《清代皇帝讀書生活》。北京：中國書店。

朱玉麒

2014 <從告於廟社到告成天下——清代西北邊疆平定的禮儀重建>，載於東方學研究論集刊行會編，《高田時雄教授退休紀念・東方學研究論集[中文分冊]》，頁 397—411。京都市：臨川書店。

朱啟鈴（桂辛）輯、闕鐸（霍初）校

1982 《清內府藏刻絲書畫錄》，收於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第 5 輯，0 646，藝術叢編，第 1 集，第 32 冊，《繡譜》。臺北：世界書局。

朱啟鈴

1928 《存素堂絲繡錄二卷》（民國十七年序排印本）。

朱誠如

2002 《清史圖典》，第 6 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何孟侯

2009 〈清代林爽文事件中的臺灣原住民〉，《故宮學術季刊》，26(4)：121-35。

李泰翰

2007 〈清乾隆年間臺灣戰圖製作經緯〉，《故宮學術季刊》，25(2)：142-49。

周凱纂

1967 《廈門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昭樞

1980 《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

洪安全主編

2004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九）。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洪安全主編

2005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洪安全總編輯

1996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洪安全總編輯

1996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二）。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徐藝圃等編

2004 《清代文書檔案圖鑑》。香港：三聯書店。

海忠

1968 《承德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1987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65-67 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1988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71 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崑岡等

1991 《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

崔岩

2014 〈從御製詩論乾隆帝的文化認同一兼論清朝的漢化〉，《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頁 115—132。臺北：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曉光

2003 《清代銅板戰功圖全編》。北京：學苑出版社。

梁揚、黃海雲

2005 《古道壯風：趙翼鎮安府詩文考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清高宗

1986 《御製文三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清高宗

2000 《御製文初集》，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569 冊，《清高宗御製文》，第一冊。海口：海南出版社。

清高宗

2000 《御製文二集》，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570 冊，《清高宗御製文》，第二冊。海口：海南出版社。

清高宗

2000 《御製文三集》，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570 冊，《清高宗御製文》，第二冊。海口：海南出版社。

清高宗

2000 《樂善堂全集·樂善堂記》，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549 冊，《清高宗樂善堂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

莊吉發

1989 《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莊吉發

1997 〈清初諸帝的北巡及其政治活動〉，《清史論集》（一），頁 235-276。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陳捷先

1988 〈臺灣的滿文石碑〉，《清史雜筆》，第 7 輯，頁 147—177。臺北：學海出版社。

黃潤華、屈六生

1991 《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惲麗梅

2008 <乾隆詩文玉冊：清宮特殊的文化現象>，收於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 8 輯，頁 374-386。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2004 《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 2 冊。臺北：遠流出版公

司。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2007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 3 輯，第 33 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發行；臺北：遠流出版。

趙剛

2011 〈「大一統」話語與早期全球化視野〉，收於楊念群編，《新史學》第五卷，《清史研究的新境》，頁 1-45。北京：中華書局。

趙翼

1982 《簷曝雜記》。北京：中華書局出。

劉小萌

2011 〈清代契約文書—以北京旗人契書為中心〉，《2011 年”滿學與清史研究”研習營講義》，頁 27-40。北京：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臺北：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慶桂

1994 《國朝宮史續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慶桂等

1986 《清實錄》，冊 25。北京：中華書局。

蔡承豪

2012 〈赴京瞻觀--乾隆年間臺灣原住民進京之行〉，《故宮文物月刊》，349:86-93。

蔡承豪

〈我有嘉賓--臺灣原住民的乾隆八旬壽典之行〉，《故宮文物月刊》，353:84-94。

寶鋆等

1987 《清實錄》，冊 51。北京：中華書局。

《 Daiicing gurun-i g'aozung yongkiyangya xôwandi-i yargiyan qooli..》。遼寧省檔案館藏。

Fanon, Frantz.

1975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Foucault, Michel.

1994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Hall, Stuart.

“Encoding, Decoding.”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ed. Stuart Hall et al., pp. 128-38. London: Hutchinson;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auer, Erich

2007 Handwörterbuch der Mandschusprache. Wiesbaden : Harrassowitz.

Haenisch, Erich.

1950 “Zwei viersprachige Inschriften zum Dsungarenkrieg aus den Jahren 1755 und 1758,” Miscellanea Academica Berolinensis, II/2 : 224-247.

Lacan, Jacques.

1981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W.W. Norton.

Winichakul, Thongchai.

1994 Siam Mapped :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Wu, Hung.

1995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於 2020 年二月投稿，於 2020 年三月審查通過)

熱振呼圖克圖之生與死

孟鴻

前文化大學輔仁大學兼任教授

摘要

近代西藏地方與中央的關係，熱振呼圖克圖實為一關鍵性人物。十三世達賴辭世後，出身於四大林之熱振呼圖克圖獲推舉為攝政，由於其未受英、印政府誘煽蠱惑，同意國民政府派大員入藏致祭，之後又同意中央派蒙藏委員會委員吳忠信入藏與之共同辦理十四世達坐床大典，使自民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若即若離關係，大見改善，吳忠信入藏後，除認證十三世達轉世靈童，辦理十四世達賴坐床大典外，更在熱振呼圖克圖同意下，在拉薩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但藏地情況至為複雜，其中受英印政府影響之親英派分子，處心積慮謀求西藏獨立，因此視熱振之傾向中央若眼中釘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後快，而熱振私行也有瑕疵，終於被諸親英分子所構陷，被捕入獄，並被毒殺於獄中，本文擬就其事跡酌為剖敘。

關鍵詞：攝政，熱振呼圖克圖 達扎

一、藏地攝政制度之由來

清乾隆二十二年（西元 1757 年），七世達賴羅桑格桑嘉措（西元 1708～1757 年）辭世，清乾隆曾諭軍機大臣等曰：

「前因衛藏之人性好擅權滋事，頗羅鼎故後辦理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時，曾降旨將衛藏一切事件，俱告知達賴喇嘛辦理，

噶隆（按即噶倫）等惟令遵辦達賴喇嘛所交事件。是以數年以來，甚屬安靜無事。茲達賴喇嘛圓寂，覽噶隆等將迪穆呼圖克圖為首之奏，只稱請掌辦喇嘛等事務，所奏殊屬含混。噶隆等頗有擅辦喇嘛事務之心，日久恐不免妄擅權柄。是以朕賞迪穆呼圖克圖諾捫汗之號，俾令如達賴喇嘛在日一體辦喇嘛事務。除明降諭旨外，再諭伍彌泰，薩喇善務宜留心，遇一切事務，俱照達賴喇嘛在時之例，與迪穆呼圖克圖商辦，毋令噶隆等擅權滋事。將此情節已降旨交章嘉呼圖克圖，命其寫信，由赴藏之扎薩克喇嘛親身密交迪穆呼圖克圖矣。……」¹

上引乾隆上諭中之「迪穆呼圖克圖」，一般史料多作第穆呼圖克圖，當時之第穆呼圖克圖係第六世，名阿旺降貝德勒嘉措（或作阿旺強白嘉措），出身於丹吉林²，第穆呼圖克圖既經中國清朝乾隆指定出任達賴之代表，在達賴轉世靈童未尋獲前、或雖尋獲但尚未成年時，代行達賴之職權，中國清朝此一措施，遂成為西藏地方政府之「攝政」制度。

清朝之所以以出身四大林，高位階（呼圖克圖）喇嘛出任西藏地方政府攝政，其目的在防止世俗貴族勢力坐大，綜計自七世達賴辭世之西元1757年，至十三世達賴圖丹嘉措親政之西元1895年，前後共一百三十八年間，其間除第八世，十二世達喇短時間親政外（八世二十六年，十二世一年），概由攝政操持藏地政教兩權，在此一百多年間，中國清朝中央共任命十一個攝政，其名單及任攝政時間如下：

1. 出身丹吉林己六世第穆呼圖克圖，攝政二十一年（1757～1777年）。
2. 出身策墨林之一世噶勒丹錫呼圖禪師（即第六十一任甘丹赤巴阿旺崔陳），攝政十年（1777～1786年）。
3. 出身功德林之八世濟曇呼圖克圖達察羅桑益西丹貝貢布，攝政七年（1804～1810年）。
4. 出身丹吉林之七世第穆呼圖克圖洛桑絳央班覺加措，攝政九年

¹ 見《清實錄藏族史料，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三月子》，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集，頁1274～1275。

² 喇嘛教格魯派有所謂四大林，指丹吉林、功德林、策墨林及錫德林

(1811~1819 年)。

5. 出身策墨林之二世活佛阿旺絳白崔陳加措，也即是第七十三任甘丹赤巴，攝政二十六年（1819~1844 年）。

6. 七世班禪額爾德尼丹白尼瑪（或作丹必尼瑪）攝政二年（1844~1845 年）。

7. 出身錫德林之三世熱振呼圖克圖阿旺益西崔陳堅贊（或作阿旺益西此陳嘉措），攝政八年（1855~1862 年）。

8. 夏扎旺秋結布，攝政三年（1862~1864 年）。

9. 德珠羅藏青繞汪曲，攝政十年（1864~1873 年）。

10. 出身功德林之十世濟嚩呼圖克圖達察阿旺班丹曲吉堅參，攝政十二年（1875~1886 年）。

11. 出身丹吉林之八世第穆呼圖克圖阿旺洛桑赤列繞結，攝政九年（1886~1895 年）³。

以上所列十一個攝政，大多出身四大林，或由甘丹赤巴中遴選，經中國清朝中央批准。「攝政」在西藏地方具有極重要地位及政治作用，攝政雖然位高權重，但從既往成例看，攝政的下場似乎都相當悽慘，如十三世達賴親政前的攝政，是出身丹吉林的八世第穆呼圖克圖，在十三世達賴親政後，因送了一雙鞋子給達賴，而達賴穿上後「立即流鼻血不知何故，頗為疑惑」⁴懷疑鞋子有問題，遂拆開鞋子，「從厚實的鞋底縫中發現一張紙條，上面書寫有呈輪形的閻羅王命根咒，符咒上有勾召火鼠年出生的土登嘉措（即十三世達賴）之字樣。」。（同注 4 所引資料），經過審訊，八世第穆呼圖克圖阿旺洛桑赤列繞結承認是他在鞋子底縫中放了那張紙條，因此八世第穆呼圖克圖判定在丹吉林寺辯經場新屋中終生閉關，不得同外人聯繫，等於活活餓死（見孫炯《西藏舊聞》頁 50），但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在其所著書中則稱：「把

³ 以上主要參考克珠群佩《西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年，頁 497~498，不過此書將第十一個攝政第穆呼圖克圖作第九世恐有誤。

⁴ 見夏格巴著《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48 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年。另孫炯《西藏舊聞》，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10 年，頁 4 作「達賴穿上後感到心神不寧。」

第穆浸泡在丹吉林寺內一個巨大的銅水桶裏活活淹死的。」⁵可見做攝政的下場何真悽慘，同時也可證見喇嘛教裏無論是達賴、活佛或一般喇嘛，並非都是仁慈的，如果八世第穆呼圖克圖果真在送給十三世達賴的鞋子底縫中塞入一張「書寫有呈輪形的閻羅王命根符，符咒上有勾召火鼠年出生的土登嘉措之字樣」的紙條，則說明喇嘛教仍具有巫術成份，與正統佛教有很大差異；設若沒有這張字條，則坐實是裁贓，正顯示攝政與僧俗高層之間的權力鬥爭，即使相關文獻紀載第穆呼圖克圖承認在鞋子底縫中塞入那張字條，需知，在三木之下，何患無供？

十三世達賴於 1933 年十二月七日病逝，由拉薩三大寺推舉出身錫德林的五世熱振呼圖克圖為攝政，其過程頗為複雜，詳見梅·戈爾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及楊克林、倪惠康、王小彬之《熱振活佛》⁶，此處不作贅述。上文提到攝政一職在尋找已逝世達賴轉世靈童及靈童未成年親政之前，主持藏地政教事務，傳統上「攝政」需經中國中央核定，於是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於 1934 年（民國二十三年）元月二十六日致電蒙藏委員會呈請轉報中央，其電文全文如次：

「至尊無上達賴佛之職權，在佛未轉世及轉世後未登座期間，現經大會公舉熱振呼圖克圖代理。熱振呼圖克圖自幼靈異昭著，智慧第一，道行學問，全藏信仰，此次大會一致推舉，並向布達拉宮帕卻洛格學瑞菩薩像前，虔誠占卜，最為吉祥，所有全藏政教大權，決定迎請澤結熱振呼圖克圖總攝。至軍事政治一切事宜，仍由司倫噶廈負責辦理。特此電知，并請轉報中央為要。」

同年元月三十一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電覆西藏駐京辦事處轉告西藏地方政府：

「西藏駐京辦事處貢覺仲尼處長及諸代表，並西藏司倫，噶廈、益倉及官民全體均鑒：三十日行政會議議決，即日呈請

⁵ 見梅·戈爾斯坦著·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北京時事出版社，1994 年，上冊頁 45。

⁶ 《熱振活佛》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2018 年，頁 57~63

國民政府以熱振呼圖克圖代攝達賴佛職權，深信熱振呼圖克圖必能益闊智慧，敷施教化，鞏固中央，以副諄教保民之至意，特電知照。」⁷

從以上所引資料看，雖然西藏地方政府推舉熱振呼圖克圖為攝政一事，只是由其駐京辦事處通報蒙藏委員會呈請轉報中央，似乎並無呈請中國中央政府核准之字樣，但是如從另一面向看，當時西藏地方政府並未將推舉熱振為攝政一事，向印度、英國、日本……等國通報，顯然認為西藏不屬於印度、英國、日本……等國，所以無需通報，以是當代知名藏學學者喜饒尼瑪·蘇發祥於其所著《蒙藏委員會檔案中的西藏事務》中，明白指出「即經呈核奉准，即無異受命中央。」⁷

二、熱振呼圖克圖

「熱振」原是喇嘛教格魯派一座寺院的名稱，如從拉薩市區出發，翻過東面的多德山谷，車行約六小時，到林周縣唐古多鄉境內，即可看一片古柏樹林，熱振寺就座落在這片古柏樹林中，熱振寺的活佛在拉薩市區小昭寺南側有一幢拉章，漢名為「凝禧寺」，藏語讀作「錫德林」，為喇嘛教格魯派四大林之一（四大林見本文注 2）。

一世熱振活佛赤列阿旺曲丹是七世達賴羅桑格桑嘉措（1708～1757 年）的經師；四世熱振活佛阿旺洛桑則是八世班禪額爾德尼法名羅桑巴爾丹節惹克巴打里別汪卻巴桑波⁸的經師；此外，三世熱振活佛阿旺益西此陳嘉措曾被中國清朝道光帝（1821～1850 年在位）封為「黃帽闡明聖教阿普林托圖諾門罕」，時為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十年後（1855 年，咸豐五年），十一世達賴辭世，三世熱振活佛出任攝政，可見熱振活佛一系，在喇嘛教格魯派中，具有顯赫的地位。

五世熱振呼圖克圖生於藏曆第十五饒迥水鼠年（民國元年，西元 1912 年）西藏貢布加察地方一戶寺院屬民農奴之家（寺院屬民類似中原

⁷ 該書係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 年出版，上引文字見該書頁 291，但此處係轉引自揚克林、倪惠康、王小彬《熱振活佛》一書頁 61

⁸ 見釋妙舟《蒙藏佛教史》，揚州廣陵出版社，2009 年，簡稱曲吉尼瑪，或作丹必旺秋，1854～1882 年住世。

南北朝時之僧祇戶），除為喇嘛教寺院務農外，還以縫紉，修鞋等手藝賺取生活所需，據傳其母在分娩時，看見對面屋頂有一個婦女正在注視看她，她便對之說：「有什麼好看的，天下女人生孩子都是一個樣。」當晚下了一場大雪，次日上午，村民們發現這戶人家屋頂上的積雪被烏鵲踩滿爪印，看上去就像許多藏文字母，此一「奇迹」引起全體村民的注意，但初生嬰兒的父母目不識丁，便請附近寺院兩位喇嘛前來辨識，待喇嘛來到時，積雪大部分都已融化，只有檐角避蔭處積雪還可依稀辨識，類似藏文楷書「熱振」兩字，認為這是一個吉兆，附近有座小喇嘛廟叫帕日寺的住持強白倫珠活佛，為之占卦認為「此子乃活佛化身」，於是年滿三歲時，便送往喇嘛寺院學法，並給「強白益西。丹貝堅贊」（意為文殊智聖佛幢）的法號，傳說這個幼兒年僅三歲就顯現許多靈異事跡，五歲時進入曲科杰寺學法。

其時四世熱振呼圖克圖已辭世多年，經十三世達賴同意予以轉世，於是熱振寺派出以達珠活佛為首的尋訪四世熱振呼圖克圖轉世靈童隊伍，結果這個五歲的幼童被認證為是四世熱振的轉世靈童，遂循例由十三世達賴為之削髮剃度，并賜法名為「圖登、強白益西、土丹堅贊」，隨後在色拉寺及熱振寺舉行坐床大典，正式成為五世熱振呼圖克圖。

自此之後在名師教授大德指導之下，術業大進，於藏曆第十六饒迥金羊年（民國二十年、西元 1931 年）在拉薩傳昭大會上，以其對喇嘛教經典之博學駁通、滔滔不絕之辯才，加壓群僧，考得「拉然巴格西」學位（格西學位共分四等：拉然巴格西為其中位階最高者），遂循例向拉薩三大寺及熱振屬寺發放佈施，然後返回林周縣之熱振寺（以上多參採孫炯《西藏舊事》）

三、出任攝效

藏曆第十六饒迥水猴年（民國二十一年，西元 1932 年）五月，十三世達賴蒞臨林周縣的熱振寺，應熱振寺喇嘛之要求，舉行了隆重的怙主無量壽佛加持儀軌，十三世達賴在熱振寺駐錫十五天，期間與五世熱振呼圖克圖朝夕相處，有綿密的互動，某日，兩人在林間散步，十三世達賴突然對熱振說：「我幼年時，因為布達拉宮視野開闊，覺得住在那裏快活，現

在年紀大了，又覺得羅布林卡（為達賴之夏宮）舒適暢快。我看今後你也夏季住羅布林卡，冬季住布達拉宮好。」（見《西藏舊事》），因為有這一段話，後來十三世達賴逝世，熱振被推舉為攝政，可能與這段話有關，不過這只是傳說而已，當時他倆在林間散步，並沒有旁人紀錄下他們的談話，因此只能視之為傳說。又傳某日傍晚，這兩位大活佛在熱振寺前的柏樹林中聊天，走到一棵巨柏前時，十三世達賴停在這棵巨柏前，若有所思地望著這棵巨柏，語氣沉重地說：「若我死了之後，請用這棵柏樹作為處理我法體靈塔的主要材料。」說著並在棵巨柏作下記號，凡此十三世達賴似乎預示他即將辭世，及至他要返回拉薩臨別時，讓近侍圖登貢培將一冊《卦神預言經》贈給熱振，並囑咐說：「這是一本鑒別善惡的重要書籍，你好好學習，……請切記，今後凡遇選定、辨認活佛等重大法事，只要按這本《卦神預言經》，就不會訛謬。我也一直以這部經文為依據」熱振為此感動的淚流滿面。同年閏五月十日，十三世達賴啟程返回拉薩，臨走時將一條阿西哈達賜給熱振並說：「今後不知能否再見，請不要再送了」。此際五世熱振熱淚盈眶，無限傷感（以上多採考楊克林等《熱振活佛》一書）。如果以上所傳都是真的，似乎十三世達賴已預知其將不久於人世，而且一再暗示屬意由五世熱振呼圖克圖出任攝政。

藏曆第十六饒迥水雞年十月三十日（西元 1933 年十二月十七日），十三世達賴辭世，得年五十八歲，但卻是自八世達賴以來住世最長者，達賴辭世後，西藏地方政壇發生重大變化，首先是十三世達賴的近侍圖登貢培（或作土登貢培，一般均作貢培拉，按「拉」係藏語對人之尊稱之詞）受到兩極化的對待，一部分俗官認為十三世達賴生前極為寵信圖登貢培，因此力推由圖登貢培出面主政，另一方面如龍廈、多吉次杰司倫，朗頓噶倫、赤門等則認為十三世達賴突然病逝，圖登貢培有疏於照顧涉嫌過失，後者占上鋒，結果圖登貢培以過失罪被逮捕，剝奪其一切權力，進而將之流放到工布崗宗（今西藏自治區林芝地區林芝縣境內），這一派如司倫朗頓、噶倫赤門等主張建立一個「攝政會議」，由在位的司倫加上兩名僧俗官員組成，顯然是戀棧既有的權位，但三大寺等寺院派則極力主張應依照舊例，推舉一位大活佛出任攝政，最後「民眾大會」採行三大寺的主張，推舉一位大活佛為攝政。

在此對所謂「民眾大會」要略作說明，按所謂「民眾大會」形成於十九世紀末期，名稱雖是「民眾」，實際是由西藏地方政府高級官員以及主要寺院的代表所組成，與真正的民眾無關，與其稱為「民眾大會」，不如稱為「西藏僧俗官員擴大會議」，更為妥適，當時西藏地方農、牧占人口中極大比例，因此不會有真正具有民意的民眾大會，這一點是研究西藏問題時不可忽略的一個因素。

雖站在民眾大會中三大寺代表提出依循舊例，從大活佛中推舉攝政，而且認為五世熱振呼圖克圖最為合適，但熱振寺扎薩江央德勒則認：「從前三世熱振活佛按（中國清朝）皇帝聖旨及西藏僧俗之託，曾兩度出任攝政，但最後卻大禍臨頭，因此，請允准本世熱振活佛不必再當此重任」。之後又提出：「如果實在不允准，則要請曾任甘丹寺赤巴（法台）的兩位赤蘇（卸任丹甘赤巴）和諸位大活佛一同在布達拉宮觀音菩薩像前進行食糲占卜」（見《熱振活佛》頁 59）。當時「民眾大會」對應由何人出任攝政問題，有非常熱烈的討論，最後提出三個人選，除五世熱振呼圖克圖外，還有曾擔任甘丹赤巴的甘丹，益西旺堆、木隆寺活佛普覺·土登強巴楚臣，逐決定在布達拉宮觀音像前以食糲占卜方式確定人選，最後在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於僧俗大眾注視之下，由五世熱振呼圖克圖出任攝政。按自中國清朝設置攝政制起，凡出任攝政都需經中國中央核准，因此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於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電告西藏駐京辦事處令其轉呈國民政府其電文為：

「在達賴喇嘛轉世後未坐床親政前，經僧俗民眾（大會）
同意，推舉熱振活佛為攝政，總攝西藏政教大權。文武諸事仍
由司倫、噶廈負責辦理。」

國民政府行政院接到西藏駐京辦事處所呈報公文後，於同年一月三十日批准由五世熱振呼圖克圖為攝政⁹。

按十三世達賴自 1904 年英軍侵入拉薩出逃外蒙古，原欲逃往俄國，但當年日、俄在我國東北發生戰爭（即日俄戰爭），俄國戰敗，而日本向

⁹ 見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頁 2696，但此處係轉引自祝啟源著，趙秀英整理《中華民國時期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63

與英國友好，因此俄國不敢收留十三世達賴，而十三世達賴生性孤傲唯我獨尊，與外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不能和睦相處，其時中英仍在談判西藏問題，英國堅拒達賴返藏，達賴又不願返回內地，既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不睦，庫倫（今烏蘭巴托）已無法停留，遂到三音諾顏部名為宏揚喇嘛教法，實為吸收外蒙古人民供養；之後清廷認為如任由十三世達賴滯留外蒙古，恐有不妥，遂命博迪蘇等赴外蒙古催促其返回內地，達賴只得奉命內返，由於英國仍拒其返回拉薩，清廷遂命其先行駐錫青海塔爾寺，由於其性格孤傲，又與塔爾寺住持阿嘉呼圖克圖積不相能，朝廷為息事寧人，特命阿嘉呼圖克圖進京「當差」，形成達賴鳩占雀巢，未幾靜極思動，奏請朝廷欲去五台山禮佛，朝廷仍曲子優容，命沿途地方官員妥予接侍，到五台山禮佛消息經披露後，各國駐華工作人員，紛紛到五台山見十三世達賴，視之為「奇貨」，之後風聞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有意晉京向中央陳述達賴離藏後，西藏政情，十三世達賴唯恐九世班禪晉京將不利於彼，遂要求晉京陞見，清廷又遂其所願，而卻九世班禪晉京，達賴在京期間，與各國駐華人員多所交通，尤其與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所接觸，達賴為急於返回西藏，態度轉為親英，之後趁光緒，慈禧先後崩殂，朝廷忙於處理國喪及新帝溥儀登基繁亂之際，奏請返廻西藏，從此走向親英之路。及至其晚年雖有轉向回歸中央之意，但西藏地方政府重要官員，幾皆為親英分子。

熱振呼圖克圖出任攝政時，西藏噶廈政府中，有頗多親英分子，此等親英分子主張脫離中國邁向獨立，但西藏自清雍正（1723～1735 年在位）設立駐藏辦事大臣起，西藏不折不扣成為中國版圖，這是史實，不容否定；至於喇嘛教與內地更有千絲萬縷關係，中國明朝所封大寶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等足可證明雙方關係之密切，其中噶瑪噶舉派之大寶法王至今仍繼續存在，因此西藏地方喇嘛教之活佛，喇嘛大多數傾向中央，在本質上熱振呼圖克圖順應歷史傳統，較傾向中央，對藏獨思想頗不以為然，但面對噶廈政府中諸多親英分子，一時之間頗感無能為力。

當時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內部情況約略而言，可分為兩派，其一派以十三世達賴之倅臣擦絨及宮壁二人為首者，由曾留學英國或印度之青年附和之，擦絨本人就曾游歷印度，此派主張較激進之改革，因而力主開發資

源，建立工業，訓練新軍以臻於富強，如拉薩之電燈廠，兵工廠，造幣廠……等，皆為擦絨所手創，如僅從此一角度看，稱之為「維新派」固無不可，此派成員多為留學英、印者，在政治認同上，多受帝國主義分化、裂解中國之影響，偏向主張西藏獨立，稱之為「親英派」更為妥適¹⁰；另一派則為豪門高第之貴族與三大寺之活佛喇嘛，主張維持現狀或和緩改革，稱之為「保守派」似甚合適。至於五世熱振呼圖克圖其立場顯然與「保守派」較為接近。

如果以上分析無訛，則五世熱振在本質上與「維新派」（也即主張藏獨者）是處於對立的，但噶廈政府中大多官員屬於親英分子。按十三世達賴生前後期，雖已覺得全面倒向英國之非是，但其所起用之官員多為親英分子，藏中事務也多由親英分子所把持，此等親英分子大事舉辦各項建設，所需經費概係取之於藏人，以致藏人窮困。五世熱振接任攝政時，在政治上，有親英分子的掣肘，在經濟上是民生困窘，熱振俯察民意，罷黜擦絨，放逐宮壁，儘量將親英分子逐出噶廈，一時藏中喇嘛、貴族、民眾同聲稱快，並鞏固了攝政的地位，從而也引進一些親信，以是西藏地方對中央的態度，也日趨溫和，但這些都是表象，那些被罷黜的親英分子，以及幕後的英印帝國主義者，豈肯善甘罷休，只是在等待或製造機會，以便反撲。

四、熱振攝政時期重大事件

在五世熱振呼圖克圖擔任攝政期間，由於其深知西藏地方與內地有極深之歷史淵源，而自清雍正之後，西藏已成為中國領土，且清朝對西藏只有施與，從未有所索取，尤其英軍入侵西藏之後，清朝賠償英國巨大款項，英軍始撤出西藏，等於中國清朝付出巨額款項，贖回西藏，因此熱振對中央懷有感恩之心，與親英分子之忘恩負義完全不同，綜計熱振在攝政任內完成了幾件具歷史意義的事件，茲分別敘述如次：

（一）歡迎黃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達賴

當十三世達賴辭世消息陳報蒙藏委員會、並轉呈國民政府行政院後，

¹⁰ 見吳忠信《西藏紀要》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年，頁74

中央政府對此極為重視，其時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1931.12.30～1934.3.15 在任）迅即於 1933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發出唁電，其電文為：

「驚聞達賴大師圓寂，震悼殊深。遙念西陲，彌切關懷。
除呈中央從優褒恤，暨令蒙古、青、康、平、熱、五台各寺唪
經外，特電致唁。」

半個多月後，也即 1934 年一月八日，西藏駐京辦事處處長貢覺仲尼又函呈蒙藏委員會稱：「擬請速派大員入藏弔唁，借謀中央與西藏一切問題之解決」、「以慰遠人而利邊局」（見《熱振活佛》頁 63）；按當時已有電報，蒙藏委員會發出唁電至貢覺仲尼要求中央速派大員入藏弔唁，竟費時十八天，顯然藏中對此事有所斟酌，其最後請求中央「速派大員入藏弔唁」，有理由推測是熱振呼圖克圖起了關鍵性作用，於是國民政府決定派國防最高會議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為入藏致祭十三世達賴之專使，此為民國以來高級高級官員首次入藏，具有相當歷史意義。

黃慕松，廣東梅縣人，早年肄業於汕頭嶺東同文學堂，後入廣東武備學堂，畢業後獲派赴日留學。回國後任廣東黃埔陸軍小學教官、校長。1911 年武昌起義後，任國民軍參謀長，國民黨執政後，民國十九年（1930 年）夏，國民政府派黃慕松到英國出席萬國航空會議，順道到歐洲各國參觀考查，又代表中華民國出席國際裁軍會議，回國出任參謀本部次長（有關黃慕松更多經歷，可參見崔保新《黃慕松奉使西藏實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

黃慕松到拉薩後，受到藏中僧俗各界盛大歡迎，五世熱振呼圖克圖也多次與黃慕松會談，黃已瞭然熱振對中央之態度，黃在其日記中提到：

「（1934 年十月二日）上午八時，往訪熱振，謝其勸助完
成兩項典禮（指冊封及致祭十三世達賴），承允遇事相商，并
申敘此次冊封致祭盛典，理應列席，且極願參與，奈有『大公
所』（按似指民眾大會）議決令其毋庸出席之經過，種種苦
衷，希代電中央警昭原諒等語，余慰藉之，約談三十分鐘。」¹¹

當黃慕松離藏返京時，經與熱振及西藏地方噶廈政府談妥留下張威白

¹¹ 見崔保新《黃慕松奉使西藏實錄》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5 年，頁 188

一人在拉薩，作為西藏與中央聯絡之窗口，遂成為後日在拉薩設置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之嚆矢，此事熱振從中應有斡旋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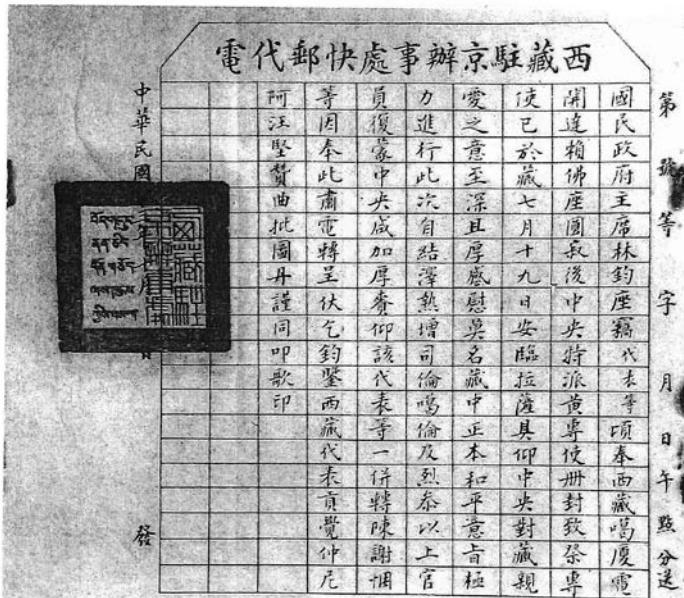


黃慕松與熱振合影

熱振呼圖克圖之所為，乃是一本清雍正以來，將西藏納入中國版圖、西藏民族遂成為中國眾多民族之一的理念，認同西藏地方是中國的一部分，西藏人也是中國國民，因此熱振之作為乃是國民應有之作為，稱其「親中」，極不妥適。惟自清季以來十三世達賴一面倒向英國，因此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中，有頗多親英分子，熱振雖將其中若干為首者罷黜，但除惡未盡，親英分子在拉薩政壇仍具有相當力量，何況幕後仍有英印政府暗中蠱惑撐腰，熱振處事常受其掣肘，但歡迎中央所派大員黃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達賴，則為民國肇建以來，西藏與中央關係之一大突破，而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也透過其駐京辦事處表達對中央政府之謝意（致謝代電見附件）。

（二）修建十三世達賴靈塔

五世熱振呼圖克圖接任攝政後，除了歡迎中央所派大員黃慕松入藏冊封並致祭十三世達賴外，第二件大事則為修建十三世達賴靈塔，所謂靈塔是專為安放喇嘛教上師、活佛遺蛻的靈塔，在藏地傳統都有為達賴，班禪以及造詣高深的上師遺蛻或骨灰修建靈塔的傳統。自西元七世紀佛教傳入吐蕃後（吐蕃即西藏），逐漸出現塔葬，如布達拉宮的紅宮就是由靈塔與靈塔殿所組成；每一世達賴辭世之後，除辦理一系列喪葬儀軌活動外，最後都會建造一座金質靈塔以安置其遺蛻，這座靈塔要呈現已逝世達賴一生政教的業績，在喇嘛教裏靈塔象徵喇嘛教最高境界，因此，已辭世達賴的



1934年10月5日，西藏駐京代表奉轉噶廈
感謝中央政府特派黃慕松先生為專使，赴藏冊
封、致祭十三世達賴致國民政府主席代電。

徒眾，新任攝政，對修建已逝達賴靈塔一事莫不竭盡所能要為之造一座美輪美奐的靈塔，更希望能超越之前所有靈塔，一以呈現已逝達賴在政教上的豐功偉業，再以彰顯攝政對已逝達賴的忠誠以及匠心獨具。

十三世達賴辭世前，在布達拉宮的紅宮內，已有五世、七世、八

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達賴的靈塔，在紅宮內已經沒有適當的地方可以建造十三世達賴的靈塔，五世熱振在此情況下乃取出前此十三世達賴所贈的《卦神預言經》來占卜，認為紅宮與丹瑪角之間可以作為修建十三世達賴靈塔之地，此項建塔工程極其浩大，從1933年年底開始，至1935年五月，終告完成，藏語稱為「格列頓覺」，其意為善妙加行。

此一靈塔呈方形的菩提狀，為木質結構，外裹金皮，其木材取自熱振寺前的柏樹（十三世達賴生駐賜熱振寺時，曾親自指定一棵巨大柏樹，以為未來建造靈塔之用），所裹的外皮共耗用黃金一萬八千八百七十兩，約合五百八十九公斤多，靈塔鑲嵌大小珍珠二萬七千四百五十五顆，鑽石、寶石、翡翠、貓眼石、瑪瑙、綠松石等各類寶石上萬顆，靈塔高十二點九七公尺，寬、長為七點八三公尺，整個靈塔包括塔瓶、塔斗、十三法輪，整個靈塔包括塔瓶、十三法輪塔幢、雨罩、月亮、太陽與寶頂，光彩奪目，瑰麗無比，塔中供奉十三世達賴法體與釋迦牟尼真身舍利，另有全套《甘珠爾》、《丹殊爾》佛經等珍貴文物，一般稱之為「妙善如意靈塔」。

靈塔上方是一座十三世達賴銀質坐資塑像，靈塔前有供桌，其上擺滿各式瓷器、琺瑯器及金燈銀碗等精巧玲瓏之文物及工藝品，還供有國民政府專使黃慕松致祭時帶來的金燈，殿堂柱子上掛滿五色繽紛的經幡；靈塔

殿四周的牆上繪有壁畫，壁畫從北壁開始，以順時針方向依次到東、南、西壁。其繪有四臂觀音、兩幅吉祥迴文詩，密集金剛、勝樂、大威德、多聞天王、五佛等；特別是二層迴廊四壁，以連環圖方式繪，有十三世達賴一生的事蹟（以上係參考楊克林、倪惠康、王小彬《熱振活佛》一書）。建造前世達賴靈塔，對喇嘛教而言，是一件重要且巨大的工程，五世熱振呼圖克圖在任攝政時順利完成了此一大任務。

（三）尋訪十三世達賴的轉世靈童

「轉世」的概念，源於佛教輪迴之說與「三身」說，所謂「輪迴」係人生前所作的「業」，死後依其所作的業，決定其在六道中的去向（六道輪迴指：天上道、人間道、阿修羅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牲道、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1988年，頁247），但修行高超者不墮入輪迴，而進入涅槃；至於轉世之說，來自佛教「三身」學說，所謂「三身」是指報身、法身及化身；所謂報身是時隱時現；法身不顯；而化身則隨機顯現，又稱應身，即所謂佛為超度世間眾生，隨三界六道之不同狀況及需要而變現之種種化身是為轉世¹²，一般人多稱之為「活佛」，其實此乃漢文之誤譯，蓋「佛」既已進入涅槃，就不可能再有「活著的佛」，在喇嘛教裏只能說「某些人可以自在地轉生，這種人稱為化身，在藏語裏稱祖古或仁波切」¹³，此處為適應既成習慣，姑且仍稱之為「轉世活佛」。

轉世活佛只出現在喇嘛教裏，在北傳或南傳正統佛教裏，都沒有所謂轉世活佛，喇嘛教裏首創轉世活佛的，是噶舉派（一般習稱之為白教），後來格魯派（一般習稱之為黃帽派或黃教，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章嘉等均屬此派）對其高位階的喇嘛也襲用轉世制度，格魯派創派者羅桑扎巴（或作羅桑扎貝巴，一般文獻尊之為宗喀巴）本身並不轉世，其弟子則以轉世方式世。因此達賴、班禪等一旦辭世，就必須尋訪其轉世靈童（蒙語稱之為呼畢勒罕，清代官文書均用此一詞彙，其意為：明心見性生死自主，詳細的解說，便是能知前生後世，不墮輪迴，生死後仍然轉來

¹² 見蔡志純、黃顥《活佛轉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8

¹³ 見茨仁唯色（即唯色）《西藏2008》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頁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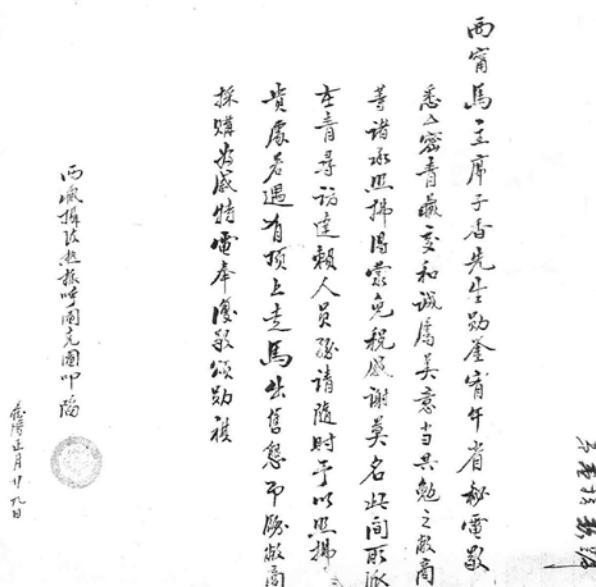
這也是攝政的最重要的任務。

五世熱振接任攝政後，尋訪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自然成為其極重要之任務，按照藏地喇嘛教傳統慣例，在尋訪達賴、班禪的轉世靈童前，都會到位於拉薩東南方約二百三十公里今西藏山南市加查縣，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拉姆措聖湖去觀湖，據說只要誠心盯著湖看，久之，湖中會出現轉世靈童所住鄉村甚至屋宇的景象，將之紀錄下來，然後交由尋訪靈童人員按圖索驥，當然這是玄之又玄之事，不過宗教原是感性，不能以理性方式加以探討，而且藏地依照這種方式尋訪靈童，已經行之有年。1935 年夏熱振呼圖克圖一行來到拉姆措湖，依照傳統儀軌進行觀湖、占卜，之後誦經、祈禱、祭祀吉祥天母……這一連串儀式作妥後，獲得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所在村莊景象。

之後，依據「觀湖」，所得，認為十三世達賴的轉世靈童在東方，於是派三組人馬，分別向東方、東南方及東北去尋訪；往東方的一組委派康色活一行前往康區尋訪；派普覺經師一行前往東南方曲科傑尋訪；派格烏倉活佛（或作紀倉活佛）以及俗官凱墨·索朗旺堆、那曲宗堆、孜仲（僧官）欽饒旦增、隨員孜仲洛桑次旺等往東北（青海）尋訪。格烏倉活佛一行來到青海玉樹後，其時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正好也在玉樹（班禪原準備返藏），格烏倉活佛遂請求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在尋訪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工作給予指導，經九世班禪大師占卜後認為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應在青海塔爾寺附近。

在這三支尋訪靈童隊伍中，以格烏倉活佛一行在塔爾寺附近的湟中縣祁家川（藏名當彩，或作當才），很快找到觀湖所見到那影像的屋宇，此屋戶主名祁卻才讓夫婦，已生有四子一女，第四子名拉木登珠，才一歲多，經過格烏倉活佛多次測試，認定拉木登珠就是十三世達賴的轉世靈童隨即以密電稟告拉薩，熱政活佛將格烏倉所發密電交給司倫、各噶倫及西藏民眾大會三方商酌，三方稟稱俟攝政卜卦及乃窮護法諭示後，如結果都一致，則可將靈童拉木登珠迎到拉薩，於是熱振活佛取出前此十三世達賴所賜贈的《卦神預言經》，經過占卜，也顯示該靈童為吉；乃窮護法也神諭：按熱振活佛觀湖所見尋訪，將無可置疑，並起立歡躍，向東頂禮三

次，¹⁵至此，靈童尋訪可說已告確定。



熱振電西寧主席馬子香感謝對藏商免稅並請隨時照拂在青尋訪達賴
人員（藏曆正月二十九日）

走向西藏獨立，因此想透過中央政府，秘密將靈童迎到拉薩，然後逕行辦理坐床，認為如此便可擺脫中央之干預，等同向藏獨邁進一步，當時（按係民國二十七年藏曆正月二十九日）五世熱振活佛曾致函青海省主席馬步芳（字子香）。意在討好（原函影本見附圖），希望馬步芳能放行靈童，該信函全文僅一百十三字，涉及尋訪靈童人員者，僅二十字意圖將尋訪靈童此等大事，與購買青海上等好馬，以及對藏商免稅混為一談，希圖將尋訪靈童一事淡化用心至為黠慧。

國民政府深知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如未經中央認證事關中央對西藏之主權認定，其後果極為嚴重，因此國民政府對格烏倉活佛尋訪靈童隊伍極為注意；儘管西藏地方政府以熱振活佛名義，致函青海省主席馬步芳，對所派尋訪靈童人員與藏商免稅，購買上等良馬等輕描淡寫，企圖鬆懈馬步芳警覺心，十四世達賴曾就此事說：

「他們（指尋訪靈童之格烏倉活佛一行）擔心他（指馬步芳）會找麻煩，因此沒有訴他（馬步芳），他們（格烏倉活佛

¹⁵ 見楊克林、倪惠康，王小彬《熱振活佛》，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8年頁91。

一行) 已經確認了最終人選(指轉世靈童)。」¹⁶

西藏地方政府想以混淆方式，將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迎入西藏，但國民政府其時對西藏事務相當重視，早已截獲格烏倉活佛拍向拉薩稱已尋獲轉世靈童真身，因此中央政府密令青海用一切辦法，嚴防「唯一靈童」擅自入藏。¹⁷

國民政府雖已知格烏倉活佛所尋訪之靈童，乃是唯一「真」靈童，但在表面上佯作不知，蓋國民政府深知，中央如不能介入靈童之認證及參與新達賴之坐床事務，關係到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事關重大，因此一方面密令青海窮盡一切方法嚴防「唯一靈童擅自入藏」，另一方面設法展開與西藏地方攝政與噶廈政府聯繫，設法主導對唯一靈童之認證及參與辦理新達賴坐床事宜，以象徵中國對西擁有主權；此所以不動聲色表示「達賴早日轉世，原為中央及全國人民一致之企盼」¹⁸，按照歷史傳統及宗教儀軌，「惟轉世經過必須呈報政府，辦理各項手續後，方為妥當。若任其自行處理，非特違背中藏歷史關係，且恐發生爭執糾紛。」¹⁹國民政府之所以重視此事，以其事關國家對西藏主權之申張，從而也可見當時蒙藏委員會確實能掌握西藏情勢及維護國家主權。

以往許多論著都提到馬步芳遲遲未能同意青海靈童拉木登珠入藏，認為除了旨在「向西藏地方政府敲詐勒索錢財外，還以同樣的手段向蒙藏委員會政府部門伸手。」²⁰當然馬步芳或其所屬藉機斂財，應也為事實，如1939年六月十五日，馬步芳曾致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稱：「此間尋獲之候選靈兒，茲定于農曆五月中旬由青動身，職府遴派師長馬元海為

¹⁶ 見十四世達賴著、丁一天譯《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北圖博之友會，2013年頁25

¹⁷ 見韓敬山《金輪再轉——近代中央政府關於達賴喇嘛轉世決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後出站報告，出站時間2015年十月，頁161

¹⁸ 見《蒙藏委員會為請令青海省府飭尋訪人員將尋訪情況呈報中央政府核辦嚴防秘密迎藏致行政院呈》，1938年四月二十六日；蒙藏委員會檔案，北京中國藏研究中心、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年，頁135，但此係轉引自韓敬山《金輪再轉——近代中央政府關於達賴喇嘛轉世決策研究》，頁161

¹⁹ 同注18，頁161~162

²⁰ 見祝啟源著，趙秀英整理《中華民國時期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年，頁242

護送專員，路費及到藏交際各費約需十一萬元，恭請轉請發給，俾得按限起程，以副鈞座關注國之至意。」（見《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頁 200），但全責怪馬步芬拖延靈童入藏藉機勒討金錢，也未必公平。

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既經決定入藏，國民政府乃決定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一則對靈童進行認定，再方面與熱振活佛共同籌辦十四世達賴坐床大典；當吳忠信尚在入藏途中，熱振活佛致電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趙丕廉轉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該電文如次：

「重慶副委員長，請轉呈主席林鈞鑒：

感電敬悉祭密。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轉身靈兒照例剃髮事，已擇定於藏曆十月十三日，本身乃罡曜均吉，至於真正坐床登位大典，亦擇定於明年（1940 年）正月十四吉日，中央代表吳委員長到達拉薩之際，自當妥商呈報。謹電呈覆。

西藏攝政熱振呼圖克圖叩馬印」²¹

以上足證熱振活佛認同國民政府有權辦理新達賴坐床事宜。至於認定靈童問題，由於吳忠信抵拉薩前，西藏地方已為靈童剃髮，再談認證，似乎為時已晚，其中透露出藏地親英分子企圖以既成事實，擺脫中央對靈童的認證權，但吳忠信仍極力設法維持此項認證靈童的歷史傳統，以維護國家主權，經過不斷溝通，以及熱振活佛體認歷史傳統必須沿續，終於在民國二十九年（1940 年）元月三十日上午，在羅布林卡花亭中察視了十三世達賴的轉世靈童拉木登珠，完成近乎認證之歷史傳統，並將察視結果認為轉世靈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靈異特著，查係十三世達賴轉世，請准免予掣籤，呈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明令予以公布，案經行政院院長蔣介石呈請國民政府，於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五日，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名義發布國民政府第 898 號令如下：

「青海靈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靈異特著，查係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轉世，應即免予押籤，特准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

²¹ 見《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頁 260

喇嘛。此令。

中國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五日」²²

從上所敘，可知尋訪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一事，五世熱振呼圖克圖

居功闢偉，而渠又能遵循歷史傳統，在藏地諸多親英分子意圖擺脫中央介入的氛圍中，仍然有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察視靈童，然後報呈國民政府明令發佈靈童拉木登珠靈異特著查係第十三輩達賴轉世，應即免予抽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完成歷史傳統之各項程序，蒙藏委員會之慎密籌畫，固居首功，但熱振之勉力配合則不容置疑。

（四）辦理十四達賴坐床大典

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既經國民政府明令公布，拉木登珠為十三世達賴之轉世靈童，緊接著即為其坐床大典，在喇嘛教中，達賴坐床大典，絕對是一件大事，儘管西藏方面一再宣稱坐床大典沒有所謂的「主持」，但坐床大典諸多事務，總需有人辦理，總其成者則非攝政熱振活佛不可。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在五世熱振活佛主持下，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整天開會，討論坐床大典的儀軌，更重要的是討論大典時，中央所派大員吳忠信的座位問題，據當年隨同吳忠信入藏之蒙藏委員會簡任秘書周昆田²³稱，最後座位安排為：

「坐床大典於（民網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五時在布達拉宮的大殿舉行，…依照舊例，所有在場人員的座位如次：

一、達賴及吳委員長（如清駐藏大臣例）坐北面南。

二、中央官吏坐東面西。

三、熱振率司倫（高於噶倫），各呼圖克圖及僧官等坐西面東。

四、噶倫及各世家公子坐南面北。

²² 同注 21 所引資料，頁 290~291

²³ 周昆田安徽合肥人，後為蒙藏會委員（1942.6.27）1949.1.6 任副委員長，嗣任委員長至 1949.11.23。

五、尼泊爾、不丹等國代表坐東面西，位在中央官吏之下。」²⁴

至於英國代表古德，則因坐位問題未參與坐床大典。十四世達賴順利坐床，熱振呼圖克圖實居首功。

五、熱振退位，被捕及被毒害而死

五世熱振呼圖克圖辦理上述幾件大事後，其聲望日隆，尤其自民國肇建，以來，西藏在英帝國蠱惑、誘煽之下，十三世達賴由反英而轉為全面倒向英國，何二、三其德，實有辱「智廣如海」之名號，惟其如此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因此西藏地方政府憑空多出一批親英份子，這一批媚英份子，其目的在搞西藏獨立，因此擺脫中央政府介入西藏地方政務，遂成為其主要目標，對五世熱振活佛秉諸歷史傳承，接受中央所派大員入藏致祭十三世達賴辭世、歡迎吳忠信入藏察視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共同辦理十四世達賴坐床大典，以及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等，均極不以為然，但其時熱振聲望正隆，此等親英分子一時之間，尚無計可施，但暗中集結從事反熱振工作，則是無日或已，所以當時的情況是外弛內張。表面上擁熱振派似占勝面，但反熱振派因有英帝國幕後撐腰且為之出謀劃策，後勢不可小覩，此為當時（民國三十年西元 1941 年之前）拉薩政壇之客觀情勢。

在主觀方面，熱振活佛也有若干舉止，容有可議之處，以致授人以柄，兼以迷信占卜之術命相之學，以為藏曆第十六饒迥金蛇年（民國三十年歲次辛巳）將不利於己，乃有暫時辭攝政之舉，推舉老邁昏庸之打扎小活佛暫代攝政之職，待閉關三年之後，再回任攝政，不料一步錯滿盤輸，本節擬就熱振活佛之私行、辭攝政及被捕入獄終被毒殺，加以敘述：

（一）、有關熱振活佛私行

如所周知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此乃近乎真理之銘言，熱振活佛對物質頗為貪婪（打扎之貪婪，更甚於熱振，這是人性，

²⁴ 見周昆田《四十年前西藏行（下）》該文刊載於《中國邊政》季刊 72 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1980 年十二月，頁 15。

縱然所謂活佛，仍是貪婪，例如十四世達賴於 1997 年首次來台，僅是為「信徒」摸頭，美其名曰「灌頂」，就摸走了三千萬新台幣²⁵，其貪婪可見一般）雖任攝政，也未能例外，當時藏地高級俗官瓊讓曾以藏地諺語：

「吃下大山，依然飢腸轆轤。

喝盡海水，仍然不解乾渴。」²⁶



俗官覺札和妻子朗杰澤珍

來形容熱振活佛貪婪；在西藏拉薩八廓街一帶，有一種以歌謠方式，傳播政治上的信息，帶有神秘色彩，幾乎是每當有大事發生時，總會先出現一些歌謠，口口相傳，很快就會弄得家喻戶曉，似乎以歌謠帶風向，上引歌謠的出現，預示拉薩政壇已經有股反熱振的風潮出現；除此之外，拉薩城裏還流傳著說：「據說他（熱振活佛）同俗官覺札之妻朗杰澤珍和他的同母異父兄弟之妻次央都有性關係，同他們過著一妻多夫式的生活，並且他（熱振）還與彭康的一個女兒有曖昧的關係」²⁷，關於這一部分，當今大陸學者楊克林等人所著《熱振活佛》一書中說：

「這期間，拉薩城裏颶起了一股陰風，私下傳說：『熱振活佛與弟媳次央以及次央的姐姐朗杰澤珍有曖昧關係。』『熱振活佛破戒於異性，無資格再擔任達賴喇嘛的經師。』『下年達賴喇嘛要受“沙彌戒”，熱振活佛若不提前辭職，那時可能

²⁵ 見 1997 年三月二十一日，台北《自立晚報》

²⁶ 見美·梅戈爾斯坦 (Melvyn, C.Goldstein) 著，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北京時事出版社，1994 年，上冊，頁 350

²⁷ 同注 26 所引書頁 365

有人藉口鬧事，給政教大業帶來麻煩。』」²⁸

其實就喇嘛教而言，無論一般喇嘛或轉世活佛，與異性發生關係似乎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當今十四世達賴就於其著作中甚至還認為性交是一種「修行」，他說：

「對於佛教徒來說（其實只是對喇嘛教徒而言），倘若修行者有著堅定的智慧和慈悲，則可以運用性交在修行的道上，因為這可以引發意識的強大專注力，目的是為了要彰顯與延長心更深刻的層面（稍早有關死亡過程時曾描述），為的是要把力量用在強化空性領悟上。」²⁹

可見在喇嘛教裏，對於「性」並不排斥，甚至還是喇嘛教密續裏的一種「修法」法門（見注 29 所引書），可見以熱振活佛對女人發生性關係加以批評，並沒有多大殺傷力，其目的只是在醜詆熱振；當時在拉薩街頭出現了一些反熱振的歌謠如：

鵬翅已被折斷，熊膽業已掏出。

誰若觸犯神龍，定會臉上生瘡。

.....

不要觸犯神龍，否則臉上生瘡。

倘若傷害老熊，你會不得好死。

.....

攝政當政年代，日子並不好過。

人們需要本教師，也需要神龍下的蛋。

這些歌謠中含有隱喻反熱振主要官員的名字，如彭雪的名字第一個音

²⁸ 該書稱係引自噶雪巴·曲吉尼瑪《回憶熱振事件》，見《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5 年 6 月第一版。另所引朗杰澤照片，係引自《熱振活佛》一書頁 176

²⁹ 見十四世達賴著、丁乃竺譯《修行的第一堂課》台北先覺出版公司，2012 年，頁 177~178

節，正好與藏地傳統信仰的本教相同；而瓊讓名字的第一個音節，與神鳥大鵬是一樣的；魯康娃名字的第一個音節又恰巧與神龍的意思相同；多波的名字意譯正是老熊，可見熱振活佛也確實有不孚人望之處。

（二）熱振活佛暫辭攝政

在西藏地方政壇，有一種奇特的現象，有心人往往將計劃中的事，先透過耳語，使之形成謠言，甚至將之編為歌謠，使謠言中的人物心驚膽懼；1940 年，拉薩街頭出頭一種謠言，指稱五世熱振活佛從 1941 年（藏曆第十六饒迥金蛇年）起，將有三年災難，必須避開權位，閉關靜修，始能免災，當時熱振活佛尚未滿三十歲，心智尚未成熟，遂被此謠言所惑，偏他迷信占卜之術命相之學，便請「護法神」打卦，不知是巧合、還是護法神神漢（神漢類似內地的乩童）已被反熱振派收買，打卦結果「證實」1941 年會遭逢「厄運」，必須閉關三年，否則恐有血光之災，俗語說：謠言止於智者，當時五世熱振活佛年未而立，距不惑之年尚遠，遂為占卜之言所惑，而有暫辭攝政以避禍之念頭，其時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得知此項訊息後，立即前往熱振活佛拉章進行勸阻，熱振向孔慶宗說明必須暫時辭職之原因為以下三項：1. 卜卦不吉；2. 此前曾兩度請辭，噶廈挽留他至十四世達賴坐床後再說，如今十四世達賴業已完成坐床大典，辭職時機已到；3. 現今體弱多病，理應暫息仔肩。並稱自己宿受中央之恩，卻因諸多阻礙，未能妥善處理好與中央政府之關係，而西藏地方諸事複雜，一旦應對不當，恐步第穆活佛之後塵³⁰。

當時五世熱振曾找其好友九世第穆呼圖克圖丹增加措（1901～1973 年）為代理攝政，但為九世第穆活佛所拒絕，熱振被第穆活佛拒絕後，又找帕邦活佛，本人雖有意願，但其管家鑒於以往幾個攝政都沒有好下場，因此力勸帕邦不要介入政治漩渦中³¹。熱振只好召集自己所屬扎薩江白堅贊、前任扎薩江白德來、雍乃喇嘛洛桑益西朗吉、卡朵喇嘛洛桑土且、

³⁰ 見蒙藏委員會檔案，《蒙藏委員會檔案中的西藏事務》頁 297，但此處係轉引自楊克林等《熱振活佛》一書頁 181。所謂第穆活佛，係十三世達賴親政府之攝政，十三世達賴親政後，等同被賜死，詳情本文首節曾有所敘。

³¹ 見德木·旺久多吉《慧眼照雪域——父子攝影師眼中的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 年，頁 93，但此處係轉引自楊克林等《熱振活佛》頁 181

森林（侍寢官）堪布阿旺洛丹等人商量，暫時辭去攝政，由誰來接替為宜，雍乃喇嘛提出：「為了避免凶兆，暫時離職二至三年再繼任攝政為宜，目前只能暫設代理攝政；倘若讓公德林（按即功德林，為四大林之一）呼圖克圖或經師普覺活佛接任攝政，將來不可能交出政權。達扎·阿旺松繞是你的經師，且年事已高，他心地善良，完全都同意這個看法，只是森林阿旺洛丹卻不同意熱振辭職，他說：「有凶兆可以祈禱消除，不必辭職，以我看來，達扎·阿旺松繞不是一個好貨，他是一個心毒手辣的人；讓他掌了權，將難以收權。」（以上均見《熱振活佛》），熱振以森本批評了他的經師，當下即加以斥責，最後採納了雍乃喇嘛的意見，決定由打扎·阿旺松繞出任代理攝政，這個打扎只是個無甚名氣的小活佛，且已老邁，據說熱振的舉荐打扎為代理攝政時，雙方約定為期三年，三年之後，由熱振回任攝政，此一約定曾經西藏地方僧俗民眾大會列為「訂下紀要」³²於是打扎於 1941 年坐上了代理攝政的寶座。

按照藏地喇嘛教格魯派政教傳統習俗，攝政之產生需經過四大林、三大寺及僧俗民眾大會同意後產生，且自有攝政以來幾乎都是出身於四大林的知名呼圖克圖，而這次熱振私人舉荐名不見經傳的打扎活佛為代理攝政，與藏地傳統政教習俗慣例不合，但諸反熱振及親英分子，一心只想要熱振下台，而且深知打扎活佛不但老邁昏瞶，且性極貪婪，易於操控，於是顧不得什麼政教傳統，就同意由打扎出任代理攝政。

打扎接下代理攝政時曾謙恭地說：「我因年邁，只能任職二、三年，到時候再奉請熱振活佛復任攝政。」³³這證實熱振與打扎之間確有一份只要打扎代理攝政三年之約，而且當時西藏僧俗民眾大會還書寫了一份紀要，這份紀要首先詳述並讚揚了五世熱振活佛在攝政期間對藏地政教事業的綽越貢獻，繼而明確寫上：「熱振活佛為消除不祥徵兆，暫時辭職回熱振寺靜修，由打扎活佛接任攝政二至三年，期滿後仍由熱振活佛繼任攝政，直至達賴喇嘛親政為止。」（見注 33 所引書），這份紀要寫成四份，每份都蓋上六枚公章，由熱振，打扎，噶廈及西藏僧俗民眾大會各存

³² 見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2 年，頁 216

³³ 見楊克林等《熱振活佛》，頁 185

一份。

為此，五世熱振於 1941 年一月十六日還特別向國民政府中央蔣介石作出報告，該報告全文如下：

「重慶轉呈蔣委員長鈞鑒：

祭密。茲以本衲攝理藏政七載有餘，仰承鈞座維護，諸事甚為順利。本衲任內唯一大事，為尋訪達賴之轉生，現已歲事。茲以本衲身體精神諸多羸弱，政務殷繁，更兼才疏學淺；深感不勝，乃向達賴喇嘛及三大寺、藏政府大會（按即僧俗民眾大會）辭職，已經大會決議通過，准卸仔肩。繼任人選，亦已由大會公推現任達賴雲蒸達扎佛繼任。

謹電呈報，並候鈞安

西藏攝政雲蒸熱振呼圖克圖叩」³⁴

與此同時，打扎也電告蒙藏委員會轉呈國民政府，該電文為：

「重慶蒙藏委員會吳委員長：

（遠密）邇者西藏攝政熱振呼圖克圖已辭職，業經達賴喇嘛明令暨西藏大會會議決定，一致推舉微末為西藏攝政。再再敦請，無法推卸。特諭吉於藏曆一月一日宣佈就職。特電摹聞，並煩轉呈蔣委員俯賜存查為荷。

達賴榮尊達扎佛敬電。」³⁵

五世熱振呼圖克圖暫時辭去攝政後，率領隨侍人員從拉薩返回熱振寺，既為閉關也為避禍，曾致函國民政府蔣介石稱：「熱振現已辭去攝政職務，居於熱振格批嶺寺，鑽研經典並禱祝國事日隆，抗戰大業早臻成功。敬請保重政躬，為國珍攝，並懇隨時電賜教誨為禱。」從此項信函中

³⁴ 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第二歷史檔案館、西藏自治區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合編《元以來西藏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中國藏學出版社，第六冊，頁 2071，但此處係轉引自《熱振活佛》，頁 187

³⁵ 該電見西藏社科院等所編《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518，引蒙藏委員會檔案

可見熱振乃本諸傳統西藏為中國領土之認知，與中央政府保持相當的聯繫與感情，同時雖暫時辭卸攝政職位，仍然希望與中央保持密切的關係（以上見（大陸第二歷史檔案館，蒙藏委員會檔案，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熱振辭攝政後致蔣介石函，此處係轉引自祝啟源著趙秀英整理《中華民國時期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84）。

（三）、熱被捕及被戕害

打扎坐上攝政寶座之後，在親英分子金錢包圍之下（喇嘛均自稱是出家人，出家人四大皆空，竟然會被金錢所支配，豈不怪哉），完全忘卻與五世熱振有師徒之情，有讓位之恩，也完全無視於曾簽下代理攝政二三年之後，要把攝政之位交還熱振之約，完全被親英分子所收買，操控，俗語說有錢能使鬼推磨，看來有錢也可以使活佛變節。於是代理攝政打扎活佛開始清除噶廈中的親熱振派官員，換上親英派分子，而且與中央漸行漸遠，但親英分子並不肯就此善甘罷休，仍在想方設法必欲置熱振於死地，認為如此始能斬草除根，並在英帝國操縱下，走向西藏獨立。

打扎代理攝政英國駐拉薩代表及親英分子指使下，設立「外交局」，向西藏獨立邁進一步，其實以老邁昏瞶的打扎，不可能知道何謂「外交」、何謂「獨立」，縱然是那些親英分子也未必瞭然複雜的國際關係，幕後有英國官員在操作，乃是無可置疑者，所謂「外文局」設立後，任命親英分子蘇康·旺欽次登（蘇康或作索康，其子蘇康·旺欽格勒，後出任噶倫，此人流亡印度後，不久被逐出噶廈，之後於 1970 年代曾來台，並出任「噶倫辦事處」負責人）為「外交局局長」。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在英國操作下，邁向獨立似已難以阻擋。

諸親英分子既要「搞」藏獨，自然視傾向中央之熱振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後快，此時代理攝政打扎羽翼已豐，開始撤換噶廈中親熱振的官員，或加以利誘拉攏到自己的陣營，打扎已經掌控了拉薩政局。

1944 年，熱振認為之前與打扎約定由其代理攝政三年之期已滿，打扎理應將攝政之位交回給熱振，於是熱振活佛遂有拉薩之行。只是權力如同鴉片，會讓人上癮，打扎既享有三年權力，豈肯輕易交出，熱振拉薩之行，未能如願，只好再回熱振寺。然而打扎及親英派諸分子仍要進一步追

殺熱振活佛。

打扎之所作所為，已經完全走上背叛中華民國道路，面向西藏獨立邁進，與熱振之理念完全相左，且熱振似已預感打扎及噶廈將有不利於己的舉動，遂派人向國民政府蔣介石投訴大意略為：「攝政打扎活佛對百姓不公正，若他辭職則罷，如不辭職，就可能用武力解決，那時，請予以軍事援助。」所以派代表到南京³⁶另今人林孝庭著、朱麗雙譯《西藏問題》一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則稱「熱振公開要求蔣介石幫助他推翻拉薩現政權。他催促中國派部隊直接到拉薩，以幫助他謀反。熱振建議，如果中國部隊不能推翻拉薩現政權，南京至少應該將中國部隊調到邊境地區，以示支持。如果這些行動皆不可能，熱振希望中國至少向他提供必要的武器，比如來福槍、機關槍與子彈，以增強自己的軍事力量。為感謝國民政府的幫助，熱振承諾，一旦成功重新執政，他的新政權將立即宣佈加入中華民國，承認中國的主機。」（見該書頁 251～252），林孝庭稱其資料出自魏龍致蔣介石情報，所附拉薩熱振與魏龍秘密談話紀要，1946 年四月二十一日（見該書頁 263），林孝庭之《西藏問題》一書，雖引徵頗多罕見之文獻，可惜林氏完全站在西方帝國主義者觀點，看中國邊疆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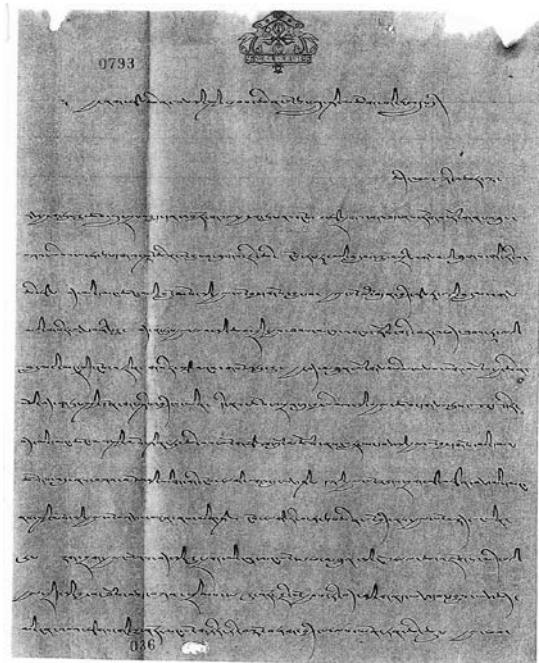
³⁶ 見夏格巴著《藏區政治史》漢譯本，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年，下冊，頁 218。

夏格巴，全名夏格巴·旺秋德丹（1907-1989 年），出生於一個西藏貴族家庭，曾擔任西藏噶廈政府的孜本。1939 年曾以隨員身份前往那曲，參加迎接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工作。1946 年曾到印度，從此開始進行藏獨工作，1947 年 10 月西藏噶廈政府派出所謂「商務考察團」到歐美各國從事西藏獨立活動，然暗中卻從事黃金買賣為自己牟利，當時一位印度官員就曾告訴美國大使說：「在他們（指商務考察團）看來，使團出使的唯一目的是代表們為自己撈一把，他們關心的是把能夠買到的黃金再設法從西藏拋回印度，以看漲的有利價格在黑市上倒賣出去」，這段記載見譚·格倫夫著，伍昆明、王寶玉譯《現代西藏的誕生》，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 年，頁 130。此人之人品可見一斑，他完全是為了搞西藏獨立而撰寫該書，此書初稿完成於 1963 年，之後在亞洲基金會贊助下到美國，由其子及羅斯金·邦德將該書由藏文譯為英文，並由美國藏學家魏里（T. V. Wyllie）編輯校訂，於 1967 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之後，十四世達賴喇嘛囑其再加補強，又經過幾年增強了該書的藏獨論述，於 1976 年在印度德里再度出版，該書除師心自用、扭曲捏造史實外，極力鼓吹藏獨，可說是錯誤百出，該書漢文譯本晚到 1992 年才以內部參考方式予以出版，並不對外發行，翻譯者為劉立千、羅潤蒼、扎西尼瑪、楊秀剛、余萬治、史京娜姆及次仁拉姆。書分上下兩冊，共 700 多頁，另西藏自治區《西藏政治史》評註小組編寫有：《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與西藏歷史的本來面目》，北京民族出版 1996 年出版，對該書作重點批評。

充滿分化，裂解中國之思維，所以對「中國」一詞的認知，也採西方赤白帝國主義的定義，認為凡不是漢人（就民族學而言「漢人」內含極為複雜，最初漢人係由華夏、東夷、百越、荊吳四大系民族揉合而成，之後四周各民族不斷融入，越至近代其內含越多元）聚居之地區，就不屬於中國，因此認為東北（帝國主義者創造了滿洲利亞），新疆（東突厥斯坦），內外蒙古（蒙古利亞），青康藏地區，皆非中國，赤白帝國主義者如何認定「中國」，是他們的事，但作為中國人；理應有思辨的能力（中國人係上位概念，其下包含漢、滿、蒙、維，藏……等五、六十個民族，乃至歷史上之匈奴，鮮卑、肅慎、柔然……等許多民族），豈可隨著洋「學者」的「說法」，而扭曲了歷史事實，林孝庭之《西藏問題》一書，雖然引用了不少罕見的資料，正如同雖然買了許多中國式的食材，卻以西式烹調方式處理，結果煮出來的仍是西餐，林氏之書，基本上是其博士論文，其指導教授腦子裏壓根不承認西藏是中國（指歷史、文化概念之中國，不指某一政權）領土，林氏為順利取得「學位」，屈從指導教授意旨，可以理解，但不會認同，《西藏問題》全書在用詞遣字上，充滿帝國主義者的思維，如頁 249 稱：「沈宗廉進一步安排嘉樂頓珠與達賴喇嘛的姐夫黃國楨（Phuntsok Tashi，按即塔克拉彭措扎西，曾於 1966 年來台謁見蔣介石，其時全程由筆者作陪）秘密前往中國」，從語氣上看，顯然是將西藏排除在中國之外，任何具有中國人基因者，看到這段文字，都會覺得反感。

無論夏格巴之《藏區政政治史》或林孝庭之《西藏問題》所引徵熱振致蔣介石之函件內容，仍是第二手資料，茲據楊克林、倪惠康、王小彬合著之《熱振活佛》一書引用熱振活佛致蔣介石函手稿，始是第一手資，茲影印引錄如所附，與夏格巴及林孝庭所述稍有出入，但大致不差。

從而可見當時打扎及親英分子，與熱振活佛已處於水火不容地步，據夏格巴書稱此一信函應是 1947 年二月二十三日之前發出。蓋打扎活佛於 1947 年二月二十三日，與噶倫喇嘛土登袞欽、噶倫蘇康·旺欽格勒商定決定派兵前往熱振寺「迎請」熱振到拉薩，準備予以「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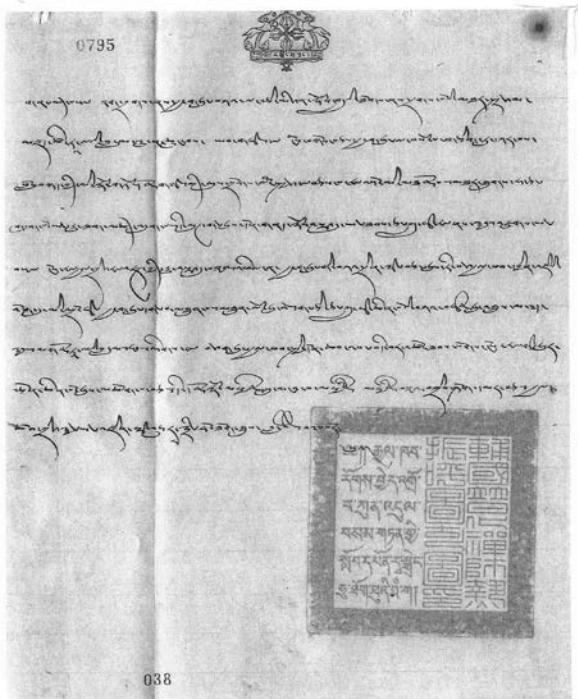


現在且看國民政府或蔣介石如何處理熱振活佛之來函，當時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並不贊同國民政府給熱振活佛實質支援，如果再看 1947 年蔣介石所面對的問題，雖然 1945 年抗戰勝利，中華民國成為四強之一，但國共內戰隨即展開，台灣雖告光復，但 1947 年二月發生「二、廿八」事件，第一屆國民大會正在籌備，新疆「三區革命」事件尚未解決，而外蒙古在蘇聯指使、支援下，對新疆發動「北塔山攻擊」事件³⁷，凡此諸事，

較諸打扎與熱振之政爭，可說嚴重許多，對蔣介石而言以已蕉頭爛額，豈有餘力處理熱振問題，蔣介石固然可以派少許部隊入藏，但必須經過青海或西康，馬步芳、劉文輝豈肯「讓路」？或許也可派馬步芳、劉文輝部隊入藏，但又恐為馬、劉部隊一旦入藏（藏軍根本無戰力不堪一擊），西藏將成為馬或劉之「地盤」，因此中央對熱振之請求支援，可說愛莫能助，一些文獻指稱國民政府支援熱振活佛，乃是無稽之談。

當西藏代理攝政打扎及噶廈政府決定派兵去「迎請」熱振活佛到拉薩受審時，是由噶倫蘇康·旺欽格勒率藏軍二百名，於 1947 年四月十四日（藏曆第十六繞迥火豬年二月二十三日）夜間出發，前往熱振寺「迎請（實為逮捕）熱振活佛到拉薩受審，四月十六日到達振寺，蘇康·旺欽格勒還假惺惺地先向熱振活佛下跪叩頭，接受熱振的摸頂祝福，然後說：「這次去拉薩。只准帶兩名隨從人員、三匹乘馬、一匹駒馬。不准攜帶武器，至於其他必需品，可隨意帶。」（見楊克林等著《熱振活佛》頁 301），就這樣把熱振「迎請」到拉薩，並將之關入監獄。

³⁷ 此塔山位於新疆東北部，與外蒙古接壤，1947 年六月五日，外蒙古軍隊在蘇聯空軍掩護下，入侵新疆北塔山地區，詳情可參見劉學銚《北塔山事件》，該文輯入劉著《正視紛爭下的新疆問題》一書，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4 年，頁 329～349。



五世熱振寫給蔣介石的信（之一）。

五世熱振在給蔣介石的信中說：「西藏的歷代法王，都接受過中央政府的恩惠，親如母子。可是，近來（達扎攝政）背叛中央，親善英國，把達旺地區割讓給了英國。……本人及隨從等對中央政府忠心耿耿。所以，請求蔣主席立刻下令，撤掉達扎的攝政一職，在達賴喇嘛親政之前，仍然由我繼續擔任西藏攝政之職。如果達扎不服從中央政府的話，請求給予空中支持，以武力驅逐達扎。」

1947 年四月十八日（藏曆二月二十七日）到拉薩，據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一書稱：審訊熱振時「他（指熱振）立刻認錯，當著西藏會議眾人磕頭說：『要去拜見攝政活佛。請求諒解息怒，磕頭懺悔。』」（見該書漢譯本下冊頁 219），但梅·戈爾斯坦於其所著《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曾訪問當年參與審理此案的噶廈政府官員，都沒有提到熱振俯首認罪之事（見該書漢譯本下冊頁 523~528），反而記載熱振說：「大扎（按即打扎）和我有師徒情誼，我決不可能想到要傷害他。」³⁸當時

審訊熱振時，夏格巴並不在場，可見夏格巴說熱振一經審訊，立刻俯首認罪，純屬憑空杜撰，其目的是在誤導世人，認為熱振活佛確主導或參與謀害打扎或叛亂一事，而捏造此一「供詞」。

熱振一案經過三次審訊，究竟應如何定罪，始終未能達成共識，就在這種懸而未決情況下，熱振在獄中於 1947 年三月二十七日（此為夏格巴書中所載之月日，應是藏曆；在梅·戈爾斯坦書中作五月八日，應為西曆），突然死於獄中，按當時熱振正值三十五歲壯盛之年，如非受到外加的傷害，豈會如此輕易喪生，即使是帝國主義英國餘孽黎吉生（Richardson，此人原英國駐拉薩代表，印度獨立後，印度仍任之為印度駐拉薩代表，繼續鼓動西藏獨立）於其所著《西藏簡史》（A Stort

³⁸ 梅·戈爾斯坦採用夏爾孜·益西土登《熱振事件及熱振被捕的回憶》據益西土登所述熱振在接受僧俗民眾大會歷次審訊之後，對他所講的話，應有可信度，見《喇嘛王國的覆滅》漢譯本，下冊頁 524，注 1

History of Tibet) 也直指：「前攝政（即熱振）死于布達拉監獄中，雖然官方沒有承認，可以毫不懷疑，他（指熱振）是被殺害的。」³⁹而藏人恰白·次旦平措、諾昌·吳堅所著《西藏簡明通史》一書也明白指出熱振「是被大扎（按即打扎）一派壞人趁其有病之時暗中毒害害的。」（見該書藏文本下冊頁 724，西藏社科院，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1 年，但此處係轉引自《西藏歷史地位辨》頁 337~338），當年拉薩多數人認為熱振活佛是被捏破睪丸而死（見《西藏歷史地位辨》頁 337）總之，熱振是被毒害或虐殺而死。然而夏格巴在其《藏區政治史》一書中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卸任攝政活佛（指熱振）身體有些不適，噶廈接到報告，立即命令迎請達賴喇嘛的私人醫生堪窮欽繞諾布詳細號脈診斷，像是患了感冒併發症，不要緊，便給法他經常服用叫做“如意寶”的藥，並將診治情況報告了西藏議會，二十八日早晨兩點鐘卸任攝政活佛圓寂。」⁴⁰完全不提熱振的死因，其刻意掩熱振死因，是在掩飾打扎活佛的心狠手辣。試想熱振活佛係出身四大林之轉世呼圖克圖，又曾任攝政，在喇嘛教或西藏地方有其地位，突然猝死於獄中，在藏地自屬重大事件，經藏地僧俗民眾大會討論後，向噶廈報告，決定成立所謂對熱振死因調查專用委員會，不過熱振是噶廈派噶倫率兵將之逮捕、並投入噶廈所管轄之監獄，而後猝死於獄中，再由噶廈所組成之專門委員會調查其死因，這就如同球員兼裁判，其調查結果能有幾許公正性，實在令人懷疑，而夏格巴也為專門調查委員會成員之一，梅·戈爾斯坦曾就熱振之死一事，訪問了夏格巴，夏格巴說：「我參與此事（指參與調查熱振死因），我完全不認為他（指熱振）當時是被殺害的，……」⁴¹，夏格巴根本就是睜眼說瞎，而其所著《藏區政治史》一書，十四世達賴曾給予高度讚許，就這一點而言，十四世達賴是否慈悲，有否智慧，實屬可疑。

熱振之死，絕對是西藏地方近代史的一件大事，任何一部有關西藏近代史事的專書，或一篇論文，對熱振之死，一定都會詳加敘述，但今人林

³⁹ 此書由李有義漢譯，北京中國社科院民族所民族研究室出版，1979 年，頁 149。但此處係轉引自王貴等著《西藏歷史地位辨》，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7 年第二刷，頁 338

⁴⁰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19

⁴¹ 見梅·戈爾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漢譯本，下冊頁 530

孝庭所著《西藏問題》（係其博士論文，有理由相信為順利拿到學位，在相當程度上曲從指導教授之思維）一書，對熱振之死，僅以「五月二日，由於（色拉寺）缺乏物資與彈藥，色拉投降，六天以後，熱振在獄中猝死。」⁴²，如此輕輕幾個字帶過，實有塊對《西藏問題》之書名，林氏之書引用了許多珍貴且罕見之文獻，可惜立論都在醜化中央政府，以後得暇時當對該書詳加駁斥。此是題外，但頗值一提。

回過頭來看，梅·戈爾斯坦於其所著《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中，提到曾訪談當年目睹熱振遭斃者稱：「熱振遺體背部、臀部有一種傷痕。」（見該書漢譯本下冊頁 530），雖然該訪談者說這種傷痕「可能是受到護法神的懲罰的所致」，吾人以理性思考，縱然宇宙間果真有神靈，神靈也只會「懲罰」人們的心靈，不會懲罰人們的肉體，可見熱振遺體背部、臀部的傷痕是人為的，想來熱振這「活的佛」在獄中，遭到凡人的鞭笞，這對喇嘛教而言，何其諷刺。

代理攝政打扎活佛是個無甚知名度的小活佛（喇嘛教裏自稱活佛、仁波且者，多到不勝枚舉），是熱振的經師，其代理攝政之位。又是熱振推薦讓予的，試想熱振被捕入獄，如果沒有代理攝政打扎活佛的授意或首肯，無論獄卒或審案官員，豈敢對熱振「呼圖克圖」施以毒手？這一場「活佛」打「活佛」的劇碼，但願只是喇嘛教格魯派的一個特例，而非常態，否則達賴所領導的黃教就太駭人了。

依照藏地習俗，像熱振此一等級的活佛，其遭斃需要展示以供信徒憑弔，於是把熱振遺斃運到拉薩協德寺供信徒憑弔，當時在熱振臉部「用一塊紅綢緞蓋著臉部讓人瞻仰，拉薩有成千上萬的人到這裏來向遺體告別，……我們看見從熱振的鼻孔流出了一股鮮血，浸透了覆蓋遺體的那塊布。……」（見《喇嘛王國的覆滅》漢譯本下冊，頁 530）；此外，當時人在拉薩的蒙藏委員會駐藏辦處英文秘書柳陞祺，也於其所著《拉薩舊事》一書，也指出「屍體是活佛圓寂後的規矩盤膝坐著的，臉上有一方綢子，綢子上有從鼻孔或是口部流出的血漬。」⁴³熱振遺斃鼻孔流出的一股

⁴² 見林孝庭著、朱麗雙譯《西藏問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 頁 258

⁴³ 見柳陞祺《拉薩舊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頁 50，按此書係其舊作，於其辭世後（2003 年辭世）始行出版

鮮血，似乎向世人訴說他是毒害而死的，同時也駁斥夏格巴所說「我完全不認為他當時是被殺害的」，證實夏格巴所說的是一派胡言。可惜美、歐許多所謂「藏學家」，如范普拉赫者流，其有關西藏的知識，多來自夏格巴的《藏區政治史》一書，其謬誤乃是必然之事。

六、結語

西藏在中國清朝以前，均稱吐蕃，從中國唐朝初期即與中原有綿密往來，自中國元朝時，將之正式納入中國版圖，及至中國明朝雖未直接統治吐蕃地區，但吐蕃喇嘛教各教派，均接受明朝頒賜的名號，如大寶法王至今仍在傳襲；中國清朝自雍正（1723～1735 年在位）在吐蕃設立駐藏辦事大臣後，復將西藏納入中國版圖，至乾隆時（1736～1795 年在位）更頒定「金瓶掣籤制」，從此西藏蒙古地區喇嘛教格魯派（或作黃教）高位階活佛轉世，如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章嘉等、均需經過金瓶掣籤，雖或間有僅尋得一名靈童，也需經過中國清朝皇帝特准免予掣籤，可見中國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充分行使主權，西藏為中國領土乃是鐵一般之事實，不容置疑。

惟以中國清代自康雍乾臻於鼎盛之後，國力停滯不前而歐洲各拜工業革命之賜，自然科技突飛猛進，相對之下中國顯得落後，尤其熱兵器方面，中國更遠遠落後於歐西各國，工業革命後，歐洲各國以機器代替人工，產能大增，因此需要更多原料，同時也需更大市場，如是層層相因，遂形成帝國主義，向外侵奪原物料產地，使之成為殖民地，奴役當地之著使之成為奴隸，此外更向人口眾多且有購買力之國家或地區尋找市場，如被拒絕，遂以優勢之武強行叩關，在此狀況下，中國遂成為帝國主義最佳侵掠標的。

英、俄為競遂中亞，同時發現西藏具高屋建瓴之地緣優勢遂開始「經營」西藏，俄國以其境內有布里雅特蒙古及喀爾瑪克蒙古⁴⁴，此二蒙古

⁴⁴ 布里雅特蒙古聚居外蒙古之北貝加爾湖以東至額爾古納河之間，其地原為中國清朝領土，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時，將之割讓予俄國。至於喀爾瑪克蒙古，即土爾扈特蒙古，係衛拉特四部之一，明末以準噶爾部獨盛，時侵奪牧地，土爾扈特乃舉部西徙至裏海北岸、伏爾迦河東西兩岸之地駐牧，其後以俄國壯大，時加徵斂，土爾扈特不堪其擾，於 1770 年（乾隆三十五年）決定

族均篤奉西藏喇嘛教格魯派，每年幾乎均有信徒前往拉薩禮佛熬茶佈施，且蒙古族藏族在體質上均屬蒙古利亞種（即一般所謂之黃種人），在體質特徵幾無差異，俄國乃對此兩部蒙古喇嘛擇而訓練之，派往西藏以禮佛習經之名，從事情報工作，其中有著名者為布里雅特蒙古喇嘛道爾吉（此人有許多化名，或作德爾智、洛桑阿旺、多爾日耶夫、佐治野夫、阿旺多爾吉，堪德徹加、羅桑姑馬等，詳見周偉洲《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頁171～172），此人自幼出家為喇嘛但被俄國間諜機構吸收並加以訓練、利用⁴⁵，於1873年二十歲時入藏「學經」，於1888年獲得喇嘛教格魯派（黃教）「拉然巴格西」學位，此人入藏時攜有大量金錢，在拉薩期間出手大方，因而廣結善緣，藏地僧俗高層對他都具好感，俗語說有錢能使要推磨，何況是人，終於經過一番「運作」，獲任為十三世達賴之「侍講」（或作侍讀），也有一些文誤稱之為「經師」，藏人通稱之為「參寧堪布」。

當時十三世達賴尚在童稚之年（1876～1933年），道爾吉自任「侍講」後，得以接近十三世達賴，由是夜以繼日灌輸以「離中、親俄、反英」思想，如所周知青少年時所接受的「知識」，具有深切之影響，何況十三世達賴既不熟悉西藏與中央或中原悠久綿密之歷史關係，也不曉知帝國主義者陰謀瓜分中國之作為，對世界局勢、國際複雜關係更是一無所知，遂墮入道爾吉所設之陷阱—離中、親俄、反英；眼見俄國「經營」有成，號稱日不沒落國之英國，豈能忍下此一「悶氣」，兼以英俄競逐中亞、西藏以其地緣優勢，對控制中亞具有關鍵作用，因此在多次欲進入西藏不可得情況下，遂於1904年悍然出兵西藏，藏地軍民雖奮力抵抗，但以武器落後，雖犧牲慘重，仍告不敵，於英軍攻入拉薩前夕，十三世達賴率近百僧俗官員逃往外蒙古（道爾吉也在其中），本欲經過外蒙古向北進入俄國，以求俄國庇護（道爾吉誑稱俄國為喇嘛教傳說中的苦婆羅，即香

東返故土（今新疆西北塔城一帶），原約定待伏爾迦河冰凍之後，河西部分涉河而東，但當年氣候反常，至約定之日河水尚未結凍，河東部分已無法等待，乃先行東返，此為今日新疆蒙古之由來，河西部分只得仍留伏爾迦河西岸，周圍操突厥語各民族，遂戲稱之為「留下者」其讀音為喀爾瑪克（Kalmak）。

⁴⁵ 見王輔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頁156

拔拉，一般稱為香格里拉⁴⁶）但以當年發生日俄戰爭，俄國戰敗，而英日向為同盟，遂不敢接納十三世達賴一行，遂停留外蒙古庫倫，但十三世達賴個性孤傲自大，與外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不能和睦相處⁴⁷，當時中英正就藏事進行談判，英國堅拒達賴此時回藏，而達賴又不願回到內地，庫倫既不便停留，於是便向西到三言諾顏部，名為弘揚喇嘛教法，實為要繼續接受外蒙古蒙人「供養」，據清末李廷玉曾於其所撰《游蒙日記》一書中⁴⁸，指出外蒙古自王公以至牧民，對十三世達賴之供養，使外蒙古元氣兩、三年難以恢復，可見十三世達賴「吸金大法」何其利害。

之後以十三世達賴久滯外蒙古，恐日久生變，遂派御前大臣博迪蘇及內閣學士達壽二人，以考察喀爾喀游牧事宜為名赴外蒙古，並輔以由李廷玉率領之馬隊三十人，勸阻達賴不得赴俄，並力促其返回內地，並「密諭」：「達賴果不歸藏，即便宜行事」（見李廷玉《游蒙門記》自序），所謂「便宜行事」，似有視情況可以任意處置之意，自此達賴不得不離開外蒙古，此時中英仍在談判中，達賴無法返回拉薩乃暫時借住青海塔兒寺，由於唯我獨尊個性，又與塔爾寺住持阿嘉呼圖克圖積不相能，清廷為息事寧人，將阿嘉調往北京「當差」，這就形成十三世達賴鳩占雀巢，未幾又上奏清廷要到五台山（又作清涼山）禮佛，清廷又准其所請，更令沿途地方官員妥善接待，達賴一行沿途威福自作，及到五台山消息見諸媒體，各國駐華人員紛紛前往五台山會見達賴，一時成為風雲人物。

其時十三世達賴離開西藏已三年多，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原欲晉京陞

⁴⁶ 苦婆羅，係梵語，藏語音譯為香拔拉，漢語再音譯為香格里拉。意為保持樂源。傳說係古印度北方的一個人間淨土。地形為圓形，雪山環繞，狀如八瓣蓮花，每瓣有河流貫串其間，為貴種王所領也。佛演說「時輪」須教時即在此處，上說見《土觀宗教源流》頁 462。但此處係轉引自五世達賴著、劉立千譯《西藏王臣記》，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年，頁 144。另王遠大《近代俄國與中國西藏》，北京三聯書局，頁 143，對香拔拉一詞也有所解說，認為佛教未來將受到大災難，屆時香拔拉將成為佛教避難與復興之所。

⁴⁷ 不能和睦相處之原因，據夏格巴《藏區政治史》稱是因哲布尊丹巴傲慢無禮，但據英人榮赫鵬《英國侵略西藏史》（該書原名為 India and Tibet，孫煦初漢譯，商務印書館，1934 年，1973 年，台灣學生書局影印出版）稱兩者不睦之原因為達賴在庫倫所得蒙人供養，未分子哲布尊丹巴，而達賴一行百多之開銷均由哲布尊丹巴供給，達賴吝於分攤，是以不睦。

⁴⁸ 此書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 年）以手抄本影印出版，1990 時再以影印列《清末蒙古史地資料薈萃》由北京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予以出版。

見，奏報三年西藏政教情況，事為達賴所悉急忙奏請晉京陛見，清廷又屈從其請，同意其晉京，而卻班禪之請，達賴到北京後與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所接觸，為急於能返回西藏，一改其反英態度，轉而親英，何二三其德，西藏情勢從此轉而親英，與中央漸行漸遠。

民國肇建後，更在英國蠱惑下，宣稱西藏獨立，民國二年（1913年）竟與外蒙簽訂兒戲式之《蒙藏條約》，互相「承認」彼此「獨立」⁴⁹，之後因外蒙古取銷獨立改為自治，此條約遂煙銷雲散，但其有意走向獨立，已然是司馬昭之心，其所以如此者，以中原軍閥割地自雄，南北對峙，無法形成強有力之中央，遂使西藏有攜貳之心，政治乃極為現實者。及至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國家在形式上完成統一，經派人與西藏駐京聯繫後、西藏眼見中央業已統一，正走向團結康壯之道，乃設立西藏駐京、駐北平辦事處，但自清末至北伐完成已有二十之久，西藏政壇早已成為親英分子之活動場域，雖然十三世達賴晚年頗有回歸中央之意念，但噶廈中之親英分子已是積重難返，而英帝國眼見國民政府漸次走壯大，更加煽動藏地親英分子之離心活動，在西藏已然形成一股極大之力量，雖十三世達賴一時之間也難以扭轉，但十三世達賴總算良知尚未完全泯滅，在 1933 年十二月十七日（藏曆十六繞回水雞年十月三十日）臨終前召集「全體司倫、噶倫及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之代表安欽呼圖克圖等（時九世班禪流亡內地）等，作遺囑曰：『爾等不聽我訓誨，吾將去矣。師兄班禪在南京，中央有力，應速請彼回藏，維持政教，前藏、後藏緇素人等，應聽班禪之教誨。中央和平，救吾等之苦惱，於戲！』此正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以上這一段十三世達賴遺言，見於釋妙舟所著《蒙藏佛教史》，按釋妙舟俗姓金，浙江瑞安人，畢於廈門大學獲碩士學位，曾任教於大夏、暨南等大學，其後出家，實為積學之出家眾，生平唯一著作為《蒙藏佛教史》，完稿於 1934 年（十三世達賴辭世後一年），1935 年由上海佛學書局出版，2009 年揚州廣陵書社再度出版。所言十三世達賴臨終遺言當屬可信，此或許其生前即有意擇定五世熱振為其死後為攝政之原由，也或者五世熱振任攝政後，之所以與中央增進關係，實為實現十三世達賴未竟之遺

⁴⁹ 有關該條約詳情可參見劉學銚《中英有關西藏之條約》蒙藏委員會，1988 年，頁 47 ~51

願。

五世熱振呼圖克圖出任攝政後，確實對增進西藏與中央政府之關係，作出許多貢獻，如黃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達賴，吳忠信入藏辦理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之察視，十四世達賴坐床、在拉薩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等，若非熱振極力勸助，絕無可能實現。然而西藏地方政府自清末以來，即為親英分子所把持，多年積垢，非短時間所能清除，中央政府當時並未給熱振多少實質支援，但親英分子則在英帝國大力支持下，大肆活動，如散布謠言，宣稱蛇年不利於熱振，甚至熱振所請來打卦的「護法神」神漢都有可能事先已被親英分子所收買，打卦結果稱蛇年（1941 年）熱振會遭厄運，再加上拉薩街頭對熱振不利之流言，逼使熱振不得不暫時辭卸攝政之位，原想找一個老邁昏庸、又能受控制的不知名活佛打扎，暫時代理攝政，待三年後，再回任攝政，沒想到所托非人，不但貪婪而且狠毒，與親英分子沆瀣一氣，最後逮捕了五世熱振，且將之害死於獄中，打扎及諸親英分子從此肆無忌憚，大步邁向西藏獨立，在英人黎吉生（此人初為英國駐拉薩商務代表，印度獨立後，續任其為印度駐藏商務代表）運作下，眼見國共內戰日熾，民國政府節節敗退，政權業已搖搖欲墜，判定已無力處理西藏問題，而中共雖然勝券在握，建政也是指日可待，但判斷仍無力進軍西藏，黎吉生認為在此權力真空階段，遂鼓動西藏走向獨立，乃有驅逐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及所有在藏漢人之所謂「駐漢事件」，使民國政府二十多年對西藏工作，及五世熱振呼圖克圖之努力，全部歸零，熱振之死至今（2020）已七十餘人，其真象鮮為人知，致其忠於中央事蹟不為多數國人所知，對於五世熱振而言，頗不公平，惟近代以來已有若干研究藏事者，已對熱振事蹟有所發揮，筆者學淺，僅就手邊有限資料，略述熱振事件原由，以就教於學界先進，如何將熱振事件更深入探索以為其平反，則有待兩岸學界之努力。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 解飢餓要靠自家飯，知冷暖只有貼心人。（回族）
城需要堅固的城門，人需要知心的朋友。（滿族）
畜靠肥膘，人靠知己。（滿族）
水深魚樂，情深人知。（毛南族）
人重感情，狗戀吃食。（土家族）
蜂蜜再甜，甜不過知心話。（哈尼族）
愛朋友勝過生命，縱然死去還留友情。（蒙古族）
與其牛羊多，不如朋友多。（蒙古族）
衣裳是新的好，朋友是舊的好。（蒙古族）
有了新交莫棄舊友，買了珊瑚蒙扔琥珀。（藏族）
只有箭一樣直的心，才能求得誠摯永恒的支情。（藏族）
哈達要潔白的好，朋友要知心的好。（藏族）
借衣打扮不好看，討食充飢沒味道。（土族）
茶水喝足，百病可除。（維吾爾族）
十個遠親，不如一個近鄰。（瑤族）
遠山使木，近水食魚。（達斡爾族）
好吃不如寬住。（布依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奴兒哈赤名字裡的東北話印記

張華克
中國邊政協會常務監事

摘要

對於清太祖「努爾哈齊」的漢字寫法「奴兒哈赤」，以往學者多有刻板印象。大多數人從民族學角度評斷，認為以漢人主政的明朝朝廷，經常有歧視邊疆四夷的劣跡，以致認定稱呼「奴兒哈赤」必然是明廷的醜化用語。然而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 年）正月，朝鮮國使臣申忠一所記述的《建州紀程圖記》中，錄出的一封努爾哈齊給朝鮮國國王的漢文書信來看，清太祖當時明確署名為「女直國建州衛管東夷人之主佟奴兒哈赤稟」，可知其名稱並非朝廷轉述，故與所謂的辱稱，當無關聯，問題即已大致澄清。此外若另從語言學角度觀察，「奴兒哈赤」誕生於蘇克蘇滸河畔，這條河今稱蘇子河，位於瀋陽市東邊，渾河上游。「奴兒哈赤」一名，不過是早年瀋陽話的一種方言的記音而已，十分傳神。瀋陽話是通行於瀋陽及周邊的一種漢語方言，屬於東北官話的一支。東北官話有不少學者認為是清朝末年，漢人闖關東時應運而生的，而把東北話視為移民方言，稱其定型於清末民初時期。不過另有學者則說，東北話並非移民方言，而是古代幽燕方言的遺緒，再受到山東、河南、河北等周邊漢語方言及東北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而漸次形成的。雙方各持己見，並不相讓。不過從「奴兒哈赤」名字，以及一些《滿文原檔》中漢字記音的人名、地名、職銜等用語觀察，可以看出清太祖無論「奴」、「兒」、「哈」、「赤」四字，或是其他漢字紀

錄，均具東北方言特色，不只與醜化無關，且可推知，東北話的語音特色，定型甚早，至少明末清初時期即已出現，並流行於當地胡人生活圈中。建州女真以漢字、滿文記音，紀錄了許多可資對照的「印記」，為東北話地何時定型，留下了寶貴的見證。

關鍵字：奴兒哈赤 濰陽 《滿文原檔》 東北話 印記

壹、前言

姓名，是每一個人都擁有的基本標誌和符號。只是這些標誌及符號，常與民族語言相關。如果脫離了本民族語言，翻譯為另一種文字，往往會有不同的涵義，甚至引起誤解，那就變成一個可資討論的議題了。

就以清太祖「努爾哈齊」名字的漢字寫法，有時常寫為「奴兒哈赤」為例，雖然都是滿文名字「nurhaci」的譯音，¹但是學者陳捷先就對此頗有意見，認為無論明朝人或朝鮮人所稱的「奴」、「奴賊」、「奴兒哈赤」、「老酋」、「奴酋」、「老乙可赤」等，皆為「醜化用語」，具有「貶意與不理性的仇意在」：

我這本小書的主人翁為什麼稱作「努爾哈齊」而不稱為
 「努爾哈赤」呢？我們從史料裡可以了解：明朝人稱他為
 「奴」、「奴賊」或「奴兒哈赤」。朝鮮人則稱他為「老
 酋」、「奴酋」、「老乙可赤」、「奴兒哈赤」等等，都是有貶
 意與不理性的仇意在的。²

此外另有學者朋祥認為，清太祖為後金開國之君、大清奠基之主。從明末至今四百餘年，聲聞遐爾。然而其滿名的漢譯，至今尚未定案，常在努爾哈赤與努爾哈齊之間擺盪，相當奇特。原因或許就在於清太祖滿文名

¹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瀋陽市：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第1版），頁1146。「nurhaci」在《滿漢大辭典》中寫做「nurgaci」努爾哈赤，有 h、g 間不同的小小差異。

² 陳捷先，《努爾哈齊寫真》，（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3[民92]，初版），頁6。所謂「我這本小書」是指《努爾哈齊寫真》這本書。

字「nurhaci」中的「ci」發音上面，漢譯可為「齊」也可為「赤」，有「平翹舌」的分別，猜測其關鍵或在於滿文書面語、口語間的差異所致。³

為了解決以上這些問題，發覺《滿文原檔》·冊四·〈寒字檔〉中，紀錄了許多漢文、滿文對譯的敕諭資料，顯示了努爾哈齊時代建州衛女真人名、地名、職銜等用語的實際發音，相當珍貴，或許可以一併解釋「貶意」與「翹舌」等種種爭議現象。

初步理解，這些滿文用語的發音，與「東北話」有著密切的關係。東北話，在論及漢語分支時又稱為東北方言，或東北官話，是東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後金開國前後，受到這種漢語的影響極大，以致當時創製的滿族文字裡錄下了這種話語的發音，成為滿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可稱之為「東北話的印記」。關於「印記」一詞，就是印章、圖章的意思。

《宋史》裡記載：「請令有司製州縣官合用印記，舊印非所當用者，毀之。」⁴另《紅樓夢》中有一段話說：「那一邊又有禮部祠祭司的印記，又寫著一行小字。」⁵因此印記常代表著不可磨滅的標記與痕跡。《滿文原檔》裡出現許多無法消除的東北話痕跡，以往研究東北話的語言學者，很難有機會涉獵這些史料，所以從未加以討論。現在將之整理爬梳，提供參考。以下就先從「奴兒哈赤」的名字談起。

貳、討論

一、「赤」字的貶義。

前面曾經提過，學者陳捷先認為，清太祖名字「努爾哈齊」如果寫做「奴兒哈赤」，就具有貶意，是一種辱稱。只有稱作「努爾哈齊」，才是正確選擇，否則就是跟著助長「不理性的仇意」。這種說法雖然普遍，但是任何論述，都需要仔細驗證，才能加以採信。如果無法通過終極考驗，卻還選擇相信，大概就屬於盲從了。

³ 朋祥，〈清太祖漢譯名正義〉，《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四平市：[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編輯部]，1991年01期），頁88。

⁴ 《宋史·卷一五四·輿服志六》。

⁵ 《紅樓夢·第五三回》。

有人根據清朝官方文獻記載，認為清太祖的名字「毫無疑問」應寫作「弩兒哈齊」或者是「弩爾哈齊」。至於為什麼如今的清史論著都寫成了「努爾哈赤」？推測這種寫法也是有所依據的。學者張傑聲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學者稻葉君山 1914 年出版的《清朝全史》影響：

根據筆者對清太祖漢譯名的梳理，將清太祖名寫為“努爾哈赤”，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學者稻葉君山 1914 年出版的《清朝全史》之影響。時下國家正在組織編纂大型清史，清太祖的漢譯名應當寫為“努爾哈赤”還是“努爾哈齊”，顯然是一个必須面對而且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筆者認為：本著名從主人、尊重歷史以及與時俱進的原則，清太祖名應寫為“努爾哈齊”。⁶

查日本學者稻葉君山所寫《清朝全史》，係由湖北蒲圻詩人但燾所翻譯，清太祖的名字正文均譯寫為「奴兒哈赤」，並非「努爾哈赤」。僅有引述外部的資料才作「努爾哈齊」，或是「弩爾哈齊」等。⁷

另張傑引用明代官方文獻如《明實錄》，其中多將清太祖的名字譯寫為「奴兒哈赤」，現將其蒐集的《明實錄》證例六則，詳列如下表一〈《明實錄》記載奴兒哈赤名字六例〉，以供參考：⁸

表一〈《明實錄》記載奴兒哈赤名字六例〉

順序	萬曆	西元	月份	紀錄
1	十五年	1587	十一月己丑	先是遼東巡撫顧養謙疏論：開原道參政王緘 剿撫無定策，反覆其詞，貽患邊疆，宜重加 議處。至猛骨字羅已叛而從逆，奴兒哈赤益 驕而為患，乞行巡按查勘，相機處分。

⁶ 張傑，〈清太祖名為“努爾哈齊”論〉，《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瀋陽市：遼寧大學學報編輯部，2011年第1期），頁64。

⁷ 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臺北市：中華書局，民49[1960]，臺一版），上一，正文「奴兒哈赤」（頁18、80、105等），引述資料才作「努爾哈齊」（頁72）或「弩爾哈赤」（頁95）。

⁸ 張傑，〈清太祖名為“努爾哈齊”論〉，《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瀋陽市：遼寧大學學報編輯部，2011年第1期），頁68。

順序	萬曆	西元	月份	紀錄
2	十六年	1588	四月庚申	兵科給事中張希皋奏：遼左猛骨、那林之 剿……而建州夷奴兒哈赤及北虜恍忽太結連 助逆，實煩有徒，不可一日而忘備也。
3	十六年	1588	九月戊寅	薊鎮總督張國彥、遼東巡撫顧養謙會題…… 溫姐子猛骨既以母族北關，攻歹商，建州酋 奴兒哈赤亦因結北關親，以歹商為事。
4	十七年	1589	九月乙卯	始命建州夷酋都指揮奴兒哈赤為都督僉事。
5	十八年	1590	四月庚子	建州等衛女直夷人奴兒哈赤等一百八員名進 貢到京，宴賞如例。
6	二十年	1592	八月丁酉	建州衛都督奴兒哈赤等奏文四道，乞升賞職 銜、冠服、敕書，及奏高麗殺死所管部落五 十餘名，令所司知之，並賜宴如例。

其他明朝人的私家著述，也都將清太祖名字寫作「奴兒哈赤」。試見以下表二〈明朝人著述記載奴兒哈赤名字五例〉：⁹

表二〈明朝人著述記載奴兒哈赤名字五例〉

順序	作者	書名	位置	紀錄
1	瞿九思	《萬曆武功錄》	卷 11《奴兒哈赤列傳》	奴兒哈赤，故王台部也。後叛走建 州，帶甲數千人，雄東邊，遂為都 指揮。
2	苕上愚公	《東夷考略》	-	初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 征阿台，為響導，死兵火。奴兒哈 赤方幼，李成梁直攏視之。
3	張鼐	《遼夷略》	-	奴之祖曰佟教場，建州衛左都督僉 事也，生佟他失。有二子，曰奴兒 哈赤、速兒哈赤。他失死於亂陣，

⁹ 張傑，〈清太祖名為“努爾哈齊”論〉，《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瀋陽市：遼寧大學學報編輯部，2011年第1期），頁 68-69。

順序	作者	書名	位置	紀錄
				而奴兒升龍虎將軍，有七子，長男曰洪把禿里，為奴殺矣，子曰阿古。
4	程開祐	《東夷奴兒哈赤考》	-	其一則東方諸夷，之為衛所甚眾，而建州領其名，曰建州女直，今奴兒哈赤之屬是也。
5	傅國	《遼廣實錄》	卷上	萬曆戊午夏四月，故龍虎將軍建酋佟奴兒哈赤初發難，襲我撫順關，陷之，以我守將李永芳去，是為奴中行說。

在以上表一〈《明實錄》記載奴兒哈赤名字六例〉或是表二〈明朝人著述記載奴兒哈赤名字五例〉中檢視，都可看出清太祖名字是寫成「奴兒哈赤」的。學者張傑將其原因歸諸於明代文獻的故意醜化，認為其中反映了歷來漢族統治者對國內少數民族的歧視與偏見，建議「儘快改正」：

其次，尊重歷史的原則。以《明實錄》為代表的明代文獻，故意將清太祖名譯寫為“奴兒哈赤”，不僅“奴”、“奴兒”貶斥之意甚為明顯，就是“赤”字也以貶意居多。諸如“赤膊上陣”、“赤地千里”均帶有明顯貶義，近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被國民黨反動派誣譖為“赤匪”，是人所皆知的事實。尤其應當指出的是，《太祖武皇帝實錄》最初將明人的“奴兒哈赤”譯寫為“弩兒哈奇”，還保留了“兒”字，可知在當時滿族人看來，“赤”字的貶意甚至超過“兒”字。研究清朝歷史，清太祖名當然要以清朝文獻的記載為准。根據清代文獻，太祖有兄弟四人：分別名為舒爾哈齊、雅爾哈齊、巴雅喇（稻葉氏《清朝全史》作巴雅齊）、莫爾哈齊。而《明實錄》將舒爾哈齊醜寫為“速兒哈赤”，如今的清史著作已經根據《清實錄》的記載改為“舒爾哈齊”，清太祖名也應當儘快改正。¹⁰

¹⁰ 張傑，〈清太祖名為“努爾哈齊”論〉，《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瀋陽市：遼寧大學學報編輯部，2011年第1期），頁69。

在這位作者的眼中，「奴」、「兒」、「哈」、「赤」等四字，除了「哈」字似乎較無疑義外，其餘「奴」、「兒」、「赤」等三字，均帶有明顯貶義，「赤」字的貶意甚至超過「兒」字。另外由於認定《明實錄》將舒爾哈齊醜寫為「速兒哈赤」，不用「舒」兒用「速」，因此「速」字也列入貶義的範圍。

雖然張傑呼籲要「尊重歷史」，然其所「尊重」的歷史檔案，偏向清廷所編修的《清實錄》、《滿洲實錄》等官方資料。這些官書斧鑿痕跡太深，比起原創性的《滿文原檔》，在客觀的程度上可能略有不足，需要區分選擇。

《滿文原檔》・〈寒字檔〉中有許多漢文敕諭資料，¹¹所紀錄的建州衛女真人名，用字相當原始粗獷，與《太祖武皇帝實錄》中所用詞彙接近，而與《滿洲實錄》並不相同。現摘錄如下表三〈《滿文原檔》與《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名稱比較〉：

表三〈《滿文原檔》與《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名稱比較〉

《滿文原檔》			《太祖武皇帝實錄》			比較
順序	名稱	頁數	名稱	卷頁	備註	相似度
1	厄一都	99	厄一都	卷一頁 8	人名	+
2	兀喇	101	兀喇	卷一頁 3	兀喇部	+
3	兀吉（胡濟）	100	兀吉	卷二頁 1	東海兀吉部	+
4	通事	101	通事	卷二頁 1	大明開原通事	+
5	孫扎七	109	孫扎七	卷一頁 6	一酋，名孫扎七光滾	+
6	色牛克	111	色牛克	卷四頁 7	人名	+
7	王家	121	王家	卷一頁 3	王家部	+
8	哈達	123	哈達	卷一頁 2	哈達部	+

¹¹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99-149。〈寒字檔〉全文計五十一頁。

《滿文原檔》			《太祖武皇帝實錄》			比較
順序	名稱	頁數	名稱	卷頁	備註	相似度
9	孟古	123	孟古	卷二頁 2	孟古路、孟古姐姐	+
10	阿兒代	125	阿兒代	卷四頁 7	人名	+
11	趙家	127	趙家	卷一頁 9	趙家城	+
12	孫扎塔	134	孫扎塔	卷二頁 6	孫扎塔城	+
13	虎兒哈	149	虎兒哈	卷一頁 3	虎兒哈部	+

註：相似度「+」代表十分相似，「-」代表極不相似。

《滿文原檔》〈寒字檔〉中可以找出十三筆人名、地名、職銜等，與《太祖武皇帝實錄》中所記載的名稱是一樣的。這可以推測，原始資料就是這麼寫的，資料多出於女真人之手，與醜寫的想像，並不一致。而且其中有三筆人名資料「厄一都、色牛克、阿兒代」所代表的意義尤其值得重視。厄一都的名字在《太祖武皇帝實錄》中一共出現了十二次，而色牛克、阿兒代等二人，各只出現一次。厄一都的名字出現在卷一、卷二、卷三等三卷中，可見其比重非同凡響。色牛克、阿兒代等二人僅現身於卷四中，有如曇花一現，份量當然無法與厄一都相比。

厄一都是後金初興的重要角色，其名稱在鄂爾泰等纂修的《八旗通志·初集》中作「額亦都巴圖魯」，¹²並非厄一都。「巴圖魯」滿文意為「勇 baturu」，¹³出於清太祖的「賜號」，¹⁴不是本名。

此外《清史稿校註》中也記錄了「額亦都」的傳記，說明「額亦都」獲得「巴圖魯」的封號的緣由，是與進攻巴爾達城時，「額亦都」率兵奮勇前進，身上遍體鱗傷，「被五十餘創」，仍不退縮有關：

太祖起兵，額亦都從，討尼堪外蘭，攻圖倫城，先登；攻色克濟城，掩敵無備，取之，獲其牛馬、甲士；又別將兵攻舒

¹² 鄂爾泰等纂修，《八旗通志·初集》，（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民 57[1968]），卷 142，名臣列傳二，頁 3705。

¹³ 羽田亨編，《滿和辭典》，（臺北市：學海書局，民 63[1974]，初版），頁 36。

¹⁴ 鄂爾泰等纂修，《八旗通志·初集》，（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民 57[1968]），卷 142，名臣列傳二，頁 3706。

勒克布占，克其城。額亦都驍果善戰，挽強弓十石，能以少擊眾，所向克捷，太祖知其能，日見信任。歲丁亥八月，令將兵取巴爾達城。至渾河，秋水方至，不能涉，以繩約軍士，魚貫而渡，夜薄其城，率驍卒先登，城兵驚起拒，跨堞而戰，飛矢貫股著於堞，揮刀斷矢，戰益力，被五十餘創，不退，卒拔其城。師還，太祖迎於郊，宴勞，其所俘獲悉畀之，號為「巴圖魯」。¹⁵

「額亦都」名稱的用法，在《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之內為「巴圖魯額亦都」，其記載較為簡略：

秋八月。戊午朔。上命巴圖魯額亦都、率兵取把爾達城。額亦都至渾河。河漲不能涉。以繩聯軍士。魚貫而渡。率精銳數人。乘夜攻之。梯城而上。城中人迎拒。額亦都跨城堞而戰。身中五十創。殊死戰不退。城中人皆潰。遂乘勝克其城而還。¹⁶

清代官書使用「額亦都」名稱的相當多，其中尤以《滿洲實錄》可為代表。《滿洲實錄》雖完成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由於其文字實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為同一版本。有人推測這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重繪《滿洲實錄》滿文本時，乾隆皇帝對滿洲檔冊有所謂「稽古右文」的保存心態，故鮮有更動。以致「《滿洲實錄》的內容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的沒有區別，而僅僅把一些不正確的發音和筆誤寫錯的字改正了而已。」

¹⁷另有人直言，這部書目的是為誨飾當年「與明朝的臣屬關係」而編：

《滿洲實錄》卷一於“其國定號滿洲，乃其始祖也”之下注曰：“南朝誤名建州”，意思說女真族的先祖早已建立了滿洲國，明朝誤為建州。這一樁有意譯飾的事件，史家早已揭

¹⁵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民88]），《清史稿校註·卷232·列傳12·額亦都》，頁7925。

¹⁶ 華文書局輯，《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53[1964]），卷2，頁6。

¹⁷ 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台北市：大化，民67[1978]，初版），頁62、78。

破，目的在於掩飾他們與明朝的臣屬關係。¹⁸

因此《滿洲實錄》雖成書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較晚，在實務上，卻須與順治重修的《太祖武皇帝實錄》等量齊觀，等於是一個翻版的副本。¹⁹不過由於乾隆改正了一些所謂的「筆誤」，以致《滿洲實錄》與《太祖武皇帝實錄》可對應的人名、地名，都有了顯著的差異。其中的差別，可從表四〈《滿文原檔》與《滿洲實錄》記載名稱比較〉中看出，相似的資料 3 筆，不相似的資料 10 筆。由於《滿文原檔》是最原始的資料，而《滿洲實錄》與之相比，大多數都不一致，可知《滿洲實錄》詞彙修改得較多：

表四〈《滿文原檔》與《滿洲實錄》記載名稱比較〉

《滿文原檔》			《滿洲實錄》			比較
名稱	滿文	頁數	名稱	滿文	位置	相似度
厄一都	eidu	99	額亦都	eidu	卷二	-
兀喇	ula	101	烏拉	ula	卷一	-
兀吉（胡濟）	uweji	100	窩集	weji	卷一	-
通事	tungse	101	通事	tungse	卷三	+
孫扎七	sunjaci	109	遜札秦光 袞	sunjacin guwanggun	卷一	-
色牛克	senioke	111	塞紐克	senioke	卷八	-
王家	wanggiya	121	完顏	wanggiya	卷一	-
哈達	hada	123	哈達	hada	卷一	+
孟古	monggo	123	孟古哲哲	monggojeje	卷三	+

¹⁸ 楊勇軍，〈《滿洲實錄》成書考〉，《清史研究》，（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2012 年第 2 期），頁 107。《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一中同樣有「南朝誤名建州」的註解。

¹⁹ 張華克，〈〈三仙女〉傳說探源〉，《中國邊政》，（臺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民 104[2015]12 月，204 期），頁 119。

《滿文原檔》			《滿洲實錄》			比較
阿兒代	aldai	125	阿爾岱	ardai	卷八	-
趙家	joogiya	127	兆嘉	joogiya	卷一	-
孫扎塔	sunjata	134	遜扎泰	sunjatai	卷三	-
虎兒哈	hurha	149	瑚爾哈	hūrga	卷三	-

註：相似度「+」代表十分相似，「-」代表極不相似。

對於「筆誤」的解釋，可從表五〈《滿文原檔》與《滿洲實錄》名稱好壞用字比較〉中，得到一個初步的印象：

表五〈《滿文原檔》與《滿洲實錄》名稱好壞用字比較〉

《滿文原檔》			《滿洲實錄》			備註
名稱	壞字一	壞字二	名稱	好字一	好字二	
厄一都	厄	一	額亦都	額	亦	
兀喇	兀	喇	烏拉	烏	拉	
兀吉（胡濟）	兀	濟	窩集	窩	集	
孫扎七	孫	七	遜札秦光袞	遜	秦	
色牛克	色	牛	塞紐克	塞	紐	
王家	王	家	完顏	完	顏	
阿兒代	兒	代	阿爾岱	爾	岱	
趙家	趙	家	兆嘉	兆	嘉	
孫扎塔	孫	塔	遜扎泰	遜	泰	
虎兒哈	虎	兒	瑚爾哈	瑚	爾	

表五中的「厄一都」的「厄」字，含意欠佳。「厄」有災難、困難的含意，如：「困厄」、「厄運」等。而改為同音字「額」以後，因為「額」通常指「頭前眉上髮下的部分」或是「器物上首靠近頂端的部分，如匾額」，「額」字意思比「厄」字意思改善了許多，十分明顯。

然而《滿文原檔》與《太祖武皇帝實錄》兩書中所用的名稱「厄一都」，卻都是「厄一都」。「厄一都」顯然是他一直在用的本名，從這二

份原始資料檔裡，不約而同的都稱呼「額亦都」為「厄一都」，相當自然，當然不覺得用字含意欠佳，或是辱稱。

究其原因，可歸因於明朝關外的女真人，對漢字的使用上，並沒有一般漢人那麼多講究，也不大咬文嚼字。女真人記名，常以直覺的記音為主，對個別的字義，從不考究。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表五中的「色牛克」，拿「色」、「牛」當作名稱，純樸、穩重，看來女真人實在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勁。但是從漢人的角度來看，以「色」字起頭，有違儒家「好德如好色」²⁰的教誨，「牛」又是家畜，怎能與人相提並論。因此重抄時一律列為「筆誤」為由，把「色」換成「塞」，「牛」該為「紐」，似乎意思就顯得高尚多了。這類漢人觀點充斥在《滿洲實錄》中，這大概就是「兀喇」換為「烏拉」、「虎兒哈」改作「瑚爾哈」的主要考量。

不過表五中的「王家」換為「完顏」，「趙家」換為「兆嘉」，一般人或許會感到，這種美化似乎毫無意義。因為「王家」、「趙家」，王、家、趙等字，都不是含意欠佳「壞字」，而《滿洲實錄》卻大費周章的加以更換，有過度修飾的嫌疑。

進一步深究起來，這裡面還牽涉到「滿化」、「漢化」的形勢問題，可不像表面上那麼單純。原來同樣一個姓氏「王家」、「趙家」，在清廷入關以前，常被視為「滿化」的象徵。當時滿洲如日中天，在關外人多勢眾，形勢大好。有些漢人或許是基於「趨炎附勢」的心理，想從漢姓轉為滿姓，順理成章。就把自己的姓氏，從單音節的姓氏改為多音節的姓氏，以避免落單，或讓人一眼就認出是個漢人。例如姓李、鄭、陳等姓的漢人，最常用的手法，是在姓氏後綴上一個「佳」音，而改姓為李佳氏、鄭佳氏、陳佳氏等，使外觀上變為多音節的形式，以與滿洲認同。因此滿洲姓氏中的「王家」、「趙家」，「家」「佳」同音，可以很容易看出，這些姓氏原本是姓王、姓趙的漢人，因為要歸順滿洲而改姓。

按理說這種舉措，是認同滿洲的「好事」，滿人應該歡迎才是，何以清高宗乾隆要對這些「好事」，還加以下手更正。原來滿人入關之後，情勢竟然逆轉。在漢人眾多的大環境之下，出現許多滿人改為漢姓的情事，讓乾隆十分不悅，而下令禁止。甚至殃及無辜，連早年關外的老漢姓「王

²⁰ 〈子罕〉，《論語》，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家」、「趙家」，都被迫避嫌更改。這件事情的原委可說明如下：

《元史》以及朝鮮《李朝實錄》等書中，都有女真之姓。例如：烏古氏（或作烏古孫氏、烏古倫氏）、紇石烈氏（或作女奚烈氏、亦乞烈氏）、不術魯氏（或作李術魯氏）、斡魯氏（或作斡勒氏）、敵烈氏、完顏氏、抹顏氏、尼龐古氏（或作尼瑪察氏、尼瑪車氏）、蒲察氏、古里甲氏、陀滿氏（或作徒單氏）、僕散氏、移刺氏、也羅氏、唐括氏等。其中，《金史》所載最多，共有 99 姓。這些姓，顯然都屬女真語，是多音節的姓。女真人進入中原地區以後，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始將女真語姓改為漢字姓，如烏古倫氏姓劉，黃摶氏姓汪、馬、趙，赤盞氏姓楊等。滿洲人哈拉的歷程，與其先人女真如出一轍。入關以前，都使用多音節的哈拉。甚至一些歸附於滿洲的漢人，也爭相效法，在姓後綴以“佳”音，如李佳氏、鄭佳氏、陳佳氏，等等。而入關以後，滿洲人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受強烈影響於漢族。其哈拉，始則反效漢人，稱某佳氏（即在原有多音節哈拉的第一個音節後綴以“佳”音，其餘音節省略），繼而將“佳”音亦省，只留一音節，再選用相應的漢字，則儼然漢姓矣。對此，清高宗深感不安，恐“失滿洲舊道”，並多次告誡“不得依附漢姓，故意牽混”。如乾隆四十年三月十八日諭：“正黃滿洲旗為補放盛京所屬義州之包衣佐領事，奏稱引見之驍騎校塔青阿，姓高佳氏，驍騎校多隆額，姓楊佳氏。夫高佳、楊佳者，皆系漢姓。塔青阿、多隆額雖屬包衣牛角，亦系盛京本地之人。夫盛京，乃我根本之區。如此流於漢俗，不可不預為匡正，若聽任自流，必使滿洲舊姓漸趨淹沒。今夫，致呼瓜爾佳氏為關佳氏、富察氏為富佳氏，是何成體統，與滿洲風俗多有關涉。將此，著寄信弘曄，留心辦妥可也。”雖聖旨屢降，奈何世風日下，仿漢姓者不斷增加。²¹

這篇論述裡說得相當清楚，乾隆皇帝所擔心的是，有人將滿洲舊姓瓜爾佳氏略稱為關佳氏、富察氏簡化成富佳氏，其「漢化」的趨勢，來勢洶洶，十分忘本，讓皇帝心寒。

因此乾隆才會說「如此流於漢俗，不可不預為匡正，若聽任自流，必

²¹ 趙志強，〈滿族〉，《中國人的姓名》，（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第 1 版），頁 86。

使滿洲舊姓漸趨淹沒。」。可是這麼一「匡正」下來，連關外的老漢姓「王家」、「趙家」，都改成了「完顏」、「兆嘉」，似乎是始料未及，有點過頭。因為姓「王」的人士，可不一定全是女真「完顏」的後代，「王家」名稱有其時代意義，其理甚明。「趙家」的「趙」，也有個別傳統，曾是百家姓之首。若替換為「兆」，則本意盡失。如此的翻譯法，當然極為偏頗，甚至失之草率。

然而翻開紀錄滿洲姓氏的《清朝通志》，帶著「佳」字的八旗姓氏卻多不勝數。《清朝通志》一書是清代嵇璜、劉墉等奉敕所撰，成書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記載自清初至乾隆五十年止的典章制度，號稱為十通之一，可信度頗高。帶著「佳」字的八旗姓氏過多，難怪乾隆會十分擔心，想到設法「匡正」。現將該書中帶著「佳」字的滿洲姓氏列如下表六〈《清朝通志》中帶著「佳」字的八旗姓氏統計表〉：

表六〈《清朝通志》中帶著「佳」字的八旗姓氏統計表〉

區分	卷數	旗姓	小計	合計
多音節	二	瓜爾佳氏	1	11
	三	-	0	
	四	郭爾佳氏、托勒佳氏、卓克佳氏	3	
	五	瓦勒佳氏、都瓦爾佳氏、蘇爾佳氏、圖爾佳氏、喀爾佳氏、瑚爾佳氏	6	
	六	伊爾佳氏	1	
	七	-	0	
單音節	二	馬佳氏、佟佳氏	2	93
	三	戴佳氏、兆佳氏、李佳氏、黃佳氏、章佳氏、嵩佳氏、性佳氏、索佳氏、齊佳氏、蘇佳氏	10	

區分	卷數	旗姓	小計	合計
	四	陳佳氏、揚佳氏、洪佳氏、盟佳氏、組佳氏、蔡佳氏、留佳氏、武佳氏、郭佳氏、珠佳氏、羅佳氏、高佳氏、孫佳氏、尼佳氏、培佳氏、盛佳氏、傅佳氏、赫佳氏、覺佳氏、都佳氏、虞佳氏、金佳氏	22	
	五	音佳氏、圖佳氏、墨佳氏、拜佳氏、甘佳氏、敖佳氏、嘉佳氏、宗佳氏、姜佳氏、陳佳氏、安佳氏、田佳氏、林佳氏、秋佳氏、屈佳氏、普佳氏、蔣佳氏、龐佳氏、費佳氏、雅佳氏、飄佳氏、杭佳氏、範佳氏、申佳氏、良佳氏、舒佳氏、陶佳氏、鄭佳氏、梅佳氏、瑚佳氏、保佳氏、方佳氏、全佳氏、莽佳氏、豐佳氏、崔佳氏、穆佳氏、耀佳氏、邊佳氏、成佳氏、寧佳氏、官佳氏、持佳氏、石佳氏、郎佳氏、仁佳氏、林佳氏、唐佳氏	48	
	六	海佳氏、兆佳氏、翰佳氏、猷佳氏、常佳氏、操佳氏、烏佳氏、侯佳氏	8	
	七	倉佳氏、商佳氏、大佳氏	3	

表六〈《清朝通志》中帶著「佳」字的八旗姓氏統計表〉，主要以「多音節」和「單音節」兩類帶著「佳」字的八旗姓氏，加以統計。結果不出所料，「多音節」的姓氏僅有瓜爾佳氏、郭爾佳氏等 11 例，而「單音節」的則多達 93 例，「單音節」的「佳」字八旗姓占比多達九成。當然「單音節」的案例中，第三卷的「兆佳氏」，跟第六卷的「兆佳氏」重複，第四卷、第五卷都有「陳佳氏」，第五卷有兩個「林佳氏」，將這三個重複剔除，「單音節」的案例還是多達 90 例，占比可達九成，是毫無疑問的。

當然這帶著「佳」字的九成「疑似」漢姓，也並非無懈可擊，例如飄

姓、瑚姓、耀姓等姓氏，排名全在《中國姓氏大全》的千名之外，²²可知其與傳統的「漢姓」，也就是百家姓的關係，相當疏遠，很難因其帶著「佳」字，就將之與傳統的「漢姓」，牽扯上關係。但是李佳氏、黃佳氏、陳佳氏、林佳氏的李、黃、陳、林等姓氏，確實是漢族中的「大姓」。因此少數的罕見飄姓、瑚姓、耀姓等姓氏，很難撼動這些漢族「大姓」帶給人的刻板印象。乾隆所擔心的顯然不算過慮。

以上談了一些乾隆改正「筆誤」的情形。乾隆更正《滿洲實錄》後，與《太祖武皇帝實錄》中，可對應的人名、地名，都有了顯著的差異。其實改正「筆誤」的動作，不只是《滿洲實錄》而已，連較早期的《太祖武皇帝實錄》，也有「改正」的情形，「弩兒哈奇」的名字，並不是最原始的紀錄：

覺常剛第四子塔石嫡夫人乃阿姑都督長女，姓奚塔喇，名厄墨氣。生三子，長名弩兒哈奇（即太祖），號淑勒貝勒（淑勒貝勒，華言聰睿王也），次名黍兒哈奇，號打喇漢把土魯，三名牙兒哈奇。次夫人乃哈達國汗所養族女，姓納喇，名揃姐，生一子名把牙喇，號兆里兔（兆里兔華言能幹也），側室生一子名木兒哈奇，號卿把土魯。²³

《太祖武皇帝實錄》將太祖的名字稱做「弩兒哈奇」，似乎相當原始。但是再與乾隆時成書的蔣良騏《東華錄》比對，又出現了破綻。《東華錄》這本書上寫的是「太祖高皇帝（諱努爾哈赤）」，「赤」字再度出現。因《東華錄》抄自國史館內部史料，故多載有《實錄》所不載的內容。可見清代官方對「赤」字其實有所隱諱，只有內部史料還保存原始的「赤」字：

景祖生子五：長禮敦巴圖魯，次額爾袞，次界堪，次即顯祖宣皇帝，（諱塔克世）次塔察篇古。顯祖嫡妃喜塔喇氏，乃

²² 陳明遠，汪宗虎，《中國姓氏大全》，（北京市：北京社出版：新華發行，1987[民76]，第一版），飄姓排名第 1341 位，瑚姓排名第 1479 位，耀姓排名第 1630 位。

²³ 復旦大學. 圖書館.古籍部.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1 版），冊 368，卷 1 頁 2。

阿古都督女，是為宣皇后，生子三，長即太祖高皇帝（諱努爾哈赤）稱為聰睿貝勒，生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孕十三月而生，龍顏鳳目，偉軀大耳，聲若洪鐘。十歲時宣皇后崩，繼妃納喇氏，撫育寡恩。年十九，俾分居，予產獨薄。後知其才德，復厚予之，太祖辭不受。時有碩色納者，九子俱獷悍；又有加虎，生子七，矯捷多力，能披甲躍九牛。二族強，凌諸路。景祖饒才智，兼禮敦英勇，破滅之，盡收五嶺東、蘇克蘇滸河西二百里內諸部，並有其地，由此遂盛。²⁴

前面說過，學者張傑聲稱：如今的清史論著都寫成「努爾哈赤」的原因，推測「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學者稻葉君山 1914 年出版的《清朝全史》之影響」。前面本文已經澄清，《清朝全史》的作者稻葉君山，使用的太祖名稱都是「奴兒哈赤」，而非「努爾哈赤」。使用「努爾哈赤」的案例不能忽略蔣良騏的《東華錄》。《東華錄》早在乾隆時代即已出現，影響力也不可小覷。

此外再與朝鮮人的資料核對，又出現了一些可資討論的話題。有學者認為，朝鮮人是當年的第三者，有時候對建州女真的了解比明朝還清楚，同時在客觀的程度上也比較好些：

明朝方面的資料相當多，但是在明朝當時和滿洲敵對的情況下，有很多失之客觀的地方，因此，如果純用明朝或明代官方的資料，也有欠客觀。朝鮮人對建州衛的女真人當然也一向有成見，尤其是邊境上的糾紛，但無論如何，朝鮮人是第三者，有時候對建州女真的了解比明朝還清楚，同時在客觀的程度上可能比明朝好一點。²⁵

根據萬曆二十四年（1596 年）正月，《建州紀程圖記》記述，努爾哈齊向朝鮮國王回帖寫著：「女直國建州衛管東夷人之主佟奴兒哈赤

²⁴ 蔣良騏撰，林樹惠，傅貴九校點，《東華錄》，（北京市：中華書局，1980，第 1 版），卷 1，頁 2。

²⁵ 莊吉發著，〈朝鮮人心目中的努爾哈齊〉，《清史拾遺》，（臺北市：學生書局，民 81[1992]，初版），頁 1。

稟」，²⁶可知努爾哈齊當時還自稱姓佟，名為「奴兒哈赤」，許多研究者都曾提到該書，認為「資料珍貴，相當可信。」²⁷現在將這段紀錄揭示如下，可以看出，這是一封給朝鮮國國王的書信，立約說明兩方的人畜交換方式：

奴酋回帖云：「女直國建州衛管東夷人之主佟奴兒哈赤
稟。為夷情事，蒙你朝鮮國我女直國二國往來行走營（管？）
好，我們二國，無有助兵之禮。我屢次營（管？）好，保守天
朝九百五十於（餘？）里邊疆，有遼東邊官，只要害我途
（圖？）功陞賞，有你朝鮮國的人一十七名，我用價轉買送
去，蒙國王稟賞，我得知，我們二國，若不保心，有你臨城堡
對只地方，著我的達子住著看守你的邊疆，若有你的高麗地方
生育不見了，我達子說知，亦尋送還，你差通事，答滿（浦）
堡城，到我家來，若有你的人畜，我送去，我的達子，到你地
方，你送還與我。兩家為律，在無歹情。後日天朝官害我，你
替我方便，壹言呈與天朝通知，我有酬報，星夜力等天朝二國
明文，及日回報，須至稟者。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稟。」

觀回帖中印跡，篆之以建州左衛之印。²⁸

在這封書信裡，有一些申忠一所加的註記。例如「二國往來行走營（管？）好」，他認為「營」字是別字，應該改為「管」字。這點有些見仁見智，因為「營」字本身就有「謀求、管理」的意思，例如「鑽營、營造」，真不能算寫錯，申忠一的要求，好像太高了一些。至於「途（圖？）功陞賞」、「九百五十於（餘？）里」，看來真的是錯別字了。據朝鮮國使臣申忠一所說，他看到有一個漢人名叫龔正陸，是浙江會稽紹興府人，通曉文墨，正在擔任努爾哈齊的家教兼秘書，隨侍在側，地位頗高。龔正陸有一個女真名字，當地人喊他作「歪乃」，意思是「外郎」。

²⁶ 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台北市：台聯國風出版社清史資料. 第三輯，開國史料(三), 1970），頁 20。

²⁷ 閻崇年，〈清太祖姓氏之謎〉，《紫禁城》，（北京市：紫禁城出版社，2004 年 01 期），頁 77。

²⁸ 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台北市：台聯國風出版社清史資料. 第三輯，開國史料(三), 1970），頁 20-21。

歪乃的漢文程度，申忠一認為並不高明，所以註解之餘，還批評說：「歪乃本上國人，來于奴酋處，掌文書云，而文理不通。」²⁹以往也有學者同意這點：

同時他也記了當時努爾哈齊屬下兵力已達一萬五千餘人，並有浙江人龔正陸為他掌理漢文文書，申忠一帶回去一件努爾哈齊致朝鮮國王李昰的回帖，文中有「我屢次營好，保守天朝九百五十於（餘）里邊疆」，這回帖就出自龔正陸的手筆，難怪朝鮮人說他「文理不通」。不過努爾哈齊如此謙虛說話，是想藉朝鮮國王之口，上報明朝，為他說些好話，掩飾他的叛逆野心的。³⁰

學者陳捷先除了贊成申忠一的觀點，認為龔正陸的手筆不怎麼樣之外，還說努爾哈齊如此謙虛的說話，例如稱呼明朝為「天朝」，自稱為「夷人之主」，把轄下的建州女真人叫做「我的達子」等用語，跟朝鮮國王打交道，是在「掩飾他的叛逆野心的」。不過從這份錯字連篇的公文書信裡，³¹也可以反映出申忠一的「求實」面向，申忠一不想為建州女真遮掩什麼，所以「照本宣科」，一字不改。但是這麼一來，也就可以了解，在這封信裡的「奴兒哈赤」，就是努爾哈齊自己的署名，與所謂的他人「辱稱」，是毫無關係的。

前面說過，依學者張傑的解釋，「奴」、「兒」、「哈」、「赤」等四字，除了「哈」字似乎較無疑義外，其餘「奴」、「兒」、「赤」等三字，均帶有明顯貶義。然而前面文中也提到過，《滿文原檔》· 冊四· 〈寒字檔〉中有許多漢文敕諭資料，所紀錄的建州衛女真人名、地名，用字相當原始，是當時女真人的常用字。既然「奴兒哈赤」是太祖自稱，當然與一般女真人名字的用字，不會相差太遠。可惜〈寒字檔〉中女真人名資料有限，僅有二百多筆，檢視之下，發覺帶著「奴 nu」音的名字，完

²⁹ 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臺北市：臺聯國風出版社清史資料· 第三輯，開國史料(三)，1970），頁 15。

³⁰ 陳捷先，《努爾哈齊寫真》，（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3[民 92]，初版），頁 48-49。

³¹ 例如其他地方：「無有助兵之禮（理）、兩家為律，在（再）無歹情。」似乎也有斟酌的餘地。

全從缺。僅有一個例子「王交 wangginu」，³²有一個詞尾音節帶著「奴 nu」，但是並不發音，無法列入證據。所幸的是，《太祖武皇帝實錄》與《滿文原檔》的關係密切，前面表三〈《滿文原檔》與《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名稱比較〉已經證實過這點。因此將《太祖武皇帝實錄》裡的女真人名列入參考，以彌補資料欠缺的遺憾。該書發「奴 nu」音的名字是「卿家奴 cinggiyanu」、「楊機奴 yangginu」，其始祖為夜黑國（葉赫）蒙古人：

夜黑國始祖蒙古人，姓土墨忒，所居地名曰張。滅胡籠國內納喇姓部，遂居其地，因姓納喇。後移居夜黑河，故名夜黑。始祖勝根打喇漢，生石兒刻命剛免，石兒刻命剛免生奇里哈尼，奇里哈尼生出空格，出空格生太杵，太杵生二子，長名卿家奴，次名楊機奴，兄弟征服諸部，各居一城，哈達人多歸之，兄弟遂皆稱王。³³

在《滿洲實錄》中，這兩個葉赫國王，稱為「清佳努 cinggiyanu」、「楊吉努 yangginu」。³⁴看得出已將「奴-nu」美化為「努-nu」，與將「奴兒哈赤」美化為「努爾哈齊」的筆法是一模一樣的。

此外既然學者張傑認為太祖兄弟速兒哈赤的「速」字也是《明實錄》將舒爾哈齊醜寫的例證，就順便檢驗《滿文原檔》·冊四·〈寒字檔〉中女真人名帶有「速」字的情形，做成表七〈《滿文原檔》女真名稱中帶速、兒、哈、赤漢字者一覽表〉如下，以為佐證：

表七〈《滿文原檔》女真名稱中帶速、兒、哈、赤漢字者一覽表〉

順序	敕諭	名字	滿文	頁碼	統計	備註
1	-	卿家奴	cinggiyanu	卷 1 頁 3	奴=2 名	《武皇帝實錄》

³²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34。

³³ 復旦大學. 圖書館.古籍部.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1 版），冊 368，卷 1 頁 3。

³⁴ 華文書局輯，《大清滿洲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 53[1964]），卷 1，頁 24。

順序	敕諭	名字	滿文	頁碼	統計	備註
2	-	楊機奴	yangginu	卷 1 頁 3		《武皇帝實錄》
3	4	野速	yeksu	109	速=1 名	
4	3	亦兒鄧	ilden	105	兒=24 名	
5	3	屠兒革	turgei	105		
6	3	大卜祿	daimbulu	106		
7	4	阿兒不哈	arbuha	108		
8	6	他兒八奚	tarbahi	114		
9	10	兒勒那	erne	122		
10	10	失兒哈	sirha	123		
11	11	張哈兒吉	janggalji	123		
12	11	兀兒刺	urla	125		
13	11	阿兒代	aldai	125		
14	12	答兒孫	darsun	127		
15	14	亦兒勝	iresen	131		
16	14	阿兒交	argio	132		
17	14	牙兒哈那	yarhana	132		
18	17	苦兒那	kurne	140		
19	17	失兒八	siraba	140		
20	18	趙兒必	jolbi	141		
21	19	束兒小	sulhio	142		
22	19	答兒學	dalhio	142		
23	20	得兒肯	delken	144		
24	20	古兒馬虎	gulmahun	144		
25	20	伍兒古得	urgude	145		
26	22	牙兒那	yarna	148		
27	22	虎兒哈	hurha	149		部族名稱
28	1	答祿哈	darungga	100	哈=42 名	
29	1	義哈阿里	ihan_alin	101		地名
30	3	翁哈大	unggadai	106		

順序	敕諭	名字	滿文	頁碼	統計	備註
31	3	阿吉哈篇姑	ajigan fiyanggu	106		
32	3	大刺哈	dalaha	107		
33	3	不刺哈	bulangga	107		
34	4	你哈里(2)	nikari	109		
35	4	我哈	oohan	109		
36	4	五七哈	uciha	109		
37	4	害查哈	haisangga	109		
38	4	你他哈	nitangga	109		
39	5	你哈里(1)	nikari	110		
40	5	張喇哈	jalangga	111		
41	5	你哈	nikan	111		
42	5	幸哈	hingga	112		
43	6	哈喇	hara	112		
44	7	凹其哈	wajingga	116		
45	7	伍哈代	unggadai	117		
46	9	失哈答	sihada	120		
47	9	東哈	dungga	120		
48	10	米哈其	mihaci	123		
49	11	答哈刺	dahara	126		
50	11	哈答哈	hadingga	126		
51	12	柴亦哈	caihua	128		
52	12	竇子哈	doosha	128		
53	12	翁哈帶	unggadai	129		
54	13	查馬哈那	samhana	130		
55	15	萬吉哈	wanjihan	135		
56	15	阿哈大	ahadan	135		

順序	敕諭	名字	滿文	頁碼	統計	備註
57	15	哈空	hakun	136		
58	15	哈失土	hasitu	136		
59	16	伍那哈來	unahalai	137		
60	16	伍答哈	udaha	137		
61	16	哈乃	hanai	137		
62	16	翁哈代	unggadai	138		
63	16	伍那哈	unaha(udaha)	138		那誤譯 da
64	17	哈兒哈	harha	139		
65	20	你哈	nikan	144		
66	21	木哈答	muhada	146		
67	21	哈哈那	hahana	146		
68	21	亦哈答	inggada	147		
69	22	哈了那	haliona	148		
70	12	伍赤台	ucitai	129	赤=1 名	

表七〈《滿文原檔》女真名稱中帶速、兒、哈、赤漢字者一覽表〉說明一個事實，女真人對名稱所用的漢字，認知口味真的與漢人有些差異。兒字出現 24 次，哈字用了 42 次，甚至有「哈兒哈」、「哈答哈」、「不刺哈」、「大刺哈」、「你哈」、「我哈」、「東哈」等名稱，充滿喜感的命名法，讓人嘆為觀止。

關於本節「『赤』字的貶義」的討論，在這裡就暫時作一個小結。清太祖名字「奴兒哈赤」，原本是一個自稱。從努爾哈齊向朝鮮國王回帖寫著：「女直國建州衛管東夷人之主佟奴兒哈赤稟」，到蔣良騏《東華錄》的「太祖高皇帝（諱努爾哈赤）稱為聰睿貝勒」，都可以看出，「奴兒哈赤」不可能是明朝人或朝鮮人所發明的貶稱。如果僅憑感覺，就認定該詞彙是出於「仇意」，那麼這種判斷就可能是民族中心主義的作用。³⁵這種主義是以自身的文化規範為唯一依據，藉此評斷其他社會的事物。通常

³⁵ 張彩霞等編著，《自由派翻譯傳統研究》，（北京市：外語教學與研究，2008，第 1 版），頁 376。

這種評斷，由於觀念偏差，會使人誤解不同的價值與觀念。從表一〈《明實錄》記載奴兒哈赤名字六例〉、表二〈明朝人著述記載奴兒哈赤名字五例〉等明朝案例中，如果以平常心閱讀，並不會感覺這些名稱是一種故意醜化的稱呼。本文利用表三〈《滿文原檔》與《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名稱比較〉，說明一些人名資料「厄一都、色牛克、阿兒代」等，原始資料就是如此，推測《太祖武皇帝實錄》為了重塑太祖形象，將「奴兒哈赤」美化為「弩兒哈奇」。³⁶而其他名稱，則因不是太祖，即維持原狀，鮮有更動。另表四〈《滿文原檔》與《滿洲實錄》記載名稱比較〉、表五〈《滿文原檔》與《滿洲實錄》名稱好壞用字比較〉是將《滿文原檔》與《滿洲實錄》二度比較，第一度的比較，了解到《滿洲實錄》曾經修改過許多名稱。第二度比較，可以看出修改的名稱都是往美化方向修改，例外極少。不過表六〈《清朝通志》中帶著「佳」字的八旗姓氏統計表〉卻顯示乾隆為了改正「筆誤」，施行美化式的詞彙修改，對史料的真實度，表面上無傷大雅，其實是一種傷害。連關外的傳統姓氏「王家」、「趙家」，都改成了「完顏」、「兆嘉」，似乎是矯枉過正。因為漢人姓「王」的人士，可不一定是女真「完顏」的後代，其理甚明。「趙家」的「趙」，也有其傳統，曾是百家姓之首。若替換為「兆」，則本意盡失。如此的翻譯法，當然有其偏差，甚至失之草率。表六以「多音節」和「單音節」兩類帶著「佳」字的八旗姓氏，加以統計。發現帶著「佳」字的八旗姓氏過多，難怪乾隆會十分擔心，想到設法「匡正」。表七〈《滿文原檔》女真名稱中帶速、兒、哈、赤漢字者一覽表〉，提出了 70 個女真人名、地名、部族名稱等，其中還包括《太祖武皇帝實錄》裡摘出的卿家奴、楊機奴等兩個女真人名，用以說明女真人的用字習慣，並沒有漢人講究。總之「奴兒哈赤」其名，是女真人的自我稱呼，與色牛克、阿兒代的名稱類似，都是女真文化的一環。這些名字在建州衛的環境裡，習以為常。只是後來生活圈子擴大，皇太極撰述《太祖武皇帝實錄》時，國都已由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的新賓赫圖阿拉，遷至瀋陽。遷都瀋陽是由清

³⁶ 復旦大學. 圖書館. 古籍部. 繕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編年類，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1 版），冊 368，卷 1 頁 2。

太祖努爾哈齊所決定的，時間是後金天命十年（1625）。瀋陽以往居住者以漢人為主，而《太祖武皇帝實錄》初纂本，四卷，是由剛林、羅繡錦等於崇德元年(1636)纂成。羅繡錦是遼陽漢人，天聰八年（1634）舉人。當年後金禮部開科，招試滿洲漢人，以通文義者為舉人，共錄取齊國儒、朱燦然、羅繡錦、梁正大、雷興、馬國柱、金柱、王來用等八人。³⁷《清史稿校註》中記錄了一些他的事蹟：

羅繡錦，亦遼陽人，以諸生來歸。天聰五年，與馬鳴佩同授工部啟心郎。六年，上以大凌河新附人眾，計國中無問官民，計口儲糧，有餘悉輸官，視市值記籍，徐為之償；有餘糧不輸者，許家人告發。繡錦、鳴佩疏言：「民有餘糧，孰肯輸之官？縱令首告，有仇則訐，無仇則隱，所得必少。且民不敢以糧入市，新人糧不足，及舊人之無糧者，皆無所於糴。不若出令，無問滿、漢、蒙古官生軍民，人輸糧一斗。有糧者固易辦，無糧者人出銀二三錢，糴以輸官，亦無大損；其有餘糧願輸官者，獎以升賞：此兩便之術也。」崇德元年五月，授內國史院學士。纂太祖實錄成，得優賚。漢軍旗制定，隸鑲藍旗。七年，兼牛彙額真。³⁸

羅繡錦因「纂太祖實錄成，得優賚。」可以推知，羅繡錦在編寫《太祖武皇帝實錄》上花過不少心血，「奴兒哈赤」名稱改為「弩兒哈奇」，應該是出於他的手筆。崇德元年（1636）能得到皇太極優厚的賞賜，也是理所當然。至於一些人名資料如「厄一都、色牛克、阿兒代」等，原始資料既如此，又是配角，當然不放在羅繡錦心中，也就免予更動。

時光荏苒，乾隆四十六年（1781），最後一部太祖實錄《滿洲實錄》完稿。雖然只是《太祖武皇帝實錄》的再次「恭繕」，³⁹但是乾隆皇帝坐鎮的北京，居住的漢人數量是瀋陽所望塵莫及的。於距離羅繡錦等纂成

³⁷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民88]），《清史稿校註·卷246·列傳26·羅繡錦》，頁8222。

³⁸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民88]），《清史稿校註·卷246·列傳26·羅繡錦》，頁8223。

³⁹ 楊勇軍，〈《滿洲實錄》成書考〉，《清史研究》，（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2012年5月第2期），頁106。

《太祖武皇帝實錄》，已經 146 年，對文字的要求標準更高，因此連配角的名稱也一併「雅化」：

《滿洲實錄》的漢文部分則以《武皇帝實錄》漢文本內容為基礎而變化。在人名、地名的修飾上，不僅要比《武皇帝實錄》雅化，也比乾隆四年定修本《高皇帝實錄》為雅。全書為避帝諱，“弦”字缺末筆，“玄”字改寫為“元”，“曆”字改寫為“歷”，等等。因清統治者聲稱現存《滿洲實錄》是重新繪寫，諸如人名、地名、諱字此類“文字上的小差異”，並不對該書所偽託的時代造成影響，故聽任繕寫官修改。⁴⁰

其實從表三〈《滿文原檔》與《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名稱比較〉、表四〈《滿文原檔》與《滿洲實錄》記載名稱比較〉，就可以比較出《太祖武皇帝實錄》跟《滿洲實錄》的用字差異，因為表三的《滿文原檔》與《太祖武皇帝實錄》選詞是相同的，所以表四就等於是《太祖武皇帝實錄》與《滿洲實錄》的詞彙比較，二者明顯有些差異，這正是乾隆皇帝推動「雅化」的成果。因此《太祖武皇帝實錄》的「弩兒哈奇」，⁴¹在《滿洲實錄》中就「聽任繕寫官修改」，更進一步雅化為「弩爾哈齊」了。⁴²

二、「赤」音的來源。

前面曾提到過，乾隆時成書的蔣良騏《東華錄》上寫著「太祖高皇帝（諱努爾哈赤）」，保存了原始的「赤」字史料，十分具有參考價值。那份檔案還有一些資料，也很關鍵，書上說「二族強，凌諸路。景祖饒才智，兼禮敦英勇，破滅之，盡收五嶺東、蘇克蘇滸河西二百里內諸部，並有其地，由此遂盛。」⁴³經查蘇克蘇滸河，今稱蘇子河，屬於遼寧省渾河

⁴⁰ 楊勇軍，〈《滿洲實錄》成書考〉，《清史研究》，（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2012年5月第2期），頁109。

⁴¹ 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版），冊368，卷1頁2。

⁴² 華文書局輯，《大清滿洲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53[1964]），卷1，頁18。

⁴³ 蔣良騏撰，林樹惠，傅貴九校點，《東華錄》，（北京市：中華書局，1980，第1版），卷1，頁2。

支流，位於瀋陽城東郊。「蘇克蘇許河西二百里內諸部」，看得出來，誇張到連瀋陽城也成了「景祖」的勢力範圍。「景祖」是追封的名號，指清景祖叫場，「叫場即覺昌安」，⁴⁴為努爾哈齊的祖父。其實覺昌安的轄下只能管管「諸部」，也就是女真人部落。至於那個瀋陽城，內有明朝的軍隊駐守，又有大小官吏，住的都是漢人，覺昌安很難插手。

覺昌安在萬曆初年收封為建州左衛督指揮，萬曆十一年（1583年），同其子塔克世因兵災死於古埒城。努爾哈齊自此接任。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建立後金國，定都於新賓赫圖阿拉，努爾哈齊登基稱汗，「奴兒哈赤自登可汗之位」。⁴⁵

努爾哈齊稱汗之後，顯然並未忘記瀋陽。天命三年（1618）努爾哈齊以「七大恨」告天，公開舉兵反明。天命四年（1619）二月，楊鎬以二十萬餘人分四路出師出擊後金，於撒爾湖（薩爾滸）大敗而還。⁴⁶努爾哈齊取得主動地位，開始向瀋陽進逼：

薩爾滸戰後近兩年間，後金軍乘勝攻佔瀋陽北部開原、鐵嶺二城，並滅掉原依仗明朝勢力苟延殘喘的海西女真葉赫部，同時積蓄糧草，打造戰具，為進一步奪取明遼東腹地做準備。

1621年明朝由於政局變化，撤換防守遼東卓有成效的經略熊廷弼，努爾哈赤覺得時機已經成熟，三月初十日，親統八旗大軍西進，欲奪取的第一座城池就是瀋陽。瀋陽城是明遼東地區戰略重鎮，因為“遼陽恃瀋陽、奉集（在瀋陽城東南四十里）為藩蔽，而瀋（陽）東捍建州（女真），西障土蠻（蒙古），較奉集更重”，所以這裡也是明軍重點防守之處，“時驍將勁卒，皆萃瀋、奉”。但此時瀋陽東部屏障撫順和北部屏障開原、鐵嶺已被摧毀，所以後金軍幾乎未遇任何阻力便於三月十二日兵臨瀋陽城下。守城明軍事先已有所準備，不僅整固城

⁴⁴ 稲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臺北市：中華書局，民 49[1960]，臺一版），上一，頁 79。

⁴⁵ 稲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臺北市：中華書局，民 49[1960]，臺一版），上一，頁 105。

⁴⁶ 蔣良騏撰，林樹惠，傅貴九校點，《東華錄》，（北京市：中華書局，1980，第 1 版），卷 1，頁 8-9。

牆，還將城周圍壕塹疏浚加深，並增添木柵，設置陷阱，城上環列火炮，由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率一萬多軍隊防守。後金兵至城下並未貿然進攻，努爾哈赤命各旗軍隊先將瀋陽城團團圍住，十三日清晨派兵至城門挑戰，明總兵賀世賢自恃驍勇，率千餘人出城東門應戰。努爾哈赤先派少量軍卒誘敵輕進，然後指揮精兵四面包圍出城明軍，賀世賢率軍且戰且退，至城西門附近時已身中十數箭，墜馬而死。後金兵乘勢以雲梯、盾車攻城，並從城東北角運土填壕，明軍雖有火炮，但燃放一段時間後即因炮身過熱而無法使用，總兵官尤世功也在激戰中陣亡。後金軍越壕急攻東門，在城內接應的後金奸細將城門吊橋繩索斬斷，八旗軍蜂擁而入，攻佔瀋陽城。隨後又擊敗從遼陽、奉集堡等處來救援的幾路明軍，僅一天時間，攻取瀋陽的戰鬥獲得全勝。以後幾天裡，又攻下遼陽，並長驅直入，一舉占領遼東、遼南地區七十多座城鎮堡寨，明遼東漢族居住地區成為後金國的新領地。⁴⁷

按說遼陽才是當時遼東的政經中心，規模第一，而瀋陽不過是遼陽的衛城，條件遠不如遼陽。然而努爾哈齊卻看重瀋陽的地理位置，因為後金天命十年（1625），提議遷都至瀋陽，諸王及大臣都力諫反對：

三月，帝聚諸王臣議，欲遷都瀋陽。諸王臣諫曰：「東京城新築，宮廡方成，民之居室未備，今欲遷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興，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瀋陽四通八達之處，西征大明，從都兒鼻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自清河路可進。瀋陽渾河通蘇蘇河，於蘇蘇河源頭處伐木，順流而下，材木不可勝用。出遊打獵，山近獸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吾籌慮已定，故欲遷都，汝等何故不從。」乃於初三日，出東京，宿虎皮驛，初四日至瀋陽。⁴⁸

⁴⁷ 佟悅著，《清代陪都瀋陽》，（瀋陽市：萬卷出版，2010，第1版），頁7。

⁴⁸ 復旦大學. 圖書館.古籍部.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版），冊368，卷4頁6。

這裡提到的蘇蘇河，就是「蘇克蘇滸 suksuhu」河，⁴⁹蘇克蘇滸滿語的意思是魚鷹。⁵⁰這條河今稱蘇子河，全長 119 公里，位於瀋陽市東郊，是渾河的上游。渾河從撫順流向瀋陽，河道全長 415 公里。蘇克蘇滸河是覺昌安發跡的領地，也是努爾哈齊的出生處。蘇克蘇滸河畔有赫圖阿拉城，是努爾哈齊建立後金的第一個都城，距離撫順約 80 公里，加上撫順距離瀋陽約 40 公里，因此沿著蘇克蘇滸河、渾河騎馬約三小時可達瀋陽。

其實遼陽只位於瀋陽南方二百三十公里處，曾是明朝遼東都司所在地，也有一條太子河流過。太子河全長 464 公里，比蘇子河還要盛大。瀋陽、遼陽各項地理條件差不多，距離大明、蒙古、朝鮮都不遠。唯一的差別是，太子河不是蘇克蘇滸河，與赫圖阿拉城無關。因此努爾哈齊堅持選擇當時的小城瀋陽，而非大城遼陽。經過約四百年的開發，瀋陽已經成為常住人口 829 萬的大都會（2016 年），而遼陽人口僅 184 萬（2015 年），已無法恢復當年盛況了。

這裡花了不少篇幅，詳細分析努爾哈齊堅持在瀋陽建都的因素，目的很單純，就是要說明，努爾哈齊說漢語的時候，猜測應該是什麼腔調。最合理的解答，應該就是瀋陽話吧。

瀋陽話是通行於瀋陽市內及郊區的一種方言，屬於東北官話吉瀋片的通溪小片。聲母，瀋陽方言共有聲母 20 個，與國語（普通話）相比，少了「zh、ch、sh、r（ㄓ、ㄔ、ㄕ、ㄩ）」四個翹舌聲母，同時多了唇齒音「v（万）」。⁵¹瀋陽話中的 20 個聲母和對應的國語聲母發音相同。國語中聲母為「zh、ch、sh（ㄓ、ㄔ、ㄕ）」的字，它們的聲母在瀋陽話中分別會變為「z、c、s（ㄗ、ㄘ、ㄙ）」。國語中聲母為「r（ㄩ）」的字，它們的聲母在瀋陽話中會變為「l（一）」或「y（ㄩ）」。瀋陽話的特色，跟一般東北方言分歧不大。另有學者分析東北方言與普通話在語音方面的差別表現在聲母、韻母、聲調等三個方面，可以當作參考：

⁴⁹ 今西春秋譯，《滿和對譯·滿洲實錄》，（滿洲：日滿文化協會，昭和 13[1938]），卷 8，頁 323。蘇克蘇滸河在此稱為蘇克素護河。

⁵⁰ 羽田亨編，《滿和辭典》，（臺北市：學海書局，民 63[1974]，初版），頁 387。

⁵¹ 万，發唇齒音 v，是老國音用聲母，現代注音裡已經沒有這個符號了。

下面談談東北方言和普通話語音的對應規律。王力先生曾說：推廣普通話主要是為了解決語音分歧問題，各地漢語方言的語法差別是很細微的……。王力先生的話說明方言的最大差別最引人注意的是語音，可以說劃分方言的主要依據也是語音。東北方言與普通話在語音方面的差別表現在聲母、韻母、聲調三個方面。⁵²

東北方言若再細分下去，聲母方面，有四個重點。韻母方面，有二個重點，計有六項特徵，可資索引。另外有些文章，詳列了豐富的韻母資料，相當值得參考，也斟酌列入採用。⁵³除了前六項特徵外，東北方言還具備第七項特徵，就是東北話的韻，跟字尾的發音有關，十分有意思，也加入了索引。⁵⁴至於聲調方面，重點不是很明確，滿文也無法表達，故暫不列入考慮。如此可以歸納出東北方言的七項特徵，製成下表八〈東北話語音的七項特徵舉例〉：⁵⁵

表八〈東北話語音的七項特徵舉例〉

特徵	類別	對應規律	國語（東北話）	備註
1	聲母	聲母的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對應規律。「資、雌、絲」和「知、癡、詩」這兩組字的聲母分別是「z、c、s」和「zh、ch、sh」。前一組是舌尖前音，後一組是舌尖後音。但東北方言發音卻不是如此，經常相反。	吃飯彳 ㄔㄢˋ chī fàn (疵飯ㄔ ㄔㄢˋ cī fàn)、詩詞ㄔ ㄕ shī cí (撕池ㄔ ㄕ sī chī)、找到ㄓ ㄉㄠˇ zhǎo dào (早到ㄉ ㄉㄠˇ ㄉㄠˇ zǎo dào)、俄羅斯ㄔ ㄉㄨㄛˊ ㄉㄨㄛˊ ㄉㄨㄛˊ ㄉㄨㄛˊ luó sī (俄羅施ㄔ ㄉㄨㄛˊ ㄉㄨㄛˊ ㄉㄨㄛˊ ㄉㄨㄛˊ shī)、支援ㄓ ㄉㄢ ㄉㄢ ㄉㄢ ㄉㄢ zhī yuán (資源ㄉ ㄉㄢ ㄉㄢ ㄉㄢ ㄉㄢ zī yuán)	

⁵² 單永賢，〈談東北話與普通話語音的對應規律〉，《語文學刊》，（呼和浩特市：內蒙古師範大學成人教育學院，1995年第05期），頁41。

⁵³ 藍偉，〈克服地方音說好普通話〉，《吉林藝術學院學報》，（長春市：吉林藝術學院，2000年01期），頁2。

⁵⁴ 藍偉，〈克服地方音說好普通話〉，《吉林藝術學院學報》，（長春市：吉林藝術學院，2000年01期），頁3。

⁵⁵ 單永賢，〈談東北話與普通話語音的對應規律〉，《語文學刊》，（呼和浩特市：內蒙古師範大學成人教育學院，1995年第05期），頁41-43。

特徵	類別	對應規律	國語（東北話）	備註
			i yuán)、木柴口ㄨˋ ㄞㄢˊ mù chái (木材口ㄨˋ ㄞㄢˊ mù cǎi)、主力ㄓㄨˋ ㄞ一ˋ zhǔ lì (阻力ㄔㄨˋ ㄞ一ˋ zǔ lì)	
2	聲母	y 和舌尖後音 r 的對應規律。漢語拼音方案中規定：i、u 韻母自成音節時使用 y，i 行的韻母自成音節，沒有聲母的時候，寫成 yi、ya、ye 等，目的是為了隔音。現行小學教材為了漢語拼音教學的方便，把 y 按聲母教，y 讀「衣」。國語（普通話）帶有舌尖後音 r 的音節，東北方言讀音與之不同。	吃肉彳日ㄡˋ chī ròu (七幼ㄐㄧˇ ㄩㄝˋ) 一一ㄡˋ qī yòu)、日子日ㄉˋ ㄕˋ rì zǐ (義子一ˋ ㄉˋ ㄕˋ yì zǐ)、容易日ㄨㄥˋ 一ˋ róng yì (熔易口ㄨㄥˋ 一ˋ yóng yì)、光榮ㄍㄨㄤ ㄉㄨㄥ guāng róng (光熔ㄍㄨㄤ ㄉㄨㄥ guāng yóng)、熱水日ㄉˋ 戸ㄨㄟˋ rè shuǐ (夜水一ㄉˋ 戸ㄨㄟˋ yè shuǐ)、人格日ㄣˋ ㄍㄜㄤˋ rén gé (銀格一ㄣˋ ㄍㄜㄤˋ yín gé)	
3	聲母	舌尖中音，鼻音 n 和邊音 l 的對應規律。國語（普通話）中 n 和 l 都是舌尖中音，但 n 是鼻音，l 是邊音，區別是明顯的。但東北方言讀音與之不同。	腦ㄉㄠ ㄉㄠ nǎo (老ㄌㄠˇ lǎ o)、老人ㄌㄠ ㄉㄣˋ lǎo rén (惱人ㄉㄠ ㄉㄣˋ nǎo rén)、難ㄉㄢ ㄉㄢ nán (藍ㄌㄢ ㄉㄢ lá n)、泥ㄉㄢ ㄉㄢ ní (犁ㄌㄢ ㄉㄢ lí)、年ㄉㄢ ㄉㄢ nián (連ㄌㄢ ㄉㄢ lián)、連長ㄌㄢ ㄉㄢ lián zhǎng (年長ㄉㄢ ㄉㄢ nián zhǎng)	
4	聲母	舌尖中音鼻音 n 和部分零聲母音節的對應規律。國語（普通話）中「礙、	耐心ㄉㄢ ㄉㄢ nài xīn (愛心ㄉㄢ ㄉㄢ ài xīn)、阻礙ㄉㄢ ㄉㄢ zǔ ài (鼠耐ㄉㄢ ㄉㄢ zǔ ài)	阻ㄉㄨˋ ㄉㄢ ㄉㄢ zǔ

特徵	類別	對應規律	國語（東北話）	備註
		愛、耐」聲母是不同的。「礙」和「愛」是零聲母音節，只有韻母 ai，而「耐」(nài)聲母是 n。東北方言中，常可聽到這樣的語言，「這是我愛(耐 nài)人」。阻ㄉㄨˇ zǔ (鼠戶ㄨˇ shǔ)不分。	ㄉㄩˋ sh ū nài) 、愛人ㄩˋ ㄉㄣˋ ài rén (耐銀ㄉㄩˋ 一ㄣˋ nài yín)	ㄨˇ sh ū)不分，再加上特徵 1 的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互換，就成為阻ㄉㄨˇ zǔ (蘇ㄉㄨ su)不分。
5	韻母	漢語輔音韻尾的相應規律。通過比較分析，東北方言有一系列音義相近的語素，首先會發現東北方言中的輔音韻尾有明顯的差別。n 是舌尖中音，是由舌尖和上齒齦構成阻礙而發出的聲音，氣流從鼻腔出來，是前鼻音；ng 是一個雙字母音素，國際音標「ŋ」它不是兩個音素相拼合而成音，是一個舌根鼻輔音。n 和 ng 在韻母中都充當韻尾，即輔音韻尾。	春風ㄉㄨㄣ chun fēng (春分ㄉㄨㄣ chun fēn) 、金魚ㄉㄧㄣ ㄩˊ jīn yú (鯨魚ㄉㄧㄣ ㄩˊ jīng yú) 、出身ㄉㄨㄣ chū shēn (出生ㄉㄨㄣ chū shēng) 、貧民ㄉㄧㄣ pín mǐn (平明ㄉㄧㄣ píng míng) 、暖氣ㄉㄨㄢˋ ㄑㄧㄣˋ nuǎn qì (囊氣ㄉㄨㄢˋ ㄑㄧㄣˋ nǎn qì) 、亂跑ㄌㄨㄢˋ ㄉㄠˋ luàn pǎo (爛跑ㄌㄨㄢˋ ㄉㄠˋ làn pǎo) 、農民ㄉㄨㄥ ㄇㄧㄣˊ nóng mǐn (能民ㄉㄨㄥ ㄇㄧㄣˊ nóng mǐn)	

特徵	類別	對應規律	國語（東北話）	備註
		但差別是明顯的，一個是前鼻音韻尾，一個是後鼻音韻尾。國語（普通話）中鼻尾音韻母有 an、en、in、un、ian、uan、uen、ang、eng、ong、ing、iang、long、uang、ueng 等共十六個。東北方言中有的人卻只有前鼻音，沒有後鼻音。有的人只有後鼻音，沒有前鼻音。	néng míng) 、賄賂厂ㄨㄟ、ㄉㄨ ㄨˋ huì lù (賄洛厂ㄨㄟ、ㄉㄨ ㄨㄛˋ huì luò) 、解剖ㄩㄧㄝ ㄩㄡˋ jiě pōu (解跑ㄩㄧ ㄩㄤˋ jiě pǎo) 、逮捕ㄩㄞ ㄩㄞˋㄩㄨˋ dàibǔ (ㄩㄞ 捕ㄩㄞˋ ㄩㄨˋ dèibǔ) 、責任ㄩㄞ ㄩㄞˋㄩㄣˋ zé rèn (ㄩㄞ 任ㄩㄞˋ ㄩㄣˋ zái rèn)	
6	韻母	舌後、半高、圓唇母音 o 和舌後半高不圓唇母音 e 的對應規律。東北方言把一些帶 o 韵母的音節讀成 e 韵母音節。	活潑厂ㄨㄛˋ ㄩㄛˋ huó pō (活 ㄩㄢˋ厂ㄨㄛˋ ㄩㄢˋ huó pē) 、 泡沫ㄩㄤˋ ㄇㄛˋ pào mò (泡 ㄇㄢˋ ㄩㄤˋ ㄇㄢˋ pào mè)	
7	韻尾	韻：漢語拼音共有 38 個韻母，它處於字腹部分,是字音中口腔開度最大、最響亮、音時最長的部分,字音主要靠它來擴大共鳴。韻母發音的基本要求是：發音明亮圓潤、肌肉控制有力.強調主要母音,音素過渡自然。如“開”字的口形 kai。值得注意的是，在字尾的收聲階段,“歸音”要圓滿。如果丟掉字尾或讀得含糊,都會引起語音不清。	代 (dài) → 大 (dà) 、大 (dà) → 但 (dàn)	

特徵	類別	對應規律	國語（東北話）	備註
		如“代”字（dài）丟掉了字尾就變成了“大”（dà）字。同樣道理，對沒有字尾的音節，口腔狀態要保持字腹的開度，不能中途縮小口形，否則字音也會發生變花如：“大”字的口形變化後就變成了“但”字（dà—dàn）。因此，要做到“氣斷聲停”、歸音圓滿。		

現將表八〈東北話語音的七項特徵舉例〉索引《滿文原檔》中女真名稱，歸納製出表九〈《滿文原檔》中女真名稱的東北話語音特徵〉如下：

表九〈《滿文原檔》中女真名稱的東北話語音特徵〉

《滿文原檔》					《滿文老檔》		對比	特徵	備註
順序	敕諭	名稱	滿文	頁碼	名稱	頁碼			
1	1	通事	tungse	101	佟色	592	事-色	1	22 例
2	2	半他失	bantasi	101	班塔什	593	失-什	1	
3	3	代事	daise	104	代理	593	事-理	1	
4	3	失汗	sihan	106	錫翰	594	失-錫	1	
5	3	送失	sungsi	107	松西	594	失-西	1	
6	4	野速	yeksu	109	葉克舒	594	速-舒	1	
7	6	包失	boosi	114	包什	596	失-什	1	
8	7	押木失答	yamsida	117	雅木西達	597	失-西	1	
9	9	失哈答	sihada	120	西哈達	597	失-西	1	
10	9	羊失	yangsi	121	揚西	598	失-西	1	
11	9	阿失那	asina	121	阿西納	598	失-西	1	

《滿文原檔》					《滿文老檔》		對比	特徵	備註
順序	敕諭	名稱	滿文	頁碼	名稱	頁碼			
12	10	失兒哈	sirha	123	西爾哈	598	失-西	1	
13	11	失汗	sihan	124	錫翰	598	失-錫	1	
14	12	伍赤台	ucitai	129	烏齊泰	600	赤-齊	1	
15	15	哈失土	hasitu	136	哈希圖	601	失-希	1	
16	15	凹失那	uwasina	136	瓦什納	601	失-什	1	
17	17	失兒八	siraba	140	西拉巴	602	失-西	1	
18	18	拜失	baisi	141	拜西	602	失-西	1	
19	20	阿失卜	asibu	144	阿希布	603	失-希	1	
20	20	慢他失	mantasi	145	滿塔西	604	失-西	1	
21	21	八羊束	bayangsu	147	巴楊蘇	604	束-蘇	1	
22	22	答束	dasu	148	達蘇	604	束-蘇	1	
22	1	刃	yan	100	銀(兩)	592	刃-銀	2	1 例
23	1	應古里	ningguri	101	寧古里	592	應-寧	4	13 例
23	2	蒼查里	sangsari	102	倉薩里	593	查-薩	4	
24	4	害查哈	haisangga	109	海桑阿	595	查-桑	4	
25	12	竇子哈	doosha	128	道斯哈	600	子-斯	4	
26	13	查馬哈那	samhana	130	薩木哈納	600	查-薩	4	
27	14	下木祖	hiyamsu	132	夏木蘇	600	祖-蘇	4	
28	15	扎亦查	jaisa	134	齋薩	600	查-薩	4	
29	15	崔班	suiban	135	崔班	601	崔-崔	4	
30	17	少子	siose	139	碩色	602	子-色	4	
31	17	解查	jaisa	140	齋薩	602	查-薩	4	
32	19	少子	siose	142	碩色	603	子-色	4	
33	20	少子	siose	145	碩色	603	子-色	4	
34	21	八查里	basari	147	巴雜里	604	查-雜	4	
35	2	襖亂	oolan	102	奧蘭	593	亂-蘭	5	13 例
36	2	戶失通	husitun	102	胡希吞	593	通-吞	5	

順序	敕諭	《滿文原檔》			《滿文老檔》		對比	特徵	備註
		名稱	滿文	頁碼	名稱	頁碼			
37	3	不刺哈	bulangga	107	布朗阿	594	刺-朗	5	
38	5	張喇哈	jalangga	111	札郎阿	595	喇-郎	5	
39	7	者住革	jejungge	116	哲忠額	597	住-忠	5	
40	11	通住虎	tonjuhu	126	屯珠虎	599	通-屯	5	
41	11	哈答哈	hadangga	126	哈當阿	599	答-當	5	
42	12	柴亦哈	caihā	128	柴河	599	哈-河	5	
43	14	亦兒勝	iresen	131	伊勒慎	600	勝-慎	5	
44	15	野成	yecen	134	葉臣	601	成-臣	5	
45	15	孫革里	sunggeri	135	松格里	601	孫-松	5	
46	15	哈空	hakun	136	哈坤	601	空-坤	5	
47	17	羊答古路	yandaguru	139	延達古魯	602	羊-延	5	
48	1	錄	uile	100	折罪	592	錄-le	6	3 例 墨=me
49	17	羅得	loodoi	139	勞堆	602	得-堆	6	
50	21	墨路	meru	147	莫魯	604	墨-莫	6	
51	1	老張	looja	100	勞紮	592	張-紮	7	
52	3	扯二格	cergei	104	車爾格依	593	格-格依	7	
53	3	屠兒革	turgei	105	圖爾格依	594	革-格依	7	
54	3	大卜祿	daimbulu	106	戴木布祿	594	大-戴	7	
55	3	駭吉革	hejige	106	赫濟格	594	駭-赫	7	
56	3	翁哈大	unggadai	106	翁噶岱	594	大-岱	7	
57	3	阿吉哈篇姑	ajigan fiyanggu	106	阿濟干費 揚古	594	哈-干	7	
58	3	他奚土	tahitun	106	塔希屯	594	土-屯	7	
59	3	扎苦七	jakucin	106	扎庫欽	594	七-欽	7	
60	4	我哈	oohan	109	敖漢	594	哈-漢	7	
61	4	你他哈	nitangga	109	尼唐阿	595	他-唐	7	
62	5	你哈	nikan	111	尼堪	595	哈-堪	7	

《滿文原檔》					《滿文老檔》		對比	特徵	備註
順序	敕諭	名稱	滿文	頁碼	名稱	頁碼			
63	6	大住	daiju	114	戴珠	596	大-戴	7	
64	6	里大	lidai	115	李岱	596	大-岱	7	
65	7	黑勒虎失土	hele husitun	117	賀樂胡希 吞	597	土-吞	7	
66	10	白義何	boihon	122	貝琿	598	何-琿	7	
67	10	惱亦麼何	noimohon	122	鼐謨歡	598	何-歡	7	
68	11	大米	damin	126	達敏	599	米-敏	7	
69	13	書扇刺	siusalan	129	舒沙蘭	600	扇-沙、 刺-蘭	7、7	
70	15	萬吉哈	wanjihan	135	完吉哈	601	哈-哈	7	哈=han
71	15	阿哈大	ahadan	135	阿哈丹	601	大-丹	7	
72	17	伍大	udai	139	烏岱	602	大-岱	7	
73	18	虎失土	husitun	141	胡希吞	602	土-吞	7	
74	18	成孫你	cengsuni	141	成蘇尼	602	孫-蘇	7	
75	18	太必扇	tabisan	141	塔畢山	603	太-塔	7	
76	19	亦車革	icengge	142	宣成格	603	車-成	7	
77	20	你哈	nikan	144	尼堪	603	哈-堪	7	
78	20	古兒馬虎	gulmahun	144	古勒瑪琿	603	虎-琿	7	
79	21	亦哈答	inggada	147	英阿達	604	亦-英	7	
80	15	本孫	bangsu	134	邦蘇	601	本-邦、 孫-蘇	5、7	

在表九〈《滿文原檔》中女真名稱的東北話語音特徵〉中，可以看出七種東北話語音特徵，《滿文原檔》的女真名稱就用到了其中的六種，關係相當密切，僅有特徵 3 沒有使用。特徵 3 是舌尖中音，鼻音 n 和邊音 l 的對應規律，例如「老人、惱人、連長、年長」混用的說話習慣，《滿文原檔》中從缺，可說略覺遺憾。

不過值得欣慰的是，順序 14 的「伍赤台 ucitai」，《滿文老檔》稱

之為「烏齊泰」，清楚說明後金天命朝的「赤 ci」，跟大清乾隆朝的「齊 ci」是同一回事，只是翻譯的角度不同而已。這個證據對於釐清「努爾哈齊」的漢字寫法「奴兒哈赤」，相當有幫助。可以讓人理解，後金天命朝的「赤 ci」字，也不過就是早年瀋陽話的一種方言的記音而已，蘇克蘇滸河畔的女真人，順流而下，遇到的不外是撫順人、瀋陽人，所學到的口音，活脫脫的都記錄到當時發明的滿文裡了，形成一種「印記」。至於所謂「用語醜化」，只能當作一種遐想看待。

以往有一種說法，常用來解釋這些滿文的語音現象，順便提出討論，以便參考。這種說法認為，滿文發展之初，純粹只在滿人生活圈裡活動，後來交往範圍擴大，與漢人的接觸越來越頻繁，出現了許多的借詞及專有名詞，原有的語音不敷所需，只好以老滿文來拼寫借詞，於是與漢語讀音相差極大：

隨著形勢的發展，滿族活動的範圍逐漸擴大，特別是與漢人的交往更加頻繁，接觸的新鮮事物越來越多，於是出現了更多的借詞以及人名、地名、官名等等專有名詞的拼寫問題。原有的語音已不夠用，又沒有增加新的語音，只好用老滿文來拼寫借詞。如：「罪 sui」、「椅子 ise」、「夫人 fujin」、「曹操 soosoo」、「涿州 sojo」、「章義站 jang isan」，這樣，就出現了以[s]代[ts]、[ts] '以[tʂ]代[z]等現象，使拼寫的借詞或人名地名等，與漢語讀音相差很大。由於習慣的原因，有些保留下來，後來仍然沿用，如[ise]（椅子）中的以[s]代[ts]。為了更好地解決借詞（主要是漢語借詞）出現的問題，達海「於十二字頭正字之外，增添新字」，這就是所說的十個「特定字母」。⁵⁶

這裡所說的「與漢語讀音相差極大」，無疑是以國語（普通話）當作標準，也就是以北京音來做衡量的，並未考慮蘇克蘇滸河的地理因素。後

⁵⁶ 季永海，劉景憲，屈六生編著，《滿語語法》，（北京市：民族出版社，1986[民75]，第一版），頁 15-16。「罪 sui」、「椅子 ise」、「夫人 fujin」、「曹操 soosoo」、「涿州 sojo」、「章義站 jang isan」等文字，原為表格，列有新老滿文及其發音，現為配合引述已將其略為簡化。

金起家的建州衛，距離瀋陽極近，那裏全是滿口講東北官話的「瀋陽銀」。⁵⁷如果把這段摘自《滿語語法》中的案例拿出來討論，可以看出，其中的詞彙明顯具有東北話語音特徵，像是「夫人 fujin」與特徵 2 有關，「罪 sui」、「椅子 ise」、「曹操 soosoo」、「涿州 sojo」、「章義站 jang isan」等都屬於特徵 4。即使在今日講滿語的錫伯族口中，還是能經常聽到類似的其他詞彙，如：「師傅 sefu」、「檔子 dangse」、「白菜 baise」等。⁵⁸因此所謂「原有的語音已不夠用」，無法表達「正確的」漢語讀音，需要製造出十個「特定字母」，以解決語音不夠用的問題。這套理論，與當年的實際情形，並不相符。

故而推測，這個借詞問題，並不能單純的從滿文字音、字母夠不夠方面考慮。因為很明顯的，「特定字母」不能用在常用借詞上，必然有其考量。推測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因為這些常用借詞，根本就是「東北話」的正常發音，以致無須更動。

由以上所研究的現象，還可以做進一步的探索。以往常有學者表示，東北地區所講語言，在明末清初時期，是以滿語為首的東北原生民族的民族語言。東北話的起源，是清朝末葉中原漢人闖關東時所形成的。其說法如下：

東北話的起源。與其他方言不同，東北話是近代才逐漸形成的方言，並非以某一小數民族語言為基礎，而是各種文化、方言的雜交產物。在中國明朝時期，東北地區為女真、金等少數民族國家的領土，這一時期並沒有東北話的概念。後滿清入關建立清朝，東北地區被清人封為“龍脈所在之地”，並不對外族人開放，東北地區所講語言仍是以滿語為首的東北原生民族的民族語。直到闖關東時，中原地區人大量湧入東北地區，東北地區的文化才正式和中原文化有真正的交流、融合，而東

⁵⁷ 「瀋陽銀」就是「瀋陽人」，瀋陽人說：「東北銀齊飯不坐旮旯（ㄍㄚ ㄉㄤ）嫌埋汰」，意思是「東北人吃飯不坐角落，嫌髒亂」。

⁵⁸ 羽田亨編，《滿和辭典》，（臺北市：學海書局，民 63[1974]，初版），頁 363、81、32。

北話也應運而生。⁵⁹

與此類似的講法，認為東北話「定型於清末民初時期。」理由是：當時國內外形勢產生變化，於是產生大量的人口流動，又因為人口流動，而帶來文化的交融與碰撞，東北方言於焉成形：

東北方言作為北方方言的次方言，是通行於黑龍江、吉林、遼寧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內蒙古東部地區的地方方言，定型於清末民初時期。這與國內外形勢變化及由此產生的人口流動密切相關，人口流動帶來文化的交融與碰撞是形成東北方言的外在原因。同時，東北方言也受到地域文化和社會文化的影響，展現著東北地區獨特的文化風貌。⁶⁰

以上這些說法顯然與東北曾經實施封禁有關。明朝末葉，大清興起，接著滿人從龍入關（1644 年）。滿人為保衛龍興之地，從順治年間修築「柳條邊」，直到清朝中葉以後，流民大量滲入，才被迫弛禁。⁶¹這段「柳條邊」經驗，就造成一種印象，清初時期，東北都是滿族居住，沒有什麼漢人。然而從前面分析過的表三到表九中資料顯示，《滿文原檔》〈寒字檔〉中一些漢字記音，如女真名字的「奴兒哈赤」，「赤」發音為「赤 ci」，以及「刀」代替「銀（兩）yan」，與滿文發音極為相似。可以大致推測，東北方言的特徵，早在明末清初時期就已經出現，決非定型於「清末民初時期」。

因此另外的說法，認為東北官話（東北方言）的淵源古老，出自「古代幽燕方言」，不是所謂的移民語言，大概這才是比較接近事實的理論：

東北官話是官話方言的一個分支。從歷時角度看，它承繼了古幽燕方言，同時又在人口遷移、民族交融等因素的推動下，融合了不同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成分。因此，東北官話與

⁵⁹ 王梓瑞，〈東北話探究〉，《文學教育(下)》，（武漢市：湖北省新聞出版局，華中師範大學編輯，2019 年 01 期），頁 91。

⁶⁰ 董苗苗，李光傑，〈從多元文化看東北方言的形成與發展〉，《長春師範大學學報》，（長春市：長春師範大學學報編輯，2019 年 09 期），頁 39。

⁶¹ 孫文良主編，《滿族大辭典》，（瀋陽市：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民 79]，第 1 版），頁 503。

遼寧地區的膠遼官話在源流上不盡相同，它並非移民方言，而是在古代幽燕方言的基礎上，受山東、河南、河北等漢語方言及東北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而漸次形成的，同時還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吸收了不少外語詞彙，是歷時與共時綜合作用的結果。⁶²

這套論述從長期歷時的角度觀察，當然較為符合歷史現實。加上《滿文原檔》裡，東北方言的「印記」，斑斑可考。甚至連清太祖努爾哈齊的漢字寫法「奴兒哈赤」，都是曾經受到東北話影響的證例，足以為東北話何時出現，留下寶貴的見證。

參、結語

本文從《滿文原檔》中，找出 80 個滿漢合璧的女真名稱，發現所謂七種現代東北話語音特徵中，這 80 個詞彙竟佔其中之六。由此可見，明朝女真人對漢語的認知，並非現代標準的北京腔，而是瀋陽地區的東北話。這項事實，對以下三種迷思，⁶³相信會產生一些啟迪作用：

第一種迷思，是「奴兒哈赤」一詞，是明朝朝廷對清太祖「nurhaci」的醜稱。其實稱「奴兒哈赤」或「努爾哈齊」都對，沒有哪種稱呼是醜稱或尊稱，只差在瀋陽城與北京城視角不同，「時、地」因素相異而已。「奴兒哈赤」的形成原因，出於當初當作標準的東北口音，實不宜以後來的北京語音來要求其「痛改前非」。

第二種迷思，是老滿文由於字母不足，以致拼寫出的借詞的發音怪異。其實老滿文的字母，用於記錄傳統的滿文借詞，如：「罪 sui」、「椅子 ise」、「夫人 fujin」、「師傅 sefu」、「檔子 dangse」、「白菜 baise」等，都是綽綽有餘的，相當充分。就連現代講滿語的錫伯族口中，還能經常聽到其說出這些詞彙。至於達海 (dahai, 1595–1632) 於

⁶² 歐陽國亮，〈東北官話的歷史源流芻議〉，《現代語文》，（曲阜市：曲阜師範大學編輯，2019年05期），頁 95。

⁶³ 「迷思」，為英語 *Myth* 的音譯，泛指人類無法以科學方法驗證的神話及幻想，常指「一種錯誤的觀念」。

十二字頭正字之外，增添新字，發明十個「特定字母」，該是另有他用，並不是用來解決這類問題的。

第三種迷思，是東北以前居民都是滿人，漢人流民闖進關東後才形成了東北話。闖關東固然盛行於清末民初時期，但是若以為清初時期，東北地區居住的都是滿人，沒什麼漢族，那就顯然不對了。翻開歷史，後金天命六年（1621），守衛瀋陽，戰死沙場的明朝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是漢人。天聰五年（1631），以諸生來歸，擔任後金啟心郎的羅繡錦，也是遼陽漢人。後金攻下的遼南七十多座城鎮堡寨，皆為明遼東漢族居住區域。因此《滿文原檔》中，存在著許多帶有方言鄉音的人名、用語，正是東北官話早已存在的「印記」，歷歷在目，值得珍視。加上清太祖努爾哈齊的漢字名稱「奴兒哈赤」，也都是曾受東北話影響的最佳案例，早已為東北話何時定型，留下了明確的見證。

（本文於 2019 年 12 月投稿，於 2020 年 3 月審查通過）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卅六）－哈尼族食 品「竹筒雞」

華 華

壹、前言

哈尼族是一個分佈於大陸西南邊區的少數民族。主要居住在雲南元江、¹瀾滄江之間，聚居於紅河、江城、墨江及新平、鎮沅等縣。境外區域也有哈尼族，常稱為阿卡族，²分布在泰國、緬甸、寮國、越南等國的北部山區，人數約有十萬。根據 2010 年大陸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中國境內的哈尼族總人口數為 1,660,932 人。

哈尼族講哈尼語，哈尼語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彝語支，同彝語、拉祜語、傈僳語比較接近。哈尼族、彝族、拉祜族、傈僳族本來就是古羌族的支脈，語言相似，也是理所當然。哈尼語還可以再細分為哈雅、碧卡、豪白等三個方言，由於彼此差別較大，相互溝通困難。這點在雲南一帶，相當正常。像是以往介紹過的怒族、景頗族等，都是如此。這些民族的各地方言，由於山高水深，阻隔太大，方言間差異明顯，互相不能通話。加上又沒有本民族的標準文字，相互間多藉著漢文溝通，勉強也算說得去。哈尼族本無文字，有些地方曾經以刻木、結繩記事，相當原始。1957 年，中共為其創立了一種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但是並未通行。後來雖有所改善，卻也不了了之，還是難以大展鴻圖。³

¹ 元江，又名紅河，元江是紅河在中國境內河段的名稱。紅河（越南語：Sông Hồng），為中國、越南跨境水系，也是越南北部最大河流，因河流多經過紅色沙頁岩地層，水呈紅色，故稱為「紅河」。

² 阿卡，認為含有貶義，因為傣族語言中「卡」或「佢」都是奴隸的意思。保有這類稱呼的少數民族還包括佤族，佤族中的一支以往常被稱為「佢佤」，因有獵人頭的習俗，所以又稱其為「野佢」。

³ 1981 年西雙版納州在中國科學院民族語言研究所協助下，重新以猛海縣格朗和哈尼族鄉蘇湖村丫口老寨的語言為標準音，對早期試行的哈尼文進行修改、補充和調整，制定了一套哈雅方言雅尼次方言的文字方案在西雙版納試行。西雙版納州主要語言是傣語，蘇湖村是說哈尼語的農村，其轄下有橄欖寨、大寨、金竹寨、魚塘

哈尼族先民為古羌族，在漢文史籍中，對哈尼族有「和夷」、「和蠻」、「和泥」、「離泥」、「倭泥」、「哈尼」、「幹泥」等多種稱呼。古代「和夷」即「和人」，是一種崇尚黑齒為美的民族。有學者認為，日本人及日本文化的起源與此有所牽連。既然有所謂的「和人」存在，就將日本人的「大和」民族，與哈尼族「牽拖」在一起了，⁴這實在是一個相當令人感到震撼的話題。就像日本前首相羽田孜（Hata Tsutomu，1935年－2017年）曾說，他們家族是秦朝徐福渡船到日本尋找長生不死藥的童男、童女後代，這種言論疑真似幻，暫時只能當作軼聞看待。不過「羽田 Hata」，日語發音為「哈達」，而「秦 Hata」的日語發音正巧也是「哈達」。羽田孜說他們家族直到二百多年前，還保留著徐福時代的老姓「秦 Hata」，大致有點來歷。後來因為家族衰敗，政治上轉為弱勢，才不得已改為「羽田 Hata」的。看來所言確有所本，不大像是吹噓，聽了讓人只能相信所述為真。

哈尼族人除了因為跟日本攀上親戚關係，而一夕爆紅之外。哈尼族的建築，以往就十分出名，值得一提。

哈尼族最初是居住在山洞的民族，常因離耕地較遠，生活上很不方便。在每天長途跋涉的困頓過程裡，他們觀察到蘑菇的造型，十分神往。因為發現到居住在蘑菇傘下的螞蟻，竟然不怕下雨，很是自在。於是哈尼族人參照著蘑菇的樣子，結束了長期「無殼蝸牛」的痛苦，修建起了自己的房子。

寨、丫口老寨、丫口新寨、半坡寨、石頭寨、小呼拉新寨、小呼拉老寨、大賀拉、南拉老寨、南拉新寨等 13 個村民小組。截止 2008 年底，有農戶 787 戶，全村人口 3,412 人。該村寨所處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共轄 3 個縣級行政區，包括 1 個縣級市、2 個縣，分別是景洪市、猛海縣、猛臘縣。景洪市哈尼族 7.03 萬人，猛海縣哈尼族 6.32 萬人，猛臘縣哈尼族 6.09 萬人，合計全西雙版納州有哈尼族 19.44 萬人。試行區域基本人數，就比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族人口的 80.86 萬人為少，加上距離紅河州約 300 公里，雖其哈尼文的語言同屬哈尼族哈雅方言區，但因行政區域不同，故據說試行成效仍欠理想，至今尚未正式使用。

⁴ 朱小豐，〈古和人與黑齒史跡初探〉，《社會科學研究》，（成都市：四川省社會科學院，2009 年第 5 期），頁 136。文中指出：和人作為一個迄今族源未知的遠古民族或部族集群，在中原民族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文獻中偶爾亦見，例如《尚書·禹貢》中記載雲：「蔡蒙旅平和夷砥績」。「夷」者，「人」也，遠古古彝語中，西戎及東夷部族集團之人大多稱夷。和夷即今語「和人」、「峨尼」、「哈尼」也。

其實哈尼族最初的房子也是當地傳統的「土掌房」，⁵不過因為居住的海拔、區域不同，為了適應多雨的天氣，哈尼族又在「土掌房」的基礎上，添加了厚厚的茅草屋頂，就形成了現在專屬於哈尼族的特色住房建築，一般人都稱其為「蘑菇房」。

蘑菇房通常有三層。底層用於飼養家畜和堆放雜物，圈養豬雞牛羊。中層是生活居住房，可將廚餘、剩飯直接往下倒，讓家禽、家畜充分利用其剩餘價值。頂層為儲藏糧食的糧倉，有避免鼠輩竊取的功效。蘑菇房頂層的茅草，有的剛剛枯黃，呈現鮮豔的黃色。有的枯萎已久，變成厚重的灰黑色。還有的甚至長出附生的小植物，變成一片綠油油的屋頂，甚是多彩多姿。哈尼族有自己的聚居區，一般三四十戶人家為一個村寨，取名則以村寨的特色為主，如：橄欖寨、大寨、金竹寨、魚塘寨等。村寨的房子配合地形而建，錯落有致，尤其是結合周邊的梯田景色，有如童話世界，十分美麗動人。

現在哈尼族為了前去遊覽的訪客方便，藉著「梯田申遺」的機會，⁶把房屋進行了大幅改造。許多民宿的「蘑菇房」，已經去掉了人畜混居、衛生堪憂的缺點，僅保留了原有特色的蘑菇房外觀，使屋子裡空間布置的更加寬敞實用與現代化，而普獲好評。

住在這麼有趣的「蘑菇房」裡，當然要品嘗一些哈尼族的美食，才算是不虛此行。

竹筒雞，是雲南哈尼族的傳統小吃。以前我們談過黎族的「竹筒飯」、白族的「瓦罐雞」，還沒有講過在竹筒裡面烤雞的吃法。而雲南的哈尼族，就是開創這種吃雞方式的急先鋒，竹筒雞因此聞名遐邇，頗具口碑，值得加以介紹。以下就談一談這種食品的製作方法。

貳、哈尼族食品「竹筒雞」

⁵ 土掌房，是雲南各民族喜愛的一種住房。這種房子是以泥土為料砌成牆體，修建的時候使用夾板固定，填土夯實逐層堆高後而形成土牆。屋頂為平頂，製作方式也與一般樓板極為相似，同時具備曬場的功能，可以晾曬農作物。土掌房是最古老的雲南傳統民居，大多建築在乾旱少雨的高寒山區和河谷地帶。

⁶ 第 37 屆世界遺產大會組委會於 2013 年 6 月 16 日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發佈會，正式公佈雲南紅河哈尼梯田成功入遺，被批准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中的文化遺產目錄。

製作竹筒雞，當然要先準備竹筒。可選生長一年的青竹一節，約長 50 公分、直徑 15 公分，一頭留節，一頭開口。雲南的各少數民族至今仍保留竹筒烹飪的傳統方法，這與滿山遍野種滿了翠竹有關。尤其是其中的麻竹，⁷桿高可達 20 至 30 公尺，直徑達 30 公分，節間可長至 60 公分，最適合選用。

再以土雞一隻，殺好以全雞形式備用。準備火腿片 100 克，乾冬菇五朵，玉蘭片 50 克。火腿片以金華火腿片為上選，現在市場上有許多洋式火腿片，千萬不要採用。洋式火腿片是夾麵包、生菜沙拉用的，那種火腿沒有經過長期發酵，鮮味強度不足。如果要燉煮中式菜肴，還是得用傳統的金華火腿，味道才夠。

另外乾冬菇也是取其鮮味。乾冬菇之所以鮮美，主要是由於其中含有蘑菇香精和鳥苷酸等成分，尤其是鳥苷酸，它的鮮味強度是普通味精的幾十倍，真是廚房聖品，不用可惜。這兩種成分只有在攝氏 25 至 35 度的環境下才「不會」被分解氧化掉。還有，泡發乾冬菇的時間不宜太長，僅須完全泡軟即可。尤其不要用過熱的水泡發冬菇，熱水會使冬菇中的揮發性物質損失殆盡，使香氣大大減少。泡發乾冬菇的水也不要倒掉，很多人在泡發乾冬菇後，會將泡過冬菇的水倒掉。這樣做其實相當浪費。因為乾冬菇在浸泡過程中，有些營養成分會溶於水中，比如水溶性的 B 群維生素，以及具有增強免疫力、抗腫瘤等功效的多糖類物質都會溶於水中。如果要解決倒掉冬菇水可惜的問題，其實只要把乾冬菇在浸泡前仔細清洗乾淨，除去泥沙、塵土，然後再加以浸泡，這樣的冬菇水就完全可以利用。可以用泡發冬菇的水和冬菇一起燉湯，這樣的湯汁會更加香濃，不需要額外放味精，味道也很鮮美，營養價值也高。

至於玉蘭片，就是用鮮嫩的冬筍或春筍，經過加工曬乾而成的製品，由於形狀和色澤很像玉蘭花的花瓣，故稱為「玉蘭片」。冬筍，在台灣可是一種稀罕的食品，連鮮吃都不夠，遑論曬乾？看來只能用一般的嫩筍乾代替了。

從以上幾味配料，火腿片、乾冬菇、玉蘭片等，就可以觀察出，雲南哈尼族的「舌尖」，有多麼的犀利，真是鮮料大集合，如果再放味精簡直

⁷ 麻竹學名：*Dendrocalamus latiflorus*，別名大綠竹、巨麻竹、巨竹、甜竹等。

就是毫無意義的畫蛇添足了。

接著將土雞內腔裝入蔥段、薑片、雞肝、雞肫、火腿片、乾冬菇、玉蘭片等，回復為全雞狀態，塞入竹筒。竹筒開口處用芭蕉葉塞緊，放在木炭文火上燒烤二小時左右，然後取掉芭蕉葉，乘熱倒入盤內，「竹筒雞」就算大工告成了。

「竹筒雞」是款待外來貴客時的第一上選。通常此菜一出，就是驚呼連連。因為竹筒的清香，土雞的肉香，結合炭火的焦香，香氣四溢，加上入口後口感特別香滑、細膩、鮮美，配合些許純釀米酒，總能使賓主盡歡，不醉不歸。⁸

參、結語

哈尼族以喜歡飲酒出名，以酒為節的活動特別多。例如祭母節、老人節、黃飯節、命名節、祭龍節、認舅節等，逢節便有美酒，因此當地人都會相互告誡，千萬不要隨便跟哈尼族比酒量。

哈尼族最有趣的酒宴是一種稱為「阿巴多」飲酒派對，外界稱之為「酒與歌的戀愛宴」。這與住在紅河邊上的哈尼族奕車支系的青年男女，習慣在「阿巴多」的場合，選擇自己中意的戀人有關。

通常一場「阿巴多」的籌備工作，全由哈尼少男打理。少男團體會在徵得足夠數量的少女應諾後，由男方出錢湊份子，請專業廚師「辦桌」。殺雞、煮肉、打酒、炒菜，進行各項準備。當然「竹筒雞」會是這次飲酒派對裡，不可或缺的一道主菜，這是不言而喻的啦。一般這類宴會在夜裡十點開席，時值亥時，是標準的夜宴。參加者約 10—30 人，會場燈火通明，允許群眾圍觀。一時人潮洶湧，十分熱鬧。桌上擺滿各式菜肴，由於多神和祖先崇拜，會先將煮熟的大公雞頭朝上擺上餐桌，並把兩個雞睾丸和一隻活螃蟹懸掛在雞身上，以取得神明的祝福。再由「帥哥頭」和「美女頭」從首席坐起，其餘男女依次配對入坐，隨後立即舉杯祝酒對歌。對歌的範圍，天文地理，無所不包，形同機智問答，是雙方的一場重大考驗。此外圍觀的群眾會在旁邊評頭論足，給予不同的評價，更使賽事緊張。一般對歌約三小時，盡興方散。這時男方會用芭蕉葉包上糯米饭和菜

⁸ 提醒各位酒後不開車，飲酒過量有礙健康。

餚送給心儀的姑娘，說是在回家的路上享用。如男女雙方情投意合，可藉機相約下次會面的時間地點，就不必再經過另一次「阿巴多」的考驗了。

根據學者的研究分析，「阿巴多」不能單純視為一般的飲酒派對。從活動的內容、意義及其對整個社會的影響來看，「阿巴多」頗具文化傳承的教育功能，讓青年人開始面對未來，是構建和鞏固整個奕車社會關係網絡的關鍵力量：

"阿巴多"是哈尼族奕車支系青年人的一種聚會交友活動。青年異性配對成雙，以酒會友，以歌達意，其目的卻並不僅僅在於交友或戀愛。從活動的內容、意義及其對整個社會的影響來看，"阿巴多"是一次培養青年人性觀念、生存理念和生活智慧的青春期教育。在這個過程當中，青年人不僅獲得了應對未來生活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技能，而且通過相互的交流和溝通，其本身成為構建和鞏固整個奕車社會關係網絡的關鍵力量。⁹

因此，有詩為證。

詩云：「哈尼酒宴阿巴多，帥哥美女全入夥，勁歌熱舞富哲理，傳承文化不蹉跎。」

⁹ 黃彩文，丁桂芳，〈哈尼族奕車人“阿巴多”酒宴與青春期教育〉，《思想戰線》，（昆明市：雲南大學，2011年 第1期），頁39。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
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
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
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05 巷 10 號 4 樓，劉學銚。
電話：(02) 2219-9314
0921-883325

